目　录

江泽民同志谈党史工作……（ 1 ）

党的早期活动

六十年前点滴回忆……傅玉符（ 7 ）
关于宋占一烈士被捕坐狱和就义前
后过程的一段回忆……张道一（ 9 ）
我在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三师范
的成长与革命活动……盛北光（ 15 ）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回忆资料

在鲁西北聊城革命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幼平（ 33 ）
难以忘怀的范筑先将军……郑校先（ 45 ）
抗日战争初期的聊城……田　兵（ 49 ）
对聊城抗日战争时期的几点回忆
……张清田（ 54 ）
在聊城工作的回忆……孟筱澎（ 62 ）
抗日战争时期的聊西北
——我的回忆及经历……柴　龙（ 66 ）

抗战烽火中锻炼出来的运东大队……胡潘生（ 80 ）
忆聊城抗日斗争片断……刘昭峰（ 89 ）
在聊堂和筑先县时期对敌斗争情况
的片断回忆……贾　强（ 99 ）
回忆筑先县（聊城）敌我斗争
情况片断……李桂臣（ 107 ）
抗日战火中我的一家……李善增（ 113 ）
关于日伪军抓我家属一事的回忆……谭启明（ 120 ）
我在聊阳和莘聊两个边区的
战斗生活……王　昆（ 122 ）
关于聊堂边区工委初创情况的补充
……刘　囍（ 135 ）
关于聊西办事处的活动简况……崔振武（ 142 ）
对聊堂县一区委——聊西北工委
——武训县七区委组织沿革
与活动情况的回忆
……苏毅　代洪光　柴龙　吴星　李纯礼（ 143 ）
李海、白堂战役轶事一则……张　炬（ 164 ）
坚持在敌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开展与敌斗争情况的回忆……李纯礼（ 168 ）
在聊城生活战斗的回忆……戴庚寅（ 173 ）
在筑先（聊城）城关区工作期间
的点滴回忆……陈伯三（ 190 ）
简忆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对敌
斗争……徐明魁（ 192 ）

冠堂地区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
情况回忆
……肖　平　许世平　李荫川　张绍迪
杨兆禄　李师魁　王庆功　穆其达（ 197）
发动群众开展借粮减息斗争
的情况……许世平　李荫川（ 205）
忆我在堂邑县工作的经历……刘　剑（ 210）
武训县抗日根据地建立始末……许世平（ 212）
对中共武训（堂邑）县委领导群众
渡过四三年大灾荒的回忆……黄国栋（ 217）
回忆堂邑“无人区”……杨香圃　魏长捷（ 220）
目不忍睹的灾荒年“无人区”……沈廷梅（ 225）
在武训县工作时况的回忆……曾广成（ 228）
解放前后的垢固镇自卫队……张云亭（ 230）
罗登殿反正起义情况的回忆……郎树林（ 235）
小王二大寨遇险记……马淑卿（ 242）
追捕栾省三、宋凤岐的简要经过
……刘桃元口述　黄国栋整理（ 245）
在聊阳县工作的片断回忆……李健民（ 250）
我在聊堂县任职期间的大事记……杨立功（ 254）
宋任穷同志在聊城……刘昭峰（ 262）
关于宋小屯、马楼村反霸斗争
情况的回忆……黄国栋（ 264）
对武训县土改复查中“反特事件”
的回忆……李玉轩（ 268）
在柳林整党情况的片断回忆……李玉轩（ 272）

支援新区 干部南下

对四八年聊城县干部随军南下的
片断回忆……李吉民　王万里（ 279）
从鲁西北到大西南
——原聊阳县干部随刘、邓大军
南下西进纪实
……张武云　杜竹林　柴　龙　王凤瑞
张芳苓　吴荣坦　袁瑞润　刘月卿（ 289）
回忆武训县动员南下干部的情况
——县长曾广成同志带近百名
干部南下……司洛路（ 315）
没有炊烟的行军……赵　畅（ 318）
随冀鲁豫南下支队南下情况
的回忆……高庆华（ 321）

党的统战工作

记忆中的父亲……刘觉民　代　流
丁甲　刘桐　王策　苏坡（ 331）

聊城、堂邑解放专辑

忆我军第一次围困聊城……吴　垦（ 343）

铁壁锁敌五百日，日出一朝焕光岳
——解放聊城综述……李笃才（ 346 ）
无人区里闹革命，三次攻克白雀城
——解放堂邑综述……李笃才（ 373 ）

报 摘 资 料

何思源图谋进攻解放区……（ 393 ）
聊城伪军出扰被歼近百……（ 395 ）
聊城人民要求解散城内伪军……（ 396 ）
水深火热的死城
——聊城居民呼唤救命……（ 397 ）
为民除害奋不顾身
——聊城解放之役官兵恐后争先
……吴　象（ 400 ）
聊城浩劫……田　兵（ 402 ）
用光辉胜利迎接新年　我军解放聊城……（ 404 ）
范筑先将军墓前……田　兵（ 405 ）
我军攻干部于聊城解放日　公祭民族
英雄范筑先……（ 412 ）
解放前后……吴　象（ 413 ）
九年痛苦一旦解除　傅家父老感谢我党
——傅斯年先生故乡访问……勇　进（ 415 ）
政府拨粮救济聊城难胞……（ 417 ）
筑先八、九、十三个区 诉苦清算分配土地
——李海村地主、赤贫均已消灭……（ 418 ）

筑先全县局面打开，十万农民反奸清算……（ 420）
筑先局面轰开了……郭少英谈　张苏记述（ 422）
筑先训练积极分子　斗倒城关奸霸地主……（ 427）
筑先群众　治河防灾……（ 429）
筑先七区挖“防空洞”中贫团结鼓励自报……（ 430）
扩大解放区，我军对敌展开夏季攻势
　打进堂邑城，逼走冠县敌……（ 432）
许家大楼强攻记……杨　杨（ 434）
堂邑东关伪军自卫团被歼灭……杨　杨（ 437）
分区部队再接再厉　堂邑全部解放
……辛　人（ 440）
堂邑战斗素描……张思曾（ 442）
火线上的慰劳……冯守愚（ 445）
堂邑战斗中武训进行火线慰劳……（ 447）
随军记
　——堂邑战斗通讯……　……阮贯之（ 449）
万余群众索还八年血债　武训四区
　摧毁奸霸统治……（ 452）
武训李大庄等村耐心说服群众，坚决
　补偿中农……马景汉（ 453）
武训农民齐换脑筋……（ 455）
武训某些村庄依照填补精神重新分配
　果实……（ 456）
武训村干响应党的号召自动退出多得
　果实……（ 457）
武训村干纷纷自退多得果实……（ 459）

警惕敌特不法地主组织暗杀组
暗杀我区村干部及人民……杨凤云（ 460）
武训深入运动进行翻身大检查……（ 462）
武训四区教育村干重新分配果实……（ 463）
武训各区深入检查解决悬案，纠正
脱离群众现象……（ 464）

读 者 校 正

对《聊城县党史资料》第一期《我党
和范筑先合作发动鲁西北抗战的
经过》一文的订正……耿荆山（ 469）
对“聊城市党史资料”第四期的更正……编者（ 471）

江泽民同志谈党史工作

江泽民同志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由《上海党史资料通迅》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全文登载。

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党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搞好党史工作，对进一步发扬光荣传统，搞好党的建设，搞好改革和四化，对当前的治理整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性，江泽民同志说：在当前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用生动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振奋精神，顾全大局，克服困难。中央最近又提出要克服党内腐败现象，保持清政廉洁，增强党的凝聚力，增加党在群众中的吸引力。党的历史上许多光荣传统，就是我们党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精神力量，我们可以利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如果不了解党的历史，不了解李大钊、邓仲夏、彭湃、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这些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的事迹，那么，我们的体会和理解是不可能很深的。特别是现在有些年青人，缺乏革命历史的知识，对当年帝国主义如何侵略压迫我们，顾正红

等一大批先烈是怎么被杀害的，过外白渡桥日本帝国主义的岗亭时要鞠躬、行礼等等都不了解，遇到有人歪曲历史，就容易上当受骗。就以较近的“文化大革命”来说，现在也有人为一些造反干将涂脂抹粉。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的确凿事实，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些涉及到党史内容的书，内容真真假假，观点是是非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很好的研究党史，不抓紧把研究成果编撰、出版，并让它发挥社会教育功能，那么象这一类的书籍就会充斥市场，就会影响党的形象；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关于党史工作的紧迫性，江泽民同志说：如果我们这一代当事人不把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好，以后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就会对中国的现代历史产生误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绩产生怀疑。现在确实就有一些青年已经上当了。用什么历史教育青年，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党史工作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说：要把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党史研究工作要实事求是，注意社会效益，以便发挥党史的教育功能和历史借鉴作用。党史研究应该走出书斋，和社会实践，和党的当前工作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使人们在党史工作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气息。这样，党史工作才会引起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党史研究的发展也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坚实群众基础，也就能够在整个党的建设中确立党史工作的应有地位，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把党史研

究中考证史实和发现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考证史实，又要研究和发现历发展的规律，使党史工作贴近生活，更具有生命力。要处理好民主革命时期同和平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关系。在继续搞好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党史工作者应当满腔热情地去完成这个时代 的 重任。

关于对党史工作者的要求，江泽民同志说：一是要加强史德方面的修养。修史要讲史德，重视史德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个好传统，这对党史工作者来说，更为重要。应该要求党史工作者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知识理论方面的修养。党史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提高党史工作的理论水平。三是提高业务工作能力，提倡自学和组织培训 相 结合，既要有计划地培训党史工作者，也要求党史工作者在工作岗位上多实践，在工作中提高自己。

注：此文摘自《中共党史通迅》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总第十七期。

党的早期活动

六十年前点滴回忆

傅玉傅

一九二五年，上海纱厂工人顾正红，不幸为日人厂主惨杀后，激起全国学生、工人、商人的愤怒，群起声援。消息传到聊城后，首先是学生起来了，他们结队游行演说宣传，那时，二中学生中聂子正和我成为行列中的带头人。聂子正和我是高小时的同班同学，进了二中后不是同班了，我们看到中国形势，想到今后应该怎么办。聂子正下决心奔赴广州进了黄浦军校第三期，经受了革命的教育培养。（那时，国共还没分开，黄浦军校的教务由周恩来主持，教官有邓演连、肖楚女等。）翌年，聂子正衔命回到聊城。那时山东在张宗昌的统治下，淫威荼毒，民命难保。进行唤发群众，组建组织极度困难，首先是找落脚地点，然后始能开展工作。我家在聊城北门里，较为冷僻，且我家在地方上颇有声望，一家人只有祖母和我二人，在我家住下来开展工作较为安全有利。故我家曾为东昌县委机关住址。

当时的学生思想，因受五卅惨案的影响，多数认识了中国的前途，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统治，中华民族的解放才有希望，实感再不能忍辱受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干革命。同时，也有一些同学还不忘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整日昏昏噩噩，不辩前途。三

师学生中因有"官卷子"吃，老夫子气很重。二中学生就较活跃。三师学生赵世廉、哈相越，那时先向我方靠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觉有可疑之处，为安全计，活动住地便暂迁至郭店屯，但没多时又感地方势力不可靠，再度迁回我家。

在那时，工作是不易开展的，但等稍有起色时，一些"尖脑壳"的硬是多方面往里钻，使工作陷入双重困难。虽然我方有王寅生、孙大安、赵以政等与聂子政共谋推进工作，为慎重之计，觉在我家目标较大，便迁入了赵以政家为集结地。以后又一次迁来我家。

时逾六十余年，我已八十有二了，记忆已衰，犹忆我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经聂子政介绍参加组织的，是单线联系，这年夏，我去济南进山东大学。一九三〇年一月，在北平清华大学工作并改名傅倩仪。革命之志未竟，脱党之讯已成以养亲而忘却，此恨绵绵！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于江苏省常州市

注：傅玉符即傅弼安、傅老九。

关于宋占一烈士被捕

坐狱和就义前后过程的一段回忆

张道一

一、坡里起义前夕，中共山东省委丁君羊和聂秉贞（聂子敬）等，均曾住在占一家布置策划起义事宜。

二、坡里起义失败后，占一烈士为了躲避敌人追查，速自跑到我家里隐蔽了四、五天。当时我父亲（张镇西）任堂邑礼节区区长（即张炉集区），可能起到一点暂时掩护作用。所以占一在心情上始终是安定的，乐观的。后来听到外边的空气不那么紧张了，于是便秘密地逃到聊城楼东福庆恒杂货店向俊如处（向是该店经理，又名向崇杰，和占一是盟友，交情至深），探听动静，另作活动。

三、坡里起义前夕，外地许多武装农民齐集在他家准备出发，正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占一对他胞兄魁一说："我是个喝了共产党迷魂汤的人，什么都不怕"。坡里起义失败后，魁一表兄曾将此话转述给我听，我时常寻思他这句话的深长含义，并默默用以形象他为人大智大勇的风格。

四、一九二八年春，大约是古历二、三月间一天的下午，占一以表兄的身份前往济南贡院墙根省立一中找我，略事寒暄，他接着说："我离家时很仓促，没有带行李，你

须借给我一床棉被来用，即是你没有闲被子，也要设法给我转借一床”。我随即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拿走了一床棉被。临别时他说：“我还没有一定的住址，以后有事我再来找你。”不久“五三惨案”发生了，我在日本攻城的炮火声中逃回老家。

五、“五三惨案”发生后，占一烈士仍潜伏在日军占领下的济南，从事地下活动，大约是同年的七、八月间，他从济南曾给我父亲寄来一封信，大意说：“我是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将为这番理想事业而奋斗终生，我这样说，这样做，我想并不辜负舅父对我教育的一片苦心（因为他求学时期，多得力于我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一切自会善自处理，不要挂念……。”

六、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占一烈士在济南被捕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我父亲耳朵里，他心乱如焚，焦急万状，随即去济探听情况，企图设法营救，迨到济后，方知本案已移交济南地方法院审理，随即出资延聘律师邢景白（又名邢先庚，原籍是莒邑梁水镇人，当时住济南西关竹杆巷执行律师业务）具状申辩，并为之出庭辩护。据我父亲说：他到济以后，本想以家属身分，要求接见占一；开始并未获准许，嗣依照法定程序，便改由律师先行接见，首先告诉占一是受你舅父的委托来出庭来为你辩护的。当时，占一并不以为然。经过几次开庭审讯，审理终结，判处死刑。据律师讲：一是由于占一党的职务重大；二是由于占一在法庭上态度强硬，从不低头，处处从道理上对抗法官，始终坚贞不屈，所以量刑最重。

七、在接到济南地方法院初审判决后，我父亲痛伤已极，

在此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决定再出资延聘律师，依照法定程序，申请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山东高等法院（五三惨案后，济南即被日军占领，占一被捕时，济南就归日军统治，当时山东党政军等机关均迁往泰安，省府主席是孙良诚，唯独司法机关仍在济未迁。直到一九二九年夏才接收济南，省府主席改由陈调元接充），这次出庭辩护人，仍是前任律师邢景白，经过多次申辩抗议，终于改处无期徒刑。这时，我父亲在心情上，虽然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总觉得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力不从心，仍不免仰天长叹！

八、在延聘律师营救占一烈士的过程中，最关心的是向俊如，他多次找我父亲，商讨设法营救，在正式宣判改处无期徒刑后，大约是一九二九年夏天，他还到济探监，面向占一慰问。舒连景对占一的被捕入狱也非常关怀，有一次他遇到我，开口就说："看见你，就想起魁甫来了。"（指占一的别号）言未毕，热泪夺眶而出。

九、一九三〇年秋，韩复榘主持鲁政，我父亲因案押解来济移交山东高等法院，为了营救我父亲，我也随同来济，约在古历十月间，我趁机便以表弟身份适自到第一监狱，申请看望表弟占一一次。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很森严、很凄凉的，隔着一个铁栏栅门，门外有两个人监视着，占一带着脚镣，光着头，穿着原来我用过的大棉袍，哗啦，哗啦的铁镣摩擦声，从远处直向铁门处走来，后边紧跟着一个武装法警，手提匣枪，大约离我还有七、八米左右，那法警向我大喝一声："你认识他吗？"我应声而答："认的，他是我的表哥"。占一烈士昂首而立，神情自若，只是面色苍白些，他好像还含着点笑容向我打招呼："你来啦兄弟"。我接着

说："我来啦，家里我姑娘她们都很好，你不要挂念！"我接着又说："你需要什么东西不？"他说："不需要什么，你们不要挂念我。"接着又说了句："外边我们的形势很紧吗？"我说："没什么，你舅正设法来营救你（其实这是句瞎话，因为这时我父亲正被押）。"话语方落，法警仿佛说了声时间到了，便扶着占一烈士回头就奔向监牢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含着激动的热泪，便离开了监狱。

十、对于本案延聘律师，设法营救，完全是我父亲由于甥舅骨肉关系，主动出面进行的，既不是受占一的要求，也不是受占一家庭的委托，其间一切负担和责任，都是他自己来承担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把一切的希望都完全寄托在律师身上，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渠道可寻。

十一、一九三〇年年终，我父亲本身讼案了结，乃于一九三一年春节后专程去济，一方面养病，另方面为占一烈士问题极度关怀，以便就近随时探问。但在思想上总认为业经正式法庭（指山东高等法院）宣判改处无期徒刑的定型案件，总不致再有任何改变了。所以再也未作任何活动。谁料万恶军阀韩复榘特意制造白色恐怖，竟而改变常规，突然组织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专门杀害共党人士，不管已到未判在押人员，一律处以极刑，怎不令人气愤填膺，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古历二月十七日），以占一为首的被处死刑的布告张贴在济南街头上了。报纸也以显著位置登出这个惊人的消息。（山东民国日报第一版，以头号字标题："红匪首领宋占一等×人，今晨一律执行枪决"）我父亲闻讯，心惊胆寒，几乎魂不附体，处于万分悲痛气愤之中，他老人家亲自前往刑场，抚尸痛哭，并就地备棺妥为掩埋，另于墓前

勒石为志。自占一被捕直至就义，我父亲费尽心机，毕竟终未能使占一烈士脱难。每一忆念及此，辄引为终身莫大遗憾。

十二、占一就义后，为顾虑其老母年高，深恐悲伤过度，始终隐瞒着她，未将实情转告，迨至一九三三年古历二月间将占一烈士之胞兄魁一，根据当时所立标志，将占一烈士遗骸运回原籍与其妻高氏合葬于祖茔。并对其老母谎称：病故于外地。

十三、占一从童年起，就经常住在我家，我俩既是表兄弟，后来又是同学（聊城模范小学），我到济上学后，也经常通信，我们之间的深切感情，此殊同胞手足。自从他加入共党组织后，他多次找我谈话让我进步。遗憾的是，我思想落后，终未能和他走向同一的道路。但我们私人之间久已存在的深情厚谊，并未曾丝毫冲淡。他的被捕，使我在精神上感受了极大的压力，但苦于自身缺少条件，无能为力，亦只有把营救的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及听到他就义的不幸消息，更使我悲痛万分，热泪直流。那时，我正在夏津任职，随即把记载他就义情况的那张报纸（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第一版）妥为收存，以为日后纪念。可惜经多年变乱，已经散失了。

十四、占一烈士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入狱至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就义，在这个漫长的阶段，除律师邢景白和其胞兄魁一及其盟友向俊如和我父亲并我个人曾到监狱做过探望外，再没听到别人探望过。据各接见的人回答，都异口同声的说："占一在狱，坦然自若。深怕别人为他分忧，从无半点怨伤表情。但自军法会审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可能预感到死期将要临头，所以，在狱中最后留有血书。

十五、解放后，聊城县长孙寒光，在西南乡的一次群众会上提到先烈宋占一的名字，其胞兄魁一这才邀同他本村的张矩作引导，到了聊城专署请求抚恤（原稿是我写的），政府当即将魁一派充为朱楼集交易员，以示优待。一九五一年，魁一向兰州大学给舒连景去了封信，要他将占一当年在三师的活动情况见告，嗣接复信，据称：他早已脱离组织，嘱向济南市委查考，旋接济南市委办公厅函复：声称当年山东红旗杂志对占一烈士之牺牲，有所记载。不久，魁一病故，政府认为占一的嫂子并非烈属之直系亲属，不得享受烈属待遇，嗣经向俊如之子向梅以占一烈士仁侄的名义向聊城政协提出请求和建议，以占一烈士牺牲之壮烈非同一般，应请破格照顾，故随又恢复其烈士资格。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舒连景以个人名义从兰州寄款二十元交向梅转交占一的嫂子作为救济的费用。这两件事我特地提出来，意在说明向俊如和舒连景两人对占一烈士家属的关怀，也籍以证实他们和占一当年情谊之深厚。

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于泰安

我在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三师范的成长与革命活动

盛北光

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三师范都在鲁西北——一座古城——东昌府。一九三四年改东昌为聊城，二中和三师亦分别更名为省立聊城中学和省立聊城师范。我青年时代就在这两所学校读书。由于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的黑暗和军伐连年混战，地主资产阶级的高利盘削，使得我尚可维持生计的家境逐渐败露破产。家庭的败落，生活的艰辛，社会政治的黑暗，使正值读中学的我深深感到了世态的炎凉，前途渺茫。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的高涨，新观念、新思想迅速在中国传播，社会变革的呼声日高。我很容易的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要求有了提高。不再象以往，只希望读完书找个事做，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满足了，而是渴望能变革当时沉闷的社会现状，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以，还在二中读书的时候，我就到处寻找共产党，想跟共产党闹革命。一九三二年秋，我考入了三师，并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所以说，聊城是我

革命的成长地，也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谈到我在二中、三师的革命活动，那时我的阶级觉悟并不高，懂得的革命道理也不多，我从我自身的经历中认识到，当时人剥削人，腐败黑暗的社会没有出路，没有前途。我参加革命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这还需要从我的幼年说起。

我原名盛广灿，号北光，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后，于壬子年正月初一，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熬盐场（村名），一个下中农家庭。父亲盛石全，少年读书无成就，为糊口、租地主土地八亩，合种三十亩砂碱地。但他不善经营农业，每年的收成除缴赋税地租，所剩无几，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因此，也兼做农家常用铁器小生意，由于社会凋敝，生意萧条，仍然入不敷出。加之连年兵患匪祸，水旱虫灾，农业欠收，常伴以野菜、豆渣、棉籽饼充饥，以维持生活并长年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至一九三一年生意倒闭，家业完全破产，土地，家产全无，除剩有几间房屋外，几乎成为赤贫。家境虽清贫，父亲却很热心农村教育，自愿捐出三间房屋办村学。我五岁时也送进村学，断断续续的读了十来年孔孟之书。学习之余，我经常帮父亲做些农活，学会了摇楼、撒种、扬场、碾磨、装车垛垛等农活，有时也跟父亲拉小车做生意。在劳动中我更多地了解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增长了社会知识。

一九二六年，暴发了阳谷县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围攻迷魂阵（地名）八里营地主乡绅的暴动，我跟随农民参加了暴动。一九二七年六月，又参加了全县农民围攻阳谷县城的大暴动。我感受到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这

年十一月我入第一小学插班读书，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到校后即参加了全校师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受到很大的锻炼。嗣年寒假距我家九里的坡里（地名）又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憾华北的农民武装起义。我和一要好的同学王桂亭到坡里想参加起义军，但反动军警把坡里层层包围，未能进入。一九二八年初，我在高小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阳谷县，一时感到形势大变，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了打神、拉庙等等的反封建活动。当时我十分信仰“三民主义”，尤其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十分欣赏，对孙中山先生创建和领导的国民党抱很大希望。可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抓、被杀，山东省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如昙花一现，烟消云散了。我跟着唱了一阵“打倒列强，除军伐”的歌，也喊了一阵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但不久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仍横行乡里，广大劳苦大众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山先生所谆谆倡导的“三民主义”如同海市蜃楼，渐渐消失。我对国民党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时我才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也只是在这时我认识到：真正能解放劳苦大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一九二八年之后我到处寻找共产党，决心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原因。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学校有六、七、八、九四个级别七个班（八班为二八年冬季招收的一个班，其余均为两个班），共有学生三百人。由于我考试成绩较优异，入校就被指定为班长。三个月后，即一九二九年

底，流窜于山东，河北一带的土匪刘桂堂（刘黑七）率匪部占领了东昌城，学校提前放假。次年，郭锡九任二中校长，郭热心教育，重视人才，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员，如国语教员雷雨田（据解放后了解雷系湖南人，农民暴动时父母被国民党杀害，雷是共产党员）、张衡等。教员中雷雨田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热心教学，善于引导启发教育，与学生相处融洽。雷、张二人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倡导男女平等和学生自治，倡导民主思想，学生管理学生事宜。但是，自治会的主席是校方指定的九级一班张××系国民党学生，与训育员冯俊武关系十分密切。自治会刚成立，冯、张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在自治会委员和各班长联席会议上企图挟制各班代表哄赶体育教员梁伯河（梁系无党派人士，进步教员）。我和其他同学看出他们哄赶梁先生的目的是想在学校安插他们的亲信，以控制学校，我发言表示反对他们的做法，并提出三点理由：一、梁先生为人正直，做事光明磊落，没看到他师德不好之处，二、梁先生体育技艺全面，如此体育教员难得，三、梁先生与同学关系好，关心学生，待同学同兄弟。我的意见得到大部分同学的赞同和支持，使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相反，由于我们识破并揭露了训育员冯俊武是兰衣社的特务。掀起了驱赶冯的风潮。冯跳墙逃跑，张××自知在校难以立足，也退学回家了。冯离校时，声言要在学生中抓共产党。其实当时二中学生中并没有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同学们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自发斗争而已。驱赶冯的斗争胜利，原自治会垮台，再重新改选自治会时，我被推选为自治会主席，委员有十级同学张武云，九级同学李旭

东等七、八人又组成了学生自治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接连的传来了丧权辱国失地要闻，沈阳丧失，辽宁沦陷，吉林被占，蒋介石命令不抵抗，东北军撤退入关，黑龙江马占山孤军不敌败退，东北大好河山沦陷，三千万同胞遭受烧杀抢掠，凌辱蹂躏等等。二中全校师生奔走相告，询问，到处可闻同学们的愤怒声，怨恨声，痛心呻吟声，学生无心读书，课堂空无一人，教员罢了教，群情激昂，校园里沸腾了！我们学生自治会决定各班分头上街，下乡，向民众宣告日寇已侵占我东北和日寇的野蛮罪行，唤起民众，抢救民族危亡。就在这时雷雨田先生和我商定以我们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召开了全校师生反日救亡誓师大会，以我们二中教室楼外面楼梯上作为讲台，我代表学生自治会首先讲了话，中心内容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东北大好河山被日寇侵占，我们的民族处于危亡关头，我们不能坐在课堂上等待当亡国奴。号召同学们团结走来，挽救民族的危亡，请愿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各班的代表都先后上台讲话表态，我们誓死不当亡国奴！雷雨田先生急步走到大会讲台上，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东北的大好河山，随着问道：“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能一枪不发的奉送给侵略者吗！”接着大声疾呼“同学们知道吗！我们的国土已被日寇侵占，我们的骨肉同胞正处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日寇在我东北丧失人性的野兽般的烧我房屋、掠我财物，杀我父兄，辱我姐妹，最后他高呼：同学们，试问我们甘愿当亡国奴，受人宰割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同学们群情激愤，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要请愿杀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会后，同学们拥到校长室外，强烈要求学校带领去南京请愿。校长郭锡九和教务处长出面劝说，一方面极力赞扬同学们爱国热情，同情同学们的要求；一方面表示劝阻说：抗日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学生应当用心读书，不可耽误学业等等。经过再三劝阻无效时，最后表示，学校的职责不能违背，不能违令带队请愿，同时，学校无钱作南京请愿的路费，如果同学们一定要去南京请愿你们自行去，自己解决路费问题，学校不阻拦就是了，希望同学们谅解学校的苦衷。当时，我们只看到依靠学校去请愿无望，没识破学校的阴谋，自治会便召开各县同学代表会议，决定向社会各界募捐路费分头去各县，一星期返回，再去南京请愿。当时我和李旭东、尹序贵、张书成、张福成去了阳谷，张武云等同学去了茌、博平，周乐亭等同学去了东阿，冠县、莘县、范县等县的同学代表也都分头去各县去募捐。不到一星期，我们返回东昌，我县募集了二百七十五元，其他同学都募到一、两百元，共募集到二千多块现大洋，我们很高兴，认为这下去南京的路费解决了。可是我们回到东昌，见二中学校大门紧闭，同学们和老师都不见了！校工告诉我们说，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学校就提前放假，食堂停伙，要学生和教师离开学校了。后来才知道，不仅是二中，三师也提前放假了。据说是山东省教育厅下令全省学校提前放假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学校和政府当局是一致的，我们那时爱国积极分子离校去募捐，是受骗上当了！由此使我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同时更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教中国。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那时我和尹序贵、朱保明三人一起商量找共产党的事，并约定在三师前期师范读

书的申景玮（申云浦）也在三师找共产党组织。当时我们分析，根据雷雨田先生的言行，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员。便打定主意等开学后一定请他介绍我们参加共产党。一九三二年春，开学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雷雨田先生。但是他因共产党嫌疑被学校辞退，谁也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我在二中毕业，和朱保明一起考入三师八级读书、尹序贵落榜，回家教书去了。到三师后，我和朱保明、申景玮就商量找共产党的事，我们三人本来就视如兄弟，约定分头找共产党，要一起参加不得隐瞒。恰巧三师党组织就在这时成立了，刘书林（刘子蔚）同志任书记，桑良扬任组织委员，孙芳茜任宣传委员。朱保明和孙芳茜都在八级一班读书，通过孙的介绍，朱于三二年九月底参加了党组织，二十天过后，朱通知我说党组织批准我参加了。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同时又不满意朱的问："为什么不一起参加组织？还有申弟（云浦）呢？"朱讲："组织不同意集体入党，要一个一个地参加"。不久，党组织也批准申景玮同志参加了。根据党的决定，我们主要搞工人运动。我分工负责做城内西南角一个推水工人的工作。因推水工人不多，我便到北门一带做掏粪工人的工作。我们从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入手，组织工人罢工。三二年冬（寒假）返乡发动组织农民和盐民活动的革命，为了发动群众革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党总支部决定在三三年春开学后，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张贴标语活动，分校内、大街和二中、三师附属小学四路，组织了四个组。我和朱保明、孙芳茜负责贴大街为一个组，王连级同志等负责贴三师附小一个组，成卷的标语都是校外同志先写好的用破袜子装浆糊，我们乘下晚自习，到熄灯三十分钟时间内，出了学校后面东便门，

孙在前面望风，我在中间拿着袜子刷浆糊，朱保明同志在后边张贴标语，从傅家宅，荣光兴旅部门口贴到南大街，又由鼓楼（古楼）东大街返回鼓楼西县衙门。不到二十分钟我们贴完就返回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睡了觉。标语都是用红、黄、绿纸写的“打倒国民党”、反对“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下面署名为C、P，很醒目显眼。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同学们议论纷纷，轰动了，说学校贴满了共产党的标语，有的说全城都贴满了，已震动了全城。我心里乐滋滋的，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打听在那里有标语。因为贴在三师校院的标语比较多，当天上午，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旅部的人都来到学校，说三师有共产党，把各班级同学试卷翻出来查对笔迹，自然无结果。学校怕负责任，说三师学生夜晚出不了校院，提出不能排除外来的共产党人在对学校搞活动。此后，三师校外每晚有部队巡逻，实行了戒严。

一九三三年六月，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省委和山东的党遭到破坏。三师党组织通知，要全体党员提高警惕，应付突然事变，要把所有党内同志的来往信件和党内的内部刊物、证件统统收藏好或销毁。学校已放暑假，我把保存的几份党刊《前哨》和几本进步书籍带回家隐藏在牛棚的墙缝里。当时白色恐怖下意志薄弱的人动摇了，并发现有个别人自首叛变。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三师开学后，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学校前大门有人把守，后便门紧闭，每到夜晚校园周围就有军队的巡逻队。学校加紧了对学生的思想行动控制，训育员胥子君如同一只饿狗昼夜不停地到处嗅寻食物一样，探索寻找他

们的政治猎物、校内一些国民党兰衣社分子和反动地主子弟，也表现出趾高气扬，扬扬得意的样子，由于他们抓不到我党内同志活动的真凭实据，经常在同志中窥视、刺探、侧击思想进步同学和我党政治面目有些暴露的同志。党支部这时布置党内积极活动的骨干同志：一、要严加警惕，时刻准备发生突然事件，如发现特异情况，可离开学校暂避；二、为了保存力量，巩固组织，行动要十分严密，同志们尽量暂时少接触，对已经红的同志可暂不接触；三、在同志们接触时，如发现有的党员异常，可回避。对已消极停业了活动的党员，要甩掉使其脱离党的联系。

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遭破坏，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了特务活动，利用我党内败类叛党分子，配合韩复榘的侦缉队，在全省施行了大逮捕、大屠杀，党的组织都失掉相互联系，只看到报纸上刊载，今天×地共党被捕，明天×地共党人员落网。一个时期内，几乎每天都有八号十一号汽车（刑车）尖叫着，载着我党的同志和思想进步的群众，残杀在济南千佛山下。全省乌云密布，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三师党的活动和全省同样处于革命低潮，这种恶劣局面，一直到一九三五年才逐渐有了些缓和。在当时形势下，我一方面由于交不出一九三四年的入校学杂费，难以续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为了向其他地地区和农村开展党的组织活动，另开党的基地，建立党的据点，党组织确定我三四年休学一年，离开三师去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任教为掩护，建立了党组织，开展起了党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暑期，聊师（这时已改为省立聊城师范）七级班毕业，刘书林等同志离开学校，把党的工作交给了八级

陈景文、九级申景玮等同志负责，这时期学校的政治空气虽然很恶劣，校图书馆成了党内同志的主要活动场地，同志们除了自己加紧钻研马列书籍外，注意时事研究，帮助培养思想进步同学，没有停止过党的革命活动，正因为如此，申景玮同志政治面目有暴露，引起校当局怀疑，他们抓不到共产党的证据，便利用放寒假时期，向家长发函以辞退（退学）的名义，开除了申的学籍。

三五年春，我休学期满，返回三师复学，钱杰东同志见到我如久别重逢的亲兄弟，抱着我的胳膊说：大哥，（在三师同学们都这样称呼我）你可回来了！赶快把支部建立起来吧！”看他激动而又焦急的样子，我很受感动，连声答应：“好、好”。我和王连级同志交换意见后，决定由我、王连级、钱杰东三人组成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党的中心支部，他二人推我任书记，王连级任组织委员，钱杰东任宣传委员。支部建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审查党员的情况。对长期不找党组织联系，不参加党的活动的党员，以后党不再和他们发生联系。同时要做好脱党者的善后工作，对和党保持联系的党员，要加强组织教育工作，以巩固纯洁党的组织；二是接受过去的教训，党的组织要绝对保秘，党员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实行单线联系；三是研究下一步工作活动，鉴于革命仍处于低潮，要在同学中做政治思想发动工作，从思想认识上培养发展党员，同时要注意活动方式、方法，要灵活，利用合法身份活动，党员可以和有社会上层家庭的同学处好关系，以掩护自己。在首次会议上审查并批准了杨绪铭同志入党，研究了学校图书管理员耿荆山误入托派、现仍积极要求参加组织的情况。半个月后，支部

第二次会议批准了宋宝印（即宋秋潭）同志入党；审查耿荆山同志确系误入托派，决定吸收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就在这时，山东省共产党的大叛徒宋鸣时由临清来到聊城，声称是专程来破获聊城师范共产党组织，抓捕聊师共产党员的。当时同学中凡爱读进步书籍，对实事政治不满，爱发牢骚的同学都很紧张，不知那些特务分子是如何追查和抓捕共产党？不知把红帽子戴到谁的头上？我们党支部也立即召开会议，布置每个党员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并研究讨论了被捕后的“三部曲”。“三部曲”是：一、被捕后，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不论敌人实行什么酷刑和骗术，决不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如有叛徒指认或有其它证据，确已无法否认，就光明正大的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学习季米特洛夫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讲演、辩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救国救民主张进行法庭斗争，反审判变被告为原告，争取法庭旁听者的同情；三、法场杀头时，要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卖国害民的国民党”、“打倒贪污腐败的黑暗政府”等口号，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那时耿荆山同志已为聊师教务员，聊师的校务会他都参加，我们布置耿了解学校当局的动态，随时通报消息。据我们当时了解，叛徒宋鸣时和聊城县国民党党部的人三次到聊师调查，开会研究共产党组织活动情况，但他们均未能查出与肯定哪个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们入党时向党委报的都是假名字，宋鸣时查对学生名册也没有查出一个共产党员的真名子。最后校长孙芳时等以“过去三师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可能是已毕业离校的六级、七级学生所为”而搪塞过去。宋鸣时宣告失败，只好灰溜溜地离开聊城。

一阵乌云过去，天气晴朗，我们反而顿感安全了。四、

五月间，在一次党支部会议上研究倡议学术辩论会，以此在同学中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会上确定了两个辩论题目，一题是"国家政权是否为人民利益的"，另一题是"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计划先辩第一题，下一次再辩第二题。为了便于展开辩论，需要先取得合法化。我和钱杰东同志到教务处请示了教务长魏孝三，说同学们为了学习得深刻，想开展学术辩论会，是否可以？教务长听到同学们自己想开学术辩论会，十分高兴，满口称赞说："好：这个方法好"。于是我们的辩论会就这样取得了合法化，也有了教务长的旨意，我们便向九级的同学号召，说教务处要我们开辩论会，请同学们踊跃参加。当时被提名选上参加辩论小组这个的感到荣耀，没有被选参加辩论小组的都想听听辩论的内容，看看胜败的结果如何。我和王连级同志分编为一、二两个组。他属九级一班，我属二班，自然形成了两个班的辩论会。为掩护自己的身份，我组除了要发展的党员对象周乐亭参加我的辩论小组外，我们各自在本班提名选了两名地主家庭出身读书的平庸同学作搭配。我们商定，王连级同志组为正统组，主张国家政权是为人民利益的，我们第二组是反对派；我们暗中规定，正统组只能辩失败，不得取胜。在各自准备辩论材料时，我感到惆怅：如果辩论展开，我势必思想面目大暴露，必然会引起校方注意，正在发愁时，钱杰东同志提出"找训育员胥子君去"。一句话提醒了我，找靠山，取得合法化。于是我跑到训育处，喊了声胥老师，请你帮助我。胥见我很尊敬他，于是又倒茶又让坐。我说："我们班开学术辩论会，同学们让我站在反对的一面，我没有这方面的词，怎么办。"胥随即连声说："这好办，好办"，提笔写了

《国家与革命》等几本书的纸条，嘱我到图书馆去借。我心里高兴的想，这样就有了依据和证据，如有人说我宣传共产党的言论是共产党，我就可以说这是国民党代表，训育员胥子君指教我的。

辩论会在九级二班大教室展开了，两个班的同学合在一个教室坐，并欢迎号召其他班级的同学来参观，室内挤了个水泄不通。会议一天一次，开半天，辩论了两天后不分胜败。这时各个教室里、寝室里、饭厅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展开辩论，到处议论纷纷，全校轰动了！一些国民党员及反动家庭出身，思想落后受不了了，接二连三地找校长孙芳时，学校开了紧急会议，教务处懊悔失误，无话讲，训育处有苦难言不吭气，于是决定发个通知“辩论会立即停止，以后不准召开了辩论会了事”。辩论会以后，党支部会议研究了个意见，我和钱杰东同志作为学生代表，向教务处提了一个建议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农村来的，将要到农村去教书，听说教务处的耿（荆山）先生对农村问题很有研究，能否请耿先生给我们讲一课！教务处主任听到建议后很高兴，表示很满意的说：“这个建议很好，我们研究一下，与耿先生商量再定。”于是耿荆山同志每周给每班上一堂“中国农村问题”课，主要讲农村革命问题。教材由我们支部帮他准备，耿增加新水四十元，拿出五元作党费，购买进步书刊、小报，供同志们阅读，一功三得。

由于我党支部有计划地开展了政治思想革命活动，加之宣传我党领导的胶东武装革命起义和冀南农民革命暴动的影响，聊师同学中革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但校方也加紧了对同学们的控制、利用三五年放暑假之机，以辞退学习的方式

开除了王连级同志的学籍。入党较早的八级班的同志，暑期毕业离校，郭清云同志病逝，老同志减少了。这时除了耿荆山同志作为特别党员单线联系，李飞同志刚插班来聊师外，我和钱杰东、宋秋潭、扬绪铭、耿玮、任汝舟等同志都在自己周 围 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在我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各班级都办起了《思想论坛》、《学术研究园 地 》、《文学艺术》等墙报（墙报名称可能记的不准），同学们的政治思想非常活跃。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面对同学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们以响应和支持平、津同学们发起救亡运动为号召，支部决定组织同学们上街示威游行，以鼓舞斗志，准备成立聊师学生救国会，进一步冲击反动当局对学生思想的禁锢。为了防止学校当局的阻止和破坏，我们秘密串联，通知了各班的同学，于星期天在城南大堤上集会，然后上街游行。为壮大声威，我们还串联了二中的部分同学参加。但是有人向学校当局告密，星期天早上，我们和几个积极分子，提前到了南大堤，等了很久不见同学们来，后来才知道，是学校校长闻讯后召集教务主任，训育员，把守学校大门，不准同学们上街。因而将大部分学生阻止在校内。有的同学从学校的后墙跳出来通知我们说，“学校被封锁，同学们也不能外出，就这样游行流产了。游行被破坏、我们就在校内联络活动，各班级同学召开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会。这时学校当局十分惊慌，他们同时组织了一小撮反动学生和校腿子暗中破坏，但是，他们的劝说和恫吓，抑制不住同学们的反帝热情，就在这时，学校宣布提前放假，停止伙食，不准同学们留在校内吃、住，并

声称这是省教育厅的命令，同学们难以坚持，陆续离开学校。

这时我们党支部召开了会议，会上都认为没有上级党的领导，与外省、市党又无联系，这样孤军作战是困难的，必须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鉴于当时山东省委还没有恢复重建，于是决定由我和钱杰东同志去山东濮县古云集找河北党组织。一九三六年一月间，我二人骑自行车冒着纷飞的大雪，经一天急行军到了古云集找到小学教员魏伯海和事务员张介夫（也可能是王世希，记不太准），但他们二人都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他们介绍我们去找陈楼小学的张承一。张提出要我们写个详细报告，再去一次，帮我们找党组织。后来不约而同的意愿，赵健民同志去了濮县和河北党取得了联系。北方局指定黎玉同志到山东恢复了省委党的组织，和聊师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

一九三六年春开学后，同学们为了应付压头的全省毕业大会考，都在埋头复习三年的课程，我们党支部正在研究反对会考之际，四月间，韩复榘通过山东省教育厅命令全省所有应届师范毕业生集中去济宁梁漱溟办的乡村建设训练处受训。聊师的党员中有我、钱杰东，宋秋潭、杨绪铭等同志去济宁受训。临走之前把聊师党的工作交给了李飞同志负责。

一九八九年五月于贵阳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回忆资料

在鲁西北聊城革命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幼平

（一），我原是红一方面军干部。长征结束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被调到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新建部，周恩来副主席兼部长）。一九三六年初夏，周副主席派遣我到白区活动，任务是观察形势，创造立足条件而后回部受领具体指示。我从瓦窑堡出发，经宁夏、绥远转到山东，暂在济南《平民日报》社以临时工作为掩护。“七七事变”后，我托人去南京给周恩来同志送工作报告并请示今后行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领导人叶剑英同志接见了我的送信人，并托转三点口头指示：（1）王就在山东创建抗战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部队要严格遵照红军的建军原则；（2）王不必主动找山东党，中央将通知山东党找他；（3）要注意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避免同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并让送信人给我带来一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在送信人尚未回到济南时，我在济南麟祥南街铭新里一个姓贾的律师家里巧遇红军战友洪裕良（后来知道贾家是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我和贾家有朋友关系），我们突然相逢都十分惊

呀。交谈后知道他是被派来山东工作的。洪裕良当时已改名洪涛，他是江西戈阳人，曾在红十军（方志敏部）当过团长，一九三三年到中央苏区学习，我们在瑞金相识。

洪涛同志向山东党汇报了我的情况，一天他带我到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公署、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驻济南办事处，有个自称叫赵伊平的，说受组织委托同我谈话。赵说："山东党已知道你是红军干部，在组织关系未正式转到前，不知你是否愿与山东省先发生工作关系？组织上想让你去聊城范筑先部（聊城政训处）工作"。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几天后，在该处处长牛连文的安排下，我同洪涛一起乘长途汽车到了聊城，到达聊城后才认识同车人中的张霖之，赵健民。时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出发。聊城政训处（全称"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后改称政治部（分配我为驻范县干事，少校军衔。在各驻县干事领导下有二十左右的上尉服务员，大都是从济南政训班分配来的平津学生和少数从当地吸收的青年学生。干事月薪五十元，服务员二十五元，两个月后聊政实行革命化，不分官兵一律十三元五。赵伊坪同志不久也到聊城。聊政的主要领导人：处长张维翰，副处长姚弟鸿，秘书长赵伊坪，组织科长张霖之、宣传科长邵子南等。司令部里有两名高级参议：张郁光、齐燕铭。

（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霖之同志以中共山东省委代表名义通知我，说我的组织关系已有中央转到；组织上决定我为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在此之前，我和山东党没有发生组织关系。鲁西北特委书记是徐运北，组织部长王晋亭，宣传部长申云浦（？），统战部长赵伊坪。据说前任特委书记是赵健民，我参加特委时他已在六支队工

作。张霖之作为省委代表领导鲁西北特委。一九三八年三月，我任军事部长兼任十支队政治部主任。十支队领导机关驻冠县。

（三）关于十支队。洪涛同志到聊城分配到堂邑。他在堂邑搞了个小部队，开始只十多人，队员有李福尧、陈中民、刘昌、张浑等，人称之洪队。一九三七年底洪涛被调到泰安东徂徕山区任四支队长（一九三八年病逝）。廖云山继任队长（四川人，红四方面军干部），人们叫它廖队。一九三八年初，在洪——廖队基础上成立十支队。支队司令是张维翰同志，张同范是同村又是亲戚，关系很深。在民族抗日高潮中部队发展很快，到三八年七月左右十支队发展到八千人，辖三个团，另有三个远遣队，即大峰山独立营（营长曹洪盛，红军干部）、东平地区的东进梯队（领导人陈伯衡、刘星）、内黄地区的南进梯队（领导人冯惊涛、熊义伍）。十支队从开始即按红军榜样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在内部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聊城陷落，范筑先殉国后，十支队改称筑先纵队。一九四〇年六月，筑先纵队和八路军先遣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这个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含在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内，全国胜利后一部分转到海军，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师的老根也是八旅。四十年代整风期间，冀、鲁、豫地区的军区政治机关都确认参加十支队与参加八路军同样计算军龄。

（四）一九三八年夏——秋，是鲁西北抗日武装发展到高峰也是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的时期。在范筑先司令建制下有三十四个支队，大支队有的约万人（如王来贤的一路军），有些小支队只数百人，共约十万人。鲁西北武装控制的地

区，东跨黄河，西跨卫河，北临津浦路，南界大名以北至鄄城一线。曾在濮（县）鄄（城）地区和高（唐）齐（河）长（青）地区打过多次战斗。作为鲁西北敌后根据地中心的聊城也处最盛时期，开办了军事教导团，政治干部学校，前者由袁仲贤、胡超伦等负责（袁、胡在一九三八年春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任范司令员的高级参谋），后者由张郁光、齐燕铭等主持。还出版了《抗日战报》，朱穆之、莫循、刘子毅、鲁西良等都在该报社工作过。整个抗日工作搞得很活跃。与友邻地区如冀南的东进纵队，泰西的张伯华自卫团联系都很密切；范司令还曾亲到威县会见过徐向前同志。

鲁西北各支队大体上分以下几类：（1）由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保安部队所编成的，如王金祥的二支队；（2）由国民党的溃散部队所编成的，如齐子修的三支队，刘耀亭的二十一支队；（3）由鲁西北的股匪所编成的，如石洪典的五支队，韩春合的六支队以及冯寿彭、吉占鳌、王来贤、王金甲的部队等，（4）由地方民团编成的，如吴作滫的七支队等；（5）我党利用统战关系，请范先生委任我党同志或开明人士当支队司令组建的部队，如十一支队（牛连文）、十二支队（傅亚平）、十三支队（冀炳南）、三十四支队（管大同）等，（6），我党创建的十支队。范对改变收编部队，特别对收编土匪饶有传奇性，抗战初期鲁西北不少地区有土匪，会道门流窜或盘踞，著名“杆子”有“硬盖子”、“西北风”、“冯二皮”、“张大脚”等等，由于这些土匪头子在全民抗日高潮、又都敬佩范先生的凛然大义，往往经过疏通劝说盏茶杯酒，就先后被收编了（“硬盖子”即石

洪典、“西北风”即韩春合）。更典型的是收编十九支队。一九三八年春节后的一天，布永言匪部袭占了阳谷城，县长徐茂理、县大队长赵晓舟等分别率县政府，县大队从东门和北门撤出城外反包围了阳谷城进行围攻，在第三天，范筑先亲率二十几个卫士骑着自行车从聊城直奔阳谷北门下戟，指着城头上正在射击的匪兵大喝：“我是范司令！我找布永言！”匪兵竟吓的抱头而窜，一会，布永言出现在城楼上，范筑先怒不可遏，痛斥他在国难当头，不打日本，当土匪，害黎民百姓，简直不齿于人类。骂得布永言垂头恭立，连声“听司令指挥！”范说：“好！委你为十九支队司令，限三天内开拔去濮县打日寇。这就是十九支队成立的经过。关于鲁西北各支队的评价是，在它接受范司令的委任前，按其本来面目是什么部队就是什么部队；接受委任编为支队后，一律称为抗日部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陷落，范司令殉国后，各支队则按其变化归宿而定，有的成了八路军，有的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队伍，有的投敌当了汉奸部队，有的重操土匪旧业，有的溃散了。回顾这一段历史，感到主要是我们改造这些部队的主观力量不够和缺少应有的时间。中共鲁西北特委当时不公开（所有党组织党员都是秘密的），聊政实际是特委公开工作机关，党员很少，有的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也不得不派非党同志担任，党支部也成立不起来。有些支队长官阳奉阴违，表面上接受政治部领导，实际上想方设法限制政工人员活动。特委军事部的力量很小，总共只有十余人；在机关里工作的二、三人；一个联络站，负责各支队党员党组织接头的，一个保卫组，负责侦察敌特国特活动的，共六人，设在古楼（鼓楼）南街距楼约二百米路西一个商店

里，伪装修车铺；另有四、五个干事专跑支队做建党工作；只此而已。没等我们打下点应有的基础，鲁西北形势即发生突变，憾未能争取更多部队到革命营垒中来。

（五），鲁西北大好形势的同时，也是国民党顽固势力和我党与进步力量磨擦最利害的时期。顽固派是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兼二支队司令王金祥为头子，司令部为中心，第二第三支队等为支柱，国民党山东主席沈鸿烈为后台的。这帮人对特委领导的聊城政治部与进步力量十分仇恨，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策动某些支队抗拒聊政领导，甚至对政工人员进行人身攻击。

举两个严重事件的例子：（1）卫队营事件——范筑先的卫队营里有十个共产党员，为首的叫孙临盘（？），冠县人，因不甘受营长的压迫，几次要求把队伍拉到十支队来，都受到组织的批评和制止。一九三八年六月底，这些同志竟违犯组织纪律，拉了一个多连跑到卫河边上，要求归入十支队。张维翰仗着他与范情同叔侄，答应容纳他们。范为此震怒，勒令张把人枪归还（我怕这些党员受到极刑，让他们“开了小差”）。王金祥们利用这一事件，大肆攻击聊政和十支队，并极力挑拨范和我党的关系，说什么“共产党背信弃义，不够朋友”，“挖墙角竟挖了范司令的卫队营”等等。聊政在反动派叫嚣中撤了我的十支队政治部主任职务，以图缓和反动派的攻击（正确处理实应向范说明实情，阐明我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诚意，并揭露王金祥的阴谋才是）。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离开十支队，专职军事部，公开名义是聊城政治部秘书。（2）十三支队事件。十三支队是我党友人和同志在鄄城地区发展的一支队伍，司令冀炳南（开明士

绅，后加入共产党），副司令王青云（中共党员）；政治部主任汪毅（中共党员，抗大学生），参谋长胡铁军（王青云的朋友）。一九三八年八月，该支队突然遭受二支队，二十一支队的袭击。部队溃散一部，王青云、汪毅当场牺牲。大概在九月间，聊政领导人邀请范先生来部队作了次恳谈，姚弟鸿、张霖之、赵伊坪等婉转批评范对王金祥是姑息养奸，担忧将来会吃亏！还指出范对依靠进步力量不够坚决。范对王金祥的问题默未表态；对后一条意见表示不同意，屈指点出他委任的县长徐茂理、吕世隆、管大同、周子明；、张舒礼等，以明心迹。在我发言时，范笑着提到卫队营事件，我向他陈述了实情，并强调保证十支队既是可靠的抗战力量，也是他的可靠卫队。

（六），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津浦线日军西犯，在东阿横渡黄河的消息传到了聊城，除部队加固城防工事，市面上基本上是镇定的。傍晚侦报李海务附近发现敌踪，特委决定袁仲贤等布置教导团，政干校等单位的撤退，叫我安排特委机关的转移。晚饭后，张霖之，姚弟鸿、赵伊坪等和高参们望见范筑先，范还在拈须批阅文件，张、姚等劝范撤出城外迎战，范表示决心守城；张姚再三力陈当前形势、力量对比和利害得失，强调应以游击战为主的意义。范终不为动，表示决心已定；并命令张、姚等和政治部等非战斗人员都出城。他还说已派王金祥出城调集部队策应。在此情况下，特委机关和学校，报社等单位在午夜先后撤出聊城，集结点指定在桑阿镇西南，冠县东南靠近沙区的一些村庄，前进道路经堂邑城南。

十五日晨，我们几位领导人率约二十名干部从东门撤出

（其他门均堵塞），日已出升，隐约听到聊城东南方向的机关枪声。因范尚在城内，大家心头沉重，绕到城西大堤上停下来计议一番，决让郁光、弟鸿返回再次奉劝，如范仍坚持，二同志就陪伴到底。而后我等西行，穿过堂邑城时已过午，晚宿营时听到了聊城失守、范司令阵亡的噩耗。张、姚已同时牺牲，料不到西堤一别竟成永诀！有些援聊部队半途折回。王金祥缩在聊城西南地区拥兵观望，哪有什么"策应"！在三、四天后，我们听了了解城内情况的王从化同志的汇报。王从化（田兵）是黎玉同志三八年十月路过聊城时留下的干部，政治部派他给范当秘书，日寇攻占聊城后，他化装乞丐在北门里呆了二、三天后混出城内。

（七），聊城失守使鲁西北一时呈现混乱。国顽策动莘县武装叛乱枪杀县长吕世隆同志，并占据了县城；西北方面有几个支队投降临清敌人，当了皇协军；王来贤部在临西又当了土匪；国民党山东省府加委王金祥为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控制了东南一隅。从聊城撤出的特委及各单位靠近十支队暂在冠、馆（陶）地区跨卫河驻扎。十一月下旬，按特委指示组织了一个临时纵队（代号二纵队，由十支队一个团，一个营和在临南活动的八路军七七一团的一个营组成），由袁仲贤和我指挥打过莘县未奏功。在此次战斗后，鲁西北特委最急迫的是拟定今后斗争方案，为了便于行动，首先精简机构，介绍了一些同志分别去冀南、太行和延安（齐燕铭同志等就是这时走的）；结束了教导团、政干校，一部分学生分配到支队，一部分遣散回家发动群众的工作；报纸也停刊了。

一九三八年底，太行总部遵中央指示，决定在鲁西北

成立八路军先遣纵队(先纵)。先纵成立的背景是：我党为照顾与范筑先的统战关系，从未在鲁西北打出八路军的旗号，现范已不在，鲁西北暂处群龙无首十分混乱之际，我党应及时公开以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收拾局面，发展抗战形势。一九三九年新年前夕，先纵司，政机关在冠县成立，司令员李聚奎，我为政治部主任，机关干部主要是从十支队和鲁西北特委抽调的。少数是李司令员由一二九师带来的。先纵初成立时本身无部队，下属指挥单位（1）津浦支队，属一一五师系统。在冀鲁边发展的武装，支队司令孙继先；（2）青年纵队第三团（代号“成安”），是冀南军区的部队，团长李继孔，副团长刘昌义，政委刘长胜；（3）一二九师骑兵团，是红军时期部队，团长汪家道，政委廖冠贤、都活动在济南、平原、聊城三角地区。先纵司政机关因在冠县整编第二团未能及时东上与上述部队会合，先纵二团是由鲁西北五支队所编成，团长是石洪典的部下荆维德（不久病故），副团长王长年，政委盛北光，政治处主任孙洪（孙锡恩）。先纵成立后，鲁西北党也由特委改成区党委而公开了，书记张霖之，组织部长赵博，朱则民，赵伊坪等都是区党委成员。十支队改称筑先纵队，在新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在卫河一线配合陈赓所属部三八六旅的临西作战。先、筑两纵的领导人都是区党委委员，而先纵与区党委的关系是野战军与地方党的关系。

（八）一九三九年三月初，先纵领导机关率二团由冠北出发东进，准备在茌（平）北与活动在茌、博、高、禹、齐地区的三部队会师。鲁西北区党委随行。部队是夜行军。正月十五日（阳历三月五日）拂晓进驻琉璃寺，刚宿营，日军

闪击到北寨门，我军立即凭寨墙以火力把敌人压在寨墙内外；随即听到琉璃寺东、东北、北、西北方向十数里内各村庄的枪炮声响成一片。敌情显然是济南和津浦线之敌合击这一地区，而先纵恰巧撞上，属遭迂战性质。司令部一方面指挥守寨战斗，一方面派遣多方联络参谋和侦察兵，数小时后与津浦支队、青纵三团、骑兵团取上联络，都在进行着激烈战斗；侦得西面无敌情，西南三十里驻有十支队七团，南面无敌情，东南仅发现少数敌军斥候。战斗进行到下午四时左右，司令部估计敌情将无大变化（因冬季天短快近黄昏），命令作战股长赵晓舟率领纵队直属部队中的非战斗单位及区党委机关先撤退，撤到琉璃寺正南十里一个村（小赵庄）吃饭休息准备夜行军；战斗部队坚持到七时，发动一次佯攻后也撤到该村会合；李司令员和我随战斗部队行动。不意赵晓舟同志带领的后方人员部队在中途遭到敌人从东面的突然侧击，部队溃散，有些同志不幸牺牲，赵伊平同志是其中之一，先纵政治部总务科长秦保三同志也在此牺牲。战斗部队按预定计划撤到集结村时，溃散人员尚未全收容起来（有些同志跑到七团，几天后才归队）。先纵部队撤出琉璃寺战斗后，当夜进至杜郎集、旦镇地区，正月十六日夜渡黄河进入大峰山。数日后，先纵遵太行总部命令，着津浦支队东过津浦路归还山东纵队建制后，率骑兵团、青纵三团、先纵二团经东平、梁山、濮阳地区井店，由宜沟车站过平汉路开进太行黎城地区整军。至一节受到刘伯承师长的检阅。

一九三九年初，一一五师的二杨——杨得志、杨勇率部由山东津浦分别进入湖西、东平地区，开发冀鲁豫（小冀鲁豫时期）和鲁西。鲁西北区党委自琉璃寺战斗后即与先纵分

手，成为鲁西区党委的组成部分（我未亲身经历，不了解详情）。

一九三九年九月，先纵从太行返回鲁西北（青纵三团归还冀南建制）、活动于冠、馆、莘、朝地区，并在茌、博地区成立第五大队，领导人赵晓舟、李光斗。先纵离太行时，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指示，先遣纵队与筑先纵队的关系，对外是友军关系，对内是领导关系（筑纵受先纵领导）。一九四〇年六月，两纵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全部开过卫河进入冀南三分区。我个人也结束了在鲁西北工作的一段经历。

最后谈谈战略地区分界线问题。七七事变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先后在十月、十一月分别开进五台山区和太行山区，前者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者开创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自一九三八年初，两师分别开始向东发展，一一五师开创了冀中，冀鲁边向山东前进，一二九师向冀南平原发展。这时中央军委对两师活动地区曾原则划分：山东全省范围归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可活动在黄河以北。鲁西北地区既属于山东，又处于黄河以北，这种划分，随着形势的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就出现了问题，如对筑先纵队则出现了两面领导的现象：先纵自太行返回鲁西北后，与地方党和政府在工作配合即产生矛盾（因先纵归一二九师建制，而地方党、政府归山东领导），一九四〇年六月，先、筑两纵编入八旅退出山东就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

于莫斯科

注：此稿抄录王幼平同志于一九七八年九月，自莫斯科邮寄给聊城县委档案组的有关他在鲁西北工作的回忆资料。

难以忘怀的范筑先将军

郑校先

在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学习工作和战斗的日子里，我曾一度常出入在范筑先将军的公馆里。我常看到范将军与我们党的同志磋商研讨问题，我多次亲耳听到范将军的教诲。范将军的抗战业绩和威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他那高大清瘦的身影，满脸细长而威武的胡须，刚毅而慈祥的笑容，仍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正直无私，忠诚爱国，坚决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大胆接受和任用我党的干部，虚心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思想和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朴素而诚实的作风，勇猛而刚正的精神，更使我难以忘怀。

范筑先将军早年当过冯玉祥西北军的旅长，一九三六年初任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当时，他虽是一个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但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我们党一直重视团结范将军的工作。早在一九三七年，周恩来同志派彭雪枫同志去山东开展统战工作时，就明确指出，要争取范筑先接受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同志也曾在一九三八年亲自写信给范将军，进行统战工作。我们党还派了大批干部和从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天津、北京等高等学府的青年知识分子到聊城，帮助范将军开展抗日工作。如：张维翰，张霖之、赵健民、张郁光、姚弟鸿、徐运北、袁仲贤、何方等许多同志，都在范将军的部

队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在鲁西北的抗日县政府中，我党不少干部担任政训员，有十多名党员先后被任命为抗日县长。我们党还在抗日政府和部队中发展了“中华民族革命青年先锋队”组织，并公开挂牌开展工作。范筑先将军对我党给予他真心诚意地支持和帮助，是十分感激的。他曾亲笔写信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派人到武汉与党中央在武汉的领导人联系，并在一九三八年初，就把自己的长子、长女和三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以表示他坚决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决心。他曾接受鲁西北特委的建议，亲自到威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部与徐向前同志会谈，参观了八路军部队，听了政治工作经验和八路军战术的介绍，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和经验。他回到聊城后兴奋地谈到，当今之世，要救中国，要想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有二十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大大超出了第六专区的管辖范围。范将军的部队也扩编到三十五个支队，六万多人，对外号称十万。我记得三八年春天，范将军曾从前线押送了一批俘虏的日本人和缴获的军用物资，在聊城游行示威。鼓舞和增强了干部群众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聊城地区成为当时山东抗日的楷模。范将军也被誉为驰名华北的“抗战老人”。

范将军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他对儿女要求是很严的。他常常教育和鼓励儿女们要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身。范将军的第一支队，本来是准备以我们挺进大队和一部分党的干部及进步青年为基础来组建的，而且准备让他在抗大学习的大儿子学习回来后，当第一支队的支队司令。记得一九三八年春节后的一天，范将军的二儿子范树民带着我们挺进队十名队干部和两名马夫，骑马赶到濮县前线找范将军，要求成

立一支队。范将军和蔼地对我们说："不要着急，先好好学习抗日的道理和本领。学习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今后还有很多事要干，仗是有打的，抗日救国的重任要靠你们青年人来承担"。后来，范树民同志英勇牺牲了，范将军仍镇定的鼓励挺进大队的队员们继续战斗，并又叫他们二女儿范树昆继任挺进大队长。他劝慰其夫人武治国说："树民为国牺牲，是咱范家的光荣。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呢？"范将军还在当时的《抗战日报》上发表的答谢各方写信发电慰问的启事中说："为国捐躯，系属军人光荣，承各方慰问，弥深感激，马革裹尸，男儿应俱素愿，既获疆场殉国，死后何憾！"深深表达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崇高精神。我到延安抗大学习后，范将军的长子、长女和三女儿曾找我，了解当时鲁西北抗战形势和范树民牺牲的情况，我都如实地一一介绍给他们。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与范将军合作抗战十分仇恨和不安，他们派遣特务，散布谣言，进行各种破坏。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曾软硬兼施向范将军施加压力，并收卖范将军的参谋长王金祥和一批顽固分子从内部捣乱。甚至借助著名的亲日分子李树椿的势力，认贼作父去勾结日本人，谋害范将军。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旬，他们采取调虎离山计，造成聊城防守空虚，让日寇的快速部队乘机直抵聊城近郊。本来范将军已接受我党建议，准备撤出聊城，运用八路军的战术围歼敌人，但王金祥、李树椿内外勾结，泄露军事机密，故意找范将军谈话，用缓兵之计和激将手段，造成战机延误，聊城被破。十一月十五日，范筑先将军为国殉难，终年五十八岁。消息传开后，许多地方都隆重集会追悼

这位抗战老人。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撰书挽联，延安《解放》周刊发表时评，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范将军的极大尊敬和深切怀念。

范将军殉国后，鲁西北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范将军的部队分成三派，一派是我党直接领导的以第十支队为骨干的抗日进步力量，成立了筑先纵队，后改为一二九师新八旅。二是以第三支队司令齐子修为首的投降派。三是沈鸿烈、王金祥（他是范将军的参谋长兼二支队司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我党与范将军团结合作建成的抗战大好局面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八五年，我借出差机会，亲自到河北邯郸市，瞻仰晋冀鲁豫革命烈士墓。其中我仔细看了范筑先老人、范树民同志和武治国老夫人的墓。前面是范筑先将军，后面是范老太太和范树民，我在那里站了很久才离开。

一九八七年十月

抗日战争初期的聊城

田　兵

大约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我跟随八路军山东纵队来到范筑先和中共鲁西特委驻地聊城。

聊城，当时是敌后进步的城市，延安所有的抗日歌曲，都有渠道流传到聊城。这是因为旧政府当时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赤心耿耿的和我们党合作，其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都是仿照我们八路军。当时以徐运北为首的鲁西特委固然全力以赴的做范的工作，上级党委还派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代表省委常住聊城（后又成为冀鲁豫省委的代表），具体领导对范的统战工作和鲁西党的工作。（一年来建立和收编了三十五个抗日支队，另外还有三路民军估计有六万人），号称十万铁军，守住了三十二县的大块国土。因此，我们党很重视这支力量。各支队都派了政治部主任，团里还设有政治处。徐向前同志也亲自做范的工作，范也把长子、长女、三女派到延安学习，以表示抗日的决心和接受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也亲笔给范筑先写信。我们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张经武和政委黎玉同志，又带了一封毛主席给范的亲笔信。范不仅列队欢迎我们，还欢宴我们。并开了联欢会，范和我们政委、司令都在会上讲了话。这是八路军第一次经过聊城。因有毛主席的信，范当面向张、黎要干部，我就是以山东纵队司令部的名义，派给范筑先将军当秘书的。由于我是临沂人，范在

临沂当过县长，范对此有某些乡情感，因此对我如同家人。要我和他一个办公室，一桌吃饭。办公室的后门出去就是内宅，他的二小姐抗日挺进队长范树昆，经常找我谈些挺进队的事，有外人在时，喊我“王秘书”，无外人时就喊我“大哥”。他们一家人，只有一个心——抗战。二小姐的弟弟范树民，原为挺进队长。未婚夫何芳，原为挺进队参谋长。打济南时，他们在齐河坡赵庄被日寇包围，拚刺刀战死。二小姐又被任为挺进队长，是决心跟日寇拚到底。范老太太是个家庭妇女，可是她把范当官以来历年积蓄的私房钱，拿出来给十支队买机枪，建立机枪营。这个十支队司令员是张维翰（彭雪峰介绍的党员），是我们共产党人完全掌握的军队。

我当时的组织关系在特委（对外，就是范的总政治部），具体领导我的是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因为是给范当秘书，领导上很重视这个工作，所以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秘书长赵伊坪、政治部副主任姚弟鸿、王幼平等同志都跟我谈了话。主要是介绍范筑先司令部的政治情况。大意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同范摩擦，收买他的部下；参谋长王金祥就可能被收买了，王曾借濮县顽固县长被杀之事，枪杀了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汪毅同志（中共党员），此冤尚未申。范是“良心抗战”，只知一心抗日，没有阶级观点，满眼尽好人。需要叫范知道，他身边的坏人。范也向我介绍了司令部的情况，大意谓政治部都是热血青年，是真心抗日的。参谋处，大都是老腐败，有些是为了升官发财。他几乎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一样，好像早就知道以王金祥为首的参谋处，跟他不一心。但尚不知道王金祥想害他。

以黎玉、张经武、江华为首的山东纵队部队，休息了三、四

天，就离开聊城，到鲁南——我的家乡去了。我就成了离群的鸟，留在了聊城司令部，以后长期在冀鲁豫区工作，经过了抗日年代和自卫战争年代。尝尽了十二年黄河两岸的风风雨雨。

……

我自觉得工作顺利，上下谐和的时候，忽然大难临头了。我所谓“大难”实指一种不合规律的“殊遇”，是当时完全想不到、料不到的。在这种“大难”中又活出来，也是完全想不到料不到到的。真象是吉人天佑一样。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当我们调来几个支队在聊城附近集训，正准备纪念聊城抗战一周年的时候，突然得悉敌人大“扫荡”（这可能就是武汉失守后敌人回师华北），十一月十二日说敌人在东阿艾山有渡河模样，范派二支队（主力）前去迎击。范此时已接受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在军事会议上说：战争胜负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决定本人退出聊城，由司法科长刘佩之任城防司令，聊城县长郑佐恒任副司令。当天晚上敲锣，要老百姓外逃，并决定坚壁清野。命令所有的非战斗人员如报社、政治部、学校等于十二、十三两天全部撤完。司令部是最后一批。范的家属撤完后，我和范准备出城，不知是点什么事罗嗦了一会，天就明了。正在上马之际，迎头来了国民党山东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由于他表面上是范的上级，范必须下马招待他，给他谈情况，并留他吃饭，待送走他时，已是午后近四时了。这时虽然敌人已逼近聊城。但我们应当急急出走才是对的。那知第一路军守聊城的王来贤部，王来贤祭祖未回，参谋长率三千多兵，给鬼子一交火就撤退了，且没有退进城来，而沿着护城堤朝北撤了！在这种危机之时，参谋长王金祥忽然请命，要求出城

把部队截回来，接范司令出城。范稍一犹豫就同意了。这就铸成了大错，参谋长走后，敌人就围城了。当时王来贤部有三千人，二支队（王金祥是司令）从东阿回来有两千人，加上受训的支队有一万人，敌人只有一个联队。如果参谋长真来接我们，显然是个胜仗，可是他拥兵不救，悲剧就发生了。当时城内未撤出的党政军老弱约有七百人，带枪的不过四百人，能打的枪不过三百支，对日寇上千精锐，当然难以决胜。何况十四日下午四、五点时，已经没有了弹药，有的机枪已打坏，敌人已开始爬城了。这一夜到夜十二时，范司令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还电告十支队司令张维翰，要他注意防御河（卫河）监视小滩（金滩）的敌人。电告三支队齐子修撤出高唐，当时齐正在高唐和敌人巷战。十二时以后，电话被敌切断了，敌人又爬城，范到东门亲自督战，此时司令部才觉得问题严重了。当时护城河水深且阔，只有望救兵一条路了。此时大家已忍不住，姚弟鸿同志说："总司令！王金祥早已把我们卖啦！救兵是不会来的了"。原手枪营长路子恒也说："我的总司令啊！王金祥靠不住啦！你良心抗战感动不了他，不冲陪着你死。……"这时范悲痛地说："我老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都是年青有为的人，救国靠你们青年！冲，我怕不安全。你们想想，聊城四面环水，水深一两丈，只有四门可通，敌人用机枪封住出口，能冲得出去吗？我想他们退到一个相当的地点，敌人的枪口掉一掉，我们就可安全冲出去的。"范司令此话令人泪下，大家只有倾心的听有无救兵的枪声。

本拟夹攻灭敌兵
省官谈机围聊城

可怜多少忧国士
不识奸人阴谋情

大家七言八语的天就明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敌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爬上东城，范司令臂上受伤，至此拚杀开始，搏斗终日；至下午四时左右，城完全陷落。城中近七百人，九死一生者不过百人，我是其中之一。多蒙聊城东北隅卖花生兼卖大粪的席常临兄救了我。化装为席的弟弟隐蔽了一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黎明，从敌人打坏的北门钻出去。过了北门桥时，听城楼上唔的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三、四个鬼子站在城楼上，正向护城堤外远方的什么目标瞄准，有一个鬼子向我摆手，我扭头就跑，听了背后响了一枪，我已跑过可以遮人的护城堤，至此便完全脱险了。范筑先将军，姚弟鸿同志，张郁光同志以下六百余人殉国。范本意是退出聊城，留少量人在城里，内外夹击敌人，打个漂亮仗的，万无料到由于李树椿的耽误军机，王金祥的拥兵不救，一句话，由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于抗战势力的破坏，使我六百多抗日志士英勇殉国了。

外堤仗有一万兵
大意失机当时情
拥兵不援本是计
致使英雄殉聊城

注：此文摘录曾任范筑先的秘书田兵同志的《革命与写作》。标题是编者所加。

对聊城抗日战争时期的几点回忆

张清田

一、沈鸿烈被轰下了政干校的讲台

正当鲁西地区在范筑先将军领导下，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斗争的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来到聊城视察。他秉承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旨意，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思想，于一九三八年秋天的一天上午，在他的护兵、参谋随从下，由政干校的校长范筑先和张郁光的陪同，来到政干校。令政干校全体师生紧急集合听他的训话。学校的礼堂里很快挤满师生，不少人因去晚没有坐位。开始，校长简单地介绍了几句，然后，欢迎沈主席训话，同学们礼貌地鼓了掌，以示欢迎。大家都在认真听，有的还拿着小本在记录。他的讲话不到十分钟，就大放厥词了，他挥着手臂高声叫喊着："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国民党。一个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一个政府，中央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听到这里，师生们激怒了，顿时乱了起来；跺脚声，口号声，鼓

掌声，说话声，混在一起，乱作一团，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对这位沈主席的讲话，再也不愿听了。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持续的时间，比他讲话的时间还长；尽管范筑先将军和张光郁都先后在台上站起身来，用双手比划着让大家停下来继续听讲话，但愤怒的师生，好像都没看到似的继续鼓掌、跺脚、喊叫，只到这位不受欢迎的沈主席掏出他的手帕揩着他头上的汗水灰溜溜的走下讲台来的时候，才算平静下来。沈鸿烈刚走出礼堂，大会就宣布散会了，同学们都高兴的议论着说："对反动的顽固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我们胜利了"。

二、手榴弹

为庆祝南浔铁路大胜利举行提灯游行大会，政干校教务处布置学生扎灯笼参加游行。个人扎，二、三个人合伙扎都可以，我被班里指定和董兰秀（女）合扎一个，我们俩是班里年龄较小的，看到年龄大些的同学，有的扎转灯，有的扎鱼灯，还有小型龙灯，飞机式的灯，这些灯用红红绿绿的纸糊起来，好看得很。我和董兰秀很羡慕他们，但不会扎，可是作为学校里布置的一项任务，又必须得完成。当有的同学已扎好送到校部时，我们俩还没动手，不知扎什么好，着急得快要哭了。急中生智，我提议说："咱俩扎一个大手榴弹吧！又简单，又好扎，三个大圈组成弹头，三个小圈组成一个手榴弹把，上面糊上黄纸，下面糊上黑纸就行了。"董兰秀同学笑着说："那人家不笑话我们吗"？我说："别的咱俩都不会，不要怕别人笑我们，咱俩都不说是什么；要保

密。”我们统一了思想之后，就动起手来，很快完成了一个大手榴弹的制做任务。糊好了纸放在那里有一人高。有的同学问我们扎的什么灯，我俩光笑不作回答。当要去校部送的时候，董兰秀同学说：“太难看了，你一个人拿去算了。”最后达成协议，我拿着，她跟在后边，硬着头皮送到校部了。当我们一进校部，教育长齐燕铭看到了，他好奇地走过来问我：“同学，你们这是扎的个什么呀？”：我回答说：“我们俩都不会扎别的，扎了个大手榴弹。”教育长爽朗的笑了起来，连声夸奖我们俩个扎得好，有意义，并说游行时要把这个大手榴弹放在最前边。最后，他笑着建议我们，最好在手榴弹上贴上一个纸条，条上写上手榴弹三个字，我们照办了。由于我们的作品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从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

三、陈庄征粮

陈庄是敌人据点通往城里公路旁边的一个小村子，敌人经常在这里路过，伪乡公所的助理员陈安兰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我向群众打听清楚后，出其不意的闯进陈安兰的家里，时值中午，他们一家正在吃饭，“你找谁？”陈安兰抬头望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继续吃着饭。

“我找你！我是八路军县政府派来征抗日救国公粮的”，陈安兰“噢”了一声，恐慌的站了起来，一家人停止了吃饭，气氛有些紧张。

我说“不用害怕，只我一个人来的。”陈安兰定了定神说，“请坐吧”。

坐下后，我开门见山的对他说："现在你立功的机会到了，一是派人给敌人送信，叫敌人把我抓起来，你在日本人那里可以立一功，也能得到赏钱；一是协助我们把你村上的公粮征起来为抗日作点贡献，在抗日政府这边立一功"。陈当即表示拥护抗日，保证在三天之内把救国粮征起来，送到指定的地点，并要我先离开陈庄，免出危险。我当时看透了他的心理，怕我在他家一旦出了问题，八路军抗日政府会找他算帐的。我说："你三天也好，四天也好，什么时候完成征粮任务，我什么时候走，我就住在你家里等着"。陈安兰着慌了，说了声："我马上办"。这时，他一方面派人到村头放哨，如敌人来了马上回来报告，一方面把村上办公的人叫来，我交待了征粮的合理负担政策，每人平均一亩地以下的免征，一亩地以上的才计征，如不按政策去办，今后查出来，是要追究责任的。具体办事的人都作了保证，算好每户应负担的公粮之后，造册登记，粮食分户保存，只需要写一个保管粮食的单据就行了，把存粮单据交来就算完成了征粮任务（今后以各户的存粮单据向各户要粮）。

陈安兰给我安排了丰富的晚饭，炒了四个菜，还准备了酒，我拒绝了饮酒，吃饭时，他的小老婆在旁搧扇子也被我制止了。饭后，我向陈进行了形势教育。总的意思是不要做死心塌地的汉奸，我的话他还是认真用心的听着，而且，一再表示他立功赎罪的决心。就这样，不到半夜时间，就把陈庄的征粮任务完成了，这时我满意地带着征粮存粮的手续离开了陈庄。

四、给伪乡长上了一课

深秋时节，我住在据点北边的杨庙村杨金岭同志家。一天下午，我俩正在他门外场院里散步，猛抬头看到三个骑车子的人从据点方向来了，为首的一人穿着大褂，戴着礼帽，挂着短枪；后边的两个人，身上也斜背着步枪。我说："这是据点的敌人？"杨金岭同志说："是伪乡长路云修回家路过这里。清田同志，你当一回特派员给他上一课"！没等我回答，伪乡长骑着车子已经来到我们跟前了。杨金岭同志扭过身子，向伪乡长招呼："路乡长，你回家看看呀"？路云修和他的两个乡兵都下了车子，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我说："特派员，这就是你昨天问起的路乡长"。路云修摘下礼帽，向我行了一个脱帽礼。金岭同志又向路云修介绍说，"特派员昨天刚来，是来调查了解在敌伪方面干事的人员表现情况的。昨天我们已经向特派员简单的回报了一下，走吧，到我家坐吧。"路云修对他的两个护兵说："你们在这里等一会，我进去坐坐就走"，两个伪乡兵乖乖的在外边等着。金岭同志把我和路云修带到他的南屋里，我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叫伪乡长也坐下，但路云修站在那里说不敢坐。杨金岭同志说："特派员叫你坐就坐么！坐下好说话"。路云修这才勉强的坐在一条板凳上。我向他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我们抗日救国是正义的，整个中国人民是拥护和支持的，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吗！小日本是长不了的。抗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你当伪乡长要认清形势，要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这次到这一带是为了调查登

记在日伪方面干事的人员，每个人的表现都要登记下来，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要根据每人的不同表现进行处理。杨金岭同志在我谈话中还进行了插话，他说："我昨天已向特派员报告了，路乡长在我们这一带从没有打过人，骂过人，更没有敲榨过群众，抗日工作人员来了，从没有向日本报告过，特派员，你如不相信，你去调查，如果我说了瞎话，你我我就是了"。路云修说："我虽然是在刘道之当乡长，我的为人，金岭最清楚，我是本地人，家里也有父母妻儿老小，有房子，我如果当死心塌地的汉奸，我还有自己的家吗"？我说："好：你懂得这些道理很好，咱们后会有期，你可以回家了"。他站起身来向我们施了一个鞠躬礼，然后说："特派员请放心，据点的情况我及时派人送来，如在我路云修身上出了问题我以全家人的生命担保"。他走出南屋门，又回过头来行了一个礼，我送到二门外，他又扭过头来让我留步，又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路云修走后，我和杨金岭回到屋里大笑了一番。我说："金岭同志，你这个戏导演的好"。金岭同志说："你这个特派员装得也像。"

五、正压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参加抗日斗争，这代表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

日寇侵略中国，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极少数民族败类卖国求荣，投靠日本为虎作伥，替日本办事，群众称之谓"伪军"、"汉奸"。他们出卖民族利益，背叛人民，在广大人

民心目中都认为是可耻的，尽管当时他们依靠日本军事上的优势，下乡扫荡烧杀抢掠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是非常空虚的，在人民群众中是抬不起头来的，一旦当了俘虏，汉奸的共同语言，往往是两句话，"为生活所逼没办法，混碗饭吃" "家里还有几十岁的老母"。然后，要求饶恕，给留一条生路等……。所以说，他们是一股邪恶势力。我记忆犹新的是四三年，我被抗日政府分配到敌占区去搞麦季征粮工作（刘道之敌据点以北一些村庄），所迂到的几件有趣的事。

如，我刚进小路庄，群众告诉我说："刘道之据点来了两个伪军，他们都拿着枪正在那里熊保长，催粮、催款哩"，劝我等他们走了再进去，显然，群众是出于好意，担心我的安全。我考虑我是抗日政府派来的，身上还带着县长张侠同志的证明信，在群众面前怎么能表现出害怕两个伪军呢？我大着胆子走向正在熊人的两个伪兵，我非常严肃地向他们宣布说："我是县政府派来征收抗日救国公粮的"。两个伪兵一惊，望着我。我说："你们是刘道之据点里的吧"？"是"。伪兵恐慌的回答，而且笔直的站在那里，显然，对这突然的问话，有些害怕了。我说："你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日本人卖命当汉奸呢"？"因为家里穷，没办法，混碗饭吃"。另一个伪兵说："我家还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娘"。他们都低下头，回答了我们的问话。一个伪军手里还拿着一根打人的小棍子，我问他们手中的小棍子是干什么用的，"是在路上拾到的"，伪兵撒谎的回答。我生气了，厉声的斥责他们说："你再去拾一条棍子来我看！分明是用来打老百姓的，你们还不老实"。伪兵见我发怒了，

立即把手中的棍子油在地下。我说："今天用棍子打老百姓，小心今后把自己的脑袋打掉了"，两个伪兵枪挂在肩上，低着头，笔直的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了，打麦场上有十几个打麦子的群众停下手中的活，在旁边观看，客观上也壮了我的胆量，我最后问了他们俩的姓名说："我不下你们的枪，你们回去吧！在八路军抗日救国公粮征收期间，你们不要再来催粮要款了，如再碰到你们，我就不客气了"！两个伪兵说声"是"，向我施了一个鞠躬礼，就灰溜溜的回刘道之据点去了。伪军走后，在场里干活的群众围上来，都高兴的笑了。有位老大爷笑着说："你们八路军身上长着掺人毛啦，两个拿着枪的伪军见了你吓得那样子，一动也不敢动，如果真的打起来，别说他们都有枪，就是不用枪凭力气，一个对一个，你也不行呀"。我笑着对在场的群众说："掺人毛长在群众之中，八路军抗日政府是抗日打鬼子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群众是拥护支持八路军抗日政府的，伪军投靠敌人当汉奸是不得人心的，是脱离群众的，这就是以正压邪"。我笑着对群众说："你们看，我还带着这个家伙"，我掀起衣服露出了挂在腰带上的一颗小手榴弹，在场的群众都开心的笑了。

1989年元月21日

在聊城工作的回忆

孟筱澎

我原籍山东省聊城东北，孟家营村。一九三七年毕业于山东省立聊城第三师范。曾在城内第一小学（即卫仓小学）任教两月余。后经友人介绍参加了山东省第六专员公署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我被分配搞文书工作，时在三七年十二月，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范筑先专员的政治部，实际是我党领导下培训干部的基地。）

一九三九年秋，我入党后被分配发展建设聊东的党组织，并建立了聊东工委，到一九四〇年秋，因工作处境困难，地委决定成立聊城县委，我即调县委工作。一九四一年春，离开聊城被调任运东地委（又名第四地委）秘书长。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在冀鲁豫平原分局参加整风学习结束后，经我请求被分配回到筑先（聊城）县委任组织部长。

一九四五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以陈再道，宋任穷为领导的第二纵队，攻打聊城之敌，全县人民欣喜若狂，热烈支援。县委分工我负责兵站的后勤工作，组织粮秣，担架支援前方。一心希望攻克聊城，全境解放，结束敌伪军统治的七年的奴隶生活。但，终因城墙坚固，环湖水深，致使我军遭到重大伤亡，而未能攻克。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

十二时，国共两党停战，我军停止攻城。一九四六年元旦开始，敌人在城内，我军控制四关，进入和平停战时期。这是第一次攻打聊城的结束。

县委机关很精干，仍活动在城东农村一带。当时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征兵征粮，支援战争。由于敌人盘踞城内，有时出来抢粮，济南的敌机经常来轰炸，为城内敌人投放给养和枪弹。在这种情况下，除老解放区外，由于对形势认识不足，觉悟不高，对群众的发动是比较困难而且有限度的。这种状况直到持续到第二次解放聊城。

一九四六年夏，县委书记陶东岱同志调去学习，党组织决定我任书记，王鲁光同志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沈廷梅任组织部长，刘子华任民运部长，刘诚任抗联主任，副县长是王筱湖。这时全县共区划为十个区，聊南以运河为界，运西为一区，运东为二区（孙堂一带），聊东南顾官屯一带为三区，聊东北蒋官屯一带为四区，于蔡庄一带为六区，杨集一带为五区，聊北为七区，聊西南孙丰、沙镇一带为八、九、十区。聊西属当时的武训县（即原堂邑县）。

一九四六年初冬，以杨勇、张霖之同志为领导的第七纵队再次攻打聊城。这时聊城城内之敌已成孤立据点。攻城的炮声时间不长，听说济南敌军来援，第七纵队撤离到聊东一带。实则城内守敌趁机怆惶窜逃，聊城获得彻底解放。我在城东关的一家大户拜见了张霖之同志。霖之同志是冀鲁豫区党委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首长。当时县级党、政、军机关进住城内。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济南的敌机不断来县城轰炸。为恐敌人卷土重来，县委决定把破除县城城墙作为紧

急任务。为发动全县人民，由干部带队，分工分段破掉城墙。虽然在寒冬季节，记得在一九四七年春节前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因为敌机轰炸，为有利工作，除留下县大队守城维持治安外，县级党政群机关搬到城东军王官屯办公。

聊城的全境解放，广大人民欢欣鼓舞，调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革命、生产积极性。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和运东地委的直接帮助下，在全县开展了反奸、诉苦、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广大贫下中农群众成立农会（实则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组织），向汉奸、恶霸、地主阶级开展诉苦、清算斗争。记得在四六年底，在聊南召开了干部动员大会，当时的区党委负责同志和地委书记申云浦同志坐着大卡车前来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给全县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在反奸诉苦、清匪、反霸的基础上，进行减租减息，实际上初步解决了土地回老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土地改革。

一九四七年春，解放战争开始了，济南，黄河以南的敌机不断来轰炸堵截我刘、邓大军打过黄河，挺进中原。大别山。在开展群众减租、减息，分浮财，分土地的同时，动员群众参军，补充主力部队，支援解放战争，妻送郎、母送子参军上前线的先进事例到处出现。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家王朝几百万军队，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取得了我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胜利。

一九四七年八月，地委通知调我和孟月山（副县长）同志南下支援解放新区。那时的调动，交接工作很简单，手八

月间即到地委报到了。由地委副书记彭天崎同志带队，编成干部队，到区党委时，编成了南下干部大队，由赵紫阳、彭天琦同志带队，待机过黄河，南下中原。大约在初冬季节，开始过黄河，在第十纵队的掩护下，跨过龙海铁路，过沙河，过信黄公路，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在红安县的七里坪略事休息，听过李先念、陈少敏同志的动员报告。而后继续西进，过平汉铁路，过府河，到达江汉区党委的鄂中地委京（山）安（陆）应（城）地区，已经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开始了游击战的生活，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第四野战军南下，解放武汉，大约行程三个月，徒步数千里，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聊西北
——我的回忆及经历

柴　龙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奉命南退，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济南、德州相继沦陷。地处鲁西北重要战略地位的聊城，也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怒吼抗日救国；汉奸及其亡国论者，则散布抗日必败的谬论。那时的聊城，人心惶惶，社会混乱，乌云密布，一片恐怖。

我家住在聊城西北的七里铺，顾名思义离聊城城里七里地。一九三七年我十四岁，正在聊城高小即卫仓小学读书。和我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五里铺的李明同志。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和对聊城的轰炸，群情义愤填膺；加之聊城那年发大水，整个聊城泛滥成灾。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无心教书上课，学生则无心上学读书，于是被迫停课，我们就失了学。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守，抗日爱国将领范筑先及一批共产党人，爱国青年为国捐躯，革命处于低潮。当时的聊城，土匪蜂起，日、伪顽勾结，“群龙无首”。

聊城失守之前，有一所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干部学校，广大的爱国知识青年在这所学校里学政治、学军事。日本鬼子

的占领后，学校也就自然解体。我们村的代洪光也曾在政治干校学习，他是我的表叔，比我大三岁，聊城失守后，他也回到了家乡。在他回来时，从聊城带来了一些进步书籍，如：《社会发展史》、《论持久战》等。由于我和代洪光是亲戚，又都追求进步，所以经常在他家玩，看他带来的那些进步书籍，听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所以，在我以后走向革命的道路，与他的帮助以及那些书籍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有满腔抗日救国热情，但不知如何进行抗日救国，这是我们那些青年的共同感觉，因此当时思想很苦闷。记得一九三八年底，代洪光去找游击队，他找到了支队领导管大同司令员，据他回来说，管大同给他谈了如何抗日，还给他带回了委任状，要他回来组织抗日游击队，收编聊西北一带被日本人打垮流窜在当地的散兵、土匪及其枪支。我们商定后就干了起来。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小，没有经验，我们说话人家根本不相信，更不用说那些散兵会把枪支给我们了。搞了几天也没结果，我们也就不再干了，又商量自己造武器，先干起来。那时代洪光有一枚日本手榴弹，我们很稀奇。我们计划造土手榴弹，当时人太少，又把代洪光的哥哥代洪生、弟弟代洪池也吸收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们用酒瓶子制成功了土手榴弹，还把废木柄手榴弹改造成能用的手榴弹。手中有了武器，胆子也就大了。我们的第一个计划提出不给城里的敌人送东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准资敌”。那时正是天寒地冷的天气，日本人、伪县府向乡里收购棉花，我们就准备截敌人的棉花车，但因力量太小，没有搞成功。接着又割敌人的电话线，敌人白天架电线，我们就晚上割电线。这个计划是搞成功了，但也惹出了祸来。敌人为找割电线的人，把

代洪光的父亲抓了去，后经托人花了很多钱，才把代的父亲救出来。在搞这些革命活动时，我们自认为是共产党干的，其实我们几个都不是共产党员。可见当时对党的基本知识根本不了解。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打听到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堂邑县黄瓜园住有抗日游击队，这个游击队的负责人叫任明，是聊西北任堤口人，他和代洪光是同学，也是中共聊堂工委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和任明取得了联系，他交给我们的任务仍然是搞枪搞武器。经过一番艰苦工作后，只动员了几个人，枪支弹药仍然没有搞到。七月，亲日派的头子齐子修来了，任明的游击队遭到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游击队损失大半，任明带着剩下的游击队员转移到博平一带，在那里并入到抗日八路军先遣纵队五大队四中队。就在这个期间，我也参加了任明的这个游击队，编在四中队。我的原名叫柴凤翔，参加游击队后改名柴龙至今。参加游击队后，就配合筑先纵队参加了讨伐齐子修的战斗。前后打了二十多天，也没打下来。当时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游击队既要对付日本鬼子，又要对付齐子修的三支队。就在这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经过：一天晚上，任明同志找我谈话，说我有抗日热情，并有所谓的“理论”，愿介绍我参加党。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心想这一回可是真正参加共产党了。当晚就为我填表办了入党手续。参加了党就听听党课。一天，中队长谢吉庆为我们讲话，他说：“军人的天职就是绝对服从。比如枪，我叫你放到井里，你就得放到井里”。我听了以后，很不服气，我说“我不能服从，为什么打日本鬼子的枪放到井里呢”。为此事进行了争论，后来经过领导解占柏同志对我的

谈话，才明白了绝对服从的道理。一九三九年底，部队转移到冠县进行整顿，就在这时，党组织要我利用家住七里铺的有利条件（北有齐子修，南有日本人的中间地带），为我们党在鲁西北建立交通站。我回到家后，首先发展了代洪光入党，代洪光又发展了李明入党。有了党员和党的组织，才好开展党的工作。我们交通站的任务是，沟通鲁西北区党委与四地委的联系。上级党给我们规定的具体任务：传递鲁西北区党委和四地委的文件，刊物、和信件；转送军事情报；为过往部队筹集船只安全过运河；护送、住宿党的负责人过往的安全。为了不至引起敌人的注意，要我们把交通站办成“灰色”的。

过往交通站的负责同志的穿着，一般打扮的比较“洋气”。他们头带礼帽，身穿丝绸大褂，骑漂亮的自行车，不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到他们就敬而远之，误认为绿林好汉。村中的一些人看到我接近这些人，互相之间“大哥”、“兄弟”的称呼，也在背后议论，我当然听之任之。这些负责同志路过我们交通站，很关心我们的工作。记得一九四〇年初，四地委宣传部长郭少英去鲁西北区党委开会，路过我们交通站（交通站设在代洪光家），他要我们把村里的党员叫来谈话。他的谈话，实际上给我们上了一次党课。他从“一二·九”学生运动讲到抗日战争，共产党人的使命。他越讲越激动，后来站在炕上给我们讲，使我们受到很好教育。

转送情报，也是一件既危险又重要的工作，因为情报危及个人牺牲事小，贻误战机和泄露秘密事大。为送情报我们想过很多办法。有一次我给博平县委书记陶东岱送情报，接到这个任务后就想，如何才能安全、准确、及时送到陶东岱

手里呢！我们想了个既不引人注意又安全的办法。利用一根干秫秸，把一节的一部份瓤子挖掉，再把情报卷成筒形放入里边，然后用泥巴堵死，当遇到敌人或情况紧急时，就把秫秸往路边或地里一丢，既安全又可靠。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把情报送到陶东岱手里的。

环境在恶化，斗争更复杂。交通站的建立，党支部的加紧活动，对敌斗争取得的胜利，给了日本鬼子、汉奸齐子修一些打击。我们针对当时的情况，坚决贯彻“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把交通站和党支部搞得更严密一些，同时，搞得也更“灰色”一些，我们采取了“合法”、“半合法”的斗争。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经过精心研究，我们采取的重大措施有两条：一，打入敌人营垒，掌握伪政权。我们通过青红帮头子黄金池的介绍，李明同志打入到警察所。由于李明等同志的机智勇敢，我们掌握了很多敌人的情报。更难能可贵的，李明同志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之后，为党的负责同志搞了一批“身份证”，避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清野”。又如我们把吴洪侠同志打入进敌人的汽车站，从敌人的每次出动汽车数了解到敌人的活动，扫荡的情况。那时打入敌人内部去的共产党员还有吴金芳、任保爵、赵国珍、路占华等同志。二，有组织、有计划地参加、利用会道门以及担任伪政权的职务。如当时被日本人利用的“安情道义会”，即青红帮，代洪光、李明、柴龙等同志通过青红帮头子黄金池也参加了青红帮，并分别拜他和保安队中队长施汉喜为师。有了这样的“靠山”，就更有利于保护同志，和对敌人进行明的或暗的斗争。

抗日战争中，卿西北的群众和一些同志，说我“胆

大”，“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应付”，其实主要靠党的正确领导和战友、群众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我在聊西北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我当过日伪汉奸的“官”，我干过出头露面的事。为了结交朋友，我当过小学教员作掩护；为了党的负责同志的安全，我当过七里铺的汉奸“村长”；为了有利于抗日斗争和传送党的地下刊物、信件和情报，我当过七个村的汉奸“大村长”；为了抗粮抗苛捐杂税，我当过封建迷信会道门红枪会的“会长”；为了抓敌人的武装，我还当过汉奸自卫团的“团副”、“区队副”（区队长由汉奸区长兼）。当时有了这些“官”，实际上有了与敌人斗争的“合法”身份，既能保护党的利益，又能保护人民的利益，一有机会狠狠打击敌人，这里仅举几例：

抗粮斗争。聊城那时有两个县政府：日本鬼子的“县政府”，汉奸头子齐子修三支队的“县政府”。敌人的催粮要粮，逼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叫苦连天。那时别说一般的老百姓招架不住，就是地主富农也面临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斗争。斗争打什么旗号？打共产党八路军的不行，因为日伪汉奸的矛头就是共产党八路军；打日伪汉奸的不行，因为人民群众最痛恨日伪汉奸，而且日伪汉奸又是斗争的对象；打国民党的旗号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抗日，是人民群众头上的石头。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打会道门这个旗号，因为会道门是迷信团体，日本人也不大过问，对红枪会有时利用，有时限制。官逼民反，参加会道门，在群众中一号召就起来了，我是“汉奸村长”（候庄乡下属六个大村的），群众又推举我当了红枪会的会长。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叫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入会，地主富农出钱出粮，这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鲁西北大灾荒，再加上日本要粮，齐子修也要粮，人民没法活下去了，那时每天都有一个小队来我们村催粮。他们首先就是在我这个“村长”家吃、等、闹，不几天我招架不住了，无奈把家属搬到城里去住，家有我一个人来对付他们。有一次汉奸来催粮，弄不到粮食，就穷凶极恶的把我吊在了梁头上。即时对敌人抗粮，不能采取硬顶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磨、托，有一次警备队来催粮，我说老百姓没有粮，他们不相信，于是我就带着他们到住家户去要，因事前，我对各户说过：“如果在你家翻出粮食来可不得了”，“可把粮食藏好啊！”后来警备队来了几次，既没有搞到粮食也没有搞到饭吃，他们就扬言要把我的腿砸断。为了不致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勉强搞了三十斤小米滚蛋。还有一次，他们搞不到粮食就把老百姓的门撬了一大堆；门板带不走，当汉奸们一走，各家把各家的又都拿走，重新安上。

抵制修复所谓的战略公路，日本鬼子为了对付游击队，加紧镇压聊城、堂邑两县的人民，要当地人民加紧修复聊城至堂邑的公路。他们给每村分任务划地段，限期修完。我们采取软托的办法不给他修。汉奸们追问下来，我说老百姓没饭吃，都出去找饭吃去了。他们不相信，伪县府建设科长发传票把我传了去，吵了一架，要关我，后要我抓人去修，后来我们又变换了个办法，出工不出力反正不给他修。当其他村修完了，我们还没修完，

撒传单，从心理上动摇敌人，又可以使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八路军在活动。为撒传单，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如用熟红薯代替浆糊贴传单，既省事又快。一九四〇年初，地委印的用日语写的告日本军人书，我和代洪生、刘万顺夜间，在西

街贴了一条街，使日本鬼子非常恐慌。为避免敌人搜查，我们巧妙地把传单放到帽子里，乘机把帽子一脱，在闹市传单到处飞。如共产党员刘金章，在聊城东关当上了店员，他利用给老板往茶馆提水的机会，用这个办法撒了很多传单。另外，我们还写布告署名八路军，警告作恶多端的汉奸、鬼子。有一次用萝卜刻了一个八路军游击队的章，写了个“布告”，贴在了聊城——临清公路上白家涯小饭馆的墙上，使过往的人都可以看到。

敌人在对付人民方面不断改变方式，我们也根据敌人改变的方式改变斗争策略。如日本人为了宣传他们的“胜利”，在城里大街上搞读报栏。我们就利用这个读报栏，贴上共产党八路军的油印小报。又如日本人搞了所谓“检举箱”，要老百姓检举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就利用“检举箱”把铁杆汉奸、伪保长以及所谓的绅士的“通八路”的“情况”投进去，以假乱真，叫他真假难分。不久，日本人知道上当了，把“检举箱”都砸了。日本、汉奸惯用造谣，夸大他们的“胜利”，吹嘘他们的“强大”，我们就搞“咬耳”政策，进行反宣传，闹的汉奸鬼子疑神疑鬼。日本人在聊城搞了个“新民会”，推行汉奸文化。搞了一个报馆，大肆宣传“皇协军，真可亲，依靠你们真放心”。他们还发行书籍，宣传“东亚共荣”、“亲善”。我们把共产党员傅茂辉打入进去，有时偷，有时当着敌人的面拿，他们干涉，我们就说替他们宣传，其实我们拿回来都烧了。

自从我们把一批共产党员打入到敌人的“心脏”以后，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汉奸三支队不敢轻易下乡来胡作非为。特别是我们利用了红枪会，发展了几千红枪会的会员后，接

着搞了个行动。那时警察所来要粮，三支队也来要粮，他一来就又吃又闹。我们一商量，把红枪会亮出来，一集合几千人，大家擂鼓呐喊，警察一看便吓跑了，红枪会追了好几里。还有一次，是红枪会教训齐子修的三支队。有一天阎觉寺过集，红枪会包围了阎觉寺，并捉了几个汉奸，我们将两个以收税为名搜刮民财的坏家伙，枪毙了一个，用刀砍了一个，其他的放了回去。从此，我可“出名”了，有的老百姓在传，汉奸们也在传，说：“柴凤翔厉害极了”，“他的红枪会刀枪不入”。汉奸区长张明堂眼看控制不住局势了，非常恐慌。汉奸县长也“看重”我了，他给我捎信，请我进城。我不去。后经张明堂作保，说县长请我去“做客”，“没恶意”我才去。伪县长见了我说：“你是红枪会，这是封建组织，为了自卫也可以，但你随便杀人不好。你是本地人，要杀你交给我杀多好呢！”我明白了，他找我谈话的目的，主要是红枪会影响了他政令的推行。因为从聊城到堂邑、临清，日本人活动，需经过红枪会控制的地盘，一旦出了事怕得罪日本人；也为把红枪会纳入他的势力范围，通过控制我控制红枪会，于是他“提挈”我为第四区伪“区队副”。经过党支部研究，我接受了汉奸区队副这个“官”。因为这有利于控制、掌握敌人的武装。

我当了区队副后，把共产党员代洪光、王丙臣、路庆祥，李少卿等带进了据点。代洪光因工作需要，不久又出来了。这个区的区队长由区长张明堂兼，所以我当了区队副后，聊古庙区队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了我们手里。但是这个据点里还住有一警察所，所长是个日本特务，经常与我们捣摩擦，此人很坏，经常监视区队，侦探我们党的活动。

进据点后，首先利用矛盾与警察所干了一仗。一天他们来拔自卫队的菜，一干涉，还把我们的人抓了一个，于是我把自卫队的通讯班集中起来，包围了警察所。后经他们托人说情，除把人放出，还赔礼道歉。不久，我们又利用各保长列罪告他，就这样把这个坏蛋挤走了。

我们的活动，自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在给汉奸们讲话时，不小心讲了一句八路军的术语“垂直领导”，被日本警察特别保安系的人员李连生听出来了，他在背后说：“柴队副说的这句话是八路军的语言”。我们几个党员商量决定教训他。我们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共产党员约他去围子外散步，到了避静处时，我以区队副的身份说话了：“你到八路军那边了解的八路情况怎么样？你被八路捉到过没有？”于是他乘机吹嘘了起来，并把他知道的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告诉了我。我又接着说：“老李，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这一问，他愣了。他以为我们叫他来是要干掉他，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杀他，因为那会暴露自己。接着我又暗示：“告诉你，我可不是真汉奸，我是生活所迫。请你到那边美言几句，我们干这一行的谁没几个朋友，请你见了八路朋友美言几句。”我这些话说的真真假假，是反话又不象反话，他干特务的一听就知道了我指他私通八路军，他再也不敢打我的注意了。

情况越来越紧张。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天，伪县长打电话要我进城见他。伪县长直接见我，我预料到没好事。去还是不去？去，实在危险太大；不去，又怕因抗命暴露自己的身份，影响党组织的安全，经和党员路庆祥、苏培岱商量，

决定还是去。到了城里伪县府的传达处报了到，传下话来说赵秘书找我。“赵秘书”，实际是“二县长”，也是个日本特务、铁杆汉奸。我心想必须认真对待。他一见面就问我：“柴队副，你那个地方八路军进来了没有？”

“白天不敢，晚上进来了催粮。”我说。

这样下去，不把我的地盘搞完了吗？”他这话显然是找我的叉子。

“白天来了我可以出去，晚上没有你的命令我不敢出去。再说弟兄们受损失我也负不起责任来。”我这一棒把他打哑了。他一看再问下去也没意思了，就说：“你太没军事经验了，在大队部受下训再回去吧！”“受训”，实际上是撤我区队副职的代名词。在这期间，我找了个机会，出去与住聊古庙据点的党员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情况有变化，我被撤职了，武器没暴露的不要暴露了；并警惕敌人搞突然袭击。并由党员苏培岱同志转告伪区长张明堂，说我被撤职了。（当时张明堂住在聊古庙据点内）

在外边吃了饭，我又回到了大队部。到了大队部我遇到了我的拜把兄弟的李纪文。李是大队的文书。他对我非常担心，他说：“你不应该在这里，你得罪的人太多。不带枪在这里很危险，被撤了职更不得了。他这话对我太重要了，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李纪文又带我见了马叶千大队副。马叶千和赵秘书几乎说的都是一样的话。第二天我又找机会到了伪区长张明堂家里，他的太太说：“区长到县长那里挽留你去了。”从区长家出来恰巧遇见了张明堂，他第一句话就说：“挽留不下呀！”我说：“留我还不干哩！”张明堂说：“你怎么还是这个脾气，江山是你打的（指聊西

北），别人来我还不干哩！”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听县长说话的意思，你还有别的事似的。”我说：“我有别的事你老兄还不知道？！”张明堂说：“对对，你的事我都知道。好了好了，我下午再去找县长说情去。”这时，我心里完全明白了，敌人对我怀疑了。于是我当即立断，骑上自行车，飞快的回到家，把枪交给了代洪光，把明信片和我的私章也交给了他，并商定我走后仍然用我的名义活动。有人问起我，就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隐姓埋名不给大家见面了。离开七里铺，日夜兼程，到了解放区，向县委书记肖平同志回报后——调我武训县第六区工作，在那里先后担任区抗联主任、区长、区委书记，一直到一九四六年调回聊城工作。

我在武训县工作期间，还曾两次回去过聊西北，和我的战友们一起，狠狠打击了敌人。第一次是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一天我从武训回家路过李庄集时，遇到了在聊古庙据点的党员李少卿等同志，他们正在商量如何活捉伪县长刘佩芝的事。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计划。那天刘佩芝在李庄集喝酒。我们的计划是在刘佩芝回家的路上，由李少卿等冒充虎兵队截击。天黑刘佩芝喝完酒就大摇大摆回家。半路上，李少卿以“宪兵队”名义把他截住了，开始他还无所谓，当叫他离开公路时就慌了。这时我和区长解岳侠在凤凰集等着。当晚把这个伪县长交给了我，由我带一个班押解送往解放区。在押送的路上，我诈他：“听说你通柴凤翔？”刘佩芝说：“我怎能通他？他是个小孩子，厉害得狠。”我与他打了这么几年的交道，现在我站在他面前，他还不认得我。到了县政府，我把刘佩芝交给县公安局管押。县长梁向明高兴地说：

"好哇，提到鲁西北的大国特了。"从此，聊城三支队的"县政府"也不存在了，他这个"县长"也自然"完蛋了。"

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日本鬼子及其走狗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聊古庙的汉奸们更是日子难熬。在这种情况下，聊西北的党组织分析了敌人的情况，认为这里住有四个小队，两个小队掌握在我们党员手里。武训县委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聊古庙据点端掉。还议定据点里以地下党员李少卿和阎学旺的小队为接应。正在积极准备中，阎学旺却不干了，他说："我没把握，我要问下我兄弟（指柴龙）可不可办，他说办得就办，他说办不得我就不办。"为什么阎学旺非要问我？原来我在聊古庙当区队副时，他在我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该同志"江湖义气"思想较为严重。一天晚上，区长解岳侠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中提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我回聊西北一次，二是希望我把独立团带回去。当时，日本人合围刚刚结束，独立团正在集结休整。独立团，实际上只有三个连，战斗力很差。我找到独立团团长程志芳，向他提出这一要求他完全同意。当天夜里我们带领部队过了马颊河，进入了聊城地。我们住下后，把在据点的阎学旺通知来。阎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干得干不得？"我回答说："干得。"他二句话没说回头就走，我赶快拉住他见了团长、参谋长等。大家商定，双方以点火吸烟为号，里边就开门把部队迎进去。但那天晚上，刚下了雪，一片白、反光，双方点火吸烟根本看不到。外边着急，里边更急。在据点的李少卿同志骗过岗哨，用绳子捆着自己设法爬下围墙和两道封锁沟，与部队联系上，然后又爬进据点。他用钉耙把据点的大门砸开，迎接

部队进去，很快汉奸们缴枪投降。这时据点的警察所还企图顽抗，我们进行了政治攻势，并说，如不缴枪就放火把你们烧死在里边，并把柴禾堆好，准备点火。警察们一看吓坏了，无可奈何地缴枪投了降。有趣的是，这晚伪区长张明堂还在据点里睡大觉，当他听到八路军进来时，衣服没穿好，党员路庆祥还叫他，他和老婆、孩子钻到床底下。战士们看他好笑，抓住腿从床底下把他拽了出来，当了俘虏。这次战斗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损失，缴获了各种武器一百五十多件。部队到了大阮庄，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宣布这个伪中队改编为独立团四连，阎学旺任连长，李少卿任连指导员。庆祝会后的一天，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同志还专给我写了信，对这次胜利表示热烈祝贺！

✕　　✕　　✕　　✕

说明：这篇回忆录记述的都是四十年前甚至是五十年前的事情，所引用的材料和事件，都是凭回忆，肯定有不准确之处，敬请当时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指正。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于贵阳

抗战烽火中锻炼出来的运东大队

胡潘生

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县城沦陷到一九四〇年春，盘踞聊城的日伪军，为维护和扩大统治占领区域，有时出城扫荡抢粮，抢物资、抢牲畜、杀人放火；有时配合阳谷、东阿两县的日伪军扰乱聊、阳、阿三县边境，妄图切断运东地区同冀鲁豫边区联系的通道，同时煽动反动迷信组织反对我军，不让进驻宿营，破坏县区的地方工作，杀害抗日工作人员，迫害爱国人士。聊东南的花牛陈村，以陈玉怀为头目的反动迷信组织干了不少坏事，陈玉怀由反动直至投降日寇，当了可耻的汉奸走狗，并且在本村安置了汉奸据点，成了人民的千古罪人。聊城东汪庄的反动势力，则建造深沟高垒，极力阻止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靠近。还有驻在博平县西部的汉奸齐子修部，在聊城日伪的指使下，疯狂地向聊城县西部和东北部进犯骚扰，屡次同我军作战，妄图扩大地盘，镇压抗日军民。在各种反革命势力联合行动的形势下，聊城城内的敌人采取更恶毒的手段，他们以县城为基点，步步为营，由近及远，设置若干碉堡据点，派驻日伪军把守，各霸一方，蹂躏群众。在水深火热中生活的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我党我军领导他们打击日伪，保家卫国。

聊城县境东南一带的许多村庄，当时就有不脱产的民团武装组织，遇有匪情便集聚起来，进行自卫战斗，匪情消除

便各自回家，照常生产。所以，在民间存有不少枪支弹药。当时，这一带村庄的民团团长，白庄的白凤仪同志，他已年届花甲，身体很健壮，他秉性刚直，待人忠厚，富有爱国思想，他在我党我军坚决抗日的革命影响下，为当地群众抗日保家的呼声所激励，从而坚定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日寇占领聊城县城后，由于日伪四处抢掠，作恶多端，弄得人心惶惶，莫衷一是。民团本来是一种松散组织，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也难以活动了，尽管如此，但人在枪在基础在，一旦有坚强的组织领导，便会应声而起，可以组成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白凤仪感觉到这种趋势，便毅然找到运东军分区，见到分区司令员刘志远同志和政治委员石新安同志，要求在聊城县东南一带成立一支抗日武装。他的要求得到运东军分区的批准，确定以聊城东南一带为基地，在聊阳阿边区一带活动，成立运东军分区运东大队，由白凤仪任大队长，将我从一一五师华山工作团调来任政委，颁发了印信，并通知有关县予以协助，经过艰苦的创建、发展和严峻的战斗过程，运东大队诞生了！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直坚持在聊阳阿边界特别是在聊城县境内打击敌人。

聊城沦陷后，原来分散在民间的枪支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将枪支卖掉了，有的被他人强行索走了，有的转移他处，但有一些仍保存在部分人家中，情况各有不同。对这种变化，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在“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统一号召下，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和深入调查，为建立运东大队作准备。当时，除同地方上的党政工作密切协作共同进行外，还动员了地方上有名望的抗日民主人士帮助建立

队伍。例如聊城魏庄的吴汉三，孙堂的孙建斋、孙振庚、高香坊的高士禄、刁绒三，杜屯的何器之，顾官屯的张振海，亢庄的亢子维，付集的付干臣，大李官屯的王连馨等，还有东阿县曹孟庄的孟广锡，赵寺的高兴聚、任金秀，官庄的唐殿安，刘集的刘益禄，阳谷县秦庄的秦长爱，孙陈庄的群众以及茌平县南陲王楼等村的群众和阶层人士都来帮助建立运东大队，动员人和枪参加进来。这些在当年为抗日救国建立运东大队积极做出贡献的人们，后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七月，大队开始秘密集中，最初有２０多人，有的人带着枪，有的人则徒手。从此，运东大队的旗号打起来了，因为有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基础，所以受到当到群众的支持和欢迎。为了发展壮大，扩大影响和避开敌人的注意，便在聊阳阿三县边境一带活动起来。当年，群众推举白凤仪为民团团长，并亲切地称呼他为“白官”，现在，“白官”给八路组织队伍，抗日锄奸，当了运东大队的队长，所以当地群众称这支队伍是“白官”领导的队伍，从一开始就很支持，很信任，因而部队的食住没有发生大的困难。

为使队伍尽快地发展壮大，我们采取了边发展边战斗，在战斗中求发展的方针。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开展破路运动，所谓破路，就是将原来的平坦道路挖成深沟，使东西南北各条道路纵横交错，沟沟相连，这样，既可阻挡日寇机械化部队的通行，又便于广大群众为避开敌人进行转移时不暴露目标，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各村男女老幼齐出动，手握锄头、铁铣，每天汗流夹背，挖沟不止。我们确定高士禄同志为破路委员，专检查验收破路工程，并把破路重点放在聊东南一带。敌伪白天出来骚扰时，群众便夜晚挖，各村分片

包干，沟深两米、宽三米，工程进展很快，大致用三、四个月的时间，破路活动便告一段落。在聊城县境内的运河以东和东南方向即在李海务以东、周店、魏庄、杜庄、八大寨以北，于集以南，顾官屯以西，将原来的道路全部挖成了沟壕。在同聊城县接壤的东阿县境内的西北一带地区即秦老庄以西，曹孟庄、西程铺、坡里、官庄、赵寺以南，孙郭、刘集以北，一大片道路也都挖成了沟；在阳谷县东北地区即七级 镇 以东，阿城镇以北一带地区的道路，也全部挖成了壕沟。这样一来，沟沟相通，村村相连，四通八达，聊阳阿三县结合成一大片，地区的路沟和村庄连成一大片，既便于我们部队的活动，又增加了敌伪外出窜扰的困难，还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从此以后，运东大队的威信大大提高，白凤仪同志的声望也随之提高，基于这种情形，聊城县的敌伪对这支队伍更加愤恨，他们有时联合东阿县和阳谷县的敌人，不断分进合击我们的部队或者出兵袭扰这一片的村庄，在敌伪几次扑空之后，歇斯底里大发作，便到白凤仪同志老家——白庄，烧毁了他的全部房屋，并殃及全村。敌伪的野蛮行为，更加坚定了白凤仪同志抗战到底的决心，激发了广大群众支援运东大队的积极性，在半年时间内，运东大队发展到近三百人。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的据点和盘踞在城内的敌人，还派小部队破坏敌人的电话联系，锯电线杆，拖走电线有时长达数里，使敌人通讯联络中断，修复也较困难。有时在夜间我们带领一些群众横向挖沟，切断公路，使敌人的汽车不能通行，敌伪小据点也不敢轻易外出。例如花牛陈敌伪据点不但远离县城，而自身力量又较软弱，唯恐受到我们的打击，只好闭门少出，即使出来，也只能在

据点周围回绕，不敢远行。敌人的软弱，不仅我们看清了，广大群众也看清了，我们的部队可以不分白天黑夜，经常主动袭击敌人、锻炼自己，战斗经验越来越多，战斗力不断增强，敌伪很怕和我们作战，只要一听到枪声便赶快缩回据点。有时我们未驻在附近，敌伪偶尔外出时，群众便大声疾呼：运东大队来了，敌伪也是赶快缩回敌巢。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部队的组织机构逐步健全了，当时除大队机关本身外，下属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杜仰云（魏庄人），在聊城东付庄作战受伤，继任中队长张开路（石雍屯人），作战勇敢，善长于指挥。二中队队长董××（于集附近董庄人），绰号董麻子，枪法很好，命中率高，能攻善守。特务队队长张振海（顾官屯人），是个孤胆英雄，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后来被内奸暗害（同时被害四人），是大队的一大损失，不久，我们便将凶手捉到处决，平民愤，慰英灵。

大队长白凤仪同志有时在大队里住几天，但不能经常随部队游击活动，但主要留在后方（所谓后方，并不是敌人到不了的地方，其实也是游击区），住在这里只是转移少些，稍为固定些，因为他是本地人，情况熟，又有广大群众掩护，他只带两个警卫员，在一个地方便可住上几个月，没有什么危险，他做的事情很多，如利用各种关系购买枪支弹药补充部队，搜集敌伪情报，传递信息，开展统战工作联络各界人士支援我军，做敌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使之不做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同时，动员组织群众抓紧破路、挖沟等工作。他做的这些事情不但在大队内，而且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是有威望的，立了功的。

还有一位是何器之同志，他是城东南河子杜人，在大队开始建立时，积极帮助发展壮大，亲自动员小儿子参加大队，在社会影响很大，传颂着何器之同志“老子、儿子一齐参军”的佳话。因他视力不好，夜间不能行军，只好住在岳父家中。他有一个贤慧的妻子，对他爱护备至，有时我们住在他家，也是热情接待的。

运东大队从拥有几十人枪开始，就投入了打击敌伪的战斗，特别是通过对花牛陈据点的战斗，使运东大队很快地发展壮大到几百人枪。花牛陈据点的敌人，曾经挨过我军主力的打击，非常惧怕同我军作战，开始他们不了解运东大队的情况，一经接触后，便仓皇逃回据点，闭门不出。盘踞在聊城之内的日伪，眼巴巴地看到花牛陈据点已承担不起县城的屏障，加之县城屡遭袭扰，交通不断受到破坏，于是，便为自身安全，准备在花牛陈附近王官庙（王官庙是一座孤立庙宇，只有几家店铺）设置新据点。于一九四〇年底，聊城敌人便动用大量兵力，带领很多民工来到王官庙修建新据点。敌人的这一毒招，引起了周围村庄群众的极大愤怒，同时也激起了运东大队的战斗激情。因此，广大群众和大队战士一致表示：坚决打击敌人的狂妄野心！就在敌伪到达王官庙的当天晚上，运东大队便对该敌进行猛烈地袭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连续响了一夜，杀伤许多敌人，敌人困守孤庙，抓不到人为他们修筑碉堡，困扰不堪，停留了几天便夹着尾巴回聊城去了。大队经过这次夜间袭击据点，锻炼了进攻守敌的本事，趁势，一月之后，大队便主动攻击驻扎在城东十多里的付庄据点，敌人龟缩在碉堡内，凭险顽守，我久攻不下，便将碉堡的配套房屋放火烧毁，碉堡处于烟火

之中，碉堡虽未攻克，却使敌人尝了烟薰火燎的滋味。另有一次，大队驻在聊城县城东十几里路的付老庄，准备在这里打击过路之敌。部队进驻该村后村封锁消息，时至中午，果有一股敌人从城内大摇大摆地走出来。这一带是敌占区，敌人料想不到有我部队在此宿营，径直向村边走来。付老庄有土寨，大队全部人员隐蔽在墙内，当敌人走到村边时，大队一齐开火，猛烈射击，毙伤一些敌人，残敌狼狈逃回城内。

运东大队与敌战斗颇为频繁。一九四一年，我们有一个粗略的估算：每月平均大小战斗有四次，这样一来，大队声威大振，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敌伪由于不断遭我打击，平时很少走出据点。在一九四一年秋，聊城之敌纠合日军百余人、伪军近千人出城扫荡抢粮，在我得到确实情报后，决心阻击敌人、锻炼部队，打一个坚守战。于是，大队在聊城东南方向裴寨一带部防，构筑简单工事，坚决阻击来敌。果然聊城的敌人出动了，他们拂晓出发，上午九时左右来到裴寨，当敌人进入我们的射程以内时，突然遭到我们的猛烈袭击，前进的敌人卧倒在地不敢前进，过了一会儿，敌人的炮兵开始向我轰击，掩护步兵前进。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激战后，我们阻击杀伤敌人的任务基本完成，村内群众又全部转移，随将部队撤到指定地点。事后，我们得知，这次战斗，敌人伤亡数十人，将尸体和受伤人员用牛车拉回聊城。我们也有牺牲，有一位连指导员及五名战士光荣牺牲，我们运东大队的副大队长王雨田同志及十余名战士负伤。这次战斗影响很大，广大群众称赞我们“真棒”！，是聊城人民的子弟兵。从此以后，小股敌人已不敢远离县城进行窜扰。

后来，敌人加紧推行碉堡政策，安置了一些新的碉堡，

聊阳阿三县的敌伪统一行动，大约在同一时期，在三县结合部的地区增加了很多碉堡，真是碉堡林立，彼此相望，每个碉堡各驻有一个连或一个排的兵力，挖掘一些封锁沟，妄图限制我军的活动把我们挤出去。敌人的碉堡虽然多了，但他们兵力分散了，非常惧怕我军的打击，整天龟缩在碉堡内，不敢轻举妄动，有的伪军则想方设法同我军拉关系，乞求我军不打击他们。敌人的这种动向为我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利用敌人为我们做事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我们做工作，有的碉堡为我们掩护伤病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情报，有的还卖给我们弹药。这样，从外表看来，敌伪碉堡多了，似乎可以限制我之活动，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便利了我们，我们的对策是：对于敌视我们，坚决同我们做对的据点，我们便用大的力量封锁、打击他们，逼着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例如对花牛陈据点，东阿县的官粮门（村）据点的敌人，便是采取这个政策对待的；对于那些不死心塌地当汉奸，同我们关系好的据点里的敌人，我们就采取外紧内松的政策，不暴露他们的面目，这样使他们放心与我们合作，例如对聊城县的周店据点、于庄据点、东阿县的孙郭据点、阳谷县的七级镇据点，便是这样对待的。

运东大队经过一年内时间的磨炼，使队伍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有显著提高，既能单独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又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和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本事，有时还配合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例如在军分区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对茌平县南部打击汉奸齐子修部的战斗。茌平南部汉奸齐子修安置的门李庄据点，直接威胁着运东地委、军分区和专员公署的活动地区，经围攻两日，敌人头目被我击毙，残敌放弃据点逃

跑，从而拔除了这个据点，解放了一大片村庄。

运东大队于一九四二年更名为运东军分区第二支队，不久，又更名为军分区第三团。这支部队在聊阳阿三县边境地区，先后战斗约四年之久，发展成为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英雄部队。正当这支部队在这个地区大有作为的时候，因国民党胡宗南部妄图进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便奉命调到陕北保卫延安去了。

四十八年的时光过去了，想想过去的艰难岁月，看看现在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无限的深思。为了怀念这支英雄部队，缅怀对创建这支队伍做过贡献的人，怀念那些并肩战斗同呼吸共命运的老同志，虽然我的写作能力和记忆力已不如过去了，可我还是决心把这些情况记录下来，以缅怀前人，启迪来者，庶可自慰。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于天津大学

忆聊城抗日斗争片断

刘昭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我的家乡——聊城。鲁西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日寇进占以后，一面四出疯狂扫荡，实行血腥的“三光政策”；一面与地方上的汉奸、土匪、恶霸相勾结，残害百姓，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一时局，我党及时加强了领导，组织青壮年，联络知识分子，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地开展了敌后抗日斗争。至一九三九年初，逐步发展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初，正式建立了县政府。第一任县长为张武云同志，一九四〇年冬换了牛连文同志任县长，到一九四一年冬是第三任县长张侠，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一九四〇年县政府建立后就成立了县大队（也叫基干大队，相当一个营的武装）。大队长是段景秋同志（城南老韩庄人），大队付是韩培城同志（城南韩庄人）。指导员是谭浩安同志（城南谭庄人）。下设三个中队。县大队受县长直接领导。当时是游击环境。县政府和县大队没有固定驻地，主要活动在聊南一带。

一、扩大影响，巩固政权

我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参加革命的，一开始就被编在聊城县大队。

当时的形势处于敌强我弱，我们的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来得及打开局面。抗日民主政府在财政上非常困难。而一些游击区的伪保甲、大商户对我们持怀疑态度，不肯向我们交粮纳税，却向敌伪政权交粮交款。为了扭转游击区这种抗粮抗税、资助敌伪的局面，县委决定开展锄奸锄霸斗争，打击最坏的，争取中间，团结进步人士，以巩固和扩大我抗日根据地。

记得是一九四一年，在敌占区许营，有个开酒锅的资本家，名叫李丙煌，是个大户，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和顽伪势力的上层人物多有往来，他不但主动向伪政权讨好交税，还散布抵制抗日政府税收的舆论。县委决定他做为突破口。县长牛连文同志和县大队长段景秋同志命令二中队副队长崔怀生同志率领六班战士，深入到敌占区许营执行任务。参加的人有我，还有席庙村的席建生、席守成等，我们趁夜间来到许营，摸到他的酒店，但李丙煌已逃跑在外，我们只抓到他的会计，就让他把账本交出来，他说柜子开不开，我们只好强行将柜子扭开，从账里证实了他们向敌伪交粮款的证据。于是责令他转告李丙煌，今后如再资敌，我们将不客气；并指定今后必须向抗日政府交粮纳税。没收了店里的现钱，将他的酒锅也给抬走，以示惩戒。临走还找到一只水壶，灌了一壶酒提上，准备带回去给同志们改善生活。由于路太远，行军是一个托累，半道上只好扔掉了。从此以后，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抗日政府就在附近，而且说来就到，行动神速。谁好谁坏都有本账。于是游击区的伪保甲和商户不敢再抗，纷纷自动向抗日政府交粮交税，就连城里四关商户，也都寻找关系，来向我抗日政府交税了。

二、切断敌人的动脉

一九四二年，斗争环境恶化，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日伪军采取了碉堡政策。一时间在我根据地内，强安据点，碉堡林立，步步为营，到处布满封锁沟。无辜群众时常惨遭杀害，战斗极其频繁紧张。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被迫缩小，敌人又拥有汽车、摩托等交通工具和骑兵，据点之间都有电话互通消息，经常是我们一有行动，敌人就倾巢出动进行扫荡，严重威胁着我抗日武装的活动；对老百姓则是拉夫抢粮，欺男霸女、杀烧劫掠，惨无人道。为此，我县政府做出破坏敌人交通线的决定，以利我们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成立了聊城县扒路委员会。由聊城县二区高家香坊的高士路同志担任委员长。在城南二区于集一带组织群众破路，经常利用夜间，各村一齐行动，在公路上挖地沟。那些沟大约都有一米多深、两米多宽。这村通到邻村，村村串连，互相沟通。这样一来，敌人来了我们就可以很快地借沟内隐蔽，迅速转移；也阻止了敌人的机械化进攻。有机会就打他的伏击。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被我们搞得晕头转向。有效的保证了聊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敌人据点的电话，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和发展，也是一大障碍。他们利用电话传递情报，对我抗日武装活动进行监视和扫荡。我们就想方设法破坏敌人的电话线。记得有一次，大约是一九四三年秋后，在城南周店和谭庄的日伪据点，经常联合出动到我解放区抓壮丁，抢粮，搞破坏，对我们威胁很大。县公安局局长李诚同志就派我带领看守班战

士，在夜间去破坏周店和谭庄之间的电话线。我们一个班乘夜间来到周店和谭庄中间的老韩庄附近，经过察看，我们把电线杆子弄倒后，用钳子把电线剪断，由于杆子不好推，我们就逐根爬上去用钳子剪，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弄了他一里多地的电线，约有二百多公尺。当时我们没有工厂，这些战利品还没法加工利用，只好把这些剪下来的铜线，第二天运往解放区的一个集市上卖掉，换来的钱为公安局的同志们改善了伙食。其他地方的抗日武装也经常这样干，搞得敌人修起这边，断了那边，一点办法也没有。

三、游击看守所和处决罪犯

抗日政府初建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开局面，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方面，当时县政府只设公安特派员一人，一九四一年，地委派孟克来聊城担任这项工作，以后逐渐发展建立了公安股，到了四二年，由于形势恶化，斗争更趋尖锐复杂，根据上级指示，十月份县政府决定正式成立公安局，由李诚同志任局长，人员从县大队等单位抽调组成。当时，我们处于游击战争阶段，县政府没有固定地点，只有一区和二区两个区政府。一区在城南周店以西，区长为周店的镇长王子彬担任，管辖范围是周店以西谭庄一带。二区区长为城南韩庄的韩效民，管辖范围是周店以东八大寨、于集一带，东到王官庙。到一九四二年又成立了第三区，区长为张佃一，管辖范围是王官庙以东，顾官屯一带。县政府、县大队主要活动在城南一带。斗争目标，除和日伪军游击作战外，对那些罪行严重的汉奸、特务、土匪、恶霸随时给予狠狠打击，

经常是派人夜间摸到他家，抓住后立即执行枪决，杀一儆百。但也有些问题一时没搞清楚的，不能马上枪决。又要防止他们给敌人通风报信，或者跑掉，只有先抓起来再分别处理。一来二去，人抓的多了，需要一定的力量看管。四二年冬，县政府决定调县大队一连六班到县公安局担任这个任务。我当时在六班当班长，接受任务后，即开始着手建立起聊城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个流动游击看守所。当时在押犯一般有十几个，多的时候二、三十个。我们当时没有固定的监房，办法是把罪犯们分别编成几个班来管理，县政府走到那里，我们就带着这批犯人跟到哪里。到达后，找几间农民的车房、草房让犯人住进去。每一个班的犯人，用绳子捆在一起，给他们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一切行动要报告，如睡觉时翻身都要经过看守的允许。我们就在外边站岗警戒。罪犯们并不那么老实，有些人也是时刻想逃跑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十几个犯人住进刘皋一家农民的房子，半夜接到命令，继续行军又走了，也没发现什么情况。谁知道第二天老乡追来，说是我们把他的房子给挖了个洞。我们去查看才发现，就是关押的犯人晚间趁看守的岗哨没注意干的。幸亏由于行军转移，他们没有得逞。我们只好向老乡赔礼道歉，赔偿了损失。从此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加强了对罪犯的看管制度。

那时候我们流动性很大，经常要转移驻地。带着一些犯人，确实是很大的累赘。县政府的人员较多，每到一个村子，时常为找不到房子为难，既不能叫犯人住房子，让政府干部露宿，又不能把犯人放在院子里，给他们以钻空子逃跑的机会。我们一时也没想出很好的办法来。有一回，我发现老乡家有个存放红薯的地井，只有三米多深，上口直径不过

一米左右，底下还真不小，有四、五个平方米。我想，要是把犯人放到这里是个好办法，当即决定，把十几个犯人沿着梯子押到下边去，然后，把梯子抽上来，派两名战士井口站岗。这样，既保险，战士们还能轮班多休息一下。以后，一到地点就找有地井的地方。自从使用这种独特形式的监狱以来，还真起了作用，没从这里跑过一个犯人。

那时候敌人扫荡，搞“铁壁合围”。发现我抗日武装，就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企图消灭我们。一九四二年冬，日本人和汉奸对聊城城南一带进行大扫荡，我们县政府被敌人给圈住了，上级决定要我们突围，从敌人的缝隙中钻出去。可是我们带着十几名犯人，这对突围是很大的障碍。我又想到利用地井的办法。就把犯人分别放进两个地井里，上面放上两个大石磨盖住，又搬了两个大石碾压在顶上。一切安排妥当，我们就跟随县政府突围走了。两天以后，日本军扫荡过去了，我带着几名战士回到原地，找到那两口地井，打开一看，十几个犯人一个也不缺，平安无事的呆在里面。但是，我们的同志，聊城县第二区区长韩效民（城南韩庄人）却在这次突围中牺牲了。

抗日战争初期，那是一个非常时期，是战争时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和政权机关是创建阶段。一切围绕着抵御侵略者，摧毁旧政权，巩固发展新政权的武装斗争。一些具体政策和法制都还很不完备。在法律方面还没有一定的成文法。关于逮捕、判决和执行镇压案犯的权限和方法，只有一般原则的规定。当时，对于那些罪行昭著，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土匪、恶霸分子，只要抓住，由县长批准即就地处决。对于那些罪行不太恶劣，经过教育有悔改表现，态度好的就

释放了。一般只关押一个多月就做出处理决定，没有长期羁押的犯人。我们对在押犯也做了明确规定：凡趁机逃跑的，抓回来就从严处理。事实也是这样执行的。有一次我带着十几个犯人住在城南孙堂，夜间被日军包围了，我们看守班的任务既要看押罪犯，还要保卫县政府人员的安全。当时鬼子来得诡秘、突然，等我们发现有情况时，已经到了跟前，没有来得及转移犯人，就和敌人交上火了。我们保卫着县政府干部，边打边撤，很快突出去了。那些犯人呢？也都四散奔逃了。可是，等到敌人扫荡过去以后，没几天功夫，就有十几个犯人陆续找到县政府驻地，回公安局来投案了。通过他们的表现，说明他们是相信我们的政策威力的。经过局长研究批准，对他们这十几个人进行了教育，再次交待了政策，都从宽处理释放回家了。

那时候和日本军遭遇打仗是经常发生的，当时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遇到敌人扫荡，情况紧急的时候，县长就向我们下达命令，对那几个重犯、要犯，在战斗中带不出时，可以就地处决，决不能让他们跑掉。根据就是经县长批准，交给我的名单。回忆那一时期，直到日本投降（一九四五年）那几年当中，我一直担任这个工作。凡经县公安局抓获的，罪行严重的汉奸、特务、恶霸等。基本上都是经我们手枪决的。前后大约有二百多名。如大土匪窦华如，汉奸六阎王、大恶霸亢甲范、高屯的杜广海、杜广燕等人，特别是杜广海、杜广燕二人，他俩是亲兄弟，在城南高屯一带独霸一方，手中有枪、专门抢男霸女，无人敢惹。高屯有个姑娘，许配盲屯，他弟兄俩见姑娘貌美，硬抢到他家与杜广海为妾，开始他把姑娘藏起来不叫人看见，后来他也不避人了。村里人谁都

知道，但女孩家的人谁也不敢去要人。一九四一年，我们把杜家兄弟逮捕，审讯后，在顾官屯大集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布了他二人的罪状，由我班拉到村边枪决，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那个姑娘被救出后，不愿再回家去，就和县大队二中队长崔延居结了婚。

我们那时候处决人犯的方法，不象现在这样，按一定程序，先宣判罪状，然后绑赴刑场执行。那时候，一般是不说给他本人知道，只叫他在前边走着，从后边开枪击毙。打死后，把事前写好的罪状布告，放在罪犯身上，我们就走了。也有个别罪行极其严重，在群众中影响极坏的罪犯，在环境许可下，就把他带到集镇上，趁赶集人多的时候，向群众讲明他的罪状，然后带到空地上，当众枪决。随后贴上一张布告。当时没有印刷布告到处张贴的条件，都是毛笔写的，这已经是很正规的了。

四、巧捉伪警长宋保山父子

一九四三年是大灾年，饥荒严重，环境更加恶化。县委为贯彻“精兵简政”的政策，部队都化整为零，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惩办汉奸，分化瓦解伪军政人员，敌我双方斗争更加激烈。敌伪军为瓦解我军斗志，到处抓我们的军抗属，烧军抗属的房子。县公安局保卫战士孙秀林同志（刘道之村人），敌人抓他的家属没抓到，捕了个空，一把火烧了他家三间北屋，烧得一干二净。类似事件非止一起，敌伪军不断向我根据地进攻，一些伪警察，伪保长们狗仗人势大肆搜捕杀害我抗属。记得那年，也就是刚入冬的时候，由

于聊城东关一个伪保长告密给伪警长宋保山，一次就将我军属数人抓去枪杀。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县公安局李诚局长把我找去，向我诉说了宋保山的罪行，命令我带几名战士把他抓来。接受任务以后，我带上副班长杨金玉和另外两名战士，由一名被害人引路，中午从刘子元村（县政府驻地）出发，下午五点多钟走到张飞庄，再往北走就是敌占区了。这个地方靠近县城，城里驻有大批伪军。东关、柳园等又有好几处据点炮楼，还有一支伪军的护路巡逻队。宋保山家就住在柳园。当时天不黑，不能再往前走，我们就找到张飞庄的伪保长张庆成（两面政权人物），在他家吃了饭，隐避到天黑以后，又出发继续往北。我们心里明知道这是一步步往敌人巢里闯，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完成任务，可没有一个犹豫的，都是精神抖擞，毫不畏惧。我们到了柳园，刚进村，就听见狗乱吠起来，我们隐蔽在暗处停了一阵，听听没动静了，即由被害人领我们直奔伪警长宋保山家大门。这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多了，他家大门紧闭。我看了一下，院墙不算很高，就命令一个战士翻墙进院把大门打开，留下副班长杨金玉守住大门，我带着其余两名战士进到院里。看了看，各屋都已熄灯，屋门关的很严。我想如果硬闯，宋保山有了准备，必定持枪顽抗。枪声一响会暴露目标，招来敌人，影响完成任务。当前任务是必须把罪犯抓回去。对此，应当以智取为高。就示意给那两个战士，冒充伪军去叫他的屋门。在此之前，我已经侦察好宋保山的卧房是院里东屋，于是就靠近窗户招呼道："保山兄，保山兄，"宋保山睡意朦胧地问了声："谁呀？"我回答："护路队的，天太冷了，借个光让我们烤烤火……"宋保山万没想到我们会摸到他屋门口来，

答应了一声，随即披衣下地开了门。我们在门开开的一刹那，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没等他看清来人是谁，窜上去就把他捆住了。随后命令他把北屋门叫开，把他父亲（也是个伪保长）也抓起来。就这样从进村不到一个小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押着两名罪犯，迅速离柳园，神不知鬼不觉，连夜回到刘子元村县公安局归案。经过审讯，二犯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不久，就在于集集上将二犯处决。还贴了布告。从此以后，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有所收敛，不大敢伤害我们的抗属了。如县大队长段景秋同志的家就住在周店，那里就有敌人的据点，段景秋同志也经常回家去。敌人明知道，但从来不敢动段本人和他的家属。

以上仅就我所记忆的片断写下来，只不过当时火热斗争的一鳞半爪而已，事隔四十年开外，一时回忆不出更多的情况，就是现有这些也很不完正，很不系统。只作为一点资料供研究参改。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八年我被调到河北平山县华北局党校学习去了，以后，聊城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以上情况有的时间地点，甚至人的名字都可能记错了，希望老同志给予更正。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

于北京

在聊堂和筑先县时期

对敌斗争情况的片断回忆

贾　强

一、在军事教育团

我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经窦继作同志介绍和考试，参加了范筑先将军的军事教育团学习。团长由范筑先司令员兼任，副团长是老红军干部袁仲贤同志。其课程，除政治课外，还有游击战术、步兵操典、实际操练、野外演习等一系列较系统的军事科目。是年九月，由陈锡庆、丁香山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月份，我们联名告发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扣发学员棉被、军装的事。经过斗争，结果将扣发的棉被、军装向学员进行了补发。时间不久，担任游击课程的袁仲贤同志调离，又派了不学无术的国民党旧军官接替。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又发动了不听他讲课的斗争，每逢他讲课，我们就起哄，结果胜利了。而后，再也没见到过这个国民党的旧军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当日寇进攻聊城时，我军事教育团离城向西南方进行了转移，十六日，宿营在莘县的八

角庙村，这时，教育团秘书陈锡庆同志给我谈话，叫我到冠县×区任区队副，我正准备到任新的工作岗位，我内兄曹英荣找到了我，说家里有事叫我回家看看，经向教育团秘书请假，同意了我回家。

我回家的那天，是十一月十七日，正是这天，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莘县抗日县长吕世隆同志。又听说日寇于十一月十五日攻陷了聊城，范筑先司令英勇殉国，致使鲁西北的形势变的极为紧张。我们的部队不知转向何方，使我与部队失掉了联系，此时，我的心如火燎，坐卧不安，难过的抱头痛哭了一场。无奈，我只好依靠地方党组织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于十二月间，经本村贾鲁峰同志介绍，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安排我做党的地下组织工作，并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肩负着其他几个村党支部的联系工作。这应特别提到与聊城县境内的庞庄庞玉香同志的联系，所进行的散发传单，破坏莘聊，莘堂敌人的电话线等革命行动。以及从庞玉香同志家至莘县马夹河西范庄范春荣同志传送文件的工作。就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间，在庞庄村又发展了庞金星、庞金岱两个党员，回想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深怀战友之情。

二、在聊堂工作团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从莘县一区调地委党校学习时间不久，便参加了地委为开辟聊堂，所组织全体二百余学员的工作团。

聊堂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顽匪常期统治区。特别是一九三八年聊城失守后，日伪顽杂勾结地主、豪绅，对这个地区的统治，更是变本加利，荼毒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地区，我们虽然于一九四〇年冬，由莘县独立营和聊西办事处，在李海、白堂据点，以及候家一带与敌人周旋过多次，但因寡不敌众，加之我们工作基础差，始终没有站住脚。因而，聊西办事处的同志，只好经常在莘县二区一带活动。时隔几年，我们再次派住工作团，对工作仍极难开展。如聊西南有有名的敌伪军郭培德 的沙镇据点， 郭培德的外号郭家宰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齐子修匪部，在李海、白堂、东候家、孙家、郑家等村都安有据点。一九四一年秋，齐匪旅长邵青胜，又在聊莘边沿的莘县二区的安头村，赵庄村，姬家等村安了据点。莘县的日伪军在莘北的铁佛寺、西吴家、燕店等村安了据点。莘县一、二区马颊河以东又全部沦陷。所以聊西地区就成了敌人巩固的后方。虽然如此，我们仍对聊西地区的敌人，坚持了坚决的斗争。我们采取了派遣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的办法，做敌伪军的工作，并及时了解敌情，向我们党传送情报。而且，通过团结士绅名流，作敌伪军上层人物的工作。如莘县二区田庄村的党员蔡新贞，就是我们打入李海匪军内部的地下党员。共产党员蔡朝光同志，则打入了齐匪营长王金合在孙家的据点。一九四二年八月，经他给我军送情报，划地图、定暗号、开寨门，在我军分区赵健民司令员的指挥下，一举全歼敌人在孙家据点的一个营的兵力。

一九四三年春，我莘县二区地下秘密区委被破坏，组织委员王明训、宣传委员楚金宝，被齐匪在安头据点的旅长邵

吉胜逮捕。通过聊西侯家据点的敌伪关系齐玉祥取保放出，而挽救了两个同志的生命财产，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破坏。

一九四二年六月间，后王家据点的齐匪营长李文宝（我们的敌伪关系），因他的士兵贾遂城逃跑，被他的部下以抓逃兵为名，从莘县二区贾庄抓走了二十八名无辜群众，我敌工人员找到李文宝讲明当前形势和对敌政策后，结果，将二十八名被害群众全部给予释放。

一九四二年，聊堂一带遇到了百年来未有的特大旱灾，庄稼稞粒未收，加之敌人的横征暴敛，人民群众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致使有的下关外，有的逃河南，有的卖土地、卖家具，甚至卖儿女，弄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饿死人无计其数，大街上，庭院里，房间内和路旁到处可见。

在天灾人祸的情况下，聊堂地区的工作开展，更加困难重重。在军事方面，敌人是大军压境，占绝对优势；而我们工作团人员则手无寸铁，赤手空拳。在政权方面，敌人从上到下，从县到区、乡、村，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只要敌人一声令下，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的工作人员下乡后的一举一动，敌人随时可知，加之，我们是外乡人，人地两生，进村之后，没有立足之地，敌、友，我都分不清。而且，人民群众常期在敌伪顽军的欺骗宣传下，缺乏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正确认识，怕变天的思 想 相当严重，所以，对我们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故直接影响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

以上，是我们工作团未进聊堂前敌我斗争和天灾情况。这些情况，说明了聊堂地区的敌我斗争是非常尖锐、 复 杂的。正因为这样，为开辟这个地区，派了我们工作团。

记得，在我们工作团到达聊堂县的第二天拂晓，还没有和所在区的负责人接上头，敌人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遭到了敌伪军郭培德部队的突然袭击。我训练班负责生活的大队长牺牲了（元朝县武委会主任），还有的同志负了伤。但我们工作队员毅然进入阵地开展工作。我被分到米楼村，由解平同志介绍，住到了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中农群众家里，房东有两个孙子，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对接受新事物较快，有进取心和正义感。由于一进村人地两生，只好通过他们小兄弟俩了解该村的阶级状况，并让他们牵线与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取得联系。同时，组织青年和儿童进行站岗放哨，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日子一长，我便与很多贫下中农接上头。经过促膝谈心，讲解敌人必败，我们必胜的大好形势，说明共产党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党，为使穷人翻身得解放，而实行减租减息、借粮、赎地，实行合理负担，反对地主恶霸，反对贪污。通过这些内容的宣传教育，贫下中农开始发动起来了，对我们比亲人还亲起来，便主动的给我们站岗放哨，随时随地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过了春节，正月十五日前，根据解平同志的介绍，我和村里几个青年演了以赎地为主要内容的自编话剧，这对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阶级觉悟、激发赎地斗争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我正在发动群众进行赎地斗争的时候，突然传来我地委党校负责人，又是工作团负责人的王东海同志被敌人杀害的不幸消息，还杀害了我赎地积极分子和家属数十人。当时，不少工作队员对这种冒险做法提出了意见。因此，地委决定全体队员暂时撤离阵地，集中在莘县的牛王庄（马颊河西边）进行整顿。我们到了牛王庄之后，地委首先召开了追悼王东海同志的大会。（东海

同志是莘县城南×村人)把东海同志的后事安排好后，地委决定多数人回原单位，少数人留聊堂县继续坚持战斗。我是被留下的成员之一。

三、在聊堂县三区

我留聊堂县后，被分到三区任区委书记。当时的区长是孙锐同志，区部只有几个人，经常在聊莘边境的莘县二区一带活动。我到聊堂三区的第一天，住到了刚解放的候家据点。一开始就碰了个大钉子，被国民党地下党员，地主恶霸，伪保长，敌特等把我轰了出来。敌人并借此在莘县的河店集上，在聊堂的沙镇集上，大肆宣传不让八路军进村啊！八路的工作队被赶跑啦等，向伪顽郭培德报功。

我住的第二个村是北候家村。住村之后亦是人地两生，这时，莘县派进敌伪沙镇据点的我敌伪关系给送信说："北候家村敌特×××，把八路军派住了工作队的事，报告了郭培德，并要求派人逮捕"。因此，我只好白天在村里工作，夜晚在树林、坟地里游击住宿。为了站稳脚跟，我在紧靠莘县边境的五圣庄发动群众，我三区部也不断在这里活动。通过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广泛发动，很快组织起民兵，自卫队、农会，开展起赎地、反霸、反贪污的斗争。并从民兵、农会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成立了党支部。

在扎好根，站稳脚的基础上，我们便向齐匪子修盘踞十三、四年之久的李海、白堂村进驻。在这期间，县委还先后从莘县调来一批干部支援聊堂对敌斗争。如调王兴华同志任区委组织委员，王月斋同志任公安助理员，郭毅然同志任区

抗联主任，张同秋同志任财务会计，×××任民政助理员，×××为财政助理员。这样，我们三区的党政机构人员就基本搭配齐全了。

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教导，千方百计的争取对敌斗争的一切胜利。一九四五年，齐匪的第六旅旅长王魁一，带领人马驻聊城的前　后化村时，经我敌伪关系赫增仁向我敌工人员送情报，由我军的二十二团长途夜袭，而一举歼灭。打死了匪旅长王魁一，缴获战俘五百余人。并缴获步枪五百多支，机枪六挺，以及大批其他物资。

一九四六年春，上级决定把冀南一地委聊堂县的聊城部分，划归冀鲁豫四地委的筑先县。从此，聊堂县三区便改名为筑先县三区。我区全体干部均留筑先县三区不动，我仍任区委书记，并提为县委委员。

四、在筑先县三区

聊堂县三区改名为筑先县三区后，县委又派来新提拔的孟××任宣传委员。我们的人多啦，于是便开始兵分两路发动群众，一路从三区的西南庞庄为依托，向封建地主势力和伪顽堡垒糖坊村一带进军。糖坊是齐匪营长李顺德的家乡，该人无恶不做，群众恨之入骨。开始群众不敢动，怕变天，当发动起来后，群众的斗争情绪便如火如荼，没收了李顺德的土地，拆掉了他的房屋，把他抓起来进行了枪决。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说：“驱散乌云见青天，翻身不忘毛主席，解放不忘共产党”。另一路，是从三区的西北五圣为依托，向齐匪

盘踞十四、五年之久的李海、白堂村进军。我们进住李海、白堂村后，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个别发动，组织了民兵。农会，青年救国会、自卫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培养了建党对象，领导群众搞起了减租减息，赎地斗争，建立健全了乡村政权。之后，在李海村又进一步发动了向齐匪营长李万保和恶霸地主又是汉奸的李广成等人的斗争。同时，在五圣、李海、小孟家、糖坊等村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而且，庞庄党支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时，我们在白堂村培养提拔佃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孟继雨同志为三区副区长。

一九四六年春，为活跃农民文化生活，鼓舞革命斗志，我们在李海村唱了三天大戏。周围多年没看过戏的群众，从几十里路都赶来看戏。这不光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而且震慑了伪沙镇据点的郭培德。我们之所以敢这样干，跟鲁西北对敌斗争形势的好转，与莘县县大队对沙镇伪据点不断包围打击分不开。

一九四六年六月间，根据县委的决定，我随县委书记陶东岱，县长张侠，县政府秘书唐××，区委书记暑光，张晏清等六人，调冀鲁豫区党校学习去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于湖南长沙

回忆筑先县（聊城）敌我斗争情况片断

李桂臣

我是聊城市于集乡郭庄村人，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三九年五月，经本村李欣如（现名李丙仁）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李欣如同志外调，由我担任村支部书记。当时我支部共有六名党员，领导我们支部的先后是苗纪臣和宗暑光同志。

那时我村处于敌占区，经常遭敌剿袭和抢掠。记得宗暑光同志第一次找我支部接关系时。（同去的还有梁景星同志），正走到我村头，敌人也早到了村头发现了他们，宗暑光和梁景星同志便机警地越过几道院墙，敌人就在后边乱喊乱叫的追赶、搜查。这时，他二人正巧碰上了我，我问："你们是哪里的，到这里来干什么？"宗暑光同志说："找李树生（我的原名），经对暗号和看介绍信，方知是自己人，于是我便立即当着本村群众，把他们安排到粉坊劳动，迷惑敌人，敌人搜查了一阵，也没查出来，就抢了些鸡、鸭滚回了据点。

当时我们支部的任务是：（一）、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政策；（二）、发展党员，扩大力量；（三）、了解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及时报告上级。

我村周围数里内有好几个敌伪据点，其中比较大的日伪据点有花牛陈、伪赵振华周庄据点，还有贾庄和潘庙的伪炮楼等。

县委认为我村地处于集以东各村庄的中心，党员多，力量强，是开展党的工作，及时了解敌情的有力之地。为加强我们支部的武装力量，于一九四〇年秋，发给了我们五支大枪和数枚手榴弹。枪弹是由我和李欣如，李炳春找到县委驻地——于村村，经县委书记李苏亲自发的，并接受了任务：（一）、要积极扰乱和监视日伪据点的活动，牵制、疲惫敌人。（二）、积极破坏日伪据点之间的电话线，切断敌人之间的联系。（三）及时向上级回报敌情。（四）作好伪军家属工作，并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

在扰乱敌人方面，我们把重点放在了日伪据点的花牛陈。因此，除夜晚打枪袭扰疲惫敌人不能睡觉外，还不断分割花牛陈至周庄之间的电话线。当时，没有割线工具，就用手慢慢地折断。时间一长肚子饿了，在秋天我们就摘些小枣充饥。

为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建立我们坚强的堡垒村，我们一方面通过日伪军花牛陈乡公所秘书李树森了解情况（我村李欣文也与伪乡公所有联系）；一方面在选村长时，事先进行串联发动选举共产党员李炳春为村长。这样我们就可用公开身份开展工作同敌人作斗争了。

我和日伪花牛陈乡公所秘书李树森是同村弟兄，又是高小时的同学，为了进一步作好他的工作，经常利用晚上到他家去玩，他对我也无话不说。后来，他知道了我与八路军有联系，但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除对我不断介绍日伪军的情况外，还答应做伪乡长郭云同的工作，叫他多做好事，留

条后路。而且，李欣文也常劝说郭云同。经过我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多次说服教育，使郭云同认识到了干伪乡长没有出路，与人民为敌，最终是死路一条。所以，于一九四一年一、二月间，郭云同便带伪乡公所的三十多名伪军和枪枝反正了，反正后被改编为我运东第三大队，郭云同任大队长，李欣文任副大队长，李树森任秘书，我们又派共产党员李希进任干事。

运东三大队成立后，到四一年夏便扩大到七十多人枪。时至冬季，由于没有了青纱帐作掩护，增加了游击战的困难，同时，敌我力量也很悬殊，加之运东三大队人员杂乱，不少人贪生怕死，经受不住艰苦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以郭云同为首的又投降了聊城伪宪兵队，当了宪兵队长，我们派进去的李希进也叛变投敌，李欣文则到了东赵庄当了汉奸三支队。

随着运东三大队的叛变投敌，我们这个支部也就暴露了，致使驻聊日伪军多次围剿我村。有一次聊城宪兵队带着四十多个鬼子半夜包围了我村，我和李欣如跑了出来，共产党员李炳春被捕，我和李欣如的家被剿。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书记袁寿宸同志召见我们谈话说："你们支部已经暴露了，敌人在到处抓你们，不能再回村工作了，县委决定调你们到县里工作。"李欣如任秘书，我任交通干部。

汉奸郭云同于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我在上海枪决，李树森在肃反时被判刑十五年，死于劳改队，李希进下落不明。

我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到县委工作。当时县委人员不多，县委书记是袁寿宸（副书记主持工作），组织部长是杜治国，组织干事刘恒光，宣传部长于化民（后改为敌工部长）

宣传干事刘泽民，还有王如章、冯秀林等同志，秘书是李欣如。县委公开的名称是民运队，跟县大队一起活动，有时也单独活动。主要活动在一、二、三区，以二区为主。

一九四三年春，于化民同志任敌工部部长，我随他到敌工部任内勤，张宗训同志任外勤，还有王竹园，李广盈、赵健民、贾涛等同志，为使敌工工作方便，除了一部分时间跟大队，县委活动外，绝大部分时间在敌占区活动，我们经常住宿的地方有卓庄王竹园同志的家，他家离敌据点近，非常有利于做敌伪工作。另一处是王河羊村王天年的家，这里是我们的联络站，再就是东阿县的双庙村王法孔的家，因那里是聊、阳、阿三县交界处，敌工工作总联络站就设在那里。三县敌工工作的总负责人是梁仁魁同志，他经常住双庙。有一次我们正在双庙开会，交通员送来了军分区的信，叫我们想法抓到聊城城内治安军的团长（因为我们军区一位领导同志被捕，经内线做工作仍不放人，只有抓住治安军的团长，才能换回我们的同志），经县委研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武工队孟克、韩学水等同志，他们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便捉住了治安军团长，而后换回了我们的同志。

我在敌工部期间和日伪较大遭遇有三次：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我和县委副书记袁寿宸同志，还有梁建忠、冯秀林同志，住在顾官屯西边的大王庄一穷人家里，同我去的还有政府的审讯干事王××（名字记不清了，没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四人还没起床，房东到外边挑水发现了敌人，便挑着空桶跑回来急慌地喊我们："快起，敌人进村啦"！当我们起来一看敌人已经堵住胡同口了，我便急速地窜过几道院墙，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在战斗中，三区队为了掩护群众，伤亡

十几人，王干事因是近视眼，在向外冲时跑到了敌人的队伍里，当场被敌人用刺刀挑死。第二次，是我跟随县大队、县委、县府活动，当时住于材庄，听说聊城增加了敌人，我们当晚就转移到茌平以南的石庄、王楼村住下。第二天拂晓，也就是一九四四年的六月二十七日，聊城、东阿、茌平、博平四个县的日伪军全部出动进行这四县的边界合围。我们筑先县的县大队三个连和县府、县委、敌工部被团团陷入敌包围圈，我们经过左冲右突，整整跑了一天，才突出重围。我们的好部长于化民同志，就壮烈牺牲在这次突围之中。当他被敌人捕获就挨了敌人三刺刀，待他寻机跑掉住在门庄时，不料又被敌捉住，野蛮的日本鬼子竟把他投入坑内，被活活淹死了。我们的民政局长韩教民同志也是牺牲在这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而且，县大队为掩护我们突围，更是伤亡残重。第三次，大约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敌工部在东阿县的秦老庄，用粮票总换了一万多斤谷子，派我带着二十多辆手推车和十几辆老牛车，把粮食运到大白庄。为防敌截粮，选定了夜间运送，当途经界牌村至东董村几里路的大沙河时，已是晚十点左右。这时，从前边过来二十多个伪军，随我执行任务的孙华山、张庆连一看情况不好，便逃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枪，我便跑上前去左放几枪，右放几枪和甩上几颗手榴榴弹来阻击迷惑敌人，由于夜深天黑，敌人不知我实情，又怕遇上我游击队的埋伏，所以，不一会敌人就逃回到据点。敌人是逃跑了，可是运粮车夫也都不见了，于是我又迅速跑到东董村喊醒了村长，找了二十多个青年，才把运粮车送到了大白庄。

一九四六年初建立七区后，把我从敌工部调该区工作。

（现在的阎寺镇）当时区部设在乔黄庄，我担任南片的工作组长，还有李惠民、纪来云、王英等同志，这个小区南到三里铺、老柳头、聂庄，北到坡苏徐等村，任务是反奸诉苦，增资、增佃，土地回赎。另外，组织民兵扩大武装力量与聊城内的敌人作斗争，以防敌出来抢粮和抓人。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又调我到城关区任宣传委员。区长是赵健民，区委书记先后是刘子华和杨林同志。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收查敌人留下来的物资，从城外运粮救济城内的灾民。在土改时，让我兼一小区组长，负责东北隅、西北隅和北关街的土改工作。四七年大参军，这个小区有二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四七年底，我参加了坡里整党，回来后又调我到工作团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团长是周海舟。一九四八年八月调我又到新七区任宣传委员，区部设在梁庄（现在的北杨集乡），并让我兼南片小区组长，住大胡村，工作重点是宣传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区委书记是王光轨，区长是齐振邦。一九四九年四月，又把我调县委党校任党支部书记。同年七月去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实际是党校）。一九五〇年五月毕业后被分到聊城专区人事科工作，从此，便离开了聊城县。

一九八四年三月

抗日战火中我的一家

李善增

我的家乡在原堂邑县谢家乡林里村（现属聊城市郑家乡）。抗日战争前夕，我的家是个大户：有祖母、父亲、母亲，我兄弟五人，嫂子三人，妻、妹，还有侄儿侄女六人，共十九口人。有地百余亩。在一般年景下，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七七事变"后，战火燃烧到我的家乡，由于日寇的疯狂摧残，使我们全家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和灾难。为了抗日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父子几人，凡能拿动武器的，都投入了抗日战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应作的贡献。

遭敌洗劫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占领堂邑县城后，敌人为进一步控制广大农村，积极发展伪军，建立区乡政权，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我党和抗日政府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亦迅速采取了果断措施。我的三哥当了区委书记、区长后，根据上级指示，立即处决了当地恶棍要充当伪区长的范书田，打死了活动频繁的敌探"邱大眼"，击毙了著名的伪匪张玉山、靳奎峰等人。接着我的三哥还带领区队，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垮了

顽匪刘中孚百余人，驱散了顽固分子李子尊胁迫组建的有枪农户一百多人的反动势力。从而，斩断了魔爪，挫败了帮凶，有力地震慑了敌人，致使敌人一度龟缩在城内，不敢轻易出动。但敌人更加仇视我党我军，特别对我们这个家更是恨之入骨了。

一九四〇年春天，日伪军在堂邑城南李大庄安设了据点。一日凌晨，敌伪百余人窜到我村，妄图抓我的家属，剿我的家。二哥玉增发现敌人进村，他便迅速逃出村，这时被敌人发觉，日寇几个骑兵立即对我二哥进行追捕，当敌人追上二哥下马抓人时，二哥与敌人展开了搏斗，因寡不敌众，又继续逃跑。敌人向二哥射击了子弹百余发，幸未击中，一气跑到二里外的郭子祥村才越墙摆脱敌人。当敌人进村继续搜捕，二哥已跑到郭子祥村前树林深处，因敌人马匹无法进入荆棘丛生的沙丘林带，只好退去。二哥才得到脱险。我父亲发现敌人进村抓人，溜到院子跳出墙外，准备逃走，转眼之间骑马的敌人来到身边。由于敌人未发现父亲越墙和惊慌，随让他溜马，父亲骑马很熟练，想骑上敌人的马匹逃走，但又想到马有群性，怕走不掉，反而坏事，随即将马拴在树上，溜出村外逃跑了。

敌人没抓到我的家属，便将我家的马车、牲畜、衣物、家具等所有财物，全部抢光，就连一个大水缸也不放过。因水缸滚动时烂了才未抢走。

敌人因没抓到人，仍不甘心，时隔月余，又二次闯进我村，纵火烧了我家的房屋、当放火敌人刚撤出村外，全村群众便紧急出动灭火，日伪军闻群众呐喊救火之声，又返回村内，镇压灭火的群众，结果将我家的二十多间房屋烧成一片

瓦砾。面对这种惨景，不要说我一家人心痛，就连全村群众无不为之叹惜。事后三哥回家见了乡亲们却说：“不要难过，敌人妄图烧我家的房，动摇我抗日决心，他们打错了算盘，这更加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烧了我的破房，打败日本再盖新的，烧了平房盖楼房。

我家遭敌人洗劫之后，我们父子无不义愤填膺。首先我大哥学增说：“过去认为三弟、四弟在外打日本保家卫国就行了，我和二弟在家种地过日子，既然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我和二弟也都参军打日本去吧！”二哥应声说：“我和大哥想法一样，让父亲在家照顾家中老幼在外地生活。”父亲也不甘心落后的接着说：“咱们父子能拿动枪支的都去抗战吧”！从此，大哥、二哥和我的父亲先后都参加了工作，大哥参加了区队，二哥参加了县交通站，父亲被安排到县参议室当了参议员，加上我和三哥早在县、区工作，我们父子五人均投入了抗日战争的队伍，特别是对老父亲已到四十多岁的人，又参加了抗战，群众无不钦佩的称赞父亲是“老司令”，之后被传为美谈。

九易其居

自从我的家庭被剿、被抓、被烧后，全家便过起了长期飘流在外的流亡生活。一九四〇年春天，堂邑城南被敌占领后，我家首次迁到聊城西南部的李海村亲戚家去住，仅仅搬去三天，因顽匪齐子修要到该村设据点，我们只好迅速迁出。于是家庭第二次转移到冠县于村、父亲的朋友家去住，在这里住了有半年的时间。冬季，伪国民党二十二旅周致中在日

寇的配合下，从堂邑北部向我根据地推进，占领了辛集、赵庄等村庄，家庭又被迫向南转移。第三次移居到冠县的油房村一个社会关系家，约住了一个月，齐子修又从李海、白堂继续向我根据地进攻，占领了莘县的大小山门、赵庄。我的家庭因受到威胁，故被迫再次转移，因距家乡越来越远，已无社会关系可寻。第四次，经政府安排到冠县大张庄居住，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一九四二年三月，齐子修又占领了冠县的桑阿镇，家庭又因无法存身，第五次移到冠县桑桥村，住了三个月。因齐子修不断出来袭扰，家庭第六次转到莘县焦庄，住了半年时间。这时因堂、冠、莘、朝几县的敌人分进合击，大举进犯解放区，连续扫荡多日，家在焦庄已不好立足，第七次又搬迁到朝北有沙丘林带的郑家居住了一个多月。后来经我解放军民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形势得到缓和，第八次迁到莘县西蒋店，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一九四三年夏季，战争形势开始好转，齐子修从桑阿镇撤退。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我的家庭又向家乡的近处转移，第九次又迁回冠县大张庄，这次又住了一年多。直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家乡全部得到解放，才返回故乡。总之，我的家庭在抗日战争中，过了六年之久的流亡生活，转移了四个县，易居九次八个地方。

父是强者

一九四〇年春天，家庭移居外地，我的祖母因全家背井离乡，过着流亡生活，老人家心里想不开，有时痛哭流涕，吃不下饭，因为心情不好，加之年迈，患病数月，到秋天就在

冠县于村逝世了。因家乡是敌占区，于祖母去世的当日夜间，我们父子几人，均携带武器，并有区队部分战士配合，将祖母的棺材送到了老家葬埋。我的父亲并没有为祖母的不幸去世感到悲伤，并对我们兄弟几人说："要好好打仗，多杀敌人，就是孝敬祖母了。"当夜，我们父子就分头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家庭移居外地多年，加之人口又多，全家吃、穿、住的生活重担，主要是落在父亲肩上，全由他老人家操持。开始家庭离原籍较近，父亲常常带着武器夜间返回家乡，找到亲友借点钱粮，加上政府救济一点，来维持生活。随着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解放区不断逐步缩小，家庭移居家乡越来越远，以及敌人封锁较严，又与家乡断绝了接济来源，生活困难愈来愈大。特别是后来遇上一九四三年大灾荒，难度就更大了。抗日军队、政府和工作人员，都食不饱腹，因而，政府对家庭的救济缩减到到最低限度，全家十多口人，一月才发二十斤谷子，一人一月只领到一斤多谷子。家乡断了接济，政府压缩了救济，粮食不够吃的，就采集野菜、树叶。到了冬季野菜树叶也吃不上了。这时堂邑县参议室，住在莘县西蒋店一个地主家里，见他家存着一大囤谷糠，父亲和几户流亡家属，向地主动员借点糠吃，而这个地主非常顽固，就是不借给，后来我们几家抗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先斩后奏将地主谷糠分吃了，这样生活仍维持不下去。就在这个最艰难的关键时刻，顽伪刘中孚看到我的家属在战争和艰苦的灾荒环境下，到处漂流，无家可归，吃不上饭。刘中孚一方面妄图断我家庭生活接济来源，将我家伯父李永祥抓到据点，审问伯父如何支援我的家庭。并询问伯父哪个亲友还在支援我

们。在大灾荒面前加日伪军横征暴敛，亲友们自己度荒就自顾不暇，那里还能支援我们的家属。刘中孚将伯父扣押了些日子，并威胁说："今后假若发现谁在支援他们家粮、款，就杀头。"另一方面又实行怀柔政策，刘中孚派我村李长海，大屯村仁伯郗凤云，到根据地劝我的父亲带家属还乡。还说什么刘中孚绝不加害，保证吃饭。父亲一眼就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并说："刘中孚要这种鬼把戏，骗不了人，我不能上他的当"。他们俩当即遭到老人的拒绝后，又找到了我三哥李善亭，三哥知其来意，一见就说："你们来看我们，表示欢迎，若动员还乡，那就请离开这里"。他俩也就不敢再多说了。从而，使敌人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可是，这时我家庭的生活困难确实是难以维持，当地老百姓，卖衣服家具破产渡荒，而我家的衣物早被日本鬼子抢走，再破产也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因而，家里人要求父亲请求政府能不能多发点救济。父亲斩钉截铁地说："那怎么能行，军队，政府和我们生活一样困难，他们还要打仗，要求政府增加救济，这个口不能张"。父亲的一席话，说得家里人也觉得没啥可说的了。但对生活困难，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全家人都垂头丧气，情绪低沉，就在这种困难和压力面前，父亲没有被压倒，老人家教育家里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继续想办法吗"！并说："你们没看到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军队正向敌占区推进吗？"这时三哥任马颊河支队长，不久，三哥就率部队打回过去撤离堂邑的部分村庄，并占领了一些敌军据点。这时，家乡虽然仍是敌占区，但比较容易进去，夜间父亲悄悄回到家乡，委托亲属卖了几亩地，换回部分粮食，才算渡过难渡之日。

日本投降前夕敌人垂死挣扎，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摧残，更加疯狂和残酷。日寇采用铁壁合围，长途奔袭，夜间偷袭等战术，妄图摧毁我抗日军队和政府。一九四四年四月一天的夜间，堂邑、临清的日伪军向聊堂县委和政府住地靳屯、路寺奔袭。这时，大哥任二区区队长，和敌人拚搏不幸牺牲。噩耗传到家中，全家人都非常悲痛。我们父子几人得到大哥牺牲的消息，回到家中，见到大哥身上被日寇杀害的壮烈情景，我和二哥、三哥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大嫂和我的母亲更是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但父亲他老人家的心情，尽管有些沉重，他没有流泪。除安慰我的嫂子外，并劝告我母亲说："流泪难过有什么用，打仗就要死人，牺牲一个不是还有四个儿子吗，还得让几个儿子坚决彻底的打日本，把日本鬼子全部消灭，咱家和全国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儿子和千百万烈士报仇雪恨"。

在战争岁月里，我的父亲虽是农民出身，却表现得十分坚强。我弟兄几人参加抗战是与老人家的坚决支持分不开的。在战争期间我家的一系列遭遇，诸如全家财物被日寇一扫而空，房屋被烧成一片废墟，家庭长期过着流亡生活，祖母因战祸去世，大哥壮烈殉国等。在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面前，父亲是那样镇定自若，毫无难色、沮丧、悲观情绪。对一桩桩事件都能正确对待。他的优良品德，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日伪军抓我家属一事的回忆

谭启明

关于日伪抓我家属一事，是一九四一年春，大约农历四月，在我的家所在村谭庄安据点不久，是谭庄据点的日伪军抓的。我当时在抗日县政府工作（聊城县），任机关指导员和机关党支部书记，尚未到二区任区长。

当时我家中四口人（父、母、妻、妹）。敌人是趁家里做饭时全家人在家，目的是抓全家人。我母亲隐藏在邻居家的柴垛里未抓到，藏了几天，由邻居伪装向外运柴，我母亲藏在柴车底部逃出我村。我父亲被抓去解往聊城城内，据说手续不符又押解回聊城城南双庙据点关押起来。我父亲乘伪军不备逃出双庙据点，伪军发觉后追捕未得逞。我妻和妹妹被抓去关押在谭庄据点里，据知是我父亲的好友（不是亲戚）五乡杜（谭庄西北三里，亦叫杜庄）的李炳义，拿了一千多粮食交伪军，被释放。

我当时听到消息后，照常工作，也没向别同志讲，我的想法是："为革命牺牲生命，家属被害都是可能的，抓就抓吧，看看情况如何再说"。回忆起当时态度非常冷静，一点也没影响工作，也没想法去营救。五乡杜的李炳义用自己的粮食赎回我妻和妹妹，我事先不知道，事后才听说。对李炳义也没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现在看来有点不尽人情。

我父母逃出，妻和小妹放出后，首先到刘集（三寺北

边刘淑宝家（刘淑宝和他儿子刘汉鼎思想进步，据说都参加共产党，刘汉鼎和我是在老韩庄完小的同学）住了几天。因敌人扫荡，又离谭庄据点太近，又搬到裴寨（八大寨较大的庄），这时我才请假到裴寨和家人见面，全家思想是一样的，“坚决抗日，没别路可走。”我父亲说：这些王八蛋，兔子尾巴长不了，不叫咱过咱就不要家啦”，还说：“跟他们斗，这些坏蛋没好下场”！我母亲还安慰我：“有你爹照料家里，你别挂着家，去当你的八路去吧”。我妻再三说：“没被敌人污辱”。我妹妹才几岁，听我父母的话。全家没什么埋怨，把仇恨更集中到敌人身上。

因环境继续恶劣，日伪军到处安据点，挖封锁沟，经常反复扫荡，抓人，我家就长期流浪在外，先后搬迁（也叫逃难）到赵庄（王官庙南）、东太平庄，东阿县的谭庄（官庄东）、西杜庄（孙堂村南）、连海子（孙堂东）、双庙于、重化于等村居住，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谭庄伪据点敌人逃跑后才回到谭庄老家中。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我在聊阳和莘聊两个边区的战斗生活

王　昆

一、聊阳边区的范围和革命力量的发展

一九三九年秋，阳谷抗日县政府成立后，我们便马上在聊阳边区开展了活动。当时的边区，除聊城和阳谷城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外，广大农村却没有敌人的据点。所以我们经常活动在七级、周店附近的村庄，如官桥口、孙沟、前后刘湾、姚皋、崔庄，仁庄、赵岗、马黄庄、老韩庄、潭庄、耿庄、三觉寺、刘集、裴寨、王寨、祝寨、任寨、红庙、四甲李、朱庄、郭店屯、梨园、赵周、焦庄、太平庄、簸箕柳、邵楼、王营、前后宋堤口、王堤口、姜堤口、郭堤口、房庄、坡里、郭庄、于半坡、王拔士、杨皋、前后化庄、刘铁匠、耿海、孙丰家、张八堤口、李八堤口、草寺、王庄集、鹅鸭坡、段坡、訾海、胥庄等。这些村庄有个很好的基础，大部分村庄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在活动。在他们的密切配合下，我们的四大队、五大队、六大队、肖华支队、筑先纵队二营、杨勇支队(也叫三四三旅)，谷山游击队，聊、阳两个县的县区武装的对敌斗争开展得很顺利。阳谷抗日县政府以及三、四区政府和区中队的工作也进行得有

声有色。在抗日武装部队和地方政权都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影响下，其他群众组织的发展也很快。如农会、自卫队、青抗先、模范班、妇女会，抗联等，随着对敌斗争的形势发展，党的力量发展得更快了，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村政权牢牢掌握在我们地下党员同志的手里。那时候，我是阳谷抗日县政府的手枪通讯班班长，经常到这些村庄找部队、找机关、找交通联络站、找群众团体、找领导同志。给他们送机密文件、传递斗争信息，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各方面的负责人都是流动的，没有固定地址，有时跑十几、二十几个村庄才能找到他们。一九三九年冬，齐南峰县长给白凤仪大队长（运东大队）一封信，叫我给他送去，我跑遍了老韩庄、源庄、三觉寺，最后才找到地方，当面把信交给了他。并等他写了回信，接着带回交给了齐南峰同志。一九四〇年夏天，徐翼县长派我护送谷泉秘书长到鲁西北地委。我们俩人路经聊阳公路，到邵楼、坡里、路过耿海、刘铁匠到孙丰家，找到了孙林同志（孙玉贵）和大老孙同志（名字记不清了），由大老孙护送我们到莘县城北河店东贾庄，在贾庄把谷泉同志交给了贾福祯同志，在他的护送下安全地到达了鲁西北地委。

一九四〇年三月份，齐南峰县长派我送急件到运东地委。我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家把急件缝到鞋低中间，又到七级附近高郑玉庄找到周云章同志，当时他是阳谷县交通联络站长，问清楚运东地委、专署、军分区活动的地址。他说："在茌（平）、博（平）两县交界处活动。"我们到了聊城与东阿交界的双庙和红庙联络站，由站长介绍认识了张武云县长，张县长马上让站长带上我到聊茌边沿交通联络站，帮

我找到了运东地委，把急件交给了当时的专员谢鑫鹤同志，并请他写了回信。我带上回信便马不停蹄往回赶，事先把回信收藏在自行车内胎中间层，防止路过封锁线遇上敌人搜查，途中又经过了交通联络站周折，最后顺利的到了目的地，并把回信交给了齐南峰县长。

一九四〇年秋天有一次敌人扫荡，上级命令我们从阿城西北的朱楼转移到聊阳边的徒骇河南岸的房庄。住下的第二天中午便发现了从房庄南面窜出来一股日本鬼子讨伐军，估计有一千多敌人。我们很快就被包围了，情况万分危急，当时我们驻房庄的部队仅有县政府警卫连一百二十多人，手枪队四十多人，手枪通讯班二十多人，加上各科室工作人员，总共三百多人。我们在徐翼县长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迅速的作好了战斗准备。徐翼同志把部队都部署在围墙上，把围子门关闭好，下午一时左右，战斗打响了，徐县长身先士卒，在阵地机智沉着的指挥作战。当敌人接近我们的外围墙沟壕射程时，只听到徐县长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手榴弹同时开了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尸体遍地。敌人曾多次向我们发起进攻，但却无跨越雷池一步。

开始，敌人对我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对我们能打阵地战的认识不够，吃了大亏，伤亡惨重。天快黑的时候，敌人孤注一掷，把子弹筒、小钢炮，轻重机枪全集中起来，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袭击。房庄的西围子门被敌人打开了，东南围墙打开了一个缺口。敌人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终于冲进了房庄村。但敌人没有想到我军很快的占领了民房屋顶的至高点，居高临下，猛往敌群中投手榴弹，在一片火海中，敌人遭受到重大杀伤。正在我们与敌浴血奋战时，三区长王

筱湖同志，区中队长王月营同志，六区李区长及区中队齐学珠同志闻讯带领两个区中队一百多人前来打援。战斗内外打，越打越激烈。徐县长抓住天黑有利时机，在外有援兵的情况下，立即从北面和东北角围墙及时撤出战斗，向七级方向安全转移了。

这次战斗，是阳谷地区抗战以来的一次大的战斗。日寇凭着武器精锐，妄图向我们突然袭击，消灭我们，但我军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同仇敌慨，越战越勇，使敌人遭到惨重伤亡。我们虽撤出了房庄，但这是有计划的主动撤离。整个战斗，我军损失很少，除有少数同志受伤外，基本没有什么牺牲。这次胜利给聊、阳、莘边区的抗日军民极大的鼓舞。彻底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鬼话。

一九四一年敌我斗争形势开始恶化，敌人经常外出进行扫荡。记得这年二月份的一次反扫荡，我们的部队从运河东出发，当天夜晚通过聊阳公路，天亮到达于半坡，但围门紧闭，我们三百多人只好原地休息。徐县长派我去叫 ，我给他们讲了好久抗日道理，这家伙就是不让进。后来我们才弄清楚，说是反动派头子王奎一有指示，不准八路军进驻。没办法，我们只好到坡里住（阳谷地）。聊、阳边革命势力的发展壮大，使敌人坐立不安，日寇勾结当地的反动势力齐子修，还有沈鸿烈的反动部队，王金祥的残部，再加上十军团以及地方上的反动会道门、忠孝团的头子赵二虎，沙镇一带的王奎一等。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从一九四〇年春开始，先后在安乐镇、石佛、青杨李、安上了敌人据点，接着沙镇、李海务，还有东阿的刘集、铜城，关山相继也安了据点。经常对聊、阳边地区进行扫荡。他们所到之处，杀人放

火，无恶不作。很多抗日干部、战士家属被抓坐牢。安乐镇和七级据点的敌人，先后几次到我家抓人，他们没有抓到我，便把我父母抓了去关押在七级据点里，后来经村里设法营救才逃出虎口，严酷斗争形势并没有把抗日战士吓倒，敌人的残酷镇压反而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使我们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二、莘聊边地区的革命基础和斗争形势

我是一九四一年春调到莘县抗日政府工作的。对那里的情况逐步有所了解，莘县与聊城交界处并不太长，南从于庙、张吕家开始，北至马桥、马菜园，总长度三十华里左右，即：莘堂公路从东不超过五华里就到了聊城地。当时活动的村庄有，孙边家、大邵家、小邵家、于庙、张吕家、单庙、前后关庄、辛庄、徐庄、刘庄、林庄、丁楼、冯海、小杨家、武庄、小杜家、陈庙、曹屯、王庄、河店、贾庄、郑堂、东赵庄、前后桃刘、丙海、郭家、楚家、大杨家，姬家、安头、杨楼、田海、肖金寺、前王家、潘庄，聊城南从齐楼、赫楼、军屯庄、大常庄开始有：孙庄、糖坊、庞庄、侯家庄、孙家、李集庄、刘堂、湾里、小吕家、大吕家、朱庄、朱堂、寨李、二张、郭楼、大小孟家、李海、白堂、候家、五圣家、王庄、大小前后孙家、华陀庙、王堂、谢家海、杨家、丙家、赵家、齐家、郑焦孙家等。共计一百个右村庄的活动范围并不大，但斗争形势很复杂。

敌人的势力有齐匪的三个旅，邵吉胜八旅，薄广三七旅。王奎一六旅，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莘聊边地区，敌人除

了三个正式旅的兵力之外，还有沙镇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大队郭培德。铁佛寺有两个汉奸中队的冯维新；西吴家的史怀壁汉奸中队，以上敌人的兵力约共五千人左右。到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莘聊边地区的斗争更加严峻恶化了。齐匪不断地向莘堂公路以西进犯；又新安了一批据点（安头、姬家、小赵庄、油坊等）。敌人仗着雄厚的兵力和密集的据点，妄图逐渐消灭我们，使得我们斗争环境越来越艰苦。虽然莘聊边地区大部分村庄被敌人占领了，但这些村庄党的工作基础很好，真正做到了有敌人无敌区的程度。我们经常深入到这些村庄活动。如贾庄党支部、郭家党支部，楚家，曹屯、马桥、大小三门、王庄、姬家、庞庄、候家、丙家、孙丰、王庄等支部。这些党支部战斗力很强，这些地下党员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但经常给我们提供准确的情报，使我们有力的打击敌人，而且还在衣物和食物上也处处关照我们，使我终生难忘。另外，这些村庄的地下民兵同志也积极的配合我们的行动，一起打击敌人。

三、战孙家

第一次战孙家，是一九四一年春。我们抗日县政府和警卫连驻姬家，二区区长孙超同志带领区中队驻田海，县大队驻杨楼和安头两个村。早饭后八点多钟发现敌情。侦察员报告说："齐子修（齐匪）八旅邵吉胜带领几百人，从白堂、李海（聊城地）出动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先头部队已到了孙家、五圣家。"王树人县长听完敌情报告，马上派人通知警卫连和县大队及二区区中队作了战斗布署：把警卫连布置

在姬家村东的有利地形埋伏起来。不一会，敌人果然窜过莘堂公路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圈。王县长一声令下，我们的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群开了火，战斗打响了。敌人一看不妙，扭头就跑，他们没有想到县大队和二区中队从另一个埋伏圈里出现了。县大队的机枪和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把齐匪打的晕头转向。县大队和警卫连的冲锋号同时吹响了。战士们象下山的猛虎，向敌人扑上去了，枪炮声，手榴弹声，震天动地。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哭天叫地。屁滚尿流，我军乘胜追击，把敌人一直赶到大小孙家及大小孟家、齐家。齐匪邵吉胜八旅被打的狼狈不堪，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再说邵吉胜，战斗一打响，他的几个警卫员架着他跑，后来便背着他跑，从那次吃败仗以后，邵吉胜部一连几个月没有敢进犯莘堂公路以西。这仗打得齐匪伤亡残重。战斗结束时，县大队和警卫连打扫战场除了拣回敌人一部分武器弹药外，还拣了敌人的好几双鞋子。证明在我们冲杀的时候，敌人只顾逃命，连鞋都顾不上要了。这一次胜利，大大鼓舞了莘聊边地区军民的战斗士气。

第二次战孙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七月份，当时组织上决定让我到鲁西北地委党校学习。在党校里由任新涛、翟彬、许旭清同志领导我们讨论学习，还有个石队长负责军事生活管理。那时候的党校没有固定地址，随地委、军分区、专署活动，经常转移在莘聊边和莘冠边地区，多数在朝北活动，学员是各县送去的，共一百多名学员。纪律很严格，保密制度明确规定，学员到校一律改名换姓（当时我由阳谷调莘县刚改名不久，所以没有再改）；二是学员中不能互相通真名、真姓；三是不能询问学员原来单位和工作性质，也不允许

问人的籍贯。学习内容是：党的基本知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加强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怎样加强阶级性和战斗性。记得当时经常给上课的有组织部长郭林业同志，地委书记许梦侠同志，有宣传部长裴奇同志，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同志，还有专员周持衡同志，都给我们作过抗战形势的报告，以及如何学习马列主义及论持久战的报告等。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进党校学习。这次学习到七月底刚要结业时，地委决定抽地委副秘书长王洪志和我，还有耿云庆同志一起到聊西开辟新区工作。结业的第二天，我们三人到了聊西工委，找到了工委书记修继光同志和组织部长孙林同志（原孙玉贵），还有宣传部长庞杰同志，宣传科长白奇同志，聊西办事处主任是刘洋溪同志（在养病），当时张华南同志代理主任。公安特派员是于龙同志。由工委书记和两位部长给我们介绍了当时的聊西对敌斗争形势。使我们明确了夏季以来，由于南下支队和回民支队到鲁西北活动，也到聊西地区打击了齐匪的嚣张气焰。不久我们从潘庄转移到马菜园（莘县地），那天早饭后，工委书记和王洪志同志开会决定：由王洪志带领孙林、庞杰、白奇、耿云庆和我共六人，到新区的大孙家、酒孙家、郑孙家、焦孙家、前孙家开展宣传活动。主要宣传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并张贴散发油印品及传单标语等。这时活动的几个村庄就在李海、白堂（敌据点）附近，就是齐匪八旅郝吉胜的驻地。我们六人的宣传组，只有王洪志带一支小手枪，我带一支三八匣枪，耿云庆带一个手榴弹。六个人就这么点简单的武器要去和两千多人的齐匪八旅斗争，讲起来真使人难以相信，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六人分头深入到四个村进行宣传。王洪志和耿云庆到酒孙家，

孙林和庞杰同志到郑孙家和焦孙家，白奇同志到前孙家，我在大孙家，中午都回到大孙家伪保长家吃饭。进村后，我们不但作个别宣传，而且召开群众大会。广大群众踊跃参加，听我们讲战争胜利形势。这一天上午我到大孙家村后的地里给正在劳动的群众进行宣传，帮一个农民拉车子送高粱回他家，我看他家很穷，对抗战打日本鬼子有点认识，我很快发展他入了党。他向我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打日本，我们谈完，我回村里去吃饭，在街上碰到王洪志和耿云庆同志在伪保长家吃饭出来，告诉我说："今天午饭吃花卷还有炒鸡蛋，你快去吃吧。"说完，他们两人去宣传了。我到伪保长家很快吃了两三个花卷就出来了，走到胡同门口，见到有些群众在胡同里吃饭，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宣传抗战救国的有利形势，正好孙林、庞杰、白奇他们三位同志也回来吃饭，我照样告诉他们说："今天上午吃好饭，吃花卷，赶快去吃吧"。他们三人进去吃饭了，我仍在那里继续宣传。正在这时候，突然发现敌人来了，群众都跑回家去关闭了大门，我出胡同一看，有十几个匪兵就冲我来了，并大声骂叫。见我只是一个人，便命令我举起手来，我急中生智，顺从的举起左手，右手迅速的从腰里抽出枪来，对准敌群一连打出去五、六枪，，当场把一匪兵撂到了。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有点不知所措，马上都卧倒地下了。我乘机突围冲了出去，冲到了大孙家村西路北的一块有墙的高粱地里，随即脱下身上的褂子，拿下头上的草帽伪装到高粱秆上，远看象个人，就在这时候，敌人大喊大叫的追过来了，"捉活的！不要叫小八路跑了"！我伪装之后走到地边，扒墙往外一看，有两个匪兵正在托着枪东张西望，等他们转回身时，我照他们背后

各打了一枪，他们拚命的逃跑了，我们又开始突围，结果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冲到一片坟地找个有利地势，休息了一下，我突然想起还有五个战友没有出来，不知他们的安危如何，为了吸引村内的敌人，我又打了几枪。正在这个紧急关头，聊西二中队闻到枪声，由李修身带领一百多人冲上来了，会面时我马上告诉："村内还有五个同志没有出来，"于是我们一起带领部队冲进村内。这时敌人撤走了，我跑到伪保长家后院里在高粱稭垛后把孙林、庞杰、白奇三位同志叫出来，随部队一起回到马菜园驻地后才知道王洪志和耿云庆两同志被敌人抓去了。后听说经组织营救了出来。有人给我开玩笑的说："在姬家那一仗，你追赶人家，这次人家追赶你。"我说"命该如此"。一笑了之。

第三次战孙家。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份，我已在莘县当武工队长。有一天下午，接到通知要我们武工队当晚参加拔聊西小孙家据点的战斗，我队全体队员听说参加攻打小孙家据点的战斗，个个都非常高兴。通知命令我们跟随司令部行动，听赵健民司令员的指挥。大家一听就更加高兴了。小孙家据点有叛徒王金合的一个营三百多敌人。王原来是聊西二中队长，投敌后当了营长，由于对我们内部情况比较熟悉，投敌后向敌人提供了不少我方党政军的内情。另外他对聊莘边地区各村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特别清楚。经常带着敌人到这些村庄抓地下党同志，还不断的抓革命干部家属。他无恶不作，对我党破坏很严重、危害甚大。群众对这个坏家伙恨之入骨，纷纷表示对这伙敌人非消灭不可。军分区领导也下了决心，集中了基干团、县大队、警卫连，邻近的区中队，武工队，共计一千多部队，从马颊河西出发，经过柴庄、销

金寺、前王家直奔小孙家据点，对敌人据点进行了团团包围，但由于夜晚活动，在抬梯队过围墙时有人不慎暴露目标惊动了敌人。赵司令员当即立断，马上下令停止攻击，撤出战斗。有了第一次的教训，第二次布置得比较周密了。赵司令员亲自交给了我们武工队一个特殊任务，叫我们找只小猫背上，由我负责与内线蔡朝光同志联系。具体方法是：叫我在据点东门外路北玉米地里揪着猫耳使小猫叫，看到据点墙上有火光时说明暗号对上，即有人下来开门与我们接头，立即协助我们攻打营部，活捉王金合。这是赵司令员交给我们武工队的第二个任务。攻打小孙家的行动开始了，在这个漆黑的晚上，我背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小猫，带领武工队，跟随军分区司令部出发了，很快就到了小孙家据点附近。我按事先布置好的任务，带领武工队埋伏到小孙家据点东门外路北的玉米地里，然后把小猫从笼子里抓出来，使劲揪他的耳朵，果然小猫叫了几声就看到了据点东门墙上有火光摇动，我又使劲揪小猫耳朵使他叫了几声。蔡朝光同志就把据点门打开了。我们见面亲热的握了握手（因他在县大队当班长时就认识），他带领我们武工队很快冲进了据点，接着穿过两道院子冲进了敌人营部，缴了伪军警卫排的枪，全排人当了我们武工队的俘虏。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叛徒王金合不在，这家伙早就跑了。以此同时，基干团、县大队等大队人马已经冲进敌人据点，把王金合全营三百多人彻底解决了，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这就是我参加三战孙家的过程。我们三战孙家，两次打了胜仗，真是大快人心，为莘聊地区人民除了害，出了气。话又说回来，这次战斗虽然打个大胜仗消灭了三百多敌人，但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抓到王金合这个叛徒。后来听说

这个叛徒的全部人马被消灭后，又跑到沙镇郭培德那里去当汉奸了。最后被我们马颊河支队消灭了。

莘聊边地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仍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广大农村仍被他们占领，不但有上述敌人兵力，还有徒骇河南阳谷县境的丁金锋、王本绍残部及洪武申、焦四等反动武器。到处是刀枪林立，这时的敌人耀武扬威神气十足，气势凶凶，好象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其实不然，我们武工队和公安保卫队为了打击敌人，经常到莘聊边地区来光顾他们。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敌占区活动呢？现在回忆起来，我们有地下党的支持和关怀帮助，所以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才能顺利的完成各项战斗任务。我们还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并作为我们的后盾。其次利用敌人的灯下黑和防区的两不管的漏洞给我们带来了活动上的方便。我们运用和执行了党的斗争策略和政策，这样以来，使我们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

四、消灭在莘聊边区活动的武装特务小组

一九四六年七、八月份，我接到聊城的周良弼同志报告说："最近从济南派遣来一股武装特务，共六人，已潜伏在莘聊边地区活动，郭大胡子为组长，活动在齐楼、赫楼、大常庄、糖坊、大小邹家、于庙、张吕家、冯海、前后关庄一带（我们知道这些村庄比较复杂）。企图杀害我们两个县边沿区的基层干部。我接到上述情况后，立即赶回公安局。当时两位局长都不在家。我便马上去找公安队阎九仲队长一

起商量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再进一步摸清敌人驻处等情况后抓紧采取行动，尽早歼灭他们。结果第二天就把情况搞清了。当天下午三点左右，我和阎队长带领公安保卫队出发了，同时通知二区（河店区）武委会主任楚金保同志，叫他带领基干民兵配合行动，他们负责从背后包抄敌人，五点半钟左右我们到达目的地，很快包围了敌人住的院子。随即我带领一个组冲进去，阎队长带领三个班的兵力抢占了房顶至高点控制院内外的出入口并负责掩护我们行动。六名特务正在院里吃晚饭，对我们的到来毫无防备，发现了我们时才拚命跑进住屋去拿枪。我一看这情况，立即跟踪追击，不让特务有拿枪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摸到枪时，就把这六个特务逮捕了。并缴获了六条长枪。经过审理，不久便在河店、孙庄、柴庙、四女树等地召开公审大会。为了大造声势，震慑敌人，当场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并根据群众的要求，对他们六人执行了枪决。

通过消灭这个特务小组，保卫了莘聊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九四七年秋我由公安局调去河店（即二区）当区长和区委书记期间，仍与聊城沙镇区人民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与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以上材料仅供参改，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于广东省茂名

关于聊堂边区工委初创情况的补充

刘　靖

（一），堂邑城西南郑家打日本鬼子一段，应该增进去。时间是一九四〇年春，我主力部队在李家海打齐子修部，堂邑城内的日本兵为救齐而出动，当时我县大队和二区区中队在郑家阻击数小时，待主力二十团一个营赶到后，给日本兵以沉重的杀伤。伪军的损失也不小。对提高人民抗日积极性有较大的作用。

（二），为了阻止敌人的扫荡，我县武装部队和人民群众曾经积极参加破路。平原地区的大车路都被破成有利于抗战的交通沟。特别对顽伪刘中孚在范庄安据点，修围墙，他们在白天修，我们组织群众在夜间破，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二区区长李善亭同志曾与敌伪有名的坏蛋靳奎峰相遇，展开搏斗，将其击成重伤，并缴获其长筒手枪一支。

（三），我们组织县区抗日人民武装，扩大抗日力量，亦有较快的发展。前有的同志写到的小部队是其中的一部分，应将全县整个人民武装力量发展的情况叙述一下。我记得小部队受挫后，将其编入县大队，县大队从各区还抽一些战士参加。到荣连超同志任大队长时，可能已发展到三、四百人，县区武装共几百人，马匹枪支有不少。六区区队在赵

安邦和范怀文同志指挥下发展很快。曾和伪军吴连杰部在场头展开了激战，范怀文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二区区队在李善亭、张道顺、刘光祖等同志指挥下，也有较快的发展。到我离开时，记得已有将近百人，战斗力也不错，并曾胜利的反击了当时区队一个班长叫靳道玉叛变所造成的损失。在后田家靳屯，曾粉碎了日本、敌伪军一次较大的扫荡。组织县区人民武装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结合当地民枪甚多这个特点，正确贯彻抗日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这个号召。后来的毛病是有点强迫命令，发展到按时按户分派人枪。这个时候，我们还贯彻了实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一条，记得任明同志在一区贯彻的较好。

在这个阶段，可以说为了抗战打鬼子，不惜身家性命，积极的展开了各种斗争，如康营打伪顽刘中孚，小月河打李子峨都提到了，还有在李大庄抓伪区长张子衡，后来在后李家打伪军，目的是接应准备起义的伪军官兵，在堂邑城南公路旁截击伪区长邱泽民，卫河支队武工队在温集集上打死了王锡奎。李善亭同志在当区长的第二天就在老贾庄西打死张玉山并缴获匣枪一支。积极作敌伪军的工作，在城内设立秘密情报站，派人去作伪一区区长肖大麻子的工作，积极争取二区伪区长宋锡山，，并积极开展了统战工作，召开了士绅名流会议，对那些大绅士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记得一次县长梁向明同志，在堂邑城南士绅名流会议上讲我党为了抗日所采取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大家起来抗战，有很大作用。堂邑城南和聊城西南不少著名士绅都参加了。

另外，我们的活动所以比较有力，这和我们开始在堂邑

城南打击一些坏人妥协投降气焰有关，如王锡奎、靳奎峰、张玉山等。还有一些坏人不知被什么人打死了，如范书田、徐化青等，都对当时能够坚持那一带的抗日有较大作用。

（四），敌伪在我们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活动的情况下，不仅常出来打我们，也采取对抗日积极的抗日干部烧房，抄家和抓人来威胁的各种办法。李善亭同志家的房子一次全部烧光，我家一次就被抓去大小六口人，后来，还多次抄家，刘中孚抓去我的母亲后，威胁她动员和我兄长刘光祖脱离部队，曾遭到我母亲严辞拒绝。大意是说："我儿子在抗日期间参加八路军打鬼子，我很高兴，为什么要动员他们回家呢？！"齐南峰同志的父母长期在外躲避，我和李善亭以及一些同志家中老少等，长期离家躲到马颊河西居住。李善亭同志的父亲李永发坚决支持儿子抗战打鬼子，他四个儿子，三个参加了抗日部队，大儿子李学曾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跟部队一起活动，人们称他为"老司令"。乔广正同志的胞兄乔广孝是国民党员，在家庭内部，乔广正同志和其兄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曾喻之为乔家的"国共两党斗争"。

（五），信中提到的拐渠会议，我记得先在南馆陶，后来又搬了一次家。会议是鲁西区党委召开的。南馆陶还住有顽军石友三部，那时统一战线内部妥协投降的危险已经很严重，汪精卫已提出公开投降，武汉吃紧。邓小平同志作了报告，题目记不得了，但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还提出了保卫武汉的口号。拐渠会议是党内在鲁西北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我和刘洪源同志都参加了，记得那时我们是归鲁西运东

地委领导。解占柏、邵子言同志(当时叫刁子言)从博平地委住地一带来，经我村走曾住了一夜，我们一起去的南馆陶，至于怎么传达的我记不清了。

（六），聊堂边区工委成立的时间是一九三九年春，当时由任明同志带着地委书记张炳元同志的信，指名要刘洪源同志任工委书记，刘喆任组织部长，念涛任宣传部长，任明任武装部长，张炬任民运部长。当时的任务就是开展聊城、堂邑一带的抗日工作，联络知识青年参加抗战。我和乔广正同志、李玉瑄（此人在一九四〇年敌伪威逼下妥协）从馆陶回来，张炳元同志给的任务就是联络知识青年，不久即组织了中共聊堂边区工委，这个阶段我们发展了一些党员，乔庄曾建立了党支部。李善亭、田志一等同志都是这个时候吸收入党的。赵子营也有几个党员，有一个农民党员来往传递信件，十分勇敢。后城东北曾建立了三区区委，区委书记是一位农民干部，叫黄新河（人称黄四哥），后来在一次行军集合前玩枪走火被误伤打死了。聊城西北几里路地方有柴龙、吴星同志他们组织了党支部领导对敌斗争，搞的很有生气。周水坑有个党员叫李希闵的，在黄瓜园被日军包围后牺牲了。通过党的秘密工作的开展，从鲁西北地区到运东四地委实际上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西边是桑阿镇的田占元同志，堂邑城南是刘喆、赵子营、乔庄一带有乔广正、念涛同志，凤凰集一带有解平同志，这样一直可到博平城北鲁西四地委住地来往传递信件通信联络。如小部队初创时的部分枪支是十支队赵健民同志领导的第三营给的，秘密埋在刘喆同志家堂屋后边，后来夜间运到小部队的，解占柏同志从家里动员出一支匣枪，一支手枪也是先经过刘喆处交给部队使用

的。

今天回忆这一段的历史时，深感如下各点：

1、在战争期间更能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的作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是新中国，这是人人明白的，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们那一群人能够参加革命，坚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统治，党只有掌握武装，正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能够抗战的力量，团结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一起共同奋斗，才会有更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

2、抗战期间的大量事实，都充分证明了青年是抗日武装斗争的先峰。那时农民只是在八路军所到之处，在各阶层青年带头参加下，我武装力量才有迅速的发展。中共聊堂工委领导成员和一些领导同志多数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只有任明同志年龄稍大些，也不到三十岁。他们接受了党的领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避一切艰难险阻，可以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烧房子，四不怕抄家抓人，五不怕没有经验，敢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对今天贯彻党的干部队伍要革命化、知识化、年青化，专业化，实行新老结合是有启发的。

3、在对敌斗争的实践中学习本领，得到锻练。我们这些人那时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只是有一股抗日、打日本的革命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就逐步学会了革命工作的一些基本知识。记得工委刚组织起来时，一次在张炬同志家开会，我们不知道会应该怎么开法，四地委宣传部长郭少英同志参加我们的会议，并教给一些如何开会、讨论、作决议等等。打仗我们也是不会的，只是靠一股革命的干劲和积极

性，在战争中学到了一些打仗的知识。李善亨同志后来成为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好的指挥员，并在困难的情况下，领导马颊河支队的抗日斗争。打枪本来是不太会打的，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会了打枪，有的同志枪打的还是不错的。

总之，那时不懂的东西很多，但有一股革命的热情和干劲，什么都靠学，什么都能从实践中学到。不会做群众工作，逐步学会了；不懂马克思主义，也在实践中学习，逐步的知道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回忆上述一些事实，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好像微不足道。问题是在于当时日本侵略军大举侵入我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节节败退，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在聊堂边地区并没有根据地，而且，自聊城被日寇占领之后，我军活动已移到冠县、馆陶一带。八路军先遣纵队也只是在聊城失守才从山西一带来到鲁西北。这时，我们距主力部队活动的地区较远，而且，附近几十里范围之内，县城都被日军占领，到处还有土匪、伪顽在活动。如堂邑五区一带有顽杂吴连杰，人数在千人以上，伪顽齐子修部势力也日渐增大，由百多人、枪，在短时间之内发展到数千人，原在我们南面，后来又移到堂邑城东北三区一带。顽伪刘中孚部也有几百人，并和国民党时期的区长张子衡等有密切的关系。李子峨是在周治中这个顽伪军培植下的一股势力，而且，到处有伪军安设据点。堂邑六区是有名的封顽势力比较雄厚的地区，村村都有围寨，都有地主武装。不让八路军进驻。这些敌伪顽势力和当地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本质是一致的。但，他们内部也有矛盾，有门户之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惧怕人民力量的发展，

可当时的人民群众，由于受封建势力和敌伪势力的压迫统治很严重，大都不敢起来抗日，谁起来抗日，谁就有身家性命之危险。只有西边冠县一带是我军活动较好的地区，但是县城不久也为日伪军侵占。可以说我们是处在封建势力和敌伪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开展抗日活动的。当时，我们和敌伪顽势力的对比，我们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由于我们有党的领导，有主力部队的支援，有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有人民群众的拥护，虽经过一次一次的难关，终得到了最后胜利。因此，现在看起来是些曲曲小事，而在当时都是很难能可贵的。谨此补充，以慰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同志。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

关于聊西办事处的活动简况

崔振武

一九四〇年我在莘县独立营当民教干事，于是年七月间奉军分区命令从莘县的西索庄到聊城的花各达庙（离敌人据点白堂仅半里远），准备攻打齐匪邵吉胜营占据的李海、白堂据点。战斗打响后，除莘县的独立四营参战攻打邵吉胜部外，还有青年支队和黄华司令员领导的教导旅。第一夜猛攻未克，便留了少数兵力进行围困，大部主力撤退李海、白堂以东潘王庙伏击齐子修的增援部队。果然齐匪的第二团来增援了，当洁洁荡荡的敌增援部队走进我伏击圈内时，正是一天的中午十二点钟前，被我们全部歼灭在伏击圈内。从此齐匪再不敢来增援。当时，由于我们没重武器，无力进行攻坚，因而对李海、白堂围困了近一个月后，因驻聊日军出动解围，我们便全部撤退了。所以从一九四〇年八月李海、白堂成为齐匪统治扩展的据点，直至一九四三年七月垮台。聊西地区被齐匪霸占了三年多的时间。因而，自一九四〇年齐匪占领聊西南后，我们为开展对敌斗争，即建立了聊西办事处。刘泮溪为主任（一九四一年病故在莘县牛王庄），后张化南为主任。因齐匪和日本侵略军联合对我，活动猖狂，办事处的人员根本不能进入聊西办事处辖区开展工作，而经常驻在莘县境一区域内，寻隙夜间到聊西辖区开展动员群众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二年聊西办事处便撤销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对聊堂县一区委——聊西北工委——武训县七区委组织沿革与活动情况的回忆

（1938年冬——1945年夏）

苏毅、代洪光、柴龙、吴星、李纯礼

一、关于党的建设

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陷落，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向相持阶段。由于武汉失守，日寇的精锐部队回头北上，大大加重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是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攻陷聊城，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不幸殉国。范将军的下属部队除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外，均转化为反动军队或直接成为日寇的鹰犬，致使鲁西北的革命处于低潮。

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低潮时期，挺身担当起了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的重任。于聊城失守不久的三九年二月份，中共鲁西北地委解占柏同志，在凤凰集召开了聊堂边党的会议，他代表地委宣布了中共聊堂县工委的成立。由工委书记刘洪源，组织部长刘[illegible]，宣传部长念方之（念

涛），民运部长张炬，青年书记舒刚分别担任。聊堂县工委建立不几天（二月份），由念方之代表县工委宣布了一区委的建立。由苏毅任书记，吴星任委员。当时刁庄已建立支部，吴星兼任刁庄支部书记，舒刚兼任舒庄支部书记，郭立武任任堤口支部书记。区委建立不久，由解占柏同志介绍一批党员去鲁西北地委党校学习（去的同志有吴星、王之达、申铭珠、宋春熙），地址在冠县北崔里庄，学习内容是有关党的建设和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学习了一个月的时间便回到了本地工作，这时已是三九年一月底。就在这批党员去鲁西北地委党校学习的同时，区委书记苏毅同志随解占柏、刘洪源同志去参加了南宫会议，主要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敌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从思想上有力的武装了县、区两级党委组织。

一九三九年初，在周店村，先后发展了聂镇、张连河入党，继而建立了党支部。同时，在玉皇庙、韩庄、田庄、道口铺等村发展了个别关系。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一区委下属支部有四个（即：刁庄、舒庄、任堤口、周店等四个支部），加上个别关系，共有二十七名党员。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吸收了聂镇同志为区委委员。（一九四〇年初，申铭珠，宋春熙脱党。一九四二年，王之达同志家中与邻居搁宅基纠纷，被三支队杀害。）

一九三九年秋，原属聊城的聊北工委的七里堡等运河以西村庄划归了聊堂县一区委。七里堡是一九三九年初夏，由柴龙同志创建的党支部，支书是代洪光。聊北工委在七里堡建立支部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起从聊北工委到鲁西北地委的交通站。交通站设在了代洪光同志家中。过往人员的食宿

安全，即由代洪光同志夫妇和其弟代洪池包了下来。这在当时，七里堡距聊城城里只七里路，由代洪光一家担此重任达七年之久，由于七里堡支部划归聊堂县一区委，加上十里营、五里堡等村的个别关系，共划过来十五名党员。柴龙、代洪光同志被吸收为一区委委员。这时委员的分工是：苏毅任区委书记，吴星任组织委员，代洪光任宣传委员，柴龙任青年委员，聂镇任民运委员。

一九四〇年初，一区委南片党的发展是快的，二月，由于十里营肖登鳌发展了和悦斋、李纯礼等五人入党，便建立了有七名党员的支部，命名为二A支部，由肖登鳌同志任支部书记。同年农历三月，由李纯礼在后八里屯发展了赵继传、赵梅春为中共党员，时到五月便有党员六名，也建立了支部，命名为三A支部，赵继传任支部书记。聊城城内也是农历五月由李纯礼发展了党员五人，七月建立了支部，时有党员六名，命名为八A支部，李纯礼任支部书记。到一九四〇年底的统计，一区委南片有支部四个，加上六处个别关系，共有党员四十三名。全区共八个支部，加上个别关系，共七十名党员。另外在三九年春夏间，吴星同志利用亲戚关系，在堂邑东北孟庄发展了路会文、路耀堂入党，并建立了支部，交由乔光正、解平领导（乔广正是聊堂六区区委书记）。

一九四〇年春，到一九四一年春，一区委的人员有了变化，聊堂县委调苏毅任县委组织部付部长，调吴星任县委宣传干事。一区委由柴龙同志接任书记。委员是代洪光、聂镇。（聂镇由于工作疲塌，于四二年去掉。）

一九四一年春，一区委扩建为聊西北工委后，时值元月

七日皖南事变，党中央为了在敌后保存大批有生力量，要求我党在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精悍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县委根据这一方针，决定把苏毅派回聊西北任工委书记，把吴星派回任组织委员，代洪光任宣传委员，柴龙任青委。工委的工作范围除原辖区，又把乔光正、解平所领导的三区委的凤凰集支部（支书张广思），赵子营支部（支书刘庆余），孟庄支部（支书路耀堂），等三个支部划归了聊西北工委领导，此时聊西北工委共辖十一个支部，加上个别关系，总共有党员九十余名。

一九四四年春夏间，工委划归了武训县委领导，命名为武训县七区委，至此，聊西北工委便结束了历史使命。这时，柴龙同志调出任六区（斗虎屯、垢固一带）区长，七区由解岳侯同志任区长，苏毅同志任区委书记兼区队政委，吴星同志任组织委员，代洪光同志任宣传委员。

一九四五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败日寇已成定局。为了配合部队解放聊城，武训县委书记肖平同志，亲自召集建立聊城城关工委的会议，宣布成立了聊城城关工委。由吴星同志任工委副书记，傅光、陈浩、范利民三同志任委员（开会的地址在堂北代里庄）。三名委员都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的干部。目的是配合部队搞好聊城的敌情，作好敌内部的工作，为解放聊城作准备。原七区区委仍坚持正常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军包围聊城，武训县七区委又分属堂邑、聊城两县管辖。

从聊堂一区委到聊西北工委，所辖区相当宽广，它包括聊城城关，城北运河以西，聊堂路两侧，马颊河以东。也就

是现在的聊城城关、阁寺镇、梁水镇、道口铺乡和堂邑镇以东地区。这个地区从一九三八年聊城失守，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聊城是鲁西北日寇的心脏地方。城西北的蒿庄又是日寇鹰犬齐子修匪部的指挥中心。阁寺、梁水镇、道口铺均设有伪杂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区乡政权，国民党汪记伪聊城县长刘佩芝把县府设在了刘庙。堂邑县的汪记县长江克敏则住周庄。蒿庄，周庄，刘庙，梁水镇，阁寺，道口铺等六处，是敌人军、政、警、宪配备齐全的大据点。加上聊堂路南侧挖一道宽十米，深八米的封锁沟，公路旁三—五里一炮楼，形成了反动派的一个交织网。

鉴于聊西北当时的特殊环境，只能进行隐蔽的斗争，不能公开建立民主政权。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由于齐子修、吴连杰等匪军的抓丁、抢粮，加之天旱成灾，堂邑的北部和西部逐渐出现“无人村”，到一九四三年春扩大为大面积的“无人区”，并从西向我聊西北工委辖区蔓延。所以直到齐匪主力被击溃后的一九四四年夏，才建立公开的区政权。

二，领导和经费问题

聊堂县委的活动基地在堂邑西南的马颊河附近（林里以西村庄）。县政权和二区区政权于一九三九年底建立，二区仅有少数村庄能收公粮，所收公粮还不足县和二区以及马河支队的开支，经费是很紧缺的。我一区委，从初建到一九四〇年初，一无武装，二无政权，三无经费来源，经费和生活费只能靠自力更生。到一九四二年，马河以东这块根据地也被齐匪挤没了，仅在马河西冠县境内保留一枪能打透的站脚

地，县委、县府全住那里。我们的党员采用打入敌内部了解敌情，自行解决个人生活。聊城城内的八A支部全体党员均采用了这种合法斗争的方式。

从以上情况看，即说明了我们一区委（后为工委）当时的困境难度是很大的。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县委刘洪源，念涛，郭清书，乔光正等领导同志，仍冒生命危险轮流深入到一区委所属各支部，听取回报，传达国内外形势，交待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区委也主动派人向县委回报工作，听取指导意见。区委按照每人分管的支部和党员传达形势，布署任务。因而，有力的提高了党员素质，坚定了革命必胜信心。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区流传着两句话："和领导握握手，能坚持三个月；和领导吃顿饭，能坚持一年半"。这就是抗日战争，大敌当前，党内外上下级之间关系息息相关，互相依赖的真实写照。下级需上级的哺育，如婴待乳；上级需下级的支持，人民的支持，如鱼需水。如一九四二年春，县委组织部长郭清书同志到我区后八里屯支部听了汇报，作了指示后，鲁西地委党刊上刊出"出现在敌占区的堡垒支部"一文，后八里屯支部听后很受鼓舞，从而，有力的经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

一九四三年春节刚过，县委书记刘洪源同志便深入到聊西北工委，在柴龙同志家召开了工委会议，讲了国际大好形势，宣读了我们的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并鼓励我们要为这一目标战斗下去，也要准备作些必要的牺牲。还说服工委的同志要学会吸烟、喝酒，不然，不利于和敌人打交道。当时，严重灾荒年已成事实，堂邑北"无人区"在扩大。领导上提出"坚持地区不留洋，县不出县，区

不出区，村不出村就地干革命”。实践证明，很多同志扎紧腰带真的坚持下来了。如孟庄路会文同志活活饿死了，但也有少数逃荒在外，对很快回来坚持革命的同志，我们仍抱了欢迎的态度。对于失掉信心，不愿干的，我们也采取了不伤感情的任其自便。

又如，一九四三年夏，念涛同志由吴星同志陪同到聊城城内检查工作，事先由打入城内敌人内部工作的李明同志填发了“良民证”。当念涛和吴星两同志检查完工作去东关路南包子铺吃饭时，忽然门口站立了两名伪警察，吴星这时警惕的考虑如何应付突然事件，吃不下饭，念涛同志却未发现，时间不长，两名警察走了，念涛和吴星同志吃完了饭便回了七里铺。这时吴星同志才敢把在城内吃饭时的情景告诉给念涛同志。

从冠县到运东地委，中间有两处地委设的交通站。一是赵子营小围子西门外烧饼铺是个交通站，由安太集一名党员负责；二是，七里铺代洪光同志负责的交通站。（原运东地委设的）代洪光同志，为使过往同志在灾荒年能吃上饭，曾亲自骑自行车去济南拖运粮食，有一次，在泮店（齐河县境）东坏了车子，连粮和车全被土匪劫去。另外，在道口铺伪警察派出所有我们的一位同志，他叫路展华，又是我们工委西去县委的交通站，往返在这里歇歇脚是很安全的。

三，关于武装斗争。

开始是迷信色彩的红枪会，而后为伪聊城县四区区队。红会活动时间是由一九四三年农历二月底到年冬。伪四区队

活动时间是由一九四三年冬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聊古庙起义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上旬）

红枪会兴起的时代背景是：一九四二年春，齐子修匪军活动范围，西到冠县的东部，东到博平县境，北到临清以南，他的指挥中心设在聊北蒿庄。当时，齐匪军号称五万人。堂邑城西、城北、城东，是日寇的统治堡垒地区，也就是齐匪的主要活动地区。经过一年的齐匪压境，反复摊敛。一九四二年冬，堂邑城北的无人区已开始形成，并向聊北边境蔓延，这既威胁着人民的生存，也威胁着我们党组织的生存。正如民谚："水净鱼飞"，情况相当严重。

一九四二年冬，工委书记苏毅同志提议叫柴龙同志在工委南部抓下红会的工作，用红会抵制齐匪入侵，防止"无人区"向聊西北蔓延。

一九四三年春，聊西北的一些村庄，开始自动组织自卫力量，防止齐匪牵牛抢粮，但仅能抵制小股齐匪的抢劫。真的要对付整个齐匪的大量入侵，光靠几个村搞自卫是无济于事的。面对当时情况，广大农民迫切希望成立红枪会，以便阻击齐匪的入侵。

一九四三年春，候庄乡乡长李纪文和各大行政村村长柴龙，左自修等人，从聊城城内出城回家，左自修劝柴龙同志当红枪会的会长，顶住齐匪入侵抢粮，李纪文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当时，柴龙同志正任五里铺、七里铺、三里铺、三里井、屯庄、老柳头等七个自然村大行政村村长。柴龙同志于农历二月底三月初，便在拥有党组织坚强的七里铺，带动五里铺成立红枪会，开始动员党员带头入会，逐步扩大队伍，并掌握不打硬仗，不硬拚的策略，在这两个村首先进行

了藏粮教育，让群众把粮食都藏好，不管谁来要粮，由柴龙出面说没有，如在谁家翻出粮食，谁就认倒霉。柴龙同志说到，群众也都办到了。

有一次，聊城城内伪警察到七里铺催粮，柴龙同志说："没粮！"伪警察拖着不走，党员同志建议"让红枪会亮亮相，看下效果。"柴龙同志同意后，七里铺红会一击鼓，五里铺首先响应，冲向七里铺。伪警察一看不妙，紧抓住柴龙同志不放，说是他挑动的红会。柴龙同志说："红枪会的事我是管不了的"。于是，伪警察便威逼、挟带着柴龙同志进城，当走到北关包子铺时，柴龙同志赊了顿包子让他们吃才算了事。这次对伪警察的软磨，没要去群众一粒粮。之后，三里铺、白庄、三里井，屯庄，老柳头等村，也相继参加了柴龙组建的红枪会。伪四区下属候庄、玉皇庙两个乡，虽没正式建立红枪会，但各大行政村的武装自立已在春天开始，听到柴龙同志的红枪会能抗粮，于是候庄乡六个大行政村在乡长李纪文鼓动下，也参加了柴龙同志的红枪会。玉皇庙乡各村也纷纷要求参加柴龙的红枪会，柴龙同志成了伪四区的红枪会会长。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伪四区属日伪统治区，而齐匪还不敢大举入侵，按当时力量对比，齐匪不管在人力，还是装备上，都比四区红枪会优越。因此，我们以防为主，不使齐匪要去粮食为目的，只要齐匪进犯，便一村击鼓，各村响应，致使小股齐匪无力侵入，大股不敢入侵。但，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红会建立起，至同年六月齐子修被日扣押期间，红会与小股齐匪的争斗每晚都有发生。通过这不断的小战斗，不光锻练了红会，保住了粮食，而且，收缴了敌人一百多枪枝。六月间，运河东世隆屯乡划归了伪四

区，该乡的红会也与柴龙进行了联合，而后，城西，聊堂路以南的后八里屯乡的红会，也与柴龙进行了联合。

红会的队伍扩大后，便主动向齐匪残部开始了出击，那是在一九四三年的六月，候庄乡乡长李纪文和柴龙同志集中了两千多人的红会，柴龙同志首先讲了话："我们为了能种地，能生活下去，才成立了红会，谁要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就要和谁拼……"接着，浩浩荡荡的红会队伍包围了阎寺集。这次大的出击，逮了汪记聊城县长刘佩芝县府的四、五人，其中收税的一人，催粮的一人，因这些人，民愤最大，当场便宣布杀掉了，其余几人宣布了放走。由此，大灭了齐匪的威风，大长了红会的锐气。又如一九四三年秋，正当齐匪军需魏振华带领七人住他岳父家刘庄时，我红会趁机出击，一举收缴了匣枪七支，大枪七支，子弹数百发，有力的武装了柴龙同志的骨干队伍。（柴龙同志使用的意大利造二把匣枪就是这次缴获的。）

齐匪残部为求生存，于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间曾两次设宴邀请柴龙等红会头目人拜把子。齐匪连长张英林和齐匪连长肖印田亦采用此法和柴龙讲和拜把子。柴龙同志每次赴宴都带着四勇士（李少卿、岳江泉、阎学旺、李士尧）。有一次，仅带着李纪文和路庆祥两谋士，敌人欲求支援他们粮食，柴龙同志一粒粮食没给予答应。敌人也没敢动一点声色。

最大的一次鸿门宴，是一九四三年秋，齐匪团长王连级，在冯庄说合人冯立明家中，冯立明事先怕发生械斗，要求双方参加的人都不带武器，但双方都怕出意外，各暗带短枪上顶门，这次，是敌人孤注一掷的尝试，敌团长王连级亲

自参加了，我们由李纪文带领冯汝贵、李士尧参加。当时，王连级动用了六百人严加布防，还有机枪十几挺，（王仅有二百人，向其他匪借用了四百人），布防在冯庄的东、西、南三面；红会亦做了应变准备，集中了三百余人的红会，当时的伪四区公所也是支持红会的，同时，住聊古庙的一个伪保安中队与红会配合，全拉到了冯庄附近。柴龙同志负责总的指挥，准备接应李纪文等人。敌团长这时处于我三面夹击之中，因此，在鸿门宴上只能提出支援他们点粮食，结果草草结束，敌人一无所得。因而，齐匪残部，面对北面的吴连杰和东北的罗兆荣等敌人的威胁，不得不转移远地求存。这时，齐匪在聊西北的力量已很单薄。

为围剿齐匪老窝——蒿庄。柴龙同志于一九四三年秋末，和世隆屯、后八里屯等乡的红会头目进行商定，集中了约五千人的红会，并配备了钢枪，从邓王庄、刁庄开始了进发，齐匪面对这支庞大的红会队伍，只好望风而逃。这次大的行动，虽无有什么缴获，但齐匪却全部离开了聊西北边境。农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安定。

齐匪在聊北匿迹，红会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一九四三年冬，红会便解体了。这时，伪四区区长张明堂感到柴龙同志在农民中有号召力，为巩固他伪区长的地位，便邀请柴龙同志任区队付，柴龙同志为了革命的需要，便接受了任职，并带进了岳江泉、李少卿、王秉臣和路庆祥等几名党员，以及阎学旺、李士尧等几名善战的勇士。这些人进了区队后，张明堂认为是好事；而伪四区警察分所，则认为是对他们的威胁。

一九四四年春，聊西北工委划归武训县，为七区区委。柴龙同志公开身份是伪四区区队付，秘密身份是武训县七区

委委员。我七区政府，为征收公粮，弄清每个村的地亩数，便是柴龙等同志设法从伪四区公所搞到的。由此，引起了伪警察所所长王传尧等人对伪区队的怀疑，尤其怀疑柴龙同志。

柴龙等同志的行动，由于引起敌人的怀疑，导致一九四四年秋末，伪聊城县长周东华（日特、国特）对柴龙同志的调离。当时，柴龙同志感到情况不对头，随即召集在伪四区区队的党员和阎学旺、李士尧等人，安排了应变准备，并把随身带的匣枪交由李少卿同志保管。同时，嘱咐他有事找七区委领导。柴龙同志一人毅然到城里进见伪县长周东华，伪县衙传达室答复"周县长不在，赵秘书在家（即赵建平），可少等"。中午快下班时，赵见到柴龙说："你很年轻，当区队副，光靠勇敢不行，要懂军事，调你到县大队学学军事，再去当个中队长多好啊！"柴龙同志明白，这是个稳心丸。柴龙同志和赵谈完后，便去了张明堂家（城里西口南）讲明了县府要调离他区队的经过。张说："兄弟，四区区队是你建立的，江山是你打的，不能没有你，县长要调你，我要挽留，不然，我这个区长也不当了，你就先听着。"柴龙同志表示："不用我正好，我还不愿意当这个区队副呢！"张明堂说："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下午我就去找县长。"柴龙同志从张明堂家出来，即去县大队部，一进门遇上了吴金芳（中共党员），他告诉柴龙同志说："他们没怀好意！"接着又遇上了原候庄乡长李纪文（这时任县大队文书，是柴龙的把兄弟），柴龙同志向李纪文说："县里说是调我来学习的"。这时，李纪文便以把兄弟的身份带柴龙同志拜见了伪大队部的大队付马叶千和所有官员，并介绍说："柴龙是我

的兄弟，请多关照。”下午开饭时，柴龙同志又去张明堂处，路上迂见张明堂找周东华回来，张说：“兄弟，不好办啊，周县长就是不让留。”柴龙说：“不让留就散啦，留我还不干呢！”对此，张表示再找周进行挽留，并反问柴龙同志：“兄弟，你还有别的事吗？”柴龙同志很机敏的说：“我的区长，我们整日在一起，我有什么事，你还不知道么！”张明堂也很滑头的说：“对，对，你的事我全明白，我明天一定再去找县长！”这时，柴龙同志已认定此地不能久留了，第二天上午便急去找李纪文，李纪文当即带柴龙同志找大队的马叶千说：“大队付，刻下，俺兄弟在这里也没事，我看，先让他到家住几天，有什么事，我随时叫他来好吗？”马叶千当即准了假。柴龙同志回到七里铺后，马上向七区委交待了工作，便去了武训县委，县委又分他到六区担任了区长。

柴龙同志离开伪四区队后，伪县长周东华，伪警察分所长王传尧等，都认为去了他们的隐患。殊不知，还有我们的四个党员（四勇士），和一谋士——路庆祥存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开始有信把伪四区队收编为县保安中队，调离聊古庙。党员李少卿同志，当即把这个情报回报给了区委和县委。县委原认为聊古庙伪据点有我们的人控制，可暂不动它，听了李少卿的报告后，感到聊古庙这个伪据点不拔掉不行了。但就近没有主力部队，仅有武训县独立团三个连，第三连又是梁水镇伪据点才起义的，不光战斗力差，而且枪支弹药也很缺。鉴于这个情况，要想拔掉聊古庙伪据点，必须里应外合，主要的是内应。当时，在伪区队的党员和勇士们都同意起义，只有阎学旺提出要听听柴龙同志的意见。武训

县委便派柴龙同志做阎的思想工作，他俩见面后，阎学旺说："兄弟，你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就听你一句话了"。柴龙同志高兴的说："好大哥，我要你听从李少卿指挥，带领区队起义走！"阎学旺欣然同意了柴龙同志的意见。当时，与李少卿约定了里应外合的时间和暗号。暗号以围墙上划火吸烟，外边也划火吸烟即开围子门，带队进据点。

在约定夜间起义的时间，正是月光加大雾，点火吸烟，互不相见，双方都在着急，这时，李少卿急中生智，对围墙上值班的说："现在各村赌博的不少，我出去看看那里有赌博的，咱们弄两个子花花"。于是，他用绳拴在围墙上，顺墙而下，爬过两道封锁沟，找到了独立团。为分清敌我，少卿同志把身上的白衬衣脱下斯成白条拴在每个战士臂上，因子弹不足，少卿又进围子取了些子弹分给战士。然后，返回用耙齿别开了围子门大锁，带领独立团和七区区队进了围子。李少卿同志首先把党员和阎学旺等人集合起来，并把伪区队集合起来，宣布了起义，这时，伪警察分所人员还在小楼上睡大觉，在向他们命令缴械投降时，伪警察企图负隅顽抗，我起义人员架起了柴禾，敌人不投降，就送他们上西天。敌人只好乖乖的缴械投降了。这次战斗，从进围子门，到结束，仅半个多小时便争取一百二十多人的区队起了义，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多支，弹药二千发，起义人员被编为县独立团第四连，由阎学旺任连长，李少卿任连指导员。这次战斗生俘伪警察十五人和伪区长张明堂，只伪所长王传尧漏网。

四，关于聊西北工委活动的几个具体事。

（1），一九四〇年初，工委委员吴星和王之达同志，去宋春熙家（四〇年后脱党）以了解宋的思想动向为目的，无意中从宋的枕下弄出一本国民党兰衣社训练特务的工作教材，宋见我们弄出这本书很恼火，要求还给他。吴星和王之达同志当即表示说："彼此谁不了解谁的底，暂借看一下，以后奉还！"王之达拿起书来走了。因王是宋的亲戚，所以，宋也不敢硬要。工委对这本特务工作教材进行了研究和传阅。后来，又给城内八A支部的同志进行了研究，以便识别和对付特务的行动。

（2），关于二A和三A支部二、三事。

十里营支部（亦名二A支部），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建立，当时有党员七人，肖登鳌任支部书记，李纯礼任组织委员，和悦斋任宣传委员（公开身份是伪村长，按年龄已四十多岁，应是我们的长者，但是对待我们去十里营工作的同志，总是热心招待，虚心听取意见。）。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肖登鳌进城脱离支部工作，便由和悦斋同志接任了支部书记，一直到四七年土改。该支部从开始建立，悦斋同志就很注意抓武装建设，光他自己出钱就搞到十几支大枪。

后八里屯支部（亦名三A支部），于一九四〇年农历五月由六名党员建立，赵继传同志任支部书记，赵春岭任组织委员。这个支部亦很注意抓武装，搞到了十几支大枪，并和十里营共搞联防。一九四一年冬，赵春岭同志去七里铺取入党志愿书和油印小册子回来的路上，与聊古庙的伪警察相

迁，被搜去入党志愿书和小册子，我区委得知，立即把营救任务交给了刁庄党支部，由吴星同志指派党员刘玉顺去说服当时任伪四区队付的王梦林（刘和王是盟兄弟），令其向伪警察分所长刘××要去小册子和入党志愿书，以改变案情，营救同志出险。王梦林以草莽英雄的气概，对伪警察分所长讲："用钱好办，带的物品，一定要当面销毁，不然，我的匣枪不认人！"把匣枪掀开机头，放在了桌子上。伪警察分所长对这样的"英雄"是胆怯的，马上表示愿交朋友，当场把小册子和入党志愿书烧毁，而以赵春岭身上带有二百元的老票向县警察局报了案。然后，接受罚款，了结了此案。（共交了五千余斤小麦）赵春岭同志的脱险与刁庄和十里营支部的支援是分不开的，也有王梦林勇斗伪警察所长的功绩。因此，二A和三A支部所以能长期在敌伪区坚持下来，根本的问题，是和悦斋、赵继传两同志对党的忠诚。他们虽已病故多年，但他们坚贞的革命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

一九四三年春，后八里屯支部与本村的坏家伙赵××，进行了一次尖锐的斗争。赵××到处宣扬赵继传通八路，企图争当后八里屯乡的副乡长。赵继传为了保护党组织免遭破坏，果断的除掉了赵××这个坏家伙，从而，巩固了我党在后八里屯乡和后八里屯村两级政权的领导地位。

（3），一九四二年冬，搞掉了齐匪在孙坊村设的后勤部。这年，我们聊堂县委和马河支队被齐匪挤到了冠县境内。如去县委汇报工作，不光得跑百多里路，还要通过大片的齐匪占领区和无数伪据点。为了安全，工委决定先由吴星同志探一趟路，向县委汇报下情况。吴星化装，骑自行车进

入我根据地。当走到县委驻地小张庄时，因他服装不适当，被民兵抓送到马支司令部。司令部的牛参谋便带吴星同志去县委先后见了秘书李善增，书记刘洪源和县长梁向明，并回报了工委情况，面对时局，县委指示说："目前正是最艰难时期，要咬紧牙，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临回工委让吴星同志把油印小册子装进车架管内带回。在回工委的途中，吴星同志住在孙坊亲戚家，这里，正是齐匪的后勤仓库重地，吴星同志趁机对敌后勤仓库存粮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因时值冬天，敌存粮仓库均在街外挖地下库存粮。吴星同志对此划了仓库分布图，交给了苏毅同志，然后用化学药水划在烟盒里面，再翻过来粘好，由解一德同志送交了县委。县委动员马河支队所有能背粮的同志，于旧历年三十晚上，长途深入敌后孙坊，一举缴获了敌后勤仓库武装，并背回粮食二千多斤，有力的解决了我县委、县府和马河支队的缺粮问题。

（4），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在日、伪（伪聊城县府）和我们都作好消灭齐匪的情况下，代洪光同志亲自进城找到八A支部书记李纯礼作了布署，说明了我军将有大的军事行动，让其密切注意日、伪军的行动，并将情报及时上报。这时，有一天吴洪侠同志乘车去济南，在行至齐河县境的焦庙附近，见到日本军用车上有一少将军衔的军官，待到济南一打听，方知是驻淄博日军旅团司令山本八八去聊城准备扫荡。洪侠同志当即回聊把这一情报送到了七里铺代洪光处，洪光同志随将情报又送往军分区。此时，我军正在冠县以东集结了七个主力兵团，准备全歼齐子修匪部。军分区得此情报，很快把部队撤至河北省境。

正是我们送出情报的次日下午，驻聊日军司令石川英一

中佐，便以“邀请齐子修进城议事，准备联合去濮、范、观抢粮为诱饵”，把齐子修诓进了日军司令部，夜间便把齐子修押上汽车去了高庄，用大喇叭向齐的部下喊话，让其缴械投降。日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和大炮，仅三个小时，齐子修匪便土崩瓦解了。而我们通过他们的互相厮杀，不光我军毫无损失，而且，清理了齐匪残余，整个聊西北，齐匪绝了迹，匪首齐子修被日军运往济南扣押了起来。

（5），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破坏了敌人的一次扫荡计划。是年春，聊城驻防日军，由一个连队，减少为两个班，驻三师学校。原驻二中日军司令部，由绥靖军十七团驻防，成为伪军的主力。十一月中旬，绥靖军十七团将日伪军联合扫荡计划抄送给伪聊城县大队一份，当时任收发的我地下党员吴金芳接此文件便立即交吴洪侠同志复写了两份。这个扫荡计划叫“晋冀鲁豫扫荡计划”，其内容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绥靖军第四集团军所属四个团（即九团、二十四团、二十团、十七团和各县大队在聊城集结），于十九日开往阳谷——莘县——朝城——观城——大名——顺德，然后开往太行山，总作战计划一个月，并附有行军地图。吴洪侠同志复写完，便把敌人扫荡计划送到七里铺代洪光处，代洪光又随即派人急速送到了我军分区司令部，交给了赵健民同志，这次情报的效果，我们是不好估计的。

（6），一九四三年春，果断处理一叛徒。

一九四一年，××打入伪新民会不到三个月，便乱搞女人、赌博、吸毒，因此，欠款很多，被伪县府扣押追款一年后，取保外押还款。这时，他又与日本宪兵队特务挂上勾，并威胁我们组织给他还债，鉴于这种情况，经上级批准，果

断的处决了这个无耻叛徒。

（７），一九四四年秋，除掉了一名叫张连杰的日本宪兵特务。此人，于一九四三年秋，通过与东关警察分所丁毅狼狈为奸，曾扣押柴龙同志，敲去手枪一支，并经常在我区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我地下武工人员处决了这个坏家伙。

（８），一九四三年冬，拔掉了田庄伪据点。吴星同志打入沙镇伪军后，借机去田庄伪据点进行了了解，了解到中队长刘子英（东北人）属聊城伪军第五大队，大队长由伪区长刘云章兼任，田庄住刘子英中队两个小队，另一小队住候营据点。田庄据点易攻不易守，该中队住田庄大围子，（没有小围子）西头是有名的杨家林，易于为我军作掩护。吴星同志把情况向苏毅同志汇报后，又派解一德报告了县委。县委把拔掉田庄伪据点的任务交给了马河支队。我军很快拔掉了田庄伪据点，中队长刘子英被击毙于炮楼内，两个小队人员全部被俘。这对沙镇伪区公所震动很大。而当地群众却倍受鼓舞。

（９），一九四三年冬，吴星同志从亲戚口中了解到齐匪部在庞庄有一台印刷机想卖掉，这正是聊堂县委所需，此事报告苏毅同志后，即派解一德同志又报告了县委，县委派武装于春节的晚上去庞庄将齐匪的印刷机起了走。

（１０），一九四四年秋末冬初之间，活捉汪记伪聊城县长刘佩芝。刘佩芝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日寇攻打聊城时，身为城防司令，于当日晚率执法队从城墙东北角下去涉水逃至朝城投靠了王金祥。一九四一年后，一直在刘庙自称聊城抗日政府县长，而又依附于齐匪三支队在刘庙据点的

保护，搞”曲线救国”。我区委曾把逮捕刘佩芝的计划回报给武训县委肖平同志。肖平同志要求我们抓活的送交县公安局。为完成这一任务，吴星同志通过统战关系伪乡长路兆盛对刘进行跟踪了解其活动，在一天中午，得知刘佩芝正在李庄集东头路北小酒铺与聊古庙伪中队长王麻子喝酒，吴星和苏毅同志估计刘晚上不可能住据点内，很可能去有关系的邓王庄住宿，而且又是他单人活动，正是个好机会，于是，便从聊古庙据点调出李少卿到了任堤口村郭立武同志家，这时，分区情报站长刘永山和柴龙同志也在场，便对活捉刘佩芝的问题作了研究，决定立即行动。柴龙同志并把自己的匣枪借与李少卿。郭立武和刘永山表示不必再找别人。他俩随即去李庄集东北一里多远的地方埋伏，李少卿进村内观察刘佩芝的动向。当太阳快落时，刘佩芝提着菜蓝子向邓王庄方向走去。李少卿马上绕道通知前方埋伏的郭、刘二同志，三人隐藏公路沟内，待刘走近，他们便以聊城赵大队付有请的名义喊住了刘，刘对赵振华大队付请他，欣然从命跟着走了。直到把他送交我们县委，他才明白上了当。从此，聊城这个汪记伪县府也就完蛋了。

（11），一九四四年秋末，我冀南七分区解放吴海子，活捉吴连杰、赵希圣后，在我管辖区内敌人，分别集中在梁水镇、聊古庙和道口铺三个据点。梁水镇伪据点内有我们地下党员两同志，一是上士文书（名字记不清了），一是小队长郎树林。当我县独立团程团长带队包围梁水镇时，由于事先我地下党员做了工作，因而，中队长罗登殿毅然带兵起了义，我们将起义部队编为县独立团第三连，罗登殿任连长，原文书任指导员。这次并收缴长短枪一百余支。

（12），一九四五年二月，与道口铺伪中队长李同和开展了一次反扑抗日家属的斗争。李同和是一个非常反动而又狡猾的家伙。他与堂邑敌工站的一位同志交朋友，也曾秘密放过我们被捕的同志。但，聊古庙伪据点被我解放后，李同和不但不找自己的出路，反而设毒计抓我们的抗日家属作人质，妄图保存他的据点。对此，我们采用了以捕对捕的策略，也抓了他的家属，经向围子里喊话对放家属时，李同和只好乖乖的把我们的家属放出，后被我主力部队包围道口铺时，李同和又耍了花招，他让我军派代表进据点谈判，当时，我军派堂邑敌工站长田志一和分区作战科高科长进了围子，李同和却翻脸不认人，把我们的田高两同志捆绑在围墙上，大讲什么“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指着被绑的田站长和高科长说：“叫你们打吧，先打死你们……”。这时，二十二团的曾付团长调炮打了一炮，李同和不敢卖狂了，声明带队投降。当晚，我部队又出发沙镇打伪杂郭培德。分区首长命令李同和去张炉集听候改编。而李同和在去张炉集的路上却转奔聊城，投了赵振华。王金祥在收编城内伪军为山东保安四旅时，认为李同和是个铁心汉奸而被提为二团二营营长，和投进城内的刘怀玉匪部合编为二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李海、白堂战役轶事一则

张　　炬

一九四〇年夏天，我军曾在聊西打过一次李海、白堂战役。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旬，在聊城东关李修身同志家深夜长谈，他很自然的聊出一段没有公开的故事，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迷了。现在李修身同志已去世，在哀悼他的时候，记录下来这段往事以示纪念。

在整理记录之前，先交代一下历史背景，便于了解其中的奥妙。

一九四〇年夏初，聊西一带存在着三方六种政治军事力量：一方是我党领导的政府和军事力量，这方面有堂邑、聊城两个县委领导的军政势力，还有聊城县委通过统战关系密切联系着一支民团武装，团长是李道一，李修身就是在这支民团里做保卫工作的。我方军事力量加在一起也不过四、五百人；第二方面的力量则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势力。他们有两股，一股是二十二旅周致中部，周是本地高佛堂寺人，弟弟叫周正刚，外号周二虎，他们于一九三九年春就在本地进行发展武装的活动，至一九四〇年夏力量还不大，主要兵力不到一百人，可是也有一批地主封建势力掌握的地方民团武装支持他们，总计约六七百人；另一股反动势力就是进攻聊西的齐子修部，齐是外地人，他原是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一个

连长，一九三七年初冬二十九军南退时，流窜出来，还带有本连的残匪百余人，一九三七年冬曾在聊西多次抢掠、绑架老百姓，后被范筑先将军收编为三支队，一九三八年有所改造，也曾随范将军打过日军，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范将军殉国，聊城陷落，齐子修的三支队就堕落成为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势力。齐自修部于一九三八年末至一九四〇年春，主要兵力盘踞在茌、博一带，有时窜扰聊东、齐河等地。一九四〇年初夏进攻聊西时，总兵力约有两、三千人。第三方面的势力则是日伪军，伪政权，这是主要敌人，他们也是操纵战争的主要方面，但在一九四〇年春夏间，日军仍然患着兵力不足的先天病，而伪军在鲁西北各地的羽毛也未丰满，所以日寇就从策略上利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岐视共产党八路军的阴谋，拉拢收买他们，这种策略方针，在当时日寇叫做“以华治华”，“以华反华”的政策。齐子修部于一九四〇年夏进攻聊西扩大地盘和势力，正是在日寇这种策略支持下演出的。

聊西堂南这块地方，于一九三九年初，在鲁西北地委领导下，建立了聊堂边区工委，至这年的秋、冬，堂邑，聊城先后建立起抗日县区政权。一九四〇年春以来，聊堂两个县委，政府和武装紧密协作，筹划着巩固这块根据地的工作，正如有的同志回忆说：“这是聊堂边区的黄金时代”。在上级党政军的领导和支持下，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聊堂边区也正是保卫莘、朝、冠中心区的前哨阵地，从鲁西北的全局来看，这块地方决不能让敌人轻易掠去，在当时聊堂两县的武装力量，对付两方三股敌人则是绝对劣势，所以上级党决定组织聊西战役，把顽军齐子修部歼灭或打出去，实际

上，我军并未把周致中部放在眼里。

这段轶事的奥妙，却正在这里。

一九四〇年初夏，战役打响之前的一个夜晚，周致中部派出来聊西北部的几个国民党头面人物，突然来到米楼村李道一团长的家里谈判，谈判的中心内容也是如何打跑齐子修部，但关键却是“你们打，还是我们打的问题”。

李道一团长反问他们：“咱们合作打老齐，力量不是更大了吗”？

他们回答说：“不能合作，上峰（国民党对上的遵称）不叫我们合作，我们不跟八路军跑。”

经过一番口舌之后，李道一团长坚决回答他们：“那么，我们一定和八路军一块打齐，你们就随便好啦”！

他们又威胁说：“你们打，日本可要出兵帮老齐！”

李又惊疑地问：“要是你们打呢？”

他们说：“我们打老齐，鬼子兵可以不出来。”

李又诧疑地问道：“你们周部的这点兵力，也不是老齐的对手呀？”

他们说：“我们可以和聊西南部的国民党头头再商量，齐部是他们勾来的，只要他们不勾结齐子修了，事情就好办啦，齐部不可能全部来聊西，光是齐部邵吉胜这些兵，如果没有南边的国民党当底线支持他，他们在这里呆不住，呆住，也长不了，我们有办法收拾他们。这里意味着国民党内有南北两伙，都同日寇勾结着，而又各自想着独霸聊西。伙同日寇反共反人民都又是完全一致的。局势是多么错综复杂啊！

李道一团长最后坚决答复他们说：“不管你们怎么办

吧，我们的民团坚决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打老齐是一定了，再者说："八路军为民除害、为国除奸是坚定不移的，他们的决心已定，我也完全赞成。

这场深夜谈判就此结束，他们离开米楼村走了，而且周致中部也很快离开聊堂边区走了。周部到那里去了呢？他们从此流窜到堂邑县北部辛集、范寨一带盘踞下来，范寨就是周的旅部所在处。这股顽匪军在堂北形成抗战中期反共害民的毒瘤。

我军集中了优势武装力量，在聊西以李海、白堂为中心的讨齐战役打响了。蝥贼不堪一击，全胜的证卷在握。正在这时，日寇的侵略大军果然出动了，并配合其空军的优势，我军在强敌压力下，只好暂且结束战役，退出战场。从此顽匪齐子修部在聊西盘踞了三年。一九四二年初又攻占了我冠县老区桑阿镇一带，给聊、堂、冠、莘边区人民造成严重灾难，当时凡是活着的人们到此，真是目不忍睹。直到一九四三年秋，我军又来解放了这一带地方的人民。

这则轶事活像一个投影，四十多年后又放映在人们面前。它是一篇很好的教材，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　　注：因记忆不详，可惜把国民党的人名遗忘，只好用"他们"来代称。深表谦意。

一九八四年元月十八日

坚持在敌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与敌斗争情况的回忆

李纯礼

一九三八年六月，我考入范筑先办的政干校第一期第一中队。同年十月毕业后，被派往大峰山战地服务团当服务员，同去当服务员的共有六人，与第十支队二团的一个连配合工作。主要是组织农民成立红枪会打日本。大约一个多月后，这个连队在段家店村被日寇包围，经冲出敌人包围，我便护送伤员回到聊城。这年底我在三纵三团一连任副指导员，因病，经政治处李福尧主任动员回家养病。可是聊城已失守，去哪里呢？于是我便回到聊城西十里营我外祖母家住。一个月后病好，我便去找部队，这时，由于部队番号改变，经多方打听，也未能找到，这时已是三九年春天。为了打听我部队活动情况，我经常赶侯营、康营、张炉集等集市，在这些集市上却遇上不少住在乡间的政干校同学，这些同学有从部队动员回家的，有聊城一失守就回家的。遇上了在田庄住的王洪民，在刘花园住的吴洪侠，在赵子营住的吴金芳，我们通过交谈，知道了王洪民、吴洪侠二人在部队已入党，是因病被动员回家。还遇上一些同学，大家共同的语言是要求赶走日本，解放中国。怎么办？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要依靠蒋介石领导打败日本；一是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

正的抗日救国的可靠领导。持后一观点的有我们四人，我们四人的共同誓言是：坚决找党，找部队，不能甘做亡国奴，找不到部队就自己搞武器，拉部队，走跟共产党抗日的路。当时，我在我舅父和悦斋家住，他很支持我的主张，因而，凡是找我的人，他都热情接待。一九三九年春，聊城伪县府给我舅送去十里营村长委任状，我舅不干，我说："你不干，别人也要干，别人干，不一定对抗日有好处，你干只要对抗日有利就可以了。"于是他就当了村长。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宣传下，也都树立了抗战必胜信心，并主动保护我们，提醒我们讲话要注意场合。

一九三九年的秋后，日本侵略者的"以华治华"的政策中，有划为"爱护村"的内容，也就是"爱护村"有保公路、修公路的责任。十里营等靠公路近的村都划为"爱护村"。当我和舅父去修公路时，就趁机向民工宣传说："咱是中国人，日本来了咱就干点，他走了咱就散，如来了八路军破公路，咱就一个顶两个干。"十里营的肖登鳌也这样宣传，我们成了知心人，他让我到他家玩，拿出了党内刊物《灯塔》，《洪流》给我们看，我们成了战友。不久肖便介绍我和我舅父加入了青救会，到冬季这个村就有青救会员十几名了。我也把在田庄的王洪民，已进城住的吴洪侠、吴金芳介绍加入了青救会。一九三九年腊月初，又由肖登鳌介绍我和舅父一块填表入了党，我和舅父又把村东头一个放羊的连生和我的两个表叔发展入了党。加上肖登鳌的交通员肖朝侦共七个党员，于这年农历年底建立了支部，建立支部时是柴龙同志代表上级组织来的，肖登鳌任支部书记，我任组织委员，和悦斋任宣传委员。柴龙同志要求我们：因地处日

伪顽匪鼻子下活动，要坚决保守秘密，党内的事，对父母妻子都不要讲；为便于掩护党组织，党支部要牢牢抓住村政权不放，把村长的职务掌握在我们的党员手里；要充分利用亲友和会道门搞好灰色活动；要想法抓武器，搞武装。这个支部被命名为二A支部，排在七里铺支部之后。

一九四〇年春，我外祖父逝世，七里铺支部来一人以吊孝为名告诉我们说："七里铺党组织与本村一富户发生争执，要求支持他们的斗争。"当时我们想，用什么方法去支援呢？钱和物支援倒可以，如去人支援，相距二十里是出师无名，来人也认为我们提的在理，也就不再要求支援他们了。但通过此事却给我们一个启示，说明一个支部单独作战是不行的，因此，我和舅父商量附近村可靠关系有哪些，在哪里再建一个支部便于相互支援，经过逐村分析，只有后八里屯村，和赵继傅既是亲戚关系，又忠诚可靠，况且还是村长，如果他入了党，这个村就是我们的了。另一个是赵春岭，他是后八里屯的小学教员，也很忠实。就这样，先发展了他二人为青救会会员（试试看），于一九四〇年农历三月初，我介绍他二人入了党。后由赵继傅和赵春岭他们又发展了四名党员。于是在四〇年的农历五月，便在后八里屯建立了有六名党员的支部，赵继傅任支部书记，赵春岭任组织委员。该村支部命名为三A支部。十里营和后八里屯两支部党员之间，虽无横的关系，而两支部领导之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友关系。我们的同志任村长，敌人来了找村长，我们也找村长，不了解情况的人分不清谁是共产党八路军。

一九四〇年三月，冀南三分区情报站长刘荣山同志和柴

龙同志到十里营让我进城了解敌情，几个新入青救会的同志掌握情况也不细，因为这时新入会的同志一无职业掩护，二不需在城内留下来，因而这时感到城内有会员作用不大，便抓紧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这年五、六月间发展了赵国珍、吴金芳，吴洪侠、任保爵等五人入党，所以于四〇年七月，便建立了有六名党员的城内支部，我为支部书记，吴洪侠任组织委员，赵国珍任宣传委员，命名为八A支部。这个支部因处在敌人心脏，所以在具体活动上，采取了打入敌人内部，用合法身份进行隐蔽的地下工作。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所有党员都有了掩护职业，有当警察的，有干伪大队文书的，有当教师的……。我们这些同志作了长达六年之久的隐蔽工作，除处决一叛徒外，其他同志均做到了革命到底。已病故的同志是吴金芳，其他同志还都健在。

回忆八A支部做过的大事有如下几点。

一九四一年春，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绘制了聊城城关详图，送交到冀南军区。

一九四二年冬，吴洪侠同志从国民党处弄出了山东党部聊城县党部组织情况和活动计划，转交到我地委领导。

一九四三年春，经地、县委批准，处决了一名与日本宪兵队挂上钩的叛徒，从而，保护了我党地下组织。

一九四三年初夏，我军由赵健民同志为主要指挥，在冠县集中七个团，准备全歼齐子修匪部，由于吴洪侠同志及时从济南了解到日本军向鲁西北扫荡的情况，及时的转交到冀南三分区，我军便改变了作战计划，停止讨齐，马上转移。致使日军与齐匪的狗咬狗的仗打响了，齐匪被扣，其主力部队被日军摧毁。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吴金芳同志从伪县大队部弄出了伪治安军的扫荡计划送交了冀南军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前夕，由王洪民同志用自行车内胎，带进日寇无条件投降的传单，晚上又由吴洪侠同志在古棚街李明同志住处召开了个党员会，到会者，有李明、吴金芳、任保爵、赵国珍、赵继传，肖登鳌等七人。研究了贴传单的方法，确定为分工三处同时进行：古楼底、古楼南、古楼东一夜贴完，吴金芳便把传单弄进伪大队部，第二天治安军和伪军庆祝日军投降，而日军两个班于拂晓便逃向济南，治安军十七团当天夜也逃往济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赵继传同志向我支部要伪军城防情况。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时，我军打响了围攻聊城的战斗。

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伪军放百姓出城，在匪军旅部的吴金芳同志告诉我，今晚敌人出城，敌人企图夺西关吕祖亩为桥头堡向城西抢粮。要我出城报告我军一定固守吕祖亩，决不能让敌人目的得逞，从此出城，使我结束了七年的城内地下工作的生活。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在聊城生活战斗的回忆

戴庚寅

一

我原在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工作。一九四四年六月底，军分区令我去聊城县大队任党总支书记。两月后，任县大队副政委。大队长由县长张侠同志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陶东岱同志兼任，副大队长是马锐锋同志，副政委王重任同志（于八月间调军分区二团工作，后任十九旅组织科长时牺牲于郓城战役中）。

当时县大队下属三个中队，约二百人左右。还有四个区队，人数不等，共约一百五十多人。战士中绝大多数是本县农民子弟。这支部队基本上活动在县区范围之内，承担着打击敌伪，保卫群众、支援政权建设的任务。不管环境怎样紧张，生活如何艰苦，都紧密地同群众战斗在一起。对建立和巩固政权以及最后解放聊城等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县大队在八年的抗日战斗中，经历了不平凡的战斗历程。它的组建和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至到聊城解放，升级到野战军，参加解放全中国。这是聊城人民的骄傲，也是聊城党的光荣。之所以如此，因为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日伪顽杂的兵力十倍大于我们，而武器也大

大强于我们，加之时逢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田园荒芜，食不饱腹，迫使我县武装力量数度起伏。特别在日寇回师华北敌后的日子里，疯狂扫荡，分区剔割，推行囚笼政策，建立保甲制，强化治安，三光政策当中，我县形成了“抬头见炮楼，走路爬壕沟”的敌人强治的局面，致使我活动地区急剧缩小，武装力量大量减员，甚至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处境极端困难。迫使不得不把县大队的建制缩编为县政府的警卫连，而实际上还不足一个排的人数。在这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聊城的党是坚强的，没有被一时的困境所吓倒，而是抗战必胜坚持到底的团结全县各界人民主动打击和消灭敌伪，不断扩大解放区，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故到一九四四年初，那种艰苦险恶的局面才有明显的好转。

县大队是受军分区和县委双重领导的队伍。大队的主职由县长、县委书记兼任，他们的兼职不是挂名，而是名符其实的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决定。因此，部队的成长、发展、壮大以及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都与他们的正确领导和重视分不开。

二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对敌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关键在于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中共聊城县委。县委成员由陶东岱、张侠、袁寿宸、王鲁光、王清洲、刘子华、范辉、戴庚寅等同志组成。东岱、寿宸两志任正、副书记。四五年七月，东岱同志调区党委学习，地委派李长瑞同志接任书记为时两个多月。东岱同志因日寇投

降，学习未成又回聊继任县委书记。

当时县委机关干部也很精干，只有两三个办事人员办理些具体事务。组、宣等业务部门由委员兼管，各负其责，经常深入基层抓所分担的任务，除开全委会或解决主要问题时，集中的时间很少。因为书记、县长兼职县大队职务，不断随部队活动，所以，我接触他们优于其他委员同志，因而得到他们的教诲和帮助较多，使我在执行政策上，部队行动上，以及自身修养上，少犯许多错误，这真是我的幸运。

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们县之所以称得起是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是因为大家同舟共济，目标一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工作积极主动认真，因而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信任。这是和县委主要负责人陶东岱、张侠同志以身作则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全县各级干部都很尊敬和信任他们。当时在干部中流传"县委有个铁面无私的陶东岱。"因为东岱同志为人刚直，对工作一丝不苟，责任心强，对自己要求很严，没有官气，生活艰苦朴素，不畏困难，对干部体贴爱护，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对原则问题态度明朗，对任何同志从不偏见，谁有优点、成绩就给予表扬鼓励，有缺点错误就批评指正，有时批的挺严肃，又能使受批者心悦诚服。我就领教过这样的批评，有一次正在开县委扩大会议，未经请假就带队打仗去了，仗打胜了，不但没得到鼓励，反而挨了批评："你身为领导干部，这样缺乏组织观念，怎样为人表率呢，如不注意改正，将来要犯大错的……。"对我这种严肃而又诚恳的批评帮助，铭记在心，使我在后来几十年生活战斗中极少出现类似的错误。张侠同志是深受聊城干部和各界人士

信赖的一位县长，他从一九四一年至四六年的任职期间，大部分时间处于艰险困难之中，聊城的恶劣环境，当时不亚于任何其他县区，敌人的疯狂扫荡、清剿、分割、封锁，使我根据地压缩到极小限度，敌我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他曾数次被敌困于村院之中。加之天灾，人民生活的困境更不可言状，党政军机关和农民食无粮，数次派队伍夜入敌区，向地主富户强行借粮以维生存。张侠同志以共产党员的英勇气魄，不惧艰险，紧紧地依靠群众，带领部队顽强战斗，和广大人民同甘共苦，战胜重重困难，渡过难关，他真可称为受命于艰难困苦之地，承担起创建，发展、巩固抗日政府的重任。为聊城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一九四四年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德、意、日为轴心的法西斯阵营面临穷途末日之际。我党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大部得到恢复和发展，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敌伪占领区急剧缩小，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胜利的曙光已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时的聊城敌我斗争形势也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一些敌伪炮楼，封锁沟墙被拔除和平掉，我活动地区有所恢复和扩大，部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或解放区，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都在向前发展。

位于鲁西重镇——聊城，当时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汪伪治安军一个团，汉奸王金祥的伪军约两千余人，分别住在我县中心地带花牛陈、谭庄、朱庄、杨集等十余座据点内，经

常出扰，抓夫抢粮，残害群众，破坏生产和政权建设。茌平、博平两县的敌伪军对我聊东地区的危害也相当严重。而我县武装力量远远弱于敌之力量，不久前在茌平南部又曾遭敌伪之合围，在孙堂继遭敌伪夜袭之挫折，中队长谢家富同志牺牲，指导员徐世德同志负重伤，部队减员，思想混乱，斗志消沉，呈现我们面前的局势是严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在这关键时刻，县委适时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县的斗争形势和任务，认为斗争形势虽很艰巨，但是一个局部问题。全国的抗战形势有很大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打败日寇为期不远。只要认清形势，树立坚强的胜利信心，加强部队军政训练，整顿组织纪律，补充兵员，积极主动对敌斗争，积小胜为大胜，对敌斗争形势一定会很快改观。

遵照县委指示，召开了若干次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反复讲了“我必胜，敌必败”的客观条件和必胜道理。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连队建设，除补充一些新战士外，还从各区队抽调了若干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充当骨干。同时经过训练，各连队都涌现出一批远投弹手，刺杀能手。如侦察班就有几位这样的同志，象谭庄那样大的据点，就能把手榴弹投到炮楼上去，对敌人是个不小的威胁。有的同志还创造了绳拴手榴弹的投掷方法。在战斗和训练空隙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开荒种地种植蔬菜的生产，在于蔡庄还建立了小小的生产基地、榨油酿酒、养猪喂鸡、做酱制菜，这对蔬菜和付食方面有力的得到了一些补充，对改善部队生活起到不小作用。从而大大改变了干部战士的精神面貌。畏难思想基本得到消除，组织纪律性加强了，求战要求

的人增多了。这为恢复和扩大根据地，不光打下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而且战斗力也大大增强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间，为除掉二区腹地刘道之伪据点，在我敌工同志的配合下，只用了几枚手榴弹的代价，就把它端掉了。继而，不断用政治攻势和军事袭扰花牛陈外围支撑点——周庄伪据点，迫敌弃点而逃。这两次小的战斗行动，对鼓舞士气和打通二、三两区的交通联系，保护群众生产，都为有益。在此期间，我一区队在杨诚同志指挥下，一枪未发的把谭庄通往聊城公路上的双庙据点拔掉了，并有收获。区队派班长苗金华同志（外号苗二虎）带几名战士，身着伪军服，手持一封无字的信，在黎明之际，声称是给伪中队长送信的，叫开寨门，面见伪队长。报告队长："我奉大队部命令，来接你的防务。"敌队长拆信后看无内容，正在纳闷之际，苗金华同志的手枪已对准他的脑壳，"不准动，动就打死你，我是八路军，你已被包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个怕死的家伙吓得哆哆嗦嗦的声称："贵军饶命，我缴枪，我缴枪……"乖乖地让他的二十多个喽罗放下武器，做了我们的俘虏。一区队这一果断大胆行动，一枪未发，拔掉据点，这是我县前所未有的一个战例。鼓舞了我广大军民，震惊了其他伪据点，创造了开辟新区更为有利的条件。这次战斗结束不久，苗金华同志被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提升为区队副队长，出席了军分区召开的英模大会，受到司令员刘志远，政委邓存伦同志接见和赞扬。得到了与会同志尊敬，分区《火花报》上还以《巧取双庙据点》，《几分钟打了个漂亮仗》，以及我写的《一封没有字的信》等文章宣扬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周店是地处聊城阳谷两县交界的一个集镇，是我县一、二两区联系的通道，也是谭庄伪据点的外围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经常骚扰我中心地区，对我各方面的开展危害很大。一九四五年初，我县大队配合阳谷县大队一举打掉了这个据点。这次战斗是由阳谷县付大队长林××同志指挥的，他是四川人，后任分区三团付团长，在苏南战役中不幸牺牲。

驻守花牛陈据点的伪军，在我不断取得战斗胜利的威慑下，再不敢象过去那样无所顾忌的逞凶作恶了，而是终日龟缩在寨内，处于缺粮断炊的境地。聊城城内的伪军头目为挽救该据点的困境，于十月间的一天夜晚，由伪军副大队长傅崇舒（聊城人）秘密的带二个中队进入花牛陈，拟在天亮之前，偷袭我三区果子王一带村庄，抢粮抓人，扰乱人心，破坏生产，企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势力范围和吃粮问题。他们的美妙计划，已被我内线工作的同志所侦破，可靠情报为我所掌握。我县大队和三团一部由梁仁魁同志统一指挥，设伏于老鸦陈偏南一带的村庄（村名记不清），待敌进入我伏击地域后，三团直插大柳张，老鸦陈断敌归路，我部则截击，以达全歼之目的。果然，伪军二百余人倾巢而出，天亮前进入果子王西南之村庄，我部发起攻击，敌人未作任何抵抗，虚放几枪，仓惶撤退，遍地逃窜，溃不成军，争相逃命。我则猛打猛追，一直追到花牛陈据点临近的陈庄村子里，敌人大部窜回寨内，少数被我活捉。追击中被我击毙击伤的动员群众送回了据点。我队也伤亡数人。承担截击的部队缴获的武器大大超过我们，这次战斗由于敌之警觉和我暴露过早，而未能全歼敌人。但对敌企图破坏我中心区抢粮的阴谋却被粉碎

了。从此，该据点的伪军再不敢成群结队的外出残害群众了。过后听我敌工站的同志讲，付崇鲁回城后，受到汉奸头子王金祥训斥，大骂他无能，连土八路都对付不了，反被打的落花流水。而付反而抱怨白凤仪（三团团长）忘了旧日之交，一点情面也不给，专门对他过不去。

一九四四年底，军分区组织往南战役，命我县大队积极活动，牵制聊城敌人东援，同时，聊城县委正在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部署明年减租减息的试点任务，为执行军分区命令和保证扩大会议安全进行，必须设法对花牛陈之敌予以打击。经周密思考，设想出一个“放敌入村，关门打狗”的作战方案。地点选在花牛陈东北角不到一华里的小陈庄，该村有二十多户人家，筑有寨墙丈余高，只有东西两门供人出入，西门面对伪军据点，从地形看是个理想的出敌不意的设伏地点。于是部署一区队在李海务一带活动，牵制谭庄之敌。二区队在通往聊城公路上王官庙一带警戒。四区队活动于军王屯监视朱庄之敌。一个中队和三区队隐蔽于大柳张以备意外情况的发生。大队部带两个中队于拂晓前进入设伏地点，严密封锁消息，寨门敞开，临街门紧闭，除警戒外，一律隐蔽待战。对村民以三区队的面目出现，从早到中午，据点敌伪人员五、六人来村催要东西，对他们宣称：“我们是抗日政府的三区队来此征收公粮，村长正为我筹备”。并教育他们不要作坏事。下午二时许分别将他们放走，让他们替我充当“义务通讯员”，以期达到“引敌出洞”的目的。

愚蠢的家伙，果真听了我们的调遣，下午三时左右敌人出来约有一个中队的兵力，分三股向陈庄扑来；两股分别向村南和村西北面包围、迂回，一股约三十余人直扑西门，敌

见门大开，并无抵抗枪声，胆子更大了，一窝蜂似的涌进西门，扑向街头，我一中队的战士迅即将西门紧闭，猛打敌背，临街房顶上的手榴弹飞向敌群，我二中队战士则迎头痛击，敌人慌了手脚，乱作一团，满街乱窜，我“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之声响遍全街。在我密集火力下，除几个越墙漏网之外，全被生俘，其中包括小队长一名。墙外之敌，一经反击都象兔子一样飞快跑回据点去了。这次伏击战，从打响到结束不到十分钟。实践证明，敌人据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是他们的保险地，只要我们准确的掌握真实情况，知己知彼，灵活、机动的运用游击战术，任何地点都是可以打胜仗的。

北杨集是聊城东北方向偏远的村庄，是聊博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一个伪军中队，它和城东朱庄之敌相互应，北靠博平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汉奸罗兆荣为依靠，对我四区根据地威胁甚大，经常抢粮抓人，摧残群众，使四区人民终日不得安宁，政府工作很难开展。对此，区、村干部和群众纷纷要求尽快拔掉这个据点。于是，我们配合分区三团在除夕之夜，利用敌人过节松懈麻痹之机，采用奇袭手段，一举攻克，并活捉伪中长苏维明以下七十余人。

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而积极主动的出击敌人，有力的打击了敌人凶恶气焰，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城外，除花牛陈、谭庄、朱庄三个孤立据点外，其他据点均被拔除，我县区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一九四四年底，以城北辛闸为中心又组建了第五区抗日区政府，调谭浩庵同志任区长兼区委书记。县大队经过这一段战火锻练，不光充实了兵员，而且军政素质大有提高，斗志更加旺盛，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中。县大队面临的任

务是上述三个据点的敌人。从而采取了一方面经常出现在据点临近的村庄，威逼敌人，迫敌不敢轻易出门；一方面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进行主动出击敌人，配合三团两次攻打谭庄据点未克，在小王庄（朱庄西一华里）、白马寺（谭庄西北）的伏击战，均有俘获。夜袭聊城东关伪警察所，极短时间内被我摧毁。城关附近的陈口、土城一带成为我不断活动地区，迫使一些伪村长向我抗日政府靠近，缴纳公粮。到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间，城外三据点之敌，分别弃点逃回城内，县城已成为汉奸伪军固守的一座孤城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军我国东北，歼灭日关东军，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各战略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向敌伪盘踞的交通要道及城市进军受降的命令。我军英勇健儿，奋勇进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投降。但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土匪、地痞流氓组成的伪军，却摇身一变竟成为“国军”了，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而等候所谓中央军来改编，继续与人民为敌。驻聊城的大汉奸王金祥、赵振华、郭墉德等一伙亡命之徒，就自称是“国军”拒不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我县大队和冀南七分区马河支队，奉命围困聊城，由七分区政委张希才同志指挥，我大队承担城东关和北关的任务，西、南两面由马河支队负责，在围城七天中，城内敌人未有大的反映，只在北关以近百人的兵力作过一次试探性的出击，被我击退，我牺牲排长一名。经多次政治攻势，劝其投降，敌不理睬，无降之意，而我们当时的兵力和装备，也不具备攻城之能力，相持下去，与我不利，随予撤围。

这次围城，在军事上虽未取得什么成果，而在政治上收获是巨大的。八路军的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优良作风，给城关人民群众以新的认识，留下了深刻影响。给敌伪在政治上是个严重打击。同时，对城周围地形和兵力部署作了一次实地观察，为以后攻城作了一定准备。

日寇投降，全国庆幸。而坐在峨眉山坐等胜利的蒋介石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了。他命令各地汉奸伪军就地待命，听候整编，并把大批用美国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开向我八路军、新四军浴血抗战创建起来的解放区来“收复失地”。在中国抗战胜利后，决定中国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尖锐的指出：“山是我开，树是我栽，果子应由我摘”。“蒋委长下山来抢果实了，我们要‘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野战兵团，充实壮大主力部队，消灭胆敢进犯之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据此，军分区命令我县大队，分批升级补充主力部队。第一批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由副大队长马锐锋同志带领一中队百余人枪升级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批一九四五年十月间，由党总支书记丁洪勋同志带二中队近百人升级到第七纵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军分区决定以聊城县大队为主和阳谷县大队组编为军分区二团。由此，我就离开聊城县委到二团工作去了。团长是梁绍臣同志，是位红军干部，一九三八年在六八九团曾和他一起工作过。副团长是张志清同志，谭浩庵同志任团副参谋长。浩庵同志是位文武兼备的好同志，我和他相处二年，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刻，听说他在淮海战役中不幸牺牲，借此以示缅怀。

五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由二纵队两位侦察员持我军分区首长手谕，命我立即随同他们去二纵司令部接受任务。由于集住地到冠县约七十余里，适值天降大雪，天寒地冻，骑车难行，奔波一夜，天亮才到达。不巧，纵队司令部于昨夜移驻堂邑西南×村，只到下午二时才找到纵司，面见到纵司政委宋任穷同志，听候指示。宋政委询问了聊城城防和敌人兵力情况。而后宋政委说："今晚十二点攻打聊城，你们的任务是佯攻南关，牵制敌人……"。由于时间紧迫，骑军回返，时间难以保证，宋命侦察连借马三匹当即回转。路经沙镇天已黄昏，催马加鞭，二十一时回到于集驻地。一天一夜难合眼，只在纵司吃了顿饭，盼望已久的主力部队攻打聊城的心情，代替了疲困和饥饿。于是立即集合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县城进发，前卫连刚进南关，二纵攻城战斗已打响了。

攻城方向选择在城西北角为主要突破口，以雪衣伪装奇袭的手段突击的，由于城高壕宽，敌有警觉，被敌发现，而变为强攻，激战一阵，未能登城，部队进入阵地将四面包围起来，继作再攻之准备。

国共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头目蒋介石撕毁了。他调兵遣将，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遵照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给进犯我上党、邯郸等地区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歼俘蒋军数万人。由于蒋介石大打内战的准备尚未

完成，以及全国人民需求和平民主，国民党被迫再次和我党商定"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

围城部队经过积极攻城准备，争取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停战令生效之前，打下鲁西大平原上这座孤立的城池，解放聊城，解除我军运动作战的后顾之忧。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十七时许，攻城战斗就打响了。攻击重点在城东南角。南门和东北角为佯攻点，陈司令员，宋政委亲临火线，指挥所设在龙洼村北运河大堤上。开始集中火力进行炮轰，几分钟便把城垛口和敌炮楼摧平，砖、瓦、木、石和敌楼守敌飞向天空，烟雾遮蔽城头，突击部队竖梯爬城，战士非常勇猛，很快登上城头，进行白刃搏斗。由于护城河冰被炮声震裂，河水又深，涉水难渡，城角两侧突出部位的隐蔽火力点未完全消灭，侧射火力对我杀伤很大，云梯被打断，后续部队运动受阻，难以继续登城。已登城部队，敌我力量悬殊，突破口未能巩固，攻城战斗随告结束，转入围城近一年之久的格局。

六

二纵攻城未克，不久离开聊城，只留四旅一个团统一指挥围城。该团驻防东关，军分区六团驻北关，二团驻南关和西关，我团防务较重，压力很大，南西两关中间地带较宽广，兵力又不充实，城内伪军夜间不断在此地段外出骚扰，有时还到城西附近村庄抢粮，扰乱群众，曾发生过若干次小的战斗，队伍经常处于战备状态。

在我攻城之前，城内伪军虽作了些长期固守城垣的准

备，在围城之后，敌之物资来源基本断绝，数千敌伪人员和市民天天消耗，粮食日益紧张，汉奸头子王金祥被迫不得不把大批的饥饿居民放出城来，以缓解他物资的困境。我抗日县政府以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本着有亲投亲，无亲投友，无亲无友者都作了妥善安置。与此同时，国民党济南当局，为安定军心和伪军吃粮问题，派遣飞机来空投点粮物。可惜，他们的飞机驾驶员胆小怕死，不敢低飞，当时我们还没有高射炮，只能用机关枪，步枪射击飞机，逼敌机在高空投放，因而，投落在城内的极少，大部作为“慰劳品送给我们”了，敌人真是枉费心机。有几次还派有战斗机护航，在城周围盲目扫射，多数炮弹打在城墙上。好像我们的飞机打敌人一样准确，打得城墙上的伪军乱嚷乱叫乱骂娘，我们的战士则鼓掌大笑。

调解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三人小组，两次来聊城举行谈判。双方（美蒋为一方）的立场观点非常明确，斗争也很尖锐，其焦点是城内的军队是汉奸伪军还是国军？双方各持论据，坚持己见，争吵不休。虽然也写了那么几条协议，只表明谈判没有公开决裂，但没解决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张侠同志写的谈判回忆较全面的概述了谈判的前因后果。现就我能记忆起与此有关的情况稍加补充。

郭仁依同志是军调部派往济南三人小组的我方首席代表。宋任穷同志是聊城前线我军首席谈判代表。第一次谈判，我驻军各团都有一位负责同志参加，主要任务是在谈判桌上用具体事实揭露城内伪军破坏停战协定；不断攻击我方阵地；开枪杀伤我军民的罪行。每当我们讲到城内汉奸队王金祥残害人民的时候，国民党的代表就坐立不安，比骂他的

祖宗就难受，就气冲冲地站起来打断我们的发言说："我们是来调处军事冲突进行谈判的，不是来听你们骂国军的，你们对谈判毫无诚意，向你们抗议"。我们抓住他蛮横无理的态度，猛烈向他反击："以王金祥投靠日寇认贼作父、奸淫烧杀我军民的种种罪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十足的汉奸卖国贼，如果这样的队伍是"国军"的话，那么真正抗日的国军不是和他们一脉相通了吗"？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个蒋方代表就低头不语，哑口无言了。还是那个貌似公正的美国佬站出来帮腔替他解了围。

谈判会议将要结束之际，美国代表提议：要亲到双方阵地观察停战情况。我们认为这个要求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问题是想通过观察地形，侦探我方军事部署。因而我们明确告诉他们："护城河外均为我军阵地，伪军都在城内，不必劳此大驾了"。而美蒋代表则说："实地观察双方驻防现状，调解冲突是三人小组的职责。"我方则说："你们如果执意要去，就一起去吧！"

南关、西关是我团防地，南关护城大堤外，是聊城的旧飞机场，西关只有一座不大的庙宇，周围无村民住家，比较孤立，只有一个连队住守。在电话上向团付参谋长谭浩庵同志作了简要安排，由他负责接待。除警戒外，其他人员均不露面，会后分乘汽车进行所谓观察双方阵地，美方代表要首先观察南关和西关，这样我当然要充当"向导"了。车行至龙洼村口，将车行至护城大堤之内，避开机场，美国佬不干，坚决要走大堤之外，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车已到南关，沿街心转了趟，看了下桥头，就完成"观察"了。车沿护城河向西关行进，这样既观察了我们的防御地带，又起了

给伪军打气的作用。城墙上衣帽不整、面黄饥瘦的伪军，嚷叫呼唤，好似捞到什么救命稻草一样。

西关除一座孤立庙宇外，再无其他屋舍，只得在停车之地有礼貌的接待，我当即把谭浩庵同志介绍给他们："这是我们的参谋长，由他接待你们"。谭说："欢迎你们……，不过城内伪军破坏停战协定"。美蒋代表根本无意听取谭的陈述，一声不吭进至庙内，胡乱转了一下，将欲退出，适值一个带班班长被美国佬遇见了，假装亲热，问这问那，观看枪枝，对着城墙上的人群比比划划说："我们美国士兵不用这种枪械，多用卡赛枪，效能很高，射击城上目标，百发百中……"。很显然，这位洋大人是瞧不起我们的武器，而玄耀他们自己。我当即回敬他说："你们美国的武器是不错，我们手里也有，是你们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惨杀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又"送给"我们的，不过目前还不多，如果蒋介石还要打内战，你们美国的武器我们还会更多"。"我们八路军打败日寇靠的是小米加步枪，武器是人使用的，我们的刺刀、手榴弹威力，不亚于你们的卡赛枪，手榴弹照样可以打到城头上去"。经过一场不冷不热的对话，美国佬不吭声了。观察结束了，他们带着"胜利"的表情回到住所，东北两关也不再观察了。

国民党反动派大打内战的准备在美国支援下，已基本完成，全国性的内战即将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二纵十团奉命归建，离开聊城。继由冀南七分区七团接替十团防地，由七团分区司令员白云同志统一指挥围城部队。七团换防很快被敌察觉，伪军头子王金祥为探明我围城部队的工事设施和战斗力，于某日夜突然向我四关袭击，东关和南关前沿阵地被

敌突破，经我激战反击，将敌驱除阵地，撤回城去，并有俘获。我团团长梁绍臣同志在指挥反击中中弹负伤。由此，城内敌人夜间外出的袭扰和我反袭扰的战斗较频繁起来。为防敌外出捣乱，节省围城兵力，约在七月间，天降大雨，运河水满，指挥部决定，在城东北方向，决堤放水围城。一夜之间，下堤之内水深数尺，成为一片汪洋，将敌城根下的所有工事一概淹没。此举在当时确实起到节省兵力，死困守敌的作用。大水何时下去，对以后攻城作战有无影响，因无亲临，不再言及。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和任务的需要，军分区决定二、六两团合并，撤销二团建制，调我和副团长张志清同志去晋冀鲁豫中央党校学习党的七大文件，从此，就离开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奋战二年多的聊城地区了。

由于时过很久，很难把二年多的事情回想清楚和准确，甚至有些事根本想不起来。加之文化水平低，只能把所经过的历史概况排列出来，仅作对哺育过我的聊城人民以报谢，并渴望当时一起生活战斗的同志，对差讹之处，予以补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在筑先（聊城）城关区工作期间的点滴回忆

陈　伯　三

一九四四年秋，我从第六专署干训班调到筑先县（即聊城）工商第一事务所工作。当时的事务所主任赵平，活动在顾官屯。一九四五年八月聊城被我围困后，事务所迁往东关越河圈，我任所主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整党（春初在东阿县秦老庄）结束，我即调往徐翼县工商局，离开了聊城。现将我在筑先城关区工作期间的情况回忆如下。

一、在围城后为了支援部队，提高战斗力，第六专署政委谢鑫鹤同志批准携款去临清采购慰劳品，我与×子厚二人骑车带枪赶赴临清，当初我们住在了冀鲁豫党委驻临清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范仰民同志亲自关照三天，将三马车慰问品全部运到聊城（毛巾、肥皂等），直接交到了二纵十团供给处。处长宋光道同志接收慰问品后，又支援了我地方枪支。我记的是七支短枪（有匣枪、手枪等），充分体现了当时密切的军政关系。这一任务的完成，不光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受到了专署的表扬。

二、在围城期间，我记得与公安派出所所长齐国辉同志的关系较好，我们是路南路北居住，当时敌伪王金祥的部队被围在城内，济南的敌人飞机每天都要飞到聊城送食品，并

轰炸市民，有时用机枪扫射，为此，我们共同组织商业户挖防空洞，敌机一来，在听到警笛后便钻入防空洞。我事务所西侧有一个磨面房东，由于敌机经常来，他麻痹大意，叫他入洞不听，而被敌弹粉身，这一教训，使东关商业掀起了防空热潮，每院都挖了这一安全防空设施。

三，一九四七年初聊城解放后，城关区正式成立，区长阎海云，副区长刘庆超，区委书记杨林同志，城关工商事务所直接受县工商局领导、局长是吴欣斋（后为副县长），副局长赵平。当时聊城市场繁荣，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会长李成林。由于聊城北有临清，南有冀鲁豫广大县城和国营泰兴隆、裕丰、运昌等大商业，再加金钟、金塔两个烟厂，国营酒厂、所以经济活跃。因此，我在那里进行工商业登记，发照、建立柳园市场，培养市场管理人员等工作是很紧张的，因为当时的工商所与税收银行都在一齐干，所以人员较多，枪支也较多，形成独立进行工作的单位。在一九四七年冬我们进行的工作是很好的，工商户登记结束后，采取了工商户自报纳税达到了专署分局的指标要求，并受到了表扬，一九四七年采取了工商联合会按行业分片相结合，自报公议，相互比较纳税的方法，这样很好的完成了税收的任务。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于北京

简忆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

徐　明　魁

我在柳林武训小学读书时，由于受徐运北（原名徐云鹤）老师的教导，即有了抗日爱国的思想，毕业后，在家住了不到一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这年下半年，我们那一带在外读书的学生，都陆陆续续回到家中，如阮庄的阮贯之，垢固的梁向明，还有从北京、天津来的外地学生。这些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学生，经常在我家附近的村子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我影响很大。三七年底，我小学同班同学靳乐东（原堂邑四区靳庄人）约我和赵树人（柴庄人，现名刘海波，任经济报总编辑）同志一起到范筑先领导下的十支队当兵抗日，我们到冠县文庙找到了原武训小学教我们算术的赵越老师要求参军，被接受后，分到了四连当兵，连长陈忠传，指导员曹丕堂。后来部队领导动员到前线打日本鬼子，我们便开往津浦铁路沿线、济南以西长清和济南至泰安北一带，与侵华日寇展开了游击战战争。有一次我们截击敌人的汽车队，大概有六十多辆；有时扒火车路上的铁轨，扒后我们就躲到离铁路三五里的山坡上，敌人的歪把机枪声，从晚十一二点，一直响到天明；有一次还把敌人的火车搞翻了，敌人的歪把机枪更是响个不停。有时把敌人的电线一割就是几里长　不知苦、不知累、

不知怕，只要是上级分配什么任务，大家都争着要去。有一次，在公路上截击敌人的汽车，需把公路挖断，有一个战友挖完后累的睡着了，敌人的汽车到他跟前，他来不及跑，被敌人活活杀死了。我们在两侧打埋伏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炸坏敌人不少的汽车。我们还打击了一些通敌的地主、士绅，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战术是打了就走，每天晚上都行军，一夜行军有时五、六十里，有时七、八十里，在紧急时一夜行百十里。拂晓，村上的人将要起来的时候，我们便在各路口和重要的地方放上哨，站好岗，群众往来只准进不准出，严防汉奸给敌人送信，天明之后村长领着我们号房。住到老百姓家后，做些群众工作，帮助住户打扫院子、挑水等，吃完饭后，就休息睡觉，到下午三、四点左右，才又开始行动。我兼任文化干事，往往觉也睡不好，要组织以连为单位的文化宣传组，挨家挨户去访问，了解民情和地主士绅汉奸的一些情况，并发动群众参加我们在黄昏离村前的联欢会。所以，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群众极热情的欢迎和接待。不久，我得了伤寒病，营长刘志远同志批准我去聊城住院治疗，我便随聊城来部队宣传慰问的张坤同志一块回聊，治病去了。

我记得在三八年的八月底前后，住了半个月的医院，病有些好转能到外边走走，一天在街上碰到我的老师徐运北，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处，问清我的情况后，送我到聊城敌干校学习。不久，日本鬼子攻打聊城，我们就在聊失守后的前两天离开了聊城到了冠县境内，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民族英雄范筑先和我们党的优秀代表张郁光、姚弟鸿等，与城共存亡光荣牺牲的不幸消息。

我在冠县住了几天之后，上级将我分到原堂邑五区垢固一带，在地下党员梁向明同志领导下工作。这块地方是原堂邑北部四、五、六区敌伪军吴连杰盘踞的地方，吴连杰部被范筑先收编为三十一旅，他们在聊城失守前，名义上归范领导，实际上早就和国民党暗通，范筑先牺牲后，他就和敌伪军联系在一起，表面上也和共产党联系。吴连杰这个狡猾的狐狸，不是一脚踏两只船，而是搞三角关系看风使舵的家伙，随着时局的变化，吴连杰很快公开投降了日寇，成了中华民族可耻的败类，人民的敌人。

垢固是梁向明同志的家，后来还有赵明同志也住在他家，我们就以垢固为中心进行活动，我们有收音机、油印机，经常编写一些宣传材料或印些传单，出不定期的小报，传播一些革命的道理和抗日救国的一些胜利消息等。一九四〇年，梁向明同志准备成立一支抗日武装，起初报名参加的有五、六十人之多，准备集合的前两天六区的一些人起了变化，不愿参加了，因此，武装没搞成。后来因环境恶劣，上级把梁向明同志调走，由我任区委书记，满九成同志任组织委员，魏长捷同志任宣传委员。那时的活动重点一是转到敌人内部去做统战工作，二是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原堂邑四区柳林以老党员赵荫庭、杨士元等同志建立的支部为活动中心，有张四古庄的乔际清，陈阳里的陈化民，刘阳里的刘海波等同志（后来乔际清，刘海波都叛变，乔际清于四四年被我镇压）；五区以垢固为中心，有梁向明、梁东来（现名梁汉一）、刘文、刘丕田等同志，还有后哨营梁曾庭，后路堂的陆学德等同志；六区有陈庄的徐明魁（原名徐玉琛）、满九成，阮庄的阮贯之、阮用之、吴何令，张美公庄的陈洪

恩、陈洪吉，魏庄的魏长捷，朱枣科的朱培厚等同志，共建了十多个支部和个别关系，共有五十多个党员，再加上一些同情革命的党外青年学生等，我们的活动范围就相当大了。

我们对伪军吴连杰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当时为了工作的方便，就有计划地打入敌人内部，以伪职人员的身份来掩护党的工作。我到六区斗虎屯伪乡公所当乡丁（半年后转为小学教员教书），满九成同志到伪军吴连杰司令部给副司令孙步云当护兵，陈洪恩同志到程子方团部当秘书，魏长捷同志到宋凤歧团政训处工作。伪军吴连杰其他团虽没有党员也有同情革命的同志，如赵昌基团有同学赵同林，黄竹斋团有吕连元，以上这些同志在消灭号称三千多人的伪吴连杰部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党为人民作出了贡献。如打阮庄小围子黄竹斋团时，就是里应外合，敌人没放一枪一弹，我们没伤一个人，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就干净利索地消灭了这个团。再如程子方团，由我们内线积极活动，东进支队首长夏碧波同志以请客的方式争取全团起义，成为抗日斗争一支武装力量。魏长捷同志在宋凤歧团争取了一部分人起义，最后只剩下伪军吴海子老窝，是在四四年冬，我军挖洞炸碉堡攻开的。那时，我是那个区的区委副书记。

在这段对敌斗争工作中，使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冀南一分区军法处长柴连超同志，被伪军吴连杰扣押到后哨营被齐子修部残酷杀害，我们地方党组织从此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自从梁向明同志走后，我们这里地方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柴连超领导的，他熟悉敌情，工作细致认真，是我党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每次向上级回报工作时，都是他领着我或满九成同志，通过“无人区”，穿过封锁沟，到元朝边

根据地找上级机关，头天下午出发，一直走到第二天中午，一百多里的路程，有时脚上磨起了泡。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过着幸福生活，回想起荣连超同志来，他那和蔼可亲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的献身精神，过去鼓舞着我们对敌英勇地斗争，现在激励着我们为四化贡献余热。

荣连超同志牺牲后，敌人更加严密监视我们地下党的活动，尤其是打阮庄小围子后，我们就更站不住脚了，为此，上级党调我到太行去学习，因开辟原堂邑四区柳林，没有去成。我在四三年初调到四区任区委副书记，开始只有我和王养善同志（后调到原堂邑六区斗虎屯工作，敌人扫荡时被捕遇害）两个人，他任抗联主任，过了几个月后又调李荫龙同志来我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大约四三年下半年或四四年初，我便参加了由地委宣传部长杨易辰同志领导的冠北工作队，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去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

冠堂地区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情况回忆

肖　平　许世平　张绍迪　李荫川
杨兆禄　李师魁　王庆功　穆其达

冠堂地区是一九四二年再次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处聊（城）临（清）冠（县）堂（邑）馆（陶）五县交界的三角地带，是鲁西北地区战略要地之一。这个地区当时日伪顽杂互相勾结，反动力量较强，封顽势力统治较严，对抗日活动的防范也比较严密。同时在这个地区土匪司令杂牌军繁多，约共有数万人，他们与日冠勾结，狼狈为奸与我为敌。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冬之前，我们只能是由小股游击队在边沿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直至一九四二年冬之后，日寇与齐子修匪部发生火并，齐部被挤出这个地区，我军主力攻克了清水、柳屯、汤村等顽固村镇之后，我抗日政权冠堂边办事处（后改为武训县政府）进入这个地区开始了活动。

此时，这个地区虽然建立了县区抗日政权，但各村基层政权仍受封建顽固势力所控制，同时日伪据点的敌人常出动抢掠抓捕抗日干部和进步群众，距离较近的杂牌军也趁机偷袭抢掠，日伪还在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的扫荡。抗日活动仍受到很多限制。

由于长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残酷统治，和周围日伪顽军的盘踞和骚扰，在群众中存有较浓厚的封建意识和恐慌心

理，对八路军抗日政府还不甚了解，对坚持根据地抗日斗争还缺乏信心，怕八路军占不长，怕地主武装和顽固势力报复，怕得罪人，顾虑人情面子等等忧虑。面对当时灾荒极其严重民不聊生和刚刚开辟该地区，群众基础不稳固的局面，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首先抓了生产自救渡过灾荒，进而，开展了借粮，赎地以及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合理负担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宣传贯彻了党的政策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广大农民群众从斗争中体会到组织的必要，组织起来才有力量。随之普遍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以及以顾工为主的工人抗日救国会组织。经过一系列艰苦而细致的群众工作，逐步打下了群众基础，使我们能够站住了脚根，并且逐步把这个地区建设成了牢固的抗日根据地。

（一）

通过组织生产自救开展抗日活动建设抗日根据地。

这个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由于长期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敌伪顽杂的横征暴敛，特别是，冠堂公路和马颊河交岔地区方园百余里，由于伪军齐子修的长期盘踞鱼肉人民，造成了骇人听闻，历史上罕见的“无人区”。在我们进入这个地区时，到处是野草丛生，兔狐横行，房无门窗，树无皮，村里村外，屋内屋外，随时随地都可发现饿死的尸体无人掩埋，呈现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我们到达后，首先组织没有逃离走的少数群众掩埋尸体，用事实教育群众，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另方面组织生产自救，收集草籽发放救济粮，组织

纺织以工代账，组织刮咸土熬小盐换些粮食，组织开荒种地（耕种一亩，政府贷谷二斗，外贷种子），逐步召回灾民恢复生产。并且号召西半部灾情较轻的村庄支援重灾区，我党政军民武等机关团体也掀起了开荒种地的热潮开展生产自救。通过一系列的生产自救工作，逐步组织起了农青妇等群众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活动，保卫自己辛勤劳动果实防止日伪抢劫。为把这一灾区逐步建设成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二）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活动。

由于敌伪顽杂横征暴敛和地主高利贷重利盘剥、把负担转嫁于劳苦大家，使得最基层的贫雇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政府制定的增资增佃减租减息政策深得贫雇农的拥护和欢迎。但是由于怕变天加上“宿命论”和“宗族观念”，认为是“命里注定的”，当家本族以及亲友和中间人的面子，怕影响信誉，怕来年再租佃当雇工找不到主顾，怕再借贷无门，因而不敢照政府政策规定办理，处于极端矛盾和痛苦的思想忧虑的状态之中，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有重点的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首先经过对受苦较深、受剥削较重、有觉悟的积极分子进行思想发动，解除了顾虑，通过他们进行串联，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如一九四三年春，王羡村刘家行一趟街上就有四五十户农民因受灾没饭吃，为了活命向邻村邓官屯的地主借粮，当时言明“吃一斗谷子秋后偿还三斗小麦。”可是到秋后种麦

季节，麦种昂贵，卖三斗谷子或绿豆才能买一斗麦种，这样就等于春天借贷一斗谷子，秋后需要偿还九斗谷子。这样极其残酷的高利盘剥压在贫苦农民身上，贫苦农民悲愤的说："春天没有饿死，冬天还高利贷还得饿死。"面对这样情况，我们在贫苦农民中，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发动，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斗争必胜的信心，首先组织起了农会把贫苦农民都组织在农会之中，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斗争。在一天的晚上由农会负责人在区抗联干部的陪同下，带领王羡村一百多还债的农民用肩挑或用手推车载着粮食浩浩荡荡向邓官屯进发，事先已由区游击队封锁了邓官屯西北三里地日伪军盘踞的王二庄据点。经过和债主的说理斗争，按照借一斗还一斗三升的利率进行偿还或订立了续借契约。开始去时人人提心吊胆，顾虑重重，沉默无言。回来时个个兴高彩烈喜笑颜开，一路上说说笑笑，经过这场斗争大大的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增强了信心，同时也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能为自己办事，在此思想基础上，农、青、妇、儿童团歌声嘹亮，沉默的村庄有了新的生气。

给地主当长工的工人除了管吃以外，工资极其低微，佃户的生活也是相当贫苦，政府虽然公布了增资、增佃的规定，但有的雇工仍然存有顾虑，个人是想增而不敢增。经过思想发动，各村组织了工会，取得了增资增佃的胜利。之后，又组织起了区工会，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斗争，最后，于一九四五年春，召开了县工会代表大会，选出了县工会委员会，健全了组织加强了领导，长工佃户有了自己的组织，腰杆硬了，情绪高了，敢于和地主们说理斗争了。地主老财只得唯命是从，照增资增佃的规定办理。

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春，由于天灾人祸，贫苦农民被生活所迫，为了活命忍痛出卖土地，封建地主就趁火打劫。有的用二升粮食就换一亩地，甚至有的用几个窝窝头也换一亩地，有下几十年苦心经营的果树一亩地内有十数棵，每棵可收上百斤的杏树、桃树被地主用二斗谷子的代价就忍痛换去。直到一九四四年之后情况才开始好转，失掉土地的贫苦农民，无地可种，悲愤交加，政府根据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为了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颁布了赎地办法，贫苦农民拍手称快。但由于长期的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人死了不能活，地卖了不敢再赎"，这种思想束缚了人民。经过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动串联组织，以农会为主体共同斗争，选择一个村召开赎地示范大会，而后全面展开，彻底地贯彻了赎地政策，解决了失掉土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贫苦农民欢欣鼓舞，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

（三）

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

由于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军节节胜利，拔除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据点，加之太平洋战争暴发以后，日寇兵力严重不足，急于收缩兵力，于一九四四年夏收后，西庄，贾镇、影庄、王二庄等据点纷纷撤退收缩回县城。这时除县城外广大地区联成了一片，此情况下，是年秋由地委副书记杨易辰同志率领的冠北群运工作队到原冠县八区清水柳屯小郭寨等村和原堂邑县六区（即武训县二、四区）柳林镇、甘官

屯等村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当年冬，中共武训县委也组织了一、三、五边区群运工作队到辛集镇、张庄、柳八寨、袁虎寨、赵里庄、戴里庄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

由于长期的封顽势力统治，各村政权一般都掌握在各村地主手中，他们任意摊派各种款项还从中贪污自肥，他们运用村政权，任意关押处罚贫苦农民，有的甚至私设公堂，任意非法拷打无辜农民，在其淫威之下贫苦农民敢怒而不敢言，这些受尽折磨的人民大众，内心里拥护共产党，盼望能够翻身得解放。但在工作队进村之后，他们却又顾虑重重怕变天、怕报复，忧疑观望不敢接近我们。经过访贫问苦，逐个的扎根串联和深入的思想发动之后，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调整建全了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选出了清算委员会，清算了多年来的村政帐目，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了反动村长及其后台地主豪绅的反动罪行。为了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动气焰，“打一警百”打开局面，在群众得到充分发动的基础上，首先在清水镇、柳林镇、赵里庄、戴里庄、辛集镇等处选择典型，对独霸一方，影响较大的恶霸，分别组织了万人斗争大会，如在清水镇斗争恶霸地主韩翼臣，柳林镇斗争了所谓“三大绅”，辛集镇斗争了反动镇长于新一，赵里庄斗争了地主赵丙午，戴里庄斗争了地主戴东成，经过这些以本村群众为主邀请周围村群众参加的万人斗争大会，以后，各村也相继召开了斗争本村恶霸地主的群众大会，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倒了恶霸地主，改造了村政权，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贫苦农民掌握了“印把子、枪杆子”，腰杆硬了，情绪高了，个个扬眉吐气。巩固了工农青妇抗日群众团体和儿童团组织，大大有利

于各种抗日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从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通过群众运动也锻炼了群众，培养了骨干，从中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分子吸收入党和充实到区、县各部门组织，扩大了干部队伍，党的组织也补充了新的“血液”。

（四）

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高潮。

经过在减租、减息、增资、增佃、生产自救等一系列工作中群众思想的发动，和斗争中实践的教育，广大群众思想觉悟逐步提高，特别是反奸清算斗争中，通过苦主对反动村长和恶霸地主种种罪恶的具体揭露，使广大群众深刻的认识到旧社会时的黑暗统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群众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翻身得解放。认识到胜利来之不易，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活动的开展，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胜利果实的高潮。在一九四五年夏季参军运动中，很多区、村干部、党员、群众积极分子带头踊跃参军，扩充壮大了人民军队，出现了不少妻送郎、父送子的先进事迹。各村民兵在参战支前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甘宫屯区（武训县二区）和柳林镇区（四区）的民兵在王庄、影庄日寇据点未撤走之前，均组织了民兵联防，每天有民兵短枪队活跃在据点周围，打的敌人小股不敢出来，大股敌人出来，走到那里，民兵就尾随到那里，到处有枪声，有民兵打冷枪骚扰敌人，搞得敌人心神不宁，草木皆兵。军分区组织的攻打吴 海 子（杂牌军吴连杰部的老巢）战斗以及攻打日伪盘踞的临清县城和堂邑县城等战斗，都有大批的民兵参加，在屡次战斗中

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神枪手和战斗英雄。如甘官屯区的柳长淮、张树栋、邢本荣、张善成、王××等，以及一区的赵书珍等都是经过在和敌伪搏斗中威震敌胆，名扬四方的战斗英雄。还有的民兵英雄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保卫斗争胜利果实而流血牺牲。王樊庄的抗日村长民兵英雄王玉臣于一九四五年夏日寇扫荡时在和日寇搏斗中英勇牺牲。战斗英雄金凤歧同志在围困顽伪军郭庄据点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许村的民兵战斗英雄邢本荣同志曾在作战中身负重伤。此外，还有很多民兵英雄们在抗日战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荣诗篇，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在历次战斗中，做军鞋、运弹药、送公粮、抬担架、慰问伤员、照顾伤员喂水喂饭，擦屎擦尿亲如家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

发动群众开展借粮减息斗争的情况

许世平　李荫川

一九四三年秋，冠堂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场与广大群众生死攸关的斗争。也是当时党、政、群、团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即：发动群众，进行借粮减息斗争。抗日战争已经推行了六周年，在长达六年的岁月里，冠堂边地区的广大人民，在日本鬼子及其伪、顽杂牌军的铁蹄蹂躏下，受尽了重重苦难。冠堂边地区，是冠堂公路以北，冠县、堂邑两县所属的部分地区，是鲁西北有名的敌伪顽杂紧密相勾结的顽固堡垒，敌人的统治力量相当强大。在党的领导下，我抗日军民同敌人经过多次较量，进行长期的、反复的艰苦的斗争，于一九四三年麦收的前后，终于迫使敌人节节败退，冠堂边地区终于成为连片的、能公开活动的抗日根据地。

由于敌人长达六年之久的盘踞骚扰，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再加上一九四三年夏天没有落雨，夏粮颗粒未收。天灾人祸，大部村庄造成了罕见的无人区。马颊河两岸方圆百余里，田地荒芜，房前屋后的庭院里，到处都长满了一人高的荒草，狐狸、野兔、老鼠到处乱窜；村庄房屋到处都是残窗破壁，炊无人烟，呈现了一种极其悲惨的景况。受灾的群众有的被逼得逃荒上河南、下关东，有的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很多户家破人亡。例如，冠北六区荆家楼村，除饿死和外逃的，剩下的只有两户，死绝的户竟不是个别的。还有冠北六区靠西边的一些村庄，如小焦庄、兰沃、柳邵、王羡，

韩路一带村庄，离敌人的据点较远一些，又靠近沙窝、丛林，受骚扰要比无人区的情况较好一点，但日子也是很难过。再加上旱灾也很严重，群众因无粮食吃，饿死的也不少。据当时调查，王羡村原有一千七百多人，除逃荒外出和饿死的，村中只剩下七百多人。当时有很多的群众为了糊口，为了活命，只好把自家仅有的土地忍痛贱价卖出，一亩好地只能换回一、二斗谷子。

各村的地主老财，在这种情况下趁机放高利贷，他们怀着乘人之危，不杀穷人不富，地里不长圈里长的生财之道大发灾难财，向借粮的农民群众提出极苛刻的条件，要有田产文书作抵压，要有富裕的亲友作保证，免得将来饿死了还不起粮债，言明，春天借一斗谷子，当年麦收后还三斗麦子。由于天旱，一九四二年秋，没有种上小麦，一九四三年春又大旱无雨，只到农历七月初才下透雨，农民没有牲畜，只得用铁铣刨，人力拉耧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抢种上绿豆。等秋天收下绿豆种小麦时，麦种又奇缺，价格昂贵，当时出三斗绿豆才能买到一斗小麦。这样，如果春天借一斗谷子。这时就要拿九斗绿豆换成三斗小麦，才能还上前一年借的一斗谷子的债。借债的广大群众唉声叹气，为还债而发愁。有的说："虽然春天没饿死，秋季好不容易收了点绿豆，指望它糊口，如还了债，大人、孩子还得饿死。"一些地主也火上加油，怕赖帐，加紧催要，不少人家又面临着家破人亡的惨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的冠堂边县委书记肖平同志，立即召开县委会研究，认为解决人民的疾苦就是我们的责任，当前，除了搞好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开荒种地搞好生产外，还要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并决

定：由县抗联领导，打好减息战役。参加这次减息斗争的领导同志有县抗联主任鲍廷干，县委组织部长念辛涛，六区抗联主任许世平同志。减息的重点是借贷粮食的高利贷，并把王羡村的债户赴邓官屯债主那里减息做为县里抓的典型。减息政策规定，每借贷一斗粮，年息三分，即借贷一斗粮，一年还本付息一斗三升。减息政策及方案确定之后，组织县区干部首先在王羡村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启发，动员群众，在提高群众觉悟情况下，依靠，发挥积极分子作用，串联群众，组织农会以及各群众团体，然后向地主进行当面交涉，按规定偿还借债。

在宣传发动群众减息斗争过程中，当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了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才逐渐提高觉悟，打消顾虑行动起来的，开始时，也碰到了种种思想顾虑和障碍。如有的人认为，借贷粮食时找关系、托人情，亲戚托朋友，是主动找人家门上，两厢情愿的，按照政府的政策还债，张不开口呀，打不破情面，怕伤了感情、怕得罪人，如果再有了困难就堵死了这条路。更主要的是还存在怕变天思想，担心共产党、人民政府是否能站稳脚跟，害怕敌人再打过来。针对群众这些思想顾虑，经研究，首先要加强党的宣传。深入到群众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打破思想顾虑，启发群众觉悟，说明大反攻已经开始了，苏联将要打败希特勒，日本鬼子灭亡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八路军、新四军不断打胜仗，全国敌占区都已开辟为抗日根据地。堂邑六区等一些村庄也都要开辟为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及其汉奸已被我军打得龟缩在县城及封锁线的几个孤立据点里，只要我抗日军民团结起来，坚决同敌斗争，我们一定要胜利，敌人一定要灭

亡。并进一步说明地主放高利贷者会使许多劳动人民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吃人肉，喝人血的高利贷历史上是罕见的，那里还有亲戚朋友的情义呢？减租减息是抗日人民政府的政策法规，每个人都要遵守执行，抗日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通过以上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教育，广大劳动人民提高了觉悟，解决了思想顾虑。这种宣传解释工作，开始是从个别人发动做起，一户一户说通以后，再用滚雪球的办法，通过积极分子串联，分片开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形成力量，从而，最后全村集中在一起成立农会，坚定了农民群众减息的信心和勇气。

王波村借贷粮食的农民群众在农会主任刘秉云、刘天月同志的带领下，经过充分酝酿和组织，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的一天下午，一百多名群众整队出发，肩挑与推着粮食奔赴邓官屯向地主进行减息还粮的说理斗争，为给群众撑腰，县抗联主任鲍廷干，组织部长念辛涛，六区抗联主任许世平及其县区干部等也陪同前往。到达邓官屯以后，首先把各个放债的地主集合在一起，由干部宣布了政府的减息规定，指出高利盘剥的危害，是不道德的非法行为，号召他们响应党和政府的法令，执行减息政策，然后由借粮农民分头去各户按三分利率偿还借粮本息，即算按规定（借一斗还一斗三升）清理了债务。也有的地主不甘心，假借仁慈，可缓至来年麦收再还，妄图变天后，照原数追交。当时，凡是不收还粮食的，重新立了字据，明年按政府的减息规定偿还。

在返回的道路上，群众兴高彩烈，有说有笑，露出了胜利的喜悦。

王羡村农民借粮减息斗争，这第一炮打响以后，胜利的消息不翼而飞，迅速传遍各个村庄，从而，各村的借粮减息斗争，即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忆我在堂邑县工作的经历

刘　剑

一九四〇年七月，地委把我从莘县动委会调到堂邑县任县动委会主任、县委民运部长。

堂邑县，当时是鲁西北斗争前哨，环境很艰苦。堂邑县城内为日、伪军占领。城东、城西、城南都有日伪军的据点，城北、城西北垢固、柳林、辛集一带为国民党匪军盘踞（约三千多人）只有堂邑西南部定远寨一带二、三十个村庄，我们可以公开活动。地委给堂邑县的任务是向鲁西北、东北部进攻，巩固冠、莘、朝根据地。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堂邑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在那里顽强斗争。县长梁向明带领县大队和政府人员昼夜奔忙，深入敌占区，进行多次大小战斗，做了大量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县委书记刘洪源同志，除掌握全盘工作外，还深入敌占区密秘进行党的活动。县委宣传部长乔光正坚持了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二区区长李善亭带领区小队，经常深入敌占区，坚持对敌斗争。县动委会，包括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共十多名干部。除配合政府进行抗日动员工作外，主要精力放在村里，深入细致的做农民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县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开辟小块根据地。我和宣传部长乔光正，县农会主任解平，妇救会主任王晓敬，按照县委指示在定远寨一带发动群众。我们和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谈心在一起，反扫荡在一起。群众和

我们熟了，说话就多了。在一个细小的生活习惯上也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和农民谈话，他先给你烟吸（烟斗里装烟），你不吸，他就觉着外气。于是，我们就学吸烟，弄一个烟斗，带一小布袋烟，和农民谈话先让他吸烟。这样，和农民关系就近了。我们发现，有的地主把持村政权大量贪污粮、款，也有的隐藏很多土地，有的坏人通敌等，我们就抓住反贪污、反黑地以及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农民很高兴，就组织了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并发展了党的组织。经过多次工作，终于把王海子、李海子、黑周家、白周家、高家、侯家等七个村的群众工作搞好了。成了小块根据地。至此，敌人奸细不敢轻易来这里，政权完全掌握在了我们手里，因而，我们的抗日军政人员也就完全可以住在这里了。

一九四一年冬，地委调我到冀鲁豫区党校学习两个月后，又分配我到鲁西北农会工作。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于河北承德市

武训县抗日根据地建立始末

许　世　平

武训县所辖范围，是冠县至堂邑的公路以北，原两县结合部的地区。

武训县正式成立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设立县以前，该地区曾是由地主封建势力长期统治的顽固堡垒林立的地区。后由国民党旧部齐子修投靠日寇，这里便是日伪残酷统治区了；加上严重干旱的自然灾害，形成了天灾人祸交加的"无人区"，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土地荒芜、杂草丛生，人烟稀少，大部灾民外逃黄河南讨饭为生，不少人饿死在村旁路边或屋内，真是死尸遍野，目不忍睹。当时这一地区的党政工作处于秘密游击活动，活动地区也限于边缘一带。

一九四三年五、六月份，由于日本鬼子和汉奸齐子修发生矛盾，自相火并，致使齐子修部从该地区败退。我地委领导为开辟这一地区，开始设立了冠堂边抗日政府，为充实这个地区的干部力量，从冠县，聊堂，莘朝等抗日根据地抽调了一批干部，跨越敌人的冠——堂公路封锁沟进入原冠县六、八区和堂邑县西北部二、四、五区开展工作。由于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灾荒，一方面进行对敌斗争，一方面进行生产救灾工作。当时旱灾持续到八月份，古历七月初七才下了透雨，群众没有牲畜，缺乏农具，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奋力开荒点种小绿豆等晚秋作物。后来又遇到蝗灾，一批飞蝗遮

天盖地而来，所到之处，大片的农作物顿遭吃光，当时为保住庄稼虎口夺粮，和飞蝗又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抗日政府以奖励粮食的办法大大地激发了群众灭蝗的积极性。秋收后，群众经过艰苦努力收获了一些粮食，可是有不少的群众，春天为保命借了地主的粮食，忍痛订立了“春天借一斗谷子，秋后偿还一斗小麦，麦种昂贵，卖三斗谷子或绿豆才能买一斗小麦，这样就等于春天借贷一斗谷子，秋后需要九斗谷子才能换三斗小麦，偿还债务。借债的农民愁容满面，悲痛地讲：”春天没有饿死，冬天还了高利贷仍然要饿死”。当时针对面临的现实情况，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必胜的信心，在群众中开始成立了农会和妇女、青年抗日救国会组织，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入党。由此，在广大农村群众中扎下了根，建立了一些关系较好，信得过，靠得住，工作积极，热心抗日的堡垒户和基点村。

是年秋，我军又先后攻克了原冠县八区一带如清水、栖屯等封建民团武装所长期统治的顽固堡垒。为进一步开辟该地区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开了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底，地委和专署对冠堂边地区进行了调整，把原冠县八区和临清，馆陶两县所属的卫河以东地区新建为永智县（为纪念抗日牺牲的军分区肖永智司令员而命名，大约是一九四五年永智县又改为卫东县）。把冠堂边改为武训县，下设七个区：原冠县六区（即辛村柳邵，张庄，柳八寨一带）为武训县一区，邓官屯，甘官屯一带为二区，辛集及其以东地区为三区，柳林、垢固一带为四区，袁虎寨、里庄一带为五区，原堂邑县以北梁浅、（梁水镇）凤凰集一带为

六、七区。六、七两区由于敌伪统治势力较强，碉堡林立，分割封锁，工作环境十分艰苦，不能公开活动，工作处于秘密游击状态。

一九四四年夏秋时，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下，日寇开始被迫从龟缩，贾镇、王庄等一些小的据点撤走，当时在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主要是借粮还粮反高利贷）和赎地斗争（指当地的地主、富农在一九四三年春天灾荒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乘人之危，以极其低微的粮款带掠夺性的购买了农民的土地，果树、林等）。以及生产自救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反奸反霸的斗争。秋收后，地委派出了冠北群众工作队，由地委副书记杨易辰同志亲自率领到武训县的二、四区和永智县（原冠县八区一带）发动群众，十月份左右，我军一举攻克了顽伪军据点——吴海子，广大农民群众拍手称快，兴高彩烈，根据地有了大面积的发展。

县委为了配合冠北工作队，使全县群众运动得到普遍发展，专门组织了县群运工作队，到一、三、五区（即张庄、柳八寨、辛集，袁虎寨一带）分别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从此全县抗日根据地的群众运动普遍的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一九四五年六月麦收季节，冠北工作队顺利结束，在斗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积站分子，经过斗争的锻练和组织的教育培养，被提拔到区、村党政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岗位，这对巩固和发展群众运动斗争的成果起了很大的作用。此时，武训县委亦曾在辛集镇召开了总结斗争经验，巩固成果的全县干部大会，会后，进而发动了参军运动，一批县、区干部（如宋合印、李士学等）在大会上踊跃报名参军，从此，全

县掀起了参军热潮。各区、村在干部、党员、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出现了很多母送子、妻送郎的先进模范。一批批新战士骑大马，戴红花，敲锣打鼓，群众列队欢送，场面十分热烈。

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前夕，正值县、区开会传达贯彻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之际，盘踞在武训县二区一带的日寇据点的日伪军，配合临清的敌人和当地的逃亡地主还乡团相勾结，对二、四区一带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袭击，遭受残重损害的有武训县二区的王二大寨村，农会挖的地道，由于地主的狗腿子伪装进步混进农会里当了内奸，经他告密被日本鬼子把地道彻底破坏，群众有的被敌枪杀，有的被烟熏死过去。四区张樊庄抗日村长王×臣同志，在敌人扫荡中，为掩护干部、群众撤退，和敌人交战中被敌人打伤后，遭到日寇的刺杀身亡。在敌人连续反复扫荡中，四区的民兵，为防止敌人个个击破，采取了全区集中游击活动，伪装大部队夜晚行军到日伪炮楼周围，故意迷惑敌人，避免了损失。

在对敌斗争中，县委还注意了开展敌伪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在伪军内开展内线工作，做到内外结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利用广播筒喊话，弓箭下书等方式对伪军进行攻心战，宣传战争形势，讲“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道理，用记“黑红点”、“生死簿”、“功过本”的办法警告伪军，不准糟害老百姓，要背敌向我做有益于抗日的事。贾镇敌据点的一名较坏的伪军方士礼（外号叫方大刀）就是经过我军指名点姓的警告者。他害怕受到我地下人员的惩治，就偷偷地逃跑到关外去了。敌伪内线工作的开展，也加强了

情报工作，能及时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一九四三年农历八月十五的夜晚，四路日伪军合击王羡村，就是得到贾镇敌据点我地下工作人员送出了情报后，我军分区，专署、县政府、县抗联等单位及时撤出该村，免遭损失，使敌人扑了个空。

一九四五年七月，堂邑县城解放，随后聊城守敌被我军包围。

一九八三年九月

对中共武训（堂邑）县委领导群众渡过四三年大灾荒的回忆

黄　国　栋

一九四三年，地处鲁西的武训县（堂邑），人祸加天旱，造成全县七百二十个大小村庄的灾荒年。并逐渐扩展到邻近县的一些村庄。受灾群众为了保命求生，纷纷外出逃荒要饭，绝大多数村庄外出乞讨的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不少的村野菜挖净，树叶吃光，连树皮都剥下充饥。据几个村的调查了解，饿死的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不少人为保命求生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村里饿死人无人埋，路上饿死的人无人管，很多村成了无人村。致使耕地荒芜，杂草丛生，村内和各户院中的杂草都长一人多高，惨状目不忍睹。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这么严重的灾害是怎样造成的呢？一般的说法是“天灾人祸”造成的，按照实际情况应该是人祸占八成，天灾只占二成。无数事实可以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从天灾情况看：一九四二年秋季只是天旱雨少歉收，由于旱情发展没种上小麦，但冬天下了大雪，一九四三年春天下了透雨。这就是当时的灾情。从人祸情况看：当时武训县全境有五种反动势力存在，即：日寇占领县城，在乡村有日伪据点，所谓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三十一旅吴连杰部的几千人占据着很大一部分村

庄，所谓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七旅齐子修部几千人除占据着堂邑县城东北梁水镇一带村庄外，一部份占据着堂邑县城的西南村庄和冠县桑阿镇一带，堂邑县城西部是土匪头子栾小秃的统治区，堂邑县城南是反动地主刘中浮的民团。有为以上服务的伪区、乡长和伪村保长。这些反动势力都同日寇是一丘之貉，他们重复的向老百姓征粮征款，而且，伪乡、保长也横征暴敛从中敲诈勒索，对交不上粮款的就拆房顶粮款。这些反动人物仗势发了灾荒财，廉价收买受灾群众的土地和财产，拿出几十斤或少量粮可以买一块地一座房，有时群众卖土地和房屋的粮食刚拿到手，就被伪保长以欠粮欠款为理由强行要去。这就是造成灾荒“无人区”的人祸。

日伪杂军和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把劳动人民推向万丈深渊的地狱。

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抗日政府，把在天灾人祸的地狱中挣扎的劳动人民拯救出来。一九四三年，我八路军把活动在冠县六、八区的伪杂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一扫而光，所剩驻防在堂邑县境内的日伪杂军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我武训县（堂邑）抗日县、区政府及其游击队于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进入所属村庄，捎信传信叫外出逃荒要饭的群众回乡，贷粮贷款并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到一九四三年秋季，堂邑西部绝大部分村庄外出逃荒要饭的群众回了家，政府随之组织建立和改造村政权，并发放麦种支援群众生产自救。绝大多数群众在个人的几亩地上种上了冬小麦。一九四四年小麦丰收，我政府在征收公粮上实行了合理负担，与此同时开展了赎地运动，无力赎地的农民由政府贷款赎地。乡村中党组织和各种组织随之逐渐建立和健全，给反动势力

以很大的打击，日伪军缩进了县城不敢出来。各村的民兵组织配合我八路军主力部队打炮楼拔据点，送军粮，出担架，站岗放哨严防坏人破坏，保卫人民利益。我县区干部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中，吃住在农村，将个人的每天二斤小米的供给（包括油盐柴）全部交给农户。和农户同吃糠菜各半的窝窝头，种地时帮助群众拉犁拉耙，收割庄稼时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干部访贫问苦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因而广大群众对待干部亲如一家，到处传颂着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

武训县（堂邑）四三年的“无人区”，在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把“无人区”变成了人畜兴旺，生产蒸蒸日上，生活步步提高的地区。并组织起有觉悟的农民武装——民兵队，模范班配合我八路军主力部队攻据点破碉堡，运军粮出担架支援前线，使日寇和伪杂军陷入了人民战争中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九八八年四月

于北京

回忆堂邑"无人区"

杨香圃　　魏长捷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四年初，在地处鲁西北的堂邑县境内，由于人祸天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悲惨荒凉的"无人区"。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因天旱不下雨造成严重干旱。干旱面涉及到附近几个县，致使农业普遍欠收。而且，这一年一般没有把小麦种上，特别堂邑县境内沿马颊河两岸，不光干旱较重，而又地多盐碱，秋收甚微，群众生活困难，加之日伪顽杂的横征暴敛，而更加快加深加重了灾情的发展。当年日伪顽杂的盘踞情况是：在堂邑城内及城周围大约在十五至二十华里以内，由日本鬼子及伪乡政权、伪警察所、伪皇协军控制着；堂邑县城北部的斗虎屯、垢固、柳林一带，由伪杂吴连杰部控制着；马颊河乔集、梁水镇一带，由伪齐子修部控制着。（伪齐部在运河以东博平境内和聊城北部村庄还占据很多村庄）一九四二年春季，伪齐子修部薄光三旅在冠县烟桑阿镇安设据点以后，对堂邑抗日县政府及县区武装进攻的频繁，斗争激烈。此时，堂邑抗日政府的活动范围逐步后撤到冠县境内活动，只有县、区武装人员在夜间才能进入堂邑边境以内活动。

由于天灾人祸，到一九四三年春天，在这里就人烟很少了。日伪顽杂就小股分散，四出抢粮，见到能吃的东西就

拿，闻到老百姓锅里有一点吃粮食的气味就翻箱倒柜，强逼少数留家的老年人交粮食。群众为争取活命，从一九四二年底起，就开始外出逃荒谋生。一九四三年的春、夏季，“无人区”内就有“十屋九空”，几乎没有人了。当时，凡属能吃的树叶、野菜、野果，都已采摘吃光，甚至连树皮也都剥下来充饥。那时灾民逃荒逃难的去向是：少数人低价变卖家产房屋和土地后，携儿带女逃向东北辽宁、吉林一带农村种地谋生，一部分人带领一家大小逃到山西省较为丰收地方靠乞讨或找临时短工下苦力谋生；多数人扶老携幼带着家中仅有的一点衣物、家俱等逃荒到黄河南的东平、汶上、梁山一带较为丰收地区兑换一点粮食吃，有劳力的尽力找点“短工”做零活，老弱妇孺多数靠乞讨渡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家把未成年女孩子嫁给当地农民作，“童养媳”，以安身求生。

一九四三年春、夏季的雨情和气候条件，是可以耕种庄稼的，逃荒到黄河南的青壮年劳力也常偷偷回家，简单撒上种子，以期秋后广种薄收，有一点收获以渡灾荒。

受灾严重的堂邑县（包括原武训县、聊堂边办事处两部分），均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第二次重新开辟，建立抗日县区政权。即：

（一），武训县抗日县政府第二次重建始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份，首建冠堂边抗日办事处，主任梁向明。下辖原冠县八区（即清水、兰沃一带），十一区（即李辛村、大小张庄、韩路一带）。划归办事处领导以后，十一区改名为一区。堂邑原六区（即赵里庄、沙王庄、刘八寨一带，后来改名为五区。一九四三年八、九月份建立四区（即柳林、杨林一

带）。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四年初建立六区（即斗虎屯以南王家庙、龙王庙一带），与伪杂吴连杰部驻地犬牙交错。一九四四年四、五月间建立三区（即辛集、鲍庄、石槽一带）；这时三区逃荒群众已有少数归来，属于半"无人区"状态。一九四四年四、五月份建立七区（即梁水镇以西和西南，凤凰集以北，乔集、芦庄一带），马颊河南岸芦庄、乔集一带当时亦属"半无人区"状态。伪齐子修部这时主力部分已垮台，但残余势力仍在原敌伪区，乡政权仍然存在。

（二），聊堂县抗日县政府亦系二次重建（指堂邑县境内部分而言），时间也起于一九四三年秋季，开始名为聊堂边区抗日办事处，以后改为聊堂县。首建一区（即定远寨、温集、毛二庄、杏园一带），二区（林里、谢家、郑家一带），三区（沙镇一带），四区（堂邑城东南一带和聊城西部地区）。

一九四三年秋重建县区抗日政权后，对于"无人区"和"半无区"的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

一九四三年秋至一九四五年。日伪顽杂对我抗日根据地扫荡、破坏得很厉害，我们针锋相对，坚持了反扫荡、反蚕食的武装斗争，并大力开展救灾渡荒工作。

（一），一九四四年春，部分外逃群众返回家乡种地，对缺少种子的，我县区抗日政权给予了种子扶持。

（二），一九四四年春耕开始，我们号召成立互助组，提倡互助换工。入夏后，群众农具缺乏，县区便及时发放农具贷款（当时县无银行，通过工商局办贷款）。

（三），一九四四年春季起，对于群众迫于四散逃荒之际低价出卖土地的，根据党的赎地政策开展了赎地工作，有力的解决了无地和少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四），对于一九四三年秋季公粮问题，凡属“无人区”村庄，一律不征公粮。对于秋收后仍是“半无人区”地方，亦不征公粮。对于堂邑境内“无人区”范围就当年比较严重地区村庄而言，大概划分如下。

（一），当年实际情况是：凡抗日游击区（敌我拉锯地区）以及敌我接合部或伪杂盘踞接合部地方，灾情都比较重。因为不光多方负担，而且敌伪横征暴敛、勒索抢掠厉害。凡处于根据地以内或深陷敌占区受敌干扰破坏少些的地方，其灾情也相应轻些。所以，造成“无人区”应是人祸天灾两个因素。而历属地瘠民贫村庄灾情更为严重。堂邑县境内“无人区”的严重村庄按片说，三区：辛集以南以东鲍庄、石庄、五岔路一带，一九四四年春季建立区政权时，多数是“无人区”（极言人少，并非一个人没有），少数是“半无人区”。六区南部：如龙王庙、阎围子以及马颊河北岸一带，当年属于“无人区”。五区东部：如陈家坊、宗家堂一带，当年属于“无人区”。七区北部靠马颊河南岸，如乔集、芦庄一带，属于“半无人区”。聊堂一区：如定远寨、黄寨子、王朝营、栾付桂村、魏庄一带靠近冠堂路两侧，属于“无人区”。

为减轻群众负担，度过灾荒，上级党和政府号召党政军等国家人员、部队，除执行抗战任务外，从一九四四年春至一九四五年夏，进行了开荒种地，争取一小部分粮食自给活动。（普遍叫搞“机关生产”）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无人区”和“半无人区”的村庄灾民，因缺吃，不少人活活饿死在屋里、路旁、地头……。有的村庄死人无人埋，任其腐臭，其惨景目不忍睹。造成田地荒芜，野草丛生，长草半人高，灾民没粮吃，只好打草籽，挖野菜，捉野兔充饥。现在回想起那时的凄惨情景仍难以忘怀。

目不忍睹的灾荒年“无人区”

沈　廷　梅

一九四三年鲁西北地委领导下的武训（堂邑）县，由于天旱不雨加人祸，造成了前所未有闻名全国的、目不忍睹的“无人区”。当时这个县东北以斗虎屯为中心的周围二十多个村庄尤为严重。这个地区北靠临清、清平两县，东靠博平，东南靠聊城。这片土地肥沃，广大农民在正常年景是能过上富裕生活的，但是祸国秧民的土匪汉奸吴连杰，以抗日为名把这一带的枪支都收集在他的手中却专门以反共反人民为能事。因而鬼子也不打他，致使他独霸一方残害百姓，经常横征暴敛，抢掠人民。在向农民敛东西时，这些土匪汉奸在村里又吃又喝，如稍有怠慢交纳东西就会遭受皮鞭的毒打。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在天灾面前，这些土匪更加穷凶极恶的对农民群众进行敲榨勒索，只要交不上粮款，就遭到皮鞭劈头盖脸的抽打，逼得无法生活，因而，有的投亲靠友，有的逃荒外流，出走者的房屋就全被土匪汉奸给拆烧掉。当时这一带村庄的民房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没了门窗，只剩下个房叉子。灾民们为了充饥，除去野菜、树叶吃光，连树皮也都剥光吃净了。后来下了透雨。群众千法百计开展生产自救，可是祸国秧民的吴连杰匪部却见耕牛给牵走，种子抢去，有的群众无奈只得晚上偷着种地，那也难免遭匪兵们的抢劫，一旦被听到动静，先打骂，然后把牲口、

种子给抢走。由于这些匪徒们如此作孽，终于形成了土地荒芜，加剧了灾情。没有逃出去的群众，白天不敢做饭，只要被土匪汉奸发现哪家一冒烟，就去把那家的食物抢走，真是逼得群众走投无路，难以生存，早走的走了，晚逃的再也走不动了，饥寒交迫无力抵御，有些人饿死在家里，有些人托儿带女饿得走不动，只好忍痛丢弃，甚至趁孩子睡觉未醒时偷偷走出，更有的虽已外出，但因为求生而卖儿卖女，卖老婆。我曾亲眼看到有个十来岁的男孩在赶集讨饭的路上，走着走着摔倒在地上，一会功夫就断气了。一路上饿死的有三、四个人，肉皮已变成了黑色，真是惨不忍睹。在位家湾集上，逃荒的见人家吃花生，立即伸出两手去接花生皮来充饥。

“无人区”形成的开初，饿死的人还有人埋，以后饿死的就无人埋了。任其尸体烂在那里臭得人喘不过气来，长尾巴蛆有一寸多长，爬的院中和街上到处是。荒草长的一人多高，野兔就在屋里生小兔。有的百十户人家的村只剩下十来个人，甚至有的村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在反扫荡时期，只要我们往扎在这样的“无人区”，日本鬼子就不到那里去。“无人区”仅剩下的少数人为活命只得靠吃草种子度日，我们在这样的“无人区”往往连一口锅也找不到。老百姓贫穷到这种地步，可是那些汉奸土匪竟把群众搞到的一点草种子也常给抢走。真可谓“雁过拔翎”地方了。因此，临清一带向黄河南逃荒的灾民，为免遭抢劫，只得绕道位家湾以东再转向南走。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八路军消灭了吴连杰匪部，那一带的老百姓才得到解放。但是只到这年底，逃荒回归的灾民还不到三分之一。于是那个区的区长要求博平六区的群众

前去种地，谁种归谁。八路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为扶持农民生产自救，不光帮助群众从外地运进一部份粮食和种子，还帮助灾民拉犁拉耙搞耕种。

记得那里刚解放时，一天有个六、七十岁骨瘦如柴的老大爷牵着一头山羊到位湾集去卖。正在成交付钱时，老大爷突然悲切地哭了起来，买羊的人不明原因，便说："你不愿卖不要紧，为什么要哭呢"？老大爷悲伤的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终于哽咽着对买羊人说："我是念这只山羊救了我的命啊！它曾生下两支小羊都让我给吃了，白天我和它藏在屋子里，不敢出门，怕被土匪抢去断了我的生路，晚上才牵它出来偷偷放牧，我每天挤点它的奶吃，这才过了生死关，要不是它我早就饿死了，今天它要离开我，我怎么不心疼呢？"老大爷的话悲切动人，催人泪下，谁人不同情灾民的苦难，谁人不恨奸匪的残忍。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于昆明

在武训县工作时况的回忆

曾　广　成

一九四四年春，我从冠县八区调老六区（武训县一区）任区委书记。有一天在张留邵天刚亮，群众说敌人来扫荡哩，于是群众拉着牛，托着东西向外跑。我同群众一起从村西北角墙豁子出去了，冲着西北跑了一段。四周看不见敌人。停下来细心一看，从西南路沟里有敌十几人骑马冲我来了。我身带文件包，还有一支二八匣枪，心想抓住也是死，突出去是胜利，于是我从路沟北边爬到路沟南边，冲着村庄飞跑，骑马的一面向我喊不要跑，一面开枪，中间有个白胡子老头在后边喊了几声不要打死，抓活的，不要打死……。敌人只冲我两腿下打，拍、拍、拍……，子弹从我脚下飞过。跑着跑着腰带开了，小文件包掉了，匣枪拿在手中，敌人看我是土八路，连喊×××，敌人为了抓活的，从后边跑过来一匹铁青马，迎头拦住我的去路，我枪一举把敌人从马上打下来，躺在麦地里乱叫，马却朝东南庄方向飞跑，我继续跑，从右边又过来一匹红马，也是从前边挡住我跑，企图抓活的，我用枪冲敌人一举，敌人一闭眼闪开了，这时，已快到围墙沟边，追我的马群停止了。然后冲着那受伤的敌人去了。回想当时的突围情景，真是好险噢。我出张留邵南门，到葛辛村葛金龙同志家擦枪时，因土塞满了枪膛，拉不开枪栓了。当我把枪擦好后，便越过封锁沟到了张货营岳母

家喝了点水然后回到了程村家里。母亲见我哭着说："都说你和王希元被打死了"。我说："这不是回来了吗"。

一九四五年春，我又从一区调到武训县三区（辛集区）任区委书记。区长王子昌，副区长郭文江。堂邑县城解放后，我被调任武训县武委会主任。

一九四五年春我是县委委员兼三区区委书记。是年秋后调任县武委会主任。县委书记是肖平，县长梁向明，抗联主任张绍狄。一九四七年调我到冀南党校学习，还有张鹤亭，王天虹、王金夫，以及各县带队的县委负责人，我任支部书记。校长是王从吾、马国瑞，教导主任王东宁、许世平等。在学习中支援刘邓大军打邯郸，全校师生到张德新区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还正在打着时，接中央指示进入大别山区。学习一年回来后，参加了柳林整党。整党结束后，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任堂邑县长，于是年秋，为开辟新区，我便报名带干南下了。南下时，我仍任县长，县委书记王俊臣、组织部长谭绍山（已故），宣传部长宋兰臣，民运部长苏毅，公安局长刘云桥。共设十个区，我带五个区，王俊臣同志带五个区（其中清平合来两个区）。三个县合并组成的冀南一大队二中队，共有南下干部一百四十八人，在魏县集中学习后便开始了南下。

一九八八年六月

于长沙

解放前后的垢固镇自卫队

张　云　亭

在对敌斗争中，县委曾决定组建了一支脱产的专业武装地方组织——垢固镇自卫队。现将该自卫队的有关情况回顾于后，作为《垢固一带解放前后敌我斗争情况》的补充。

组建垢固镇自卫队的背景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原堂邑县最北面的最后一个日伪据点——吴家海子（在垢固西南面，离垢固约三公里）被我军攻克之后，垢固一带虽然得到解放，但垢固北面十华里之外仍为碉堡林立的敌占区。垢固一带处于新解放地区的前沿，属于接敌区，日伪军曾多次窜到这一带进行扫荡，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汉奸也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活动，他们秘密串联，同盘踞在临清的日伪军相勾结，妄图把日伪军请来垢固一带重新修筑据点（当时曾查获他们联名邀请日伪军回来的书面材料）。逃至临清的吴连杰残部，也扬言要卷土重来。由于地主劣绅同日伪军的勾结和告密，临清的日伪军在一天夜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窜到林庄，将我队包围，区队突围未成，区队长韩××及队员大部牺牲或被俘，致使区队解体。后来又在夜间窜到邓庄，枪杀并抓走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敌人还扬言要到垢固来抢集等。敌情严重，斗争复杂，敌人时有窜扰破坏的可能。群众缺乏安全感，人心惶惶，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垢固的集市贸易也难以进行，严重的影响着我党在这一地区组织与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及村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而

本区的区队已不存在。为确保垢固一带的安全，保卫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监视和防止敌人的窜扰破坏活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四四年底，决定组建一支脱产的专业地方武装组织——垢固镇自卫队。并派县府工作人员刘义（曾任县长梁项明同志的警卫员）负责该队的组建工作。陆续在各村动员了约二十名左右有一定觉悟的骨干分子参加，从而，垢固镇自卫队正式成立。

垢固镇自卫队是县委武装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是脱产的专业地方武装组织，除配备有步枪武器外，还配有轻机枪一挺。供给由地方财政开支。县长梁项明同志很关心自卫队的建设，曾来垢固镇（梁是垢固人）看望自卫队，县委武装委员会负责人孙涛同志，曾多次来给大家做思想工作。

自卫队队长刘义（冠县人），班长陈炳云，司务长杨敬斋，炊事员小名叫夏六，机枪手王化宽，还有队员梁继任、梁金德、张汝琛、史公臣、王庆华等。

自卫队成立后，即担负起了保卫垢固一带安全的任务。昼夜在垢固北面巡逻、监视敌人的动向，严防敌人的窜扰破坏活动。那时垢固五天逢两个集，在逢集那天，加强北面的流动哨，盘查可疑的行人，防止敌人来抢集，保障集市贸易正常进行。同时，随时注意当地地主、汉奸的动向，监视他们的活动。由于自卫队的存在，使小股敌人不敢轻易前来窜扰，当地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敢轻举妄动。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天上午十时许，临清的日伪军约三百人左右突然窜来，从垢固北赵庄向垢固行进，被正在垢固西面放哨的自卫队员梁继任同志发

现，梁当即鸣枪报告，全体队员闻声立即进入垢固西面的工事，进行了猛烈的阻击，迫使敌人停止了前进，在垢固岗子下面踌躇约半小时之后，因摸不清我们的力量，怕中埋伏，未敢冒然前进，而折回临清。事后，据曾经参加了这次行动、临清解放后逃跑回来的伪军分队长陈茂林供称：敌人那次行动的计划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入垢固，进行一次报复性的大破坏，由于遭到顽强的阻击，误认为有大部队在此，在诱敌深入，怕上了当，未敢冒然进犯而折回，使垢固镇避免了一场浩劫。

自卫队还经常保卫并协同区政府干部到接敌区各村开展宣传工作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区干部进村工作，自卫队员在村外放哨，防止敌人突袭。

自卫队还负责对破坏活动的土豪劣绅的看管、关押及向上级机关押解的工作。如山东六区专员张树梅（垢固人）的哥哥张树森（地主、劣绅）因有破坏活动，区干部派自卫队将其抓获，在自卫队关押数日后，送往上级有关方面处理。

一九四五年七月，军区决定调部队解放垢固以北地区。县委武装委员会决定调垢固镇自卫队随军分区部队到上述地区作战，被暂时编入二十四团三营。首先赴清平参加了消灭郑延绍（当地小军阀）伪军及解放清平新县城康庄及其以北地区的战斗。战斗结束后，上级曾派自卫队员将大批的战利品负责运送到斗虎屯兵站。

在穿插作战中，自卫队还参加了攻克白渡口伪军据点的战斗。在追击敌人时，队员梁金德同志曾缴获步枪一支，子弹数十发，受到上级的表扬。

经稍加休正，又随二十四团参加了解放临清的战斗。攻克临派县城之后，曾负责押送过堂邑逃到临清而后被捉获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并根据俘虏的口供，负责到临清城东油坊等村收缴了一批武器、弹药。

紧接着又随二十四团参加了解放高唐的战斗。解放高唐县城后，即开始围攻郭庄伪军据点。该据点内有伪军两个团，总指挥叫郭金城。郭庄围墙较高，安有电网，墙外壕宽水深，又正值雨季，强攻十分困难。二十四团团长屈乾坤同志，在察看地形时，因遭到敌人的冷枪射击而牺牲。后来采取了围困战术。在郭庄四门之外强修工事、挖掘战壕、把敌人紧紧围住，防止其逃跑或窜出来破坏。在近两个月的郭庄战斗中，自卫队一直同三营并肩作战，负责强修东门外的工事，围堵东门。每天夜里都有小的战斗，后来敌人以假装投降麻痹我军，夜间逃跑至博平。自卫队奉命回到垣固镇。

是年十月，县武委会决定撤销垣固自卫队。县武委会负责同志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指出：日本已投降，垣固以北地区已解放，自卫队已完成了保卫垣固一带安全的任务。现在要精兵简政，同时要加紧村政权建设，而各村均缺少骨干力量，为此，动员队员回到各村充当村政权建设的骨干。队员们依据上述决定回到各村，自卫队宣告结束。

垣固镇自卫队虽然只存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时光的推移，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作为曾在自卫队工作过的成员，回

顾一下这段短暂的历史，还是颇有意义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

于重庆

罗登殿反正起义情况的回忆

郎 树 林

我是聊城市阁寺镇凤凰集村人。一九四三年二月，在赵子营村刘庆余家经聊堂县委书记刘洪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我正在堂邑一区人民自卫团（该团于一九四一年春成立我即在该团任小队长），团长是汉奸区长、肖大麻子兼，副团长是罗登殿。

当时，我们党既同堂邑县城内上层敌伪人员进行周旋，又和汉奸区长肖大麻子争夺人民自卫团领导权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春，堂邑一区人民自卫团改编成堂邑第七中队（当时堂邑所属共十七个中队），解除了肖大麻子团长职务，由副团长罗登殿任中队长（是年我党在该中队建立了地下党的小组，冯春来任党小组长，党小组直接受谢九岭掌握。）我的公开身份仍是小队长，张振山是班长。

罗登殿这个人，因我和他共事多年，对他的一切比较了解。这个人为人豪爽，作风正派，大不同于其他敌伪人员，因而，经党组织分析研究定为争取反正起义对象。当时上级领导解长林和刘洪源同志很重视对罗的争取工作，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一九四一年春，堂邑一区人民自卫团一成立，我聊堂县

敌工科干事谢九岑受七区和聊堂县委刘洪源的委派就到罗的自卫团做地下工作，谢经我介绍认识了罗登殿，而后，谢向罗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罗接受了我党的领导，从此，谢在自卫团便开始了党的敌伪工作。

一九四二年间，我曾陪罗登殿到堂邑西抗日游击区与县委书记刘洪源同志联系过一次。同年，在向县委回报工作时，在赵子营村见到了刘洪源同志后，叫我返回堂邑通知张振山陪罗登殿和他见面。记得那天夜间我和洪源同志在罗的家里等着，由罗的弟弟罗登华给我们看门。当张振山陪罗回到罗屯已是夜间。洪源同志主要向罗登殿了解了堂邑日伪情况，并讲了抗日形势，作了对罗的进一步鼓舞工作。当晚，我和罗登殿便到了堂邑七中队部，洪源和振山同志便住在了罗的家中。

根据形势，一九四三年间，由张振山陪罗曾去冠县游击区和党联系，由分区政治部主任解长林和敌工科郭科长等领导同志听取了张、罗有关堂邑日伪军情况的回报，并指示罗回去后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向分区回报日伪情况，掩护好地下工作人员，帮助我党除奸等。与此同时，经分区研究决定：委任罗登殿为我马颊河支队第三中队队长（支队长是李善亭同志）。张、罗从分区接受任务回来不久，分区对罗的委任状由谢九岑同志亲手转交给了罗本人。至此，罗所属的堂邑第七中队名为堂邑伪大队部所属，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地下军。

堂邑第七中队在道口铺、蒋庄、梁水镇驻防时（此时张振山已离开七中队到七区任队副了），谢九岑、张振山、刘金河、经常向罗了解日伪情况，有时秘密住罗的炮楼，有时

住在罗的家中。在堂邑东关驻防时，分区参谋张文会同志曾几次去了解堂邑日伪情况。我和罗都作了回报，所以，日伪的行动部署及时准确的被我军所掌握。一九四三年我军第二十四团为军事行动必须在道口铺通过，而当时的日伪警察所也驻该地，恐对我军行动不利，于是，我和罗登殿商量后，由张振山引路在我七中队驻防的炮楼东通过。同一年，张振山、谢九岑陪同分区二十四团参谋程安然（还有程的警卫员四人各带一支匣枪，住在罗所属的侯庄炮楼。因擦枪时被地主侯昌泽发现，侯回报了李四元（李是七中队司务长、忠实日伪，汉奸范大队副叫李秘密掌握罗的七中队情况），李四元又回报了堂邑汉奸大队部，当时，堂邑汉奸大队部立即派下人来，并通知罗带人同去侯庄炮楼搜捕。情况十分紧急，罗急忙派罗清甫、张广德二人跑步到侯庄炮楼叫谢九岑、张振山和程安然等急速转移。于是他们三人当即离开，使日伪军捕了个空。事后，我们商量以李四元假报情况的罪名，将其开除回家（李是堂邑人）。此后，我们就派冯春来（共产党员）任七中队事务长。

一九四三年间，七中队在道口铺驻防时，国民党派下来的联络员（据说与国民党姚树梅有联系）以此地无汉奸的口号在道口铺附近活动，积极为国民党网罗势力。对此，谢九岑曾几次与武工队联系，因没得手，后叫罗派人将该人打死在道口铺附近。

第七中队在堂邑城北五里墩驻防时，分区敌工科长荣连超同志，曾不断往返中队，连超同志进城了解日伪情况，我和罗给他办好进城的证件，或派人护送。记得有一次，荣连超同志去冠县游击区寻找我分区司令部，当时日伪疯狂、哨

卡甚多，行动不便，我和罗商量后，决定由我和一小队长田丙申护送荣连超同志去分区。我与田陪同荣连超同志半夜从五里墩动身，走小道秘密绕过石卫城的大炮楼，后穿过高粱地、越水沟，天明时到了一个村子，一打听，聊堂边抗日县政府正驻该村，我们见到了县长梁向明同志，在该村休息了一晌，下午两点来到了七分区临时驻地华村。分区政治部主任解长林和其他领导和我们见了面，当晚观看了分区演出的文明戏。第二天我与田回到了七中队的驻地五里墩（后来荣连超同志被汉奸吴连杰杀害）。

关于梁水镇起义

梁水镇在当时地处堂邑、聊城、茌平三县之界，日伪力量比较弱，是我军活动较好的游击地带。当时有堂邑伪一中队（队长李起贵）来梁驻防，没住几天便被我七区区队（区队副张振山）配合其他部队将其打回堂邑。谢九岑、张振山和我秘约罗登殿来梁驻防，罗向堂邑大队部提出要求批准后，于一九四四年秋，罗带中队由蒋庄调防梁水镇。在梁水镇驻防期间，谢九岑、张振山和我曾多次与罗登殿商量该中队反正起义一事，因该中队中有不少人员的家处堂邑城内和城关附近，因此，日伪威胁甚大，又因梁水镇驻有伪警察所和江克敏的一个小队，周围又接近伪杂罗兆荣的防地，东北有王兴邦部，所以形势复杂，人员思想混乱。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的夜间，我军对堂邑和堂邑所属的据点，都进行了军事行动或政治攻势，当时因有其他任务，谢九岑、张振山和我都未在中队，分区和县委又未派人通知。因来，十月十

一日夜间，当听到围子外面唱起军歌，并叫罗登殿队长出来答话时，全中队立即上围墙守卫。误认是王兴邦部和罗兆荣部有诈收枪，于是罗登殿便叫冯春来、田丙申、马春林布置火力，整个中队处于戒备状态。后来通过叫话，方知是我独立团时（该中队与马河支队有联系，独立团是刚起义的部队，所以一向没有联系），罗登殿才一人立即出了围子到梁水镇街里一个店里同团政委李振北、团长程子芳，副团长邢×等人见了面。李政委讲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罗向李回报了七中队的情况（张子恒小队仍驻道口铺）经研究由罗派张德泽去道口铺令张子恒带小队速去斗虎屯改编。十月十一日夜，我在家中，当我得知当晚有军事行动后，便急忙赶回到梁水镇，罗带李振北和警卫员王皋堂去围子里集合队伍，李和罗都讲了话。此时，除张子恒小队外，全部人员起了义。随之我们又收缴了伪警察所的枪支。当夜弄了几辆大车拉着弹药和一些军用物资便开赴斗虎屯。当我从梁水镇赶到道口铺时，张子恒小队已被二区张双岑收去了。第二天我回到斗虎屯向李政委回报了张子恒小队的情况。然后将七中队改编成我军独立团三连，罗登殿任连长，我任指导员，王国栋任通讯员。

堂邑第七中队在梁水镇起义，是聊堂地区时间较早的一次革命行动。这对该地区的日伪势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冀南日报立即登载了罗登殿带队起义的消息。同时，堂邑日伪司令部下达了对罗登殿和郎树林的通缉令，并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出动了大批队伍，由汉奸大队副王永安带领到罗屯和凤凰集逮捕罗和我的家属，这天的临明天日伪军便包围了罗屯村，捕去了罗的父亲和三弟关押在许家大楼进行

审讯，其他人逃亡在外，家中被日伪军清扫一空。当日伪来到凤凰集时，我的家属已经转移，日伪捕了个空。

县委和分区领导对罗之父亲和弟弟被捕家庭受害十分重视，决定采取各种方式和关系进行营救，分区领导还委托谢九岑带去分区给罗登殿的慰问信和一笔冀南票作为家庭受害弥补费，分区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使罗深受感动。由于当时我军处于困难时期，结果罗将这笔款全用在了战士们的生活补贴上。

我独立团在斗虎屯整训，接到分区指示，要李振北、罗登殿、郎树林去分区参加会议，于是我们便骑马赶到了分区驻地——安头村。分区参谋长刘思明，副政委张希才亲切接见了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座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庆贺在党的政策感照下起义有功人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阶层士绅名流，有起义的张百成，杨保祥等。会上分区首长讲："堂邑县第七中队长罗登殿同志在梁水镇带队起义，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还讲："郎树林在白色恐怖下，不怕艰苦，为党作了一些工作……"

关于配合弟兄部队作战

一九四五年初，遵照县委指示，拔除聊古庙据点。由程团长、李政委带领我们一、二连负责将据点围住，三连去聊古庙东埋伏，阻击聊城增援敌人。我们将聊城通往聊古庙的电话线割断，保证了顺利拔除聊古庙伪据点。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打堂邑，独立团三连罗登殿连长带领全连负责将十八里铺到母祥庄一段公路全部破坏，聊城通堂

邑的电话线全部割断。然后埋伏在冷庄和候付庄一带。待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内，我军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人几次冲锋突围都无法通过，只好夹着尾巴逃回聊城，我军则猛追狠打，活捉了两个鬼子，缴获了一挺轻机枪。此次阻击战将日伪打回聊城，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堂邑、道口铺战斗的顺利进行。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独立团三连和兄弟部队参加了围困聊城的战斗。此后，还随兄弟部队参加了高唐战斗，双井战斗、康庄战斗和郭庄战斗。

高唐郭庄战斗后，独立团进行了整编，三、四连进行了合并，罗登殿任连长，阎学旺任副连长、李少卿任指导员。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意在说明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和正确，同时缅怀在战争年代为党和人民事业而牺牲的革命同志。

一九八五年五月

小王二大寨遇险记

马　淑　卿

抗日战争时期，武训县（原堂邑县）二区小王二大寨，是一个有四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除有一户地主外，其它都是贫下中农，群众基础很好。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减租减息、除奸反霸的斗争，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建立了农救会（主任是张万和同志）、妇救会、儿童团（包括姐妹团）和民兵联防队（队长张书栋同志是一位打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组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个村党组织和村干部力量强，群众觉悟高，是附近有名的模范村。在支援前线（包括做军鞋、抬担架）、缴纳公粮、扩军优属、反奸除霸、减租减息等项工作中都能走在前面，起模带头作用，曾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区委书记（兼抗联主任）陈书谏同志，区长郑海鹏同志和我（区妇联主任）都常来村里工作。小王二大寨距离敌伪据点影庄只有八九里路，敌人早把该村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寻找机会消灭村里的民兵和群众组织。为了防御敌人的突然袭击，坚持“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的对敌斗争方针，全村群众动员起来，昼夜奋战，挖了一条能攻善守，四通八达的秘密地道（室内室外有口，能进能出，道内弯弯曲曲，便于防守和隐蔽）。遇有紧急情况，可把村干部和群众迅速转移到地道里隐蔽起村，邻近卫东县的干部有时也来地道里隐蔽。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麦收季节),有一天,我按照区委指示去小王二大寨布置麦收和缴纳公粮工作,晚上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讲了征收公粮任务和合理负担政策。并要群众警惕敌伪军和还乡团出来抢公粮,破坏麦收。这个晚上,我住在农会主任张万和同志家里。半夜,民兵联防队员来报告,说影庄据点的敌伪军和还乡团一百多人,带着数十辆大车,用麻袋装着锯末和辣椒,急速向我方向来了。村干部和民兵迅速挨家挨户通知群众进入地道隐蔽起来,只有那户地主没有进地道。不多时,敌伪和还乡团包围了村庄。在地道里,我和村干部、民兵凑在一起,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多我少和没有外援的情况,提出坚持地道战,不出去同敌人硬拼的斗争策略。如敌人从洞口先把头伸进来,一定要进来一个消灭一个;如敌人的两只脚先伸下来,就把他拉下来再消灭,总之,要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坚持同敌人拚到底,誓死不投降。天亮了,敌伪军、还乡团与地主六猪头勾结起来用铁锹,洋稿挖起洞来。有的地段被挖开了缺口,敌人就点燃锯末和辣椒扔进洞口,再用风车向地道内吹烟,企图把全村群众熏死在地道里。地道里的烟雾越来越浓,呛得人难受。有的儿童忍耐不住发出哭声,农会主任张万和同志有个六、七个月的独生女儿,被烟熏得哭出声来,他严厉命令妻子用双手卡住女儿的脖子不让出声,以免暴露目标。这时地道里的民兵同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阻击敌人挖洞和施放烟雾,迫使敌人始终不能进入地道。气急败坏的敌人破坏地道不得逞,就在村里放火,烧了民兵队长、农会主任、妇救会主任和一些群众的房子,直到下午三时左右,县大队迅速赶来才把敌人赶跑了。战士们向地道内喊话:"敌人打跑了,老乡们快快

出来吧！”洞里的群众不明村里情况，怕上敌人的当，还不敢出来，后来听出是熟悉人的喊声，群众才从洞里慢慢出来。这次战斗中有三十七位同志不幸牺牲。

县委区委和政府领导同志，亲切慰问了死难者家属和脱险出来的干部和群众，同时又安排了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工作，以后又召开了全村的追悼大会，表彰了小王二大寨民兵和群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追认在这场斗争中牺牲的三十七名干部、民兵和群众为抗日烈士家属，并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

追捕栾省三、宋凤岐的简要经过

刘桃元口述　黄国栋整理

栾省三又名栾小秃，是堂邑城西定远寨人，“七七芦沟桥事变”前是有名的土匪头子，宋凤岐是堂邑城西北五岔路村人，地主成份。“七七事变”前是小学教员。“七七事变”后，这两人在其家乡一带联络了一些游民、土匪，成立所谓抗日义勇军，到处收缴民枪，抢掠群众财物，群众对其非常愤恨，有民枪的村庄自动组织起来不准他们进村。

一九三七年腊月二十五，栾小秃他们攻进史庄，不但收缴民枪，抢掠民财，还用铡刀铡死五、六名群众，有的竟被铡成三段。一九三七年腊月二十八日，栾小秃他们又攻进洼刘村，杀死群众三、四十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一九三八年初，栾小秃等匪部被范筑先收编，并任命栾小秃为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第二十六支队司令，宋凤岐为支队副司令。这支土匪队伍当时已扩大到五、六百人，范筑先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整训，目的是把这支土匪队伍训练成一支抗日力量，对他们进行集中整训期间，堂邑城西各村群众稍得安宁，广大群众积极拥护范筑先对他们收编整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军侵占聊城，范筑先牺牲，这支队伍又成了无王的蜂，到处抢掠民财，敲诈勒索，奸污妇女，无恶不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日军侵占了堂邑县城，栾小秃

带领他的一部份人投靠了县城内的日军，被编为伪军（皇协军），县城内的日军任命栾省三（栾小秃）为堂邑县皇协军大队副。从此他经常带领伪军到堂邑县城西一带村庄抢掠民财，并在吕铺、阎营安上据点。还经常带领伪军对我在县城以西村庄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县区政府进行扫荡袭击。宋凤岐带领一部分人投靠了吴连杰。（吴连杰部原也是一部分土匪和赵吉胜、黄竹斋两个民团组成的一支所谓抗日义勇军，被范筑先收编为第三十一支队。范筑先牺牲后，吴连杰又投靠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被编为山东省保安第三十一旅，任命为旅长。明为国民党山省的地方保安部队，暗投日寇，以保住他们的占领地盘）。宋凤岐投靠吴连杰后，被编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三十一旅第三团，任命宋凤岐为团长，陈英为副团长，下设三个营。该团总兵力只有四、五百人，虽兵力不多，但对群众的危害很大。他们在所辖村庄重复地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民财，闹得民不聊生，而且经常到非辖边沿村庄牵牛"绑票"、劫路，宋凤岐的营长和多数的连、排长以及部分士兵都吸海洛因（白面），或贩卖海洛因。宋凤岐的家属依仗宋的势力对所在村的群众进行勒索。他们敲诈勒索群众财产的方法多种多样，如，宋的外甥丢了羊，要他村群众赔偿，村干只得按地亩派款赔偿，广大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我武训县独立团围攻吴连杰部第三团宋凤岐驻村邓庄，宋凤岐无力抵抗，被迫交枪投降，我军收缴步枪一百多支，机枪一挺，对其士兵，大部经教育释放，对暂时未释放的团长宋凤岐等二十多人进行教育期间，宋凤岐逃往敌占区济南。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军攻克堂邑县城，栾省三逃至敌占区济南。栾省三和宋凤岐在济南搜罗同

党，妄图重回堂邑继续为非作歹。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栾、宋二人化名潜入博平地区。宋凤岐化名担任一药店职员，栾省三也在博平地。后被我县公安局侦察清楚后，我堂邑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刘桃元同志带领部分保卫队员追捕时，正值青纱帐季节，由于一保卫队员鸣枪，致使栾小秃进入青纱帐内逃脱。栾小秃的逃脱，失掉了追踪的线索，一时线断查无下落。

追捕栾省三、宋凤岐的简要经过是：

追捕栾省三（栾小秃）和宋凤岐是堂邑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刘桃元同志于一九四九年起，在平原省公安厅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经过刘桃元同志较长时间的化装侦察，在已查清宋凤岐化名在博平地一药店任职员，栾省三查无下落的情况下，平原省公安厅决定暂不逮捕宋凤岐，命令刘桃元同志继续侦察栾小秃的下落。

刘桃元同志化装成一名贩卖纸烟的商人，在博平、聊城、堂邑、阳谷等县各集市活动，同一些小商贩接触较多，在阳谷地同一小商贩接触时，了解到栾小秃的内弟带着半口袋绿豆在阳谷某村一户住宿，刘桃元即在这户远处窥视等候栾小秃的内弟出来，栾小秃的内弟于第二天天没明时即骑自行车带着绿豆出来，向聊城方向走，刘桃元同志骑自行车带着一二十条烟尾随其后。当栾小秃的内弟又向博平地走时，刘桃元同志怕其发觉，不敢离的太近，便以看见对方为准，当栾小秃的内弟又从另一条路返回聊城上了至邯郸的公路时，骑自行车做小生意的人就多了，刘桃元同志混入其中紧紧跟随，离栾小秃的内弟较近了些，走了一天，栾小秃的内弟进

入一个村的旅店，刘桃元同志也和其他做小生意的人住进了这个旅店。刘桃元同志住下后就打听邯郸花椒的价格，重点向栾小秃的内弟打听，并说他是第一次到邯郸做生意。二人谈的很投机，就喝起酒来，栾小秃的内弟看到刘桃元确实是个做小买卖的，便答应同行到邯郸帮助刘桃元同志卖烟买花椒，二人到达邯郸后进入一个饭馆吃了饭，帮助刘桃元同志把烟卖掉，就对刘桃元同志说："买花椒得到郓城去买，并指给去郓城的路"。刘桃元同志看出了他的目的是想把他支走，刘桃元同志为了不露马脚，推车走了，走到不远的拐角处，把自行车存入一家做小买卖的店内，看着原和栾小秃内弟吃饭的饭馆，不一会栾小秃的内弟骑车向另一条街道走，刘桃元同志立即雇了一辆三轮车，说明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尾随前边骑自行车的人，不要离的太近，也不要离的太远，三轮车夫领会了其中之意，紧紧钉住前边骑自行车人，一直跟到一个僻静街道，前边骑车人进入一个大门，刘桃元同志下车问清了该街道名称和该大门牌和门内机关名称，如数付给了三轮车钱。刘桃元同志回到原存车处把自行车取出，直奔邯郸市公安局回报，邯郸市公安局立即组织公安干警逮捕栾小秃，叫刘桃元同志旁观，栾小秃化名担任邯郸市运输公司经理。该处是栾小秃的住处，有三道门（大门、二门、三门），三门里北屋就是栾小秃的住屋。市公安局的同志弄开三道门连一点声音都没有，栾小秃正和他的内弟在屋内喝酒，市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并用枪指向了栾小秃，栾小秃说："我栾小秃已活到时候了，我的枪就在我枕头底下，去拿吧"！栾小秃被带上手铐和他的老婆被押解到聊城。

在逮捕栾小秃的同时，聊城和博平县公安局将宋凤岐逮捕也押解到聊城，经过审讯其罪恶，他俩供认不讳，将栾的老婆释放，于一九五一年将栾小秃、宋凤岐押解到堂邑枪决。这就是我公安人员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至一九五一年追捕到枪决栾小秃、宋凤岐的简要经过。

一九八八年五月

在聊阳县工作的片断回忆

李健民

聊阳县组建于一九四七年八月，撤销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历时近二年的时间。当时，正值毛主席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伟大号召之际。地委为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便决定把聊城县西南的四个边沿区和阳谷县西北的四个边沿区划出，组成一个边沿县——聊阳县。聊阳县即由此产生。

聊阳县建制后，虽历时近二年时间，但却为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做出了一定贡献，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

首先应说明，聊阳县建制之前，聊城县委土改部部长沙晓鲁同志就在这里稳妥顺利的进行了土改工作。得到土改和财产的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在新建聊阳县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沙部长，她德高望重，很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给聊阳县的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而后聊阳县的工作能以顺利地开展，是与沙晓鲁同志的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分不开的。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我离开博平县，（当时我任博平县委付书记兼县长）带着任聊城县委书记的调令到地委报到，当天晚上，地委付书记郭少英同志代地委给我谈话，说：“有个困难问题给你谈谈”，我说：“有什么问题就说吧”。两人哈哈大笑一阵，少英同志接着就说：“现在形势

有变化，你的工作也要变化一下，现在新组建了一个聊阳县，这个县地处边界，工作较苦，是有名的国民党多、土匪多，特务多的三多地区，加上又是聊城、阳谷两县各划出的四个边沿区组成，干部的团结也是主要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地委考虑你去了从各方面说都比较合适”等等。我说：“我以为什么问题哩，这算什么问题，为了工作的需要，调换工作是正常的吗！没问题”。我便交回调聊城县的调令，答应明天就去聊阳。

到聊阳县任职后，首先到了朱台村与沙晓鲁同志较全面的交换了意见，接着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县、区党政负责同志参加），说明了新建县的基础和处境，并针对新划县的特点进行了广泛具体的讨论，达到了认识统一。强调了各级领导班子必须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团结一致，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深入联系群众，走好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同时，确定抓住支援前线为主要中心任务，以此带动和促进民兵建设，搞好生产，尽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在县委的领导下，围绕中心任务，发动广大党政干部都自觉的深入基层，用党的政策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因而，使党的各项工作得到顺利开展。实践证明，只要群众理解了党的政策，就会心明眼亮，力量无穷。所以，农会、妇会、民兵和儿童团真正拧成了一股绳，做到了时刻警惕和严防敌特的造谣破坏，就这样，在这名扬在外的三多的县境（国民党、特务、土匪），没有发生过盗窃，拦路抢劫案件。

从工作中体会到，在实践中使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增长知识，提高觉悟的好方法。记得在一九四八年春，某村的一个水塘，因蒸发而冒出一种异味，相传是神水，能治病，于

是外村去打“神水”的群众络绎不绝。我们据此进行了分析研究，采取的对策是：不劝阻，不拦挡，不控制，更不施加压力，而是到群众中去，观看打“神水”的情况，问候病情，然后通过干部家属，积极分子的实践，向群众宣传，说明没有什么“神水”能治病、完全是封建迷信，自欺欺人。群众通过“神水”能治病的实践，教育了自己，提高了认识，懂得了科学治病的道理，“神水”之迷自行解决了。如果当时反对打“神水”，敌特分子可能钻空子，造我们的谣，挑拨党群关系。

关于复查土改问题，聊阳县八个区虽然进行了土改，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土地《法大纲》，又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了复查，在复查中有偏必纠，避免了过“左”过“右”。如沙镇北刘庄村，在复查中发现了一户新兴中农被错斗，该退赔的立即作了退赔，另外查出一户漏划地主，便重新发动群众进行了斗争。

根据地委整党精神，结合复查土改并开展了整党活动，把一些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清除出党，如刘庄的土改所以不彻底，就是因为党支部内不纯，我们紧紧抓住这一典型，县委决定解散了这个支部，重新进行了党员登记。因而群众情绪空前高涨，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更加顺利开展。

县委抓住土改复查和整党后的有利形势，随即领导群众大搞生产，在抓生产的同时，又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普查丈量土地，经过土地丈量，查出了大量黑地，仅刘庄一个村就少报土地八百亩。在领导和群众都心中有数的基础上颁发了土地证，巩固了贫农分得土地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丈量土地，把一些瞒产瞒地的坏村干赶下了台，因而，使公粮的

征收，合理负担，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等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互助组格具配套等各种劳动组合，象雨后春笋般应润而生。

在抓农业生产的同时，我们还组织群众从事了副业生产。根据各村不同情况开展传统性的副业，如后刘庄的铁丝罩滤、邵堂村的槐木扬场铣等，还在金庄发动群众集资办起了孵化小鸡坊，发展全县的养鸡生产。同时，根据很多村土地盐碱不产粮的情况，便组织群众熬小盐，供应群众食盐的需要。小盐不光廉价可食，还能在盐渣里提取火硝，供鞭炮作坊当鞭炮花药。而且，盐碱沙地荆条满地，我们就组织群众发展编织业，这样既满足了群众筐、篓、篮等工具的需要，又增加了经营者的收入。

聊阳县还有一种特产——荸荠。它的功能有消痰化食建胃等作用，且销路很广。可通过商人组织外销到禹城、天津、济南等地。

县委县政府在这一时期，由于密切合作，紧密团结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周围，坚守岗位，积极工作，所以，社会秩序安定，生产发展，群众生活改善，对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的空气很浓，干劲很大。做军鞋，抬担架，送粮草，只要一通知，都很快完成任务。地委书记谢鑫鹤同志曾在会议上表扬过聊阳县由落后变先进的事绩。

时间已过去四十年，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聊阳这段史实，聊阳的广大群众和干部都给我留下较深较好的回忆。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日

于北京

我在聊堂县任职期间的大事记

杨　立　功

聊堂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对敌斗争的形势需要，由聊城城西、堂邑城南组成的向聊城、堂邑之敌进行斗争的一个县级建制，故名为聊堂县。隶属鲁西北地委、专署（当时叫冀南七地委、七专署）。

当时聊城、堂邑县城均未解放，聊西南重镇——沙镇仍为汉奸郭培德盘踞。全县五个区，只有一、二区一部分村庄为根据地，其余均为游击区和敌占区。

从一九四五年六月至一九四六年元月聊堂县制结束，我任聊堂县委书记，时间只七个月，但形势变化急剧。

一、赴任时的形势

一九四五年初，地委以地委党校学员近２００人（区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各半）组成工作队，到聊堂开辟工作。为了便利工作，工作队的许多同志兼任了县、区党、政、群的领导职务。党校队长孙良才同志兼任了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书记李飞同志因病在根据地休息）；党校副队长王东海同志也在县委兼职，协助县抗日联合会的工作（简称县、区抗联）。

工作队于一九四五年初到达后，拟定了以反奸清算、反霸

清算为中心任务，由县区武装作掩护，把干部分至五个区，发动群众，面向聊堂两县城关和沙镇伪军据点开辟工作。当时县区抗日武装总共不足三百人，与敌伪比较，相对处于劣势，加之聊堂县绝大部分地方长期为敌伪统治，党组织的基础和群众工作都甚薄弱，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反奸反霸清算运动不但没开展起来，反而把汉奸家属、恶霸劣绅，大地主都吓跑到沙镇和聊城、堂邑敌伪据点里去了。他们当中有些组成了极反动的还乡团、敢死队，客观上扩大了敌人的势力。而且，新进据点的恶霸地主与家乡千丝万缕，不但经常带领小股汉奸队、还乡团四处骚扰，还不时勾引大股敌伪军到根据地“扫荡”。这样一来，广大群众害怕遭敌报复，不但不敢起来反奸反霸，反而对工作队敬而远之，甚至有极少数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致使工作队以至游击队的活动都甚为困难。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作队负责人之一王东海同志和警卫员，在郭关庙遭还乡团夜袭，惨遭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县。由于敌伪骚扰频繁，小偷抢劫盗窃，引起群众惊恐不安，县委本来对原定工作方针和工作部署就有不同意见，王东海同志牺牲后，争议更趋激烈，原定工作方针和部署，已不能再行继续。地委决定：在举行王东海同志追悼会后，党校工作队除自愿留下的一部分同志外，全部撤回根据地继续学习。

为了安全起见，王东海同志的追悼会于五月下旬在莘县境内牛王庄举行。我当时刚从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回来，地委已同我谈话，安排我到元朝县（全解放区）任县委书记。因我与王东海同志既是老同学又是老战友，所以，在前往元朝县赴任前，我随地委副书记杨易辰同志去参加东海同志的

追悼会，追悼会庄严悲痛，会后工作队撤走，因县委书记李飞同志患病，不能赴任，没人接管孙良才同志的工作（工作队长兼任县委副书记并主持工作）。地委决定改派我到聊堂县任县委书记。六月初，地委用一头毛驴送我到聊堂。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单枪匹驴赴任的。

二、转变工作方针，重新部署工作

我于六月初到任后，面临以下紧迫任务：（一）欢送工作队，重建干部队伍；（二）转变工作方针，重新部署工作。

我到聊堂之后，经县委商定把全体干部集结于聊堂县紧靠莘冠边界的村庄。待确定工作队人员的去留后，即欢送工作队回地委驻地。工作队近２００人，大部分撤走，留下数十人，连原聊堂干部共有１００余人。当时情况，就工作队来说，是工作受挫，损兵折将；就对敌斗争形势讲，是局势吃紧，主力撤离，一时颇有凄凉之感，面对这种情况，最紧迫的任务是调整县区领导班子，总结前段经验教训，重振干部士气。

工作队撤走之后，县委中熟悉当地情况的只有王筱湖、郭清书、张炬三位同志，他们对后来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县委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和聊堂的情况，虽然当时全国已进入全面反攻，抗战接近胜利，但由于聊城是山东敌人在鲁西的固守据点，不但驻扎着数千伪军，而且还驻扎着一个联队的日军。更特殊的是随着鲁西莘、冠、朝、阳等县城的解放，土豪劣绅，恶霸地主都聚集在聊城，他们组成了众多的

死心塌地反共反人民的还乡团，沙镇、堂邑成了聊城伸出的两只魔爪。特别是沙镇，是由地头蛇、老土匪头子郭培德聚集的四、五百土匪、还乡团等反共反人民的死硬分子固守着，而我们则只有不满３００人的县区武装。也就是说，就聊堂的小局讲，暂时还是敌强我弱，再加上聊堂大部分地区长期是敌占区，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都较薄弱，广大群众迫切要求的是“安居生产”。根据上述分析和地委的指示，县委确定了暂时放弃开展反奸反霸清算运动的方针，改为“联合抗日，减租减息，保卫生产”。

由于方针对头。因此，干部的精神振奋了，群众的情绪也安定了，当时正值夏种季节，先是组织联防领导夏种，保卫夏种；接着领导秋收，保卫秋收。与此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国际上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的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国内各个战场反攻胜利捷报。群众抗日的信心大增，情绪大振。

在此期间，县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领导成员陆续得到充实，县委增加了副书记（兼抗联主任）刘洪源，增加的县委委员有县长梁向明、县府秘书仲凯、马河支队队长李善亭、武委主任马代槐。随之，各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顺利开展起来。

同时，对敌伪军展开了系统的政治攻势，向他们宣传国际国内的战争形势，进行抗日必胜及即将胜利的前途教育；宣传我党我军对“不作恶、少作恶，可以宽大处理，立功者授奖”等宽大政策。孤立了伪军中的死硬分子，打击了敌伪的反动气焰。

三，半年时间打了三个大仗

（一）、七月间，鲁西北军分区集结全区主力，首先打下了堂邑县城。战斗由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同志直接指挥，时间选择在一个大雨之夜，从莘北远途奔袭。这次战斗，战前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除了县的领导同志外，一般干部群众都是在行动的时候才晓得，为了保守秘密，连担架队都是从莘县带来的。部队在临战的当天下午到达聊堂境内，赵健民司令员在县委机关稍事休息，给我们扼要地讲了战斗部署，我们汇报了战勤工作和堂邑县城解放后的准备工作。天黑之后，在茫茫的雨夜里，部队强行军进入战斗位置。深夜发起了进攻。由于部队行动保密、神速，出敌意料之外，堂邑守城伪军几乎没作多大的抵抗就缴械投降了。在攻击城内两个堡垒时，虽遇到了抵抗，我军有少量人员牺牲，但整个战斗按原定计划胜利结束。天亮后，在部队打扫战场的同时，我们进城，清理伪政府，接受人员档案，迅速建立正常秩序。

（二）、在“八、一五”日本无条投降一个月后，鲁西北军分区对聊城沙镇的敌伪军，先是令其缴械投降，在其拒降之后，军分区集结全区武装力量，攻打沙镇据点。战斗由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政委（兼地委书记）许梦侠同志亲自指挥。经过充分准备后，实施夜间突袭，突袭未克，继续围攻至第二天中午。据点内聚集了鲁西北一带的还乡团，由血债累累的老土匪头子郭培德领头。由于敌人拚死顽抗 围攻连连受挫，第二天下午，部队撤出战斗。据点虽没有攻克，但

在我的政治和军事的攻势下，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战斗之后，敌人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外出。后聊城之敌以“扫荡”为名，把郭培德部及其家眷和财产接进聊城城内。郭培德被八路军赶跑后，当地人民兴高采烈。

沙镇一仗，我八路军声威大震。在胜利的鼓舞下，我聊城游击队经常活动于聊城县城关附近，不断打击零星外出之敌，截击小股逼粮催款、抢劫作恶的汉奸队。从此，聊城形势大变，干群情绪昂扬。

根据形势变化，县委重新确定了开展反奸清算和反霸清算（简称双反双清）群众运动的方针，并做了具体部署。但是，实践证明，这个部署在当时仍实之过急。实际上，“双反”运动是在聊城解放后才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三）、第三个大仗是围攻聊城之敌。这次战斗在一九四五年底打响。

当时，聊城已成了鲁西孤立的伪军据点，国民党为抢摘抗战胜利的“桃子”，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竟不问这些伪军来历及其罪恶，便授予国民党军番号。聊城这伙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老土匪、大恶霸、汉奸队、还乡团竟然打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极为愤慨。冀鲁豫军区基于这些情况，组织了围攻聊城的战斗。

战斗由宋任穷同志亲临指挥。组织了数万人的兵力投入战斗，动员了聊堂及聊城周围各县的群众参加支援前线。聊堂的任务是支援聊城西北区的攻城部队。聊堂县进行了总动员，组织了四支支前大军：一支是一千人的运输队，用肩挑车推运送粮弹；一支是担架队，在前线随战斗部队行动；一

支是武装民兵，直接参加战斗；一支是前线慰问队，随时慰问伤员，并负责及时给部队补充鞋袜。当时，我任支前指挥部政委，梁向明、李善亭分别任正、副指挥。在战斗打响前，我们三人被召到总指挥部，宋任穷同志向我们讲解了作战意图和部署，并交待了支前任务。

战前，我们组织大批遭受过敌伪残害、抢劫的群众向攻击部队和突击队控诉敌人的暴行，以激起战士们的义愤，鼓舞部队的斗志。战斗打响时，正值严冬，北风凛冽，大雪纷飞，冰天雪地，恶劣的天时对我极为不利。攻城战士的棉衣棉裤被雪水淋湿冻僵。敌人为阻击我军进攻，把环城湖面的冰层破开，给攻城造成极大困难。为了冲过环城湖，突击队不得不涉过一米多深的冰水。凛冽的寒风一吹，衣服立即冻得僵硬，使勇敢善战的战士难以施展本领。加上守城亡命之徒的拚死顽抗，围困数天，屡攻不克。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我军主动撤出战斗。

撤出战斗前，总指挥部又把我们召去，说明撤出战斗的原因，指示我们，撤出战斗后，实行政治围攻，瓦解敌人，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我们遵照指示作了部署。

四、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指示：凡是条件具备的抗战时期的边区县制，一律撤销。

已全部解放的聊堂和堂邑将按照旧区划建立堂邑县制。聊城城关虽仍为敌伪盘踞，但为了组织统一的对敌斗争，为

了有利于对抗国民党争夺敌后根据地的斗争，也需要按照旧区划组织聊城县制。聊城战役后，鲁西北地委责成聊堂县委全权办理撤销聊堂县建制事宜。经县委研究，决定将两个区架子交聊城县，由聊城县重划，其余交堂邑县，由堂邑县重划；县武装统归马河支队，由分区整编；县党政群机关干群人员，除少数自愿分到聊城县工作外，其余一律到地委另行分配工作。受鲁西北地委的委托，我绕过聊城城关，前往运东地委汇报撤销聊堂县制的工作安排，获得了完全同意。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一九四六年二月×日在聊堂县委驻地召开全体干部大会，由刘洪源同志宣布干部去处名单，聊堂县在胜利地完成其历史使命后满圆结束。

聊堂县制结束后，干勤人员一分为三，兵分三路各奔前程。其中一部分由鲁西北地委分配到完全生疏的运东地委。两个地委均未另派人工作，完全由聊堂县委自理。全体干部顾全大局，服从分配，充分体现了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

于北京

宋任穷同志在聊城

刘　昭　峰

一九四六年秋，我正在聊城城北辛闸村搞土改。一天下午我到村子里的街上找人，当我走到村北口时，忽然看见从南面路上不远的地方来了七、八个人，他们穿着浅灰色的军装，每人骑一匹高头大马，在村北口路西唐清泉小饭店门前下了马，并在门口喝茶。这时我一眼便认出中间的首长，正是当时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同志，因为他经常到我县指导工作，我们对他都比较熟悉。当时，我立即向前问候宋司令员。经过简短交谈，才知道宋任穷同志这次来聊城县是来指导国、共、美三人小组谈判的，我当即请宋司令和其他同志到土改工作队办公室休息。宋任穷同志和秘书来到我们工作队后，宋司令向我了解村里土改的情况，问土改工作进行的是否顺利，有什么困难，群众发动的怎么样？有什么顾虑？他还详细询问了群众的生活情况等，我向他回报了辛闸村的土改情况，对宋司令说："村子里有几家地、富，现在通过做工作，发动群众对一部份地、富已经进行了斗争，但工作还不太理想，因为聊城县城还没解放，一些群众有顾虑，可能是怕敌人来报复。宋司令员说："对！县城还没有解放，群众思想有顾虑这并不奇怪，我们要深入发动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另外，反动势力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共产党现在正和蒋、美两方进行谈判，我党是主张和平、停止

内战的，但美、蒋方面没有诚意，我们解放聊城最终还要靠武装，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宋司令还对我讲了当前的形势，对土改工作作了一些指示。天色很晚了，我把村长找来，为宋司令员等人安排了晚饭，因为当时群众生活较苦，宋司令员面对粗茶淡饭丝豪没有不高兴，而是吃得津津有味。饭后，警卫员在街上找到了一个两间门脸的小饭铺住下，因为我们办公室实在住不下七、八个同志。我见宋司令就睡在小饭店的一块门板上。第二天很早他们就离开聊城赶奔临清去了。临走时，宋司令员让秘书给留下了饭钱和住店的钱。

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今天回忆起来，还使我无限感慨。我想，那时党的高级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生活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司令员和战士，睡的都是门板，吃的都是一样饭菜，正是这样，我们才得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试想，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党的这种优良传统不同样值得发扬光大的吗！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

于北京

关于宋小屯马楼村反霸斗争情况的回忆

黄 国 栋

宋小屯和马楼村是原堂邑县第五区所辖村，村村相邻，中间户连户没有界限，是同一个土围子，只是南街最南头，约有十户穷苦人因住的太分散，修建土围子时没有被圈进去。南街叫宋小屯，姓宋的多，北街叫马楼村姓马的多，两村合计约有三百多户人家。

解放前南街穷，北街富。南街的村政权依附于北街村政权。如修正土围子，买枪保卫土围子，是为了防止土匪牵牛架户（绑票）的，但土匪绑票绑的是富户，不绑穷人的“票”。修建土围子的费用，按土地的亩数摊派，苦了南街多数的穷苦群众，“兔子不拉屎”的盐碱地也得分摊费用。

北街地大主马丙符曾同垢固大地主黄竹斋争当第五区区长，因马、黄在县的势力均等，争到最后，黄竹斋为五区北部村庄的区长，马丙符为五区南部村庄的区长。黄、马分庭抗礼，谁也不买谁的账。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在各自所辖区村庄培养自己的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都是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损己害民维护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七七事变”后，他们又各投靠山，黄竹斋搜罗北部村庄民枪并强征壮丁六、七百人，投靠伪杂吴连杰部当了第二团团长。马

丙符的院内弟兄马丙仁则投靠吴连杰部当了一团的营长，马丙符同驻防堂邑县城的日伪军联系密切，保住了五区南部村庄区长的宝座。

一九四〇年的十月，马丙符把县城的皇协军、伪警察请到宋小屯、马楼土围子里驻防，并积极向各村推行保甲制度。

一九四五年七月，堂邑县城被我军解放，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地方上的反动地主逃到各大、中城市，拢罗地痞流氓组织所谓“还乡团”，企图卷土重来，马丙符、马丙仁等当时就逃到聊城、济南等城市。

我堂邑第五区遵照县委的指示，继十八个村联合斗争沙王庄大地主林海鹏父子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在宋小屯、马楼村展开了反霸斗争。区委派我和吴荣禄等同志协助这两个村的村干部联合开展这一斗争。

一九四六年，马丙符、马丙仁等上层反动人物已逃往聊城、济南等城市，没逃出的小恶霸坏分子，在本村充当反动上层人物的耳目当暗探。

堂邑县解放后，我和吴荣禄等同志到宋小屯、马楼等十几个村（即第三小区）协助村干开展减租减息和组织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等工作。我们晚上常在马楼一户家中开会议事。

在宋小屯、马楼村征收公粮时，有人公开的向区、村干部提出：“你们向天上看看国民党运兵的飞机，国民党快来了，你们共产党还要粮食干什么？……”。

以上情况说明了马楼村的反动暗探、坏分子还在积极地进行活动。这次反霸斗争必须连根拔除，才能安定民心。还必须宋小屯、马楼村联合开展这一斗争，才能取得斗争的彻

底胜利。

反霸斗争的前夕，南街宋小屯的村干部就开始召开积极分子会、农会会员会、妇女会、民兵会、儿童团员会；北街马楼村干部召开基干民兵会。这些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反霸斗争对象的家属没有得到丝毫的消息。于某日晚十点钟，南街宋小屯村干部带领男女群众分十队，同一个时间，突然对斗争对象进行清抄查封财产，伪营长马丙仁的家属顽抗，在屋里手持铡刀、菜刀，半敞着屋门，大声喊着："不要命的进吧……"，在屋里大骂，我们去后，在院中进行政策教育，叫他们放下铡刀、菜刀等，屋内仍然大骂不听教育，并说："国民党军队快过来了，来到后就血洗南街宋小屯，你们还不赶快滚他妈的蛋，你黄国栋、武荣禄的家离这里只有三、五里路，国民党也不会饶了你们的家属……。"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眼看一场血的混战就要开始，我再一次向屋内这户家属下达命令，命令他们把铡刀、菜刀等武器抛出来，你们男女老少都举手出屋，屋内人不出来，仍然骂声不止。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叫村干部组织带领十几名男壮年到院门外这家放柴草的地方，把这家的秫稭全部搬来围住家房子，这时我又向屋内说："如果你们顽抗到底，就放火烧这座房子，叫你们同这座房子同归于尽，"限你们全家在屋内商量三分钟"。不一会他们全家就哭着求饶，把铡刀、菜刀等全部从屋内抛了出来，并举手出屋。叫民兵把男大人带走，把妇女和孩子留下，随之清抄查封了这户的财产。这两个村的反霸斗争清抄查封他们的财产，才得以顺利进行。接着召开了群众的诉苦大会，并将没收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

全区各村先后都如此开展了反霸斗争，从此，生产积极，出担架，运军粮，支援前线，青壮年报名参军，父送子，妻送郎，上战场打老蒋，形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一九八八年三月

对武训县土改复查中“反特事件”的回忆

李　玉　轩

“反特事件”的前后梗概

解前前的武训县境，日伪顽杂与地方封建势力交织在一起，对广大群众多方进行残苦的剥削和压迫，要粮要款，敲诈勒索，干尽坏事，闹的天无宁日，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简直是过的地狱生活。解放后，我们虽然领导群众生产自救，进行增资增佃和土地改革斗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发动群众还不够充分等原因，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仍在暗地造谣破坏，威吓群众，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因此不少群众怕变天的思想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摧垮封顽势力，完成土改任务，很有必要把反奸诉苦和土改复查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灭封顽势力，充分的把群众发动起来。针对这一目的要求，武训县委于一九四七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反奸诉苦和土改复查的斗争运动。从运动发展的情况看，基本上是顺利的，也是健康的。但，不可否认，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在我们一区就出了问题，一度把反奸诉苦和土改复查斗争引向了反特斗争，扩大了敌人面，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可以说犯了一个大错误。

“反特事件”的经过

一九四七年我在一区工作。区政府设在温集。区委书记是宋兰臣，区长王向村，抗联主任吴星。这个区的领导作风，一般讲是比较稳当的，工作上与其他区比起来，虽算不上先进，但也不属后进，是个中上游区。一九四七年七、八月份，为学习兄弟区的先进经验，把反奸诉苦和土改复查运动搞的更好些，制定了三条措施：（一）把全区贫下中农有计划的集中到区里，以村为单位食宿自行解决；（二）把全区民兵统一组织起来进行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一夜之间，把全区恶霸地主和坏分子全部扣押起来，罪大恶极的由区管押，一般由各村民兵在本村自行看管；（三）对恶霸地主和民愤极大的坏分子事先报县审批几个死刑对象，待大会开会期间，有计划的处决，杀一杀敌人的威风，显示一下人民群众的力量。以上三条措施，经过紧张的准备，诉苦大会如期召开了，把被斗对象拉到主席台前边，诉苦人登台向被斗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控诉，群众情绪非常高昂，当斗争达到高潮时，在为民除害的口号声中，把事先已批准死刑的被斗分子拉出场外不远地方就地枪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第二天大会继续召开，由于被斗分子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群众打的也比较厉害，因而，个别被斗分子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公开要求与领导单独谈话，并声称有重大问题交待……，为此，他编造了一个所谓“坏人”名单，说某某人是国民党员，某某是狗汉奸，某某是特务分子……。在此情况下，领导上信以为真，当即把全区干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派到各村去发动群众与在村管押的地富分子开展斗争；另一部分留在区里为全区性的斗争大会服务，继续做在区管押人员的审理工

作。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其他同志一起到马颊河西一些村庄去的。据了解我们下村以后，留在区里工作的同志，就以所谓供出的“坏人”名单开始抓人了。我是在马颊河西位庄村领导群众正在开斗争会的时候被抓起来的。我们被关押后，区里的同志仍边审边抓，并对抓的同志动用各种刑罚，（如坐老虎橙、用香烤、灌凉水、拳打脚踢、严刑吊打）有的人受刑太重当场丧生。这样以来，实际上已把土改复查运动引向了“反特”方面去了。当时被抓的人员中，有党员、有村干部、有教员、有医生、有小区干部、有区干部、也有群众。一区干部除我被抓外，还有公安助理员和武委会干部李文旺，财政助理马××。县公安局干部李建华也被抓起来了。我们这些人被关押在县公安局，其面广数大是惊人的，县区两级被关押起来少说也有近百人，或百人以上。另外，个别区领导到马颊河西一些村抓人时还公开宣布在区委委员李××领导下的村干部，百分之八十都是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尽快交待并揭发别人，争取从宽处理。这样以来，实际上就给人家扣上了“特险”的帽子。因此，全区上下造成一片恐怖，气氛十分紧张。当时马颊河西一些村干部都不敢在自己家睡觉，开会跑到地里去开，不少村干部和群众对区领导产生了怀疑说：“现在的区领导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专抓好人”？！对此，有的村干部和群众便跑到县委和地委反映所谓“反特”问题。一区干部本身之间也产生了互不信任的情绪，有的同志只要听到喊自己的名字就吓一跳，怕搞到自己头上来。甚至有的对区委书记也产了怀疑说：“平时对区委组织委员那么好，现在也不行了”。一九四三年县委书记刘洪源被临清敌人抓去过，因此，对刘也打了问号，如此等等

情况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反奸诉苦和土改复查运动的正常进行。虽然所谓“反特”运动的时间不算太长，但给党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很坏的。为此事，上级党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组织了若干工作组分别到县区作进行调查了解和处理工作，并分别在不同场合承认了错误给予受害同志平了反，从而挽回党的影响。一九四七年底在地委整党时，为了教育同志，严肃党纪，对有关同志分别给予了党纪处分，一区区委会解体重新组合，从此，“反特”事件就算全部结束了。

沉痛的教训

一区在土改复查运动中，为什么一度出现“反特”事件呢？这是值得一个思考的问题。“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句话说起来好讲，做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不少同志有这种感受，我个人也不例外。一区到底为什么出了一段不正常的“反特”事件呢？！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左倾”思想的支配，大搞逼供信造成，只要有了“左”的思想，就容易头脑发涨，对党的严禁逼供信的教导和同志们的善意劝告就不听进去了，因此，对抓来的人不调查，不分析，不谈话就施展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抓，因而，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反特”事件。回忆当时运动之初，自己脑子也有些发热，如果自己不当对象不离一区，同样会犯这类错误。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日

在柳林整党情况的片断回忆

李　玉　轩

在柳林整党已过去四十多年了，有些情况记不很清了。当然，主要问题还是有印象的，甚至还是比较深刻的。

柳林整党，是四八年一月开始，二月底结束的。原计划旧历年前结束，结果，因事多延期，所以，旧历年也是在紧张的整党过程中度过的。整党大会会址设在柳林东门外路北广场，用苇席搭的大棚，周围挖了一些防空壕，主席台前横联写的是：冀南一地委县、区党员干部整党大会。参加整党的全体成员，以县为单位，分别住在柳林镇和其周围的一些村庄。我们武训县是住在柳林西南方向的乔庄村。

历时四十多天的整党活动，是比较紧张的。但，大会开得次数并不太多，记得总共召开了三次。一是动员报告；二是大会典型发言；三是整党总结。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土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半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一百多万有生力量，敌人由开始全面进攻，而被迫转向防御；我们则由开始的防御转向全面反攻。战场已经不在解放区而打到蒋管区去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个急转直下的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了所有参加整党的全体同志。现在回想起当时情景，仍记忆犹新。随着形势的发展，解放区扩大了，被解放的人口增加了，党的队伍空前壮大。整党报

告中强调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我们彻底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很快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当时的情况是新老解放区都需要我们去进行工作，老解放区通过减租减息，特别是根据“五四”指示精神，对地主开展了各种形势的斗争，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成立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农会组织，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一份土地，实行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应当提出，随着大好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问题：地主流氓分子乘机混入党的队伍中来，他们在农村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中控制了领导权，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包庇地主，该斗争的不斗争，并出面为他们讲情，把地主成份错误地划成富农和中农，也有的故意制造混乱，侵犯中农利益，把中农错误地划成地富成份进行斗争，曲解党的政策，冲击工商业，分地主的地时少分减分劣地……。这样一来，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

根据大会报告的精神和所接触的问题来看，柳林整党主要是解决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反对地主阶级立场，纠正左的偏向。解决的方法，主要靠小会解决问题，强调自我革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不是人人过关，而是重点解决问题。整党结束时，强调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重要性。新解放区需要开展工作，老解放区需要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不是再按土地法大纲重来一遍，而是以土地法大纲有关条款，把错划、漏划的阶级成份纠正过来。纠正的方法，以贫雇农为骨干和农会商量，把伤害中农的问题合理加以解决，巩固与中农的关系，共同向漏划地主开展斗争，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整党总结时，把整党过程中揭露的问题

严肃地进行了处理。对在土地改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分别不同情况给予适当的处分。另外，根据上级党委有关领导干部回避的指示精神，对有关领导同志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县长梁向明、县委书记刘洪源同志都是在那个时候离开武训县的。当时并宣布曾广成同志为武训县县长。各区领导成员也有类似的调整。以上，就是柳林整党的大体过程。回忆起在柳林整党重要意义的时候，有以下三件事：

一、柳林整党结束的同时，宣布临清县为土改重点县。为了加强领导，总结经验，同时公布了参加重点县土改的有关人员，县委负责同志司洛路就是其中的一个。各区都有人参加，四区是我去的。到临清以后，我被分配到七区丁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地委武装部付部长孙虹同志。七区区委副书记是地委负责同志尚志学，区委书记是临清县原来的。临清县委副书记是冀南区党委负责同志王任重（现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县委书记也是临清原来的。这个县因敌人盘踞的时间较长，解放的较晚，所以大部地区没进行减租减息和土改斗争，为此，基本上是按照土地法大纲的精神要求和条款进行的，进展得比较顺利，半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结束了。十月份我们便又回到各县区工作岗位，土改中遗留的问题由临清县的同志自行处理。

二、四八年十一月，武训县决定，分批分期对农村党组织进行整顿，同时，结合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四区以柳林为整顿重点，首先遇到的是党组织要公开，并邀请贫农积极分子帮助整党的问题。这件事就当时来讲，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要说农村党员，就连我个人，也是经过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脑子里转了几个弯子，思想才搞通。这不是

一个人、一个村、一个区、一个县的问题，多年来党组织在广大农村都是处于秘密状态，党员身份是绝对保密的，发展党员是个别吸收，下达任务是个别布置，单线领导，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个人入党之后，不要说村里的群众，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妻子都不能叫他们知道，这是党的纪律。现在，党要公开，并邀请党外群众帮助整党，这是形势需要，党的工作的需要，经反复学习，大家搞通了思想，统一了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党的觉悟。农村党组织经过一番整顿，对地、富出身表现不好的，不够党员条件的，分别进行了劝退和清除；对在土改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同志执行了党的纪律，也分别给予了不同的处分。在整顿的同时，根据土地法大纲的要求精神，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发动群众纠正了错划、漏划的阶级成份。把土改时中农拿出来的土地退还给了他们；把漏划地主的土地拿出来再一次分给少地农民。对地主少分地、分坏地的问题也进行了调整，分给他们大体相当农民的一份土地，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进一步落实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农村党组织经过整顿纯洁了组织，加强了团结，改进了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三、四八年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满足新解放区的需要，在上级党的指示下，从多方面抽调了一批强有力的干部，组成一支奔向大别山的干部队伍。一地委南下负责人是武装部长杨新一。其他人我就记不起来了。武训县组成一个县级机关架子和几个区的架子，并且也任命了县区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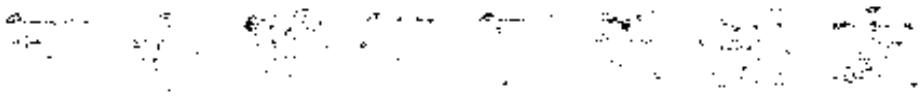
以上三件事，我认为应当说是“柳林整党”精神在有关

方面的具体体现。从这里来看，柳林整党意义就比较全面了。柳林整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团结，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意义非常重大。从大军即将过江、全国即将解放的前景来看，意义更加伟大和深远。

一九八八年三月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老干部局

支援新区干部南下



对四八年聊城县干部随军南下的片断回忆

李吉民　王万里

解放战争后期，一九四八年三大战役后，特别是淮海战役后，长江以北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开始了向蒋介石反动派大举反攻。党中央针对这一大好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召，并为新区的接管工作提出了抽调地方干部随军南下。中共聊城县委遵照上级党的指示要求，开始了南下干部的动员和具体组织工作。

一、组建接管新区的班子。

聊城县组成一个县的随军南下干部班子。段斌三任县委书记，沈廷梅任县委副书记，訾瑞林任组织部长，孟景侠任宣传部副部长，办公室主任袁令明，组织部还有王俭云同志。张佃一任县长。还抽调了一些科局长，如：齐振邦、刘洪山、赵玉山、明耀中、李晋卿等人。同时，还决定每区抽调干部五至七人，勤杂三人。实际上有的区少于五人，个别区多于七人。组成了六个区。区委书记有：王万里、姜梦斗、张清田、刘庆超、李吉民、张玉振。区长有：周明轩、

杨中正、王炳晨、郑惠彬、陈赖晨、张兴鲁。共抽调干部八十二人，行政勤杂二十四人，总计一百〇六人。

二、进行思想动员工作

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旬，原县委组织部长沈廷梅同志亲自到了三区（侯营）召开会议，在会上宣布李吉民提为区委副书记，陈赖晨提为副区长，许承印提为副宣传委员，张凤岐提为副组织委员，下午召开干部大会讲了全国大好形势和组织干部随军南下的重要意义。接着宣布县委决定调我们四人和财政助理员任宪华同志随军南下。当时，有四人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一人态度暧昧。我区五个干部中，家庭有四种情况，一是家中没有问题；二是老人难以说服，一走了之；三是家中祖母、父母不会同意，又不能不讲；四是家中父母、爱人和本人都不同意南下。经过研究分析有四种原因，一是存有："老不征北，少不征南的旧观念；二是，乡土观念深，不愿离开本地区；三是，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虽在淮海战役被消灭了主力几十万，退守长江以南，但还有一定力量，怕打仗牺牲；四是，父母年老体弱，生活确有困难。根据这一情况，分别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区委书记梁建忠同志，主要负责动员三个勤杂人员南下。我和张凤岐同志负和南下干部的思想动员工作。并主要研究了两个同志的家庭责本人的具体情况，然后亲自到户进行思想动员。第一，我们反复讲了大好形势，说明了蒋介石已决定了失败的命运；第二，阐述了我们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接管新区的重要意义组第三，反复讲解了党的纪律，说明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服从；

织决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第四，讲了县委规定：凡随军南下的同志，其家庭按军属待遇，区、村对其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保证做好照顾；第五，对南下同志的爱人问题，讲明了组织上已决定待南下干部到达工作地区后进行接送。有个同志的家庭提出叫爱人一块南下，我们同意了他父亲的要求。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我区胜利完成了随军南下干部的任务。

三、菏泽整编

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南下干部全部集中到了聊城县城，经地委动员、欢送，于古历正月十七日出发，到达了冀鲁豫区党委驻地——菏泽。我们住在了八大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到八大寨不几天，一区于明传，二区杨庆林两同志，经过对家庭反复说服教育，终于用自己的路费赶到了菏泽，加入了南下队伍。

我们在八大寨住了一个月。主要学习接管城市方面的有关方针政策。根据南方山路、田埂路和小河流多的地理特点，进行了夜行军和紧急集合以及过独木桥的练习。同时，为方便行军，进行了轻装，把多余的棉衣等东西减了下来，并动员了部分女同志暂回聊城，待到目的地后再来接她们。经编队，聊城县南下干部编为冀鲁豫南下六大队三中队，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我三区和四区编为一个班，我任党小组长，王炳晨任班长。通过这段学习和整编，提高了认识，树立了信心，增强了行军的能力，正式拉开了随军南下的序幕。

四、安庆渡江

三月下旬，我们从菏泽出发到龙海路朱集子上火车，当晚到了徐州。因淮河桥未修好又步行到了蚌埠后坐车到达合肥，住在了合肥西郊。在合肥市，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在一个剧院里听了张鼎承同志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然后，步行到达桐城。这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与我党正进行谈判，所以在桐城住了近半月。国民党蒋介石拒绝在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书上签字。我解放大军于四月二十日发动攻击，冲破长江天险，顺利过了长江。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想长期固守长江南的密梦。我南下大队指示各中队分前后两个梯队，前梯队不分昼夜急行前进，准备在望江过江，因连续下雨，天又黑，路又滑，泥浆到膝盖，一晚上只走了六、七里路，整个大队便住在了汪家大家庙里。我班十几个人分到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人多屋小，只有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集合出发时，才宣布改在安庆过江，当天下午到达安庆，傍晚，后梯队也到了安庆，有的没吃饭，就集中在安庆东门外码头过江。因三中队有个区组织干事苏××，病重，派人送到部队医院，所以，我们过江后就天大亮了。到达崇德镇后，大队决定聊城县（三中队）的同志接收余江县，姚修文专员随我们前去，经乐平、万年两县，于五月上旬到达了余江县城

五、接收余江

到达余江县的第二天，在县政府门外召开了群众大会，姚专员向广大群众讲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并宣布了新政府的成立。任命张佃一为县长，段缄三为政委。县政府：县长张佃一，秘书科长齐振邦，财政科长刘洪山，民政科长李志洪，建设科长李晋卿，税务科长姚中正，工商局长赵玉山，银行行长明耀中。县委会：县委书记段缄三，组织部长訾端林，宣传部副部长孟景侠，办公室主任袁令明，组织干事王俏云，宣传部干事于明传。保安队改编为县中队，指导员高登海。县以下设七个区：

城关区区长张兴鲁、区委书记张清田
一区区长郑惠彬　　区委书记王万里
二区区长周明轩　　区委书记姜梦斗
三区区长阎学旺　　区委书记张连河、阎庆安
四区区长陈赖晨　　区委书记李吉民
五区区长杨中正　　区委书记刘庆超
六区区长王炳晨　　区委书记张玉振

县委副书记沈廷梅调临川县任县委书记，我区任宪华同志调专署财科工作。

余江县情况很复杂，全县主要分为林、王两大派。王派以吴家俊（国大代表）为首，掌握着县保安队和大部分乡保武装以及土匪。林派也掌握着一部分乡保武装。两派斗争非常尖锐。夜间枪声不断，经常有人被杀和被抢。由于我解放大军突然过江，两派还未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便趁大军

压境有利时机和余江又是红军方志敏同志的家乡，基本群众听说共产党来了，曾当过红军和深受压迫、剥削的群众，因而，每天都有不少人主动到区里给介绍情况。

在余江县三个多月的工作中，除广泛宣传党的政策，稳定各阶层情绪外，其主要任务：一是，征收粮食供应军队；二是收交武器，我四区这段时间收交长短枪近百支。根据县委对各区组建区队的指示，我区建立了三个班，三十多人的区队。刚建立的区队还执行过两次任务，一次县调一个班看守邓埠镇铁路大桥；另一次调一个班从余江押船运粮到鹰潭。在这段时间，县府还办了一次为职员学习班，我区三个伪乡长都进了学习班。趁此机会，我们选派了过去当过红军，我们来后积极提供情况又工作表现好的同志到平定、香桃、黄溪渡三个乡代理乡长。

在余江工作期间，我们失去了一位年青的好同志。大约七月下旬，县银行杜吉庆同志由邓埠镇乘坐余千县县商船回县城，船行至平定乡境内，为保护商船，单独一人与土匪战斗，不幸牺牲，年仅二十岁。

西进出发前，县委书记段斌三同志带领县区部分干部到杜吉庆墓地告了别，并追认杜吉庆同志为共青团员。

六、进军大西南

一九四九年七月，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作出由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决定，把赣东北地区移交四野战军。鹰潭地委根据这一指示，又把沈廷梅同志调余江县任县委副书记，以便带领我们西进。工作移交四野后，于八月中旬，全县南

下干部和新吸收三十余人当地干部，共一百一十余人集中余江县城出发。到上饶区党委驻地后，住了二十多天，这期间，区以上干部听了区党委副书记关于赣东北三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全体干部还听了宣传部长申云浦同志关于西进的动员报告，并学习了有关贵州的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

余江县的西进干部改编为四大队三中队。县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前梯队于九月初出发，由段缄三、张佃一、訾端林和县区主干三十余人乘火车直达南昌。在南昌住了七天又转乘汽车到达了湖南省会长沙，在长沙住了十天，并在十月一日参加了隆重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接着我们步行到了湘潭，住在了西郊赖家大屋。后梯队由沈廷梅同志带领，从九江乘船经武汉到达湘潭。前后梯队会合后，驻扎在湘潭街里。在此我们进行了轻装，并动员一部分老、弱和妇女同志暂留在湘潭。于十月底步行前进，经雪峰山、藏江，进入贵州的玉屏县到达三穗县。在三穗县工作一个月后，镇远地委通知我们三中队到铜仁地委重新分配工作。到达铜仁后，三中队的干部又一分为二，由沈廷梅同志带领我们接收思南县，张佃一同志带领一部分同志接收印江县。因江口县保安队叛乱，在铜仁住了半个多月，于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接收西五县的同志一道从铜仁出发。绕道经岭巩、石仟县，于二十二日进入思南县城。

七、解放思南

我们进入思南之前，就由地下党组织的黔东北纵队和思

南工作团接管，经过几天的筹备工作后，于二月一日，在县政府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新政府成立。先仲虞（黔东纵队司令员）任县长，沈廷梅任政委，朱亚江为团长和副政委。县政府设民政科，科长齐振邦，财粮科长刘洪山、工商科长高勤斋，公安局长张兴鲁，银行行长谭刚，税务科长岳发泉，贸易组张金庆，其他如秘书科，教育科均是黔东北纵队和工作团的同志担任。黔东北纵队（这支部队多系伪乡武装收编组成）改为县大队，由辛衍英任副大队长。沈廷梅同志任县委书记，朱亚江任县委副书记(不久病故)，未到职组织部王俗云、宣传部李吉民，办公室刘庆超任主任，县共青组团于明传任书记，杨庆林任秘书。

解放前，思南县设一个区十九个乡镇。新政府成立后，暂设七个区。一区区长郑惠彬，二区区长李增成，三区区长高光悦，四区区长王炳晨，五区区长张连河，六区区长×××，七区区长李志勋。

一九五〇年元月底，我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十六军一三八团到达思南驻防。一三八团一营留在贵阳。三营和机枪连住沿河县，一个连到德江，思南团部，一个连和在县直属部门抽调了一些干部加强我们三。四、六、七区的工作。

土匪暴乱。在三月初的赶场（赶集）一天，以国民党乡长周光荣、陈古桐为首的打了文家店，当时杀死一三八团一个连指导员，一个当地民主人士（六区副区长）和一个税收员，接着国民党乡长秦明善打了五区，抗联主任葛志恒和江西来的熊同志不幸牺牲。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乡长白朝珍为首的攻打我七区，以李志勋区长带领十二人打了一天一夜，土匪用火攻烧了区政府，在敌众我寡，又无支援的情况

下，第二天黄昏突围时，全部牺牲。三月二十六日，惯匪大老花、小老花攻打六区（唐头），闵庆安同志发觉后，带领全区七名同志突围出来，一三八团一个连在文家店剿匪，派了一个班送物到县城，路过六区被土匪包围在一个山头上。从上午一直打到天黑，终因弹尽无援，我方十三位同志不幸全部牺牲。三月三十日，匪首程刚，趁赶场（赶集）之际攻打我四区（许家坝），当时，刘庆超同志在四区，他和王炳晨同志带领区部分同志冲了出来。组织委员陆宗业、通讯员夏金垦和部队的一个排长牺牲。（牺牲在大街上）在这段时间，县大队三个中队四百余人，三中队长刘仁喜（乡长）带领全队进行了叛乱，其余两个中队也逃跑了一部分。

这次叛乱，完全是被俘国民党军队勾结特务、原伪保武装、恶霸地主和惯匪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

为集中力量剿匪，省委指示：铜仁地区西五县（思南、印江、德江、石仟、沿河）撤到东四县（江口、铜仁、松桃、玉屏），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集中思南县开始转移。石仟县四月五日被土匪包围，武大觉同志带领本县干部已突围到铜仁。四月七日，印江保安队叛变，张佃一同志带领全部人员到达思南。因印江是转移到铜仁的必经之路。为了安全转移，一三八团派孙占祥同志带一个连和印江县的全体同志及时返回，重新占领了印江县城。一三八团三营从沿河到思南后，才知沿河从半路上直达印江。思南、德江两县，傍晚从思南出发，夜十一点到了印江。八日一早，四县从印江出发，当天下午到达江口县闵孝区，九日至江口县城。

我们在江口县帮助工作两个月，于七月上旬返回思南县。这时，我五兵团十六军四十六师丁师长住在思南指挥剿

匪，为了配合部队剿匪，开展了全面的组织发动工作。县委调刘庆超到六区任区长，杨庆林调十区任区委副书记，从三区调李玉岭到十区任区长，其他区长，一区郑惠彬、二区李增成、三区高光悦、四区王炳晨、五区张连河、七区单用华、八区杨培勤、九区闵庆安。十区是区委书记兼区长。不久，先仲虞调西南局革大学习，张角维任县长(师作战科长)。九月西南局派部队来贵州剿匪，九十一团来到思南县围剿土匪一个多月，除少数散匪外，股匪被我部队基本剿净。随后，全县展开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恢复生产等工作。

一九八八年七月于贵阳

从鲁西北到大西南

——原聊阳县干部随刘邓大军南下西进纪实

张武云　杜竹林　柴　龙　王凤瑞
张茅岭　吴荣坦　袁瑞润　刘月卿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对我们这些从鲁西北的聊阳县南下、西进的全体同志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这支六十多人的干部队伍，就离开家乡，跟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参加接管新区的工作。

至今已过去三十九个年头。三十九年，仅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然而，对人的一生来说，对我们这些当时还有"虎气"的青年（少数人已步入壮年）来说，却走过了人生的一大半时间之多。如今，大多数同志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回忆我们走过的路，看看现在，想想将来，我们的心潮澎湃，我们的思绪万千！

在这几十年的历程中，我们之中有十多位战友在贵州的剿匪斗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眠在祖国大西南的这块土地上。有十多位同志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过早的与世长辞。还有几位同志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含冤而死。据统计，尚健在的有三十八位同志，其中二十五位同志已经离休，五位同志退居二线，三位同志还任职工作着。

在随军南下、西进四十周年将要来临之际，回顾一下这

几十年的战斗历程，我们想，还是很有意义的。

组织南下干部

打开《毛泽东选集》第1350页，有这样一段话："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致五千万到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决定抽调3960名干部随军南下，组成南下支队，其中六地委（即聊城地委）抽调干勤人员六百二十多人组成南下支队，六大队。中共聊阳县委组成接管一个县的干部班子。南下干部的条件：年青、身体好，有一定政治和文化水平，有独立工作的能力。组织南下干部的方法，是深入动员，自愿报名，组织批准。消息一传出，全县广大干部立即沸腾起来，报名的，写申请的，向党表决心的络绎不绝。有的同志怕批不准南下，找领导倾诉衷情。有的同志怕家庭不同意，造成不应有的麻烦，干脆不告知家里，直到过江之后才给家写信声明已南下。县委经过对每一报名南下干部的反复研究，确定了南下干部的名单，报经地委批准。当时，县委有六位委员，县委书记李健民调地委，和地委机关的同志一起南下，县委付书记沙晓鲁同志调北京工作。负责带领全县南下干部的是县委委员、民运部长杜竹林和宣传部付部长柴龙。

我们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到地委所在地聊城集中，被编为六大队第五中队。为了加强五中队的领导，大队派张武云担任中队长，杜竹林担任政治委员，柴龙协助队长、政委工

作。中队以下设班，当时担任班长的有：孙德祥、康阜。杜仲文、王凤瑞、孙瑞民、张茅岭、冯保平、裴惠民等同志。整编完后，初步进行了军事化的训练和教育；紧接着，由地委举行了欢送大会。从在聊城集中到离开聊城，整个过程大概是五天的时间。

告别家乡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的一天，（十三或十四），我们遵照南下支队六大队决定，按照行军的序列，从聊城出发，开始踏上了向江南进军的征途，告别了养育我们的鲁西北人民。

我们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有一定的政治觉悟，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但是，毕竟大多数是农民子弟，有不少的同志还是刚翻身分了土地的农民。现在，将要远离故土，离开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幼小的儿女，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南下，这是战争的需要！这是革命的需要！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再回来，会不会牺牲，这些问题不能不想，不能不考虑。“老不征北，少不征南”的古老格言，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仍有影响。今天，当大家离开自己的家乡时，离开自己的亲人时，有的同志真是“一步三回头，望望聊城的大古楼”。有的同志望一眼，再望一眼，向自己的村庄方向喊着：“家乡，再见了！”有的同志抓上一把土带着上路，说：“家乡土可治水土不服的病”。范来义同志（在余庆县已离休）是个刚翻身的农民。家有年迈的老母亲和妻子、幼儿。南下对他来说确实是一场

严峻的考验。当他告别母亲和妻、小时，母亲和妻一边抱着他的一根腿，说："你走了我们怎么过？我们怎么活？"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南下的决心。孙瑞民同志不仅自己决心南下，而且把他的弟弟孙景寅动员同来，在一九五〇年的土匪叛乱中，兄弟二人同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中队称为老大哥的炊事员邹发尧同志，南下时已年过五十岁。家里穷的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解放翻身后，他年老志坚，坚决和大家一起南下。用他的话来说是"送大家上江南"。他在一九五〇年的土匪叛乱中被土匪活埋了。这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的好同志，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第二个集结点——菏泽

从聊城到菏泽有三百多里路，我们走了四天才到。菏泽位于鲁西南，它是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所在地，当时是冀鲁豫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我们的心目中。菏泽就是"城市"，就是冀鲁豫区的"首府"。我们的宿营地是菏泽城南的晁大庄，传说这是梁山首领晁盖的家乡。我们在这里将接受进军江南前的整训。

整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党中央有关接管新区的方针政策，并着重学习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战略决策，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以及知识分子政策。在学习这一系列政策之前，为了武装大家的思想，拿出一定时间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二是军事训练。这一课对于克服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地方干部的散漫性，是极为重要的。如紧急吃饭（练五分钟吃饱），紧

急集合，学打绑腿；打背包，练习过独木桥，进行防空演习，锻炼晚上习惯性大便（避免第二天急行军时因大便掉队）等。通过紧张的军事生活，大家由不适应到适应，这就为向江南进军作好了准备。

在从菏泽出发之前，干部思想曾发生了一场小的波动。原来曾宣布冀鲁豫南下干部随刘、邓大军参加解放京、沪、杭的接管工作。上海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而杭州更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去那里接管，大家自然是很高兴。当整训快要结束时，当我们将要离开冀鲁豫南下时，上级宣布我们的任务是去接管赣东北，顿时大家的头上象泼了一瓢冷水，议论纷纷。经过上级反复动员，介绍情况，说明道理，同志们的思想很快就想通了。有的同志说得好：“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向那里。那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那里去”！二月二十八日，区党委为南下的同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区党委书记的洋复生、军区司令员刘志远代表区党委军区讲了话。徐运北、申云浦代表南下的同志也讲了话。

踏上南下的征途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四月初，我们迎着初春的阳光，迈着骄健的步伐，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从菏泽出发，经过鲁西南的定陶、曹县等地，进入陇海线上的商丘火车站。我们在这里乘上东去的火车。

我们乘坐的火车，是露天车厢。车里坐得相当拥挤，大家把各自的背包一个挨一个的平放好，然后再坐在各自的背

包上。尽管那样，大家还是非常兴奋的，歌声不断，谈笑声阵阵。由于这里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沿线的铁路遭破坏，火车走走停停；停下之后何时开，我们这些“乘客”谁也不知道。火车一停下来，上级就通知“没有命令不准下车”。因此，在火车厢里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等，那是常事。吃喝都在车上，饿了吃点炒面，渴了喝几口仅有的凉水，而且，也不敢多吃多喝，大家最怕大小便。

在火车上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我们到达了安徽省的固镇车站。由于战争的破坏，铁路中断了，我们在火车上渡过了一昼夜，下火车步行。经过两天的行军，我们到达了淮河边上的重镇蚌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民党军队惨败的景象：火车道上，沟壕内，淮河里，还可看到国民党兵的尸体。三、五一群，七、八人一伙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太太小姐们，有的身披绿军毯，有的头上裹着脏毛巾，有的互相搀扶着，有的拄着棍子艰难地沿着铁路边向北走，夕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在蚌埠稍作休整后继续前进，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合肥。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我们到达了合肥市，宿营在郊区的茅家湾一带。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和体会到了祖国南方的风土人情及其生活习惯。在合肥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继续学习接管新区的政策，二是检查总结自南下以来执行纪律的情况，三是了解群众的生活及其风土人情。记得这里的老百姓把牛屎贴在墙上，晒干后作燃料煮饭，我们北方来的人不习惯这种生活。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大家就到山上拣松壳和松毛做饭。时置青黄不接，吃菜特别困难，我们就到田边地埂上找香椿树摘椿芽吃（当地老百姓

不吃这东西，看我们吃，笑我们有点“野”），到小麦地里拔野韭菜。虽然生活比较苦，但当大家想到解放江南人民时，再苦心里也是甜的。

艰苦的行军生活

大概是四月十一日前后，我们从合肥出发了，继续向南行进。从这里开始，没有了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乘，全靠两条腿走路了，时值南方的雨季，阴雨连绵，大雨小雨下个不停。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脚在泥中走，人在雾中行”。我们走的道路，由于战争的破坏，年久失修，满路都是黄胶泥，一步一滑，一双布鞋走不了两里路，底子就没有了。有的同志干脆赤脚走。同志们不知摔了多少跤，真正地成了“泥人”、“水人”。身外雨淋，体内流汗。又臭、又粘、又咸。这样的行军生活，过了四、五天，胜利地到达了宿营地——桐城北边的一个村子。

四月十七日，我们离开桐城继续南下。出发之前，大家接受了从合肥到桐城行军包袱重的教训，进行了轻装，有的把被子里仅有的斤多棉花抽掉，有的把棉衣的棉花抽掉，有的干脆把夹衣去掉里层变成单衣。一天急行军刚住下(可能是四月二十日)，我们奉命提前吃晚饭夜行军。这天夜里伸手不见五指，雷声震耳欲聋，倾盆大雨浇了下来。这是我们南下以来遇到最坏的一个天气，最大的一次大雨。开始大家还小跑似的行进，可是雨越来越大，路越来越难走了。我们走的是路还是田，是河沟还是平地，实在是分辨不清了。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浆里走，进三步退两

步，一个摔下去，几个跟着躺在泥浆里。据有的同志统计，那天晚上行军摔跤最多者达五十次之多，少者也有二十多次。队部的通讯员盛广和同志，他人长的矮小（大家都叫他憨八），由于他牵着驴行军，我们借着雷电的光，只见他除了戴的军帽之下的两只眼，完全成了一个泥人了，大约到深夜两点，我们才奉命找了个小村庄休息。天刚麻麻亮，我们又奉命冒雨行军，这时，大家才知道，我们这一夜的行军，绕来绕去行程只有八华里。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大家回忆起这段历程时，还感余味无穷。

团结友爱之情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别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在那战争的年代，在那数千里的南下、西进的行军中，真正的体现了出来。那时我们每天的生活公式是：起床——吃饭——行军——宿营——做晚饭吃——休息——再行军……。每天的行军是极度疲乏的，特别在急行军的时刻，只要一声令下就地休息，不管地上是泥是水还是牛屎，躺下就能呼呼入睡。我们的老宓大哥（上面提到的炊事员宓发尧同志），还练就了行着军入睡的本领。在安徽南桐城至安庆的路上，大雨下个不停，背包越走越重，同志们宁肯把自己背了数百里路的东西丢掉，也不肯把病号身上带的米袋、干粮丢掉。在那一夜行军八华里的倒霉路上，有的同志走不动了，甚至有掉队的危险，同志们就高度发扬了团结互助精神。张茅岭同志在那一夜行军中自己背着背包还左手拉着孙洪杰，右手拉着一位女同志三人齐步前进。队部的通讯员袁秀珍一个跟头栽到河沟里去了，大家借助于雷电喊他拉他。当听到他躺

在泥泞里说："你们走吧，不要管我，"大家立即跳进河沟里，你推我拉的把他托了上来。一天八、九十里路的行军，到宿营地找不到住房是平常的事。有时虽找到了住房，但相当拥挤。如中队部有一次宿营，十多个人找到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就是这十平方米房子的里边，还堆积的房东的很多东西，剩下的空地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同志们推来让去，大家宁肯自己坐着，也让别的同志休息。这个屋内有一张小单人床，同志们坚持让杜竹林、任守范夫妇休息，任守范坚决不接受同志们的照顾，在他的提议下，让两个最小的林金玉、杜保义和她夫妇二人共四人挤在这张小床上休息到天明。鞋子是行军生活中最需要、最宝贵的东西。穿"飞"了，就赤脚行军，有的脚板上打满了血泡。后来，上级就号召大家学打草鞋，但泥泞的道路，穿不多久就烂了，于是很多同志就用稻草把脚包起来。刘月卿同志临南下时没有告诉家中父老，鞋子衣服没有更换的，于肇明同志主动把自己的一身衣服，一双鞋子送给了刘月卿同志。中队领导在南下中处处以身作则。中队长张武云同志，南下干部中他的年龄最大，能走能背，耐渴、耐饿、不怕苦、不怕累。给大家以很大鼓舞。

渡江的时刻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在我们告别故乡鲁西北时，就被两种命运决战口号激励着、鼓舞着。如今，马上就要过长江了，大家的心情激动、兴奋、紧张，当然也有点害怕。

四月二十二日，大家背着湿淋淋的背包，冒雨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安庆方向进发。傍晚，我们抵达紧靠长江北岸的城市安庆北关宿营。这天行程八十多里，大家又累又饿，当各班安排住房后，就忙于做饭，大家以为不会马上过江，好好地睡个大觉再说。杜仲文同志班住在一个富户人家的房里，爱开玩笑的刘书善同志说："我们睡睡资本家的床，看看是什么味。"动作快的班，饭已做好而且开始吃，动作慢的班，饭还没煮好。就在这时，大队的紧急集合号吹响了！大家以为发生了敌情，迅速扑灭了火，丢下碗中的饭，以最快的速度跑向集合点。部队奉命跑步前进。安庆由于刚解放，社会秩序还未恢复正常；可能为防止敌人飞机空袭，全市无灯光。安庆的街道坎坷不平，加之又是降雨天气，深一脚浅一脚，有的摔倒了，爬起来再跑，有的东西跑掉了（有把水壶跑掉的，有把鞋子跑掉一只的，有把挎包跑掉的），也顾不得拣。在路边，偶而还可看到国民党兵的尸体。我们一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江边集合之后，才知道要渡江了。

同志们望着从来没有见过的长江，心潮起伏，激动万分。有的同志感叹地说："长江呀，昨夜炮火连天，今夜风平浪静。"有的同志说："在家听上年纪的人说，黄河面恶心善，长江面善心恶。"这是北方人的传说。大约零时以后，（即四月二十三日）开始上船渡江了。四月的夜晚，还有寒意，加之我们的衣服已被雨水和汗水浸透，不少同志发起抖来。可是由于长途跋涉的极度疲劳，不少同志坐在背包上就入了梦乡。江边数不清密密麻麻的船只，每支船只能容十个人左右。在船上，同志们似乎忘记了疲劳，有的唱歌，有的谈笑风声，李剑非同志风趣地说："江心的水煮茶味道最

美。”他伸手灌了一壶，很多同志也学着他灌了江心的水。杜仲文同志班有十三个人，乘一支较大一点的船，但船的中心站有一头毛驴，船到江心后，这个讨厌的家伙，老是起蹄，每当这时，江水就向船里溢，弄得大家非常紧张。同志们过江以后的那个高兴劲，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

上岸之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蒋介石军队的一片狼籍：被我军摧毁的敌军碉堡，还在冒烟；被我炸毁的战壕缺口，到处可见；那些残缺不全的各种武器，以及衣服、罐头盒子，各种生活用具，比比皆是。蒋介石鼓吹的“长江天险”，“钢铁防线”，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泡影。我们紧随作战部队前进。为了防备敌机的轰炸，上级命令必须离长江二十里以外休息做饭。我们是在至德县境内的一个村子吃的饭，也是第一次在江南吃饭。为了庆祝渡江的胜利，各个班都想法弄到了一点好吃的。杜仲文班的修宝善，还想法弄到一碗水酒让大家喝。将要进入江西省了，大家再次议论江西的风土人情以及对人的称呼，如对成年的男人女人，要称“老俵”、“老板娘”，吃饭叫“卡饭”等。

到了景德镇

过江之后，时值春末初夏，这里已不是华北大平原的景色了。生长在鲁西北的我们，处处感到新鲜好奇，真正感受到了“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的滋味。从安徽至德向江西行军的路上，我们走大路向南挺进，而国民党的败兵走小路、走田埂向北溃散。夕日那些“长官”、“太太”们的神气已在他们身上看不见了。他们三三两两走在田埂上、路边

上，蓬头散发，浑身污浊，大多数都把军帽丢掉了，偶尔有戴的，也把帽徽扯下丢了。他们拉着根木棒，有的扶着自己的老婆，满脸胡须，无精打彩，一瘸一跛，步履艰难地蠕动着。他们是被解放军遣送回家的。在马路的两边，经常看到四轮朝上的、两轮斜靠的，甚至还有冒着烟的国民党的军用卡车。我们边行军、边说笑着。有的同志询问败兵们的当时情况，他们说："大军（指解放军）的炮一响，我们就乱了套，连长官都带头逃命，哪里还敢抵抗"。这或者就是"兵败如山倒"的缩影吧。

大约走了五、六天的路程，我们从安徽的至德到了闻名中外的瓷都——景德镇。早在未到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大队的通知：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规定不准在街上买东西吃，防止国民党特务下毒。同志们虽然严格遵守了上级的规定，但思想上有些不快。那时大家身上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有些同志临南下时托亲朋好友筹借了几块大洋，也有的变卖自行车之类的东西弄到了几块大洋，大家把这几块大洋作为南下之中的应急之宝。现在也算进了大城市了，想买点东西吃都不准，思想上是有意见的。有的讲怪话说："行军一个多月，光吃大米饭，肚子都饿扁了，想给嘴解解馋又不允许"。景德镇的街上，由于刚解放不几天，行走之人寥寥无几。然而还是有为数不多的小饭馆开业，卖的是面食，大家是想吃又不敢吃，当看到面食又不能吃时，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有很多同志保持着吃面食的习惯。

在景德镇住了两天，主要为接管工作从思想上作好准备，也为了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不少同志利用这短暂时间

接近群众，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了解群众的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在班里作了汇报。

接管临川县

五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离开了景德镇。和往常一样，离开前各班派代表检查了群众纪律，看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损坏的赔偿了没有，院子扫干净了没有，水缸打满了没有等。在检查过程中，出了一个小小插曲。原来队部的一个通讯员用一块大洋镶了一个金牙，他一吃粘的东西就掉了下来，显然是上当受骗了。此事大家知道后，当然成了笑料，而这个同志认为是违犯纪律又有点不好意思。此事虽然没有挨批评，却成了大家行军中的笑料之一。

从景德镇出发，经过乐平、万年、贵溪，于五月十五日到达了鹰潭。贵溪县是方志敏同志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比较好，党的地下组织一直坚持斗争。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又是送茶水，又是向我们手里塞鸡蛋，我们非常受感动。有的群众握着我们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了！"其热烈场面，使我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鹰潭，我们南下支队六大队奉命组建鹰潭地委和专署，我们五中队（聊阳干部）的任务是接管临川县。地委为了加强领导，调沈廷梅同志任临川县委书记，明确张武云任县长，杜竹林任组织部长兼管宣传部的工作，柴龙任公安局长。县委、县府机关以及各区，根据我们干部的实际情况进行配备。

我们是五月二十二日到达临川的，临川是赣东北的一个大县，赣江横贯东西，县城（即现在的抚州市）有七万多人，地委决定由张金屏等同志带一个中队接管，筹建临川市。我们的任务是接管农村。干部下去之后，夜以继日地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①建立政权。公布县、区政府的成立，接管区、乡、镇政权，并限期各级旧职人员报到。②收缴枪枝。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就收缴了满满的一屋子枪枝，我们干部都武装起来了。③向富户借粮。为了保证大军过境的供给，新区征收公粮的条例尚未制定，权宜之计就是向地主、富户借粮。④做好统战工作。临川是当时三野政委饶漱石的家乡，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召开上层人士座谈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我们利用上层人士，把县青年党头子李星桥，县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张之楚动员了出来。另外，我还在恢复工商业、维持社会治安，救济灾民（这一年全县不少地方出现水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作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以毛主席、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为锐利武器。

在临川开展接管工作不久，有的乡已经出现了土匪扰乱。一天下午，温泉区青云乡（饶漱石家乡）来人报告，说有一小股土匪在抢东西。经研究由区长张茅岭带领于肇明、修保善、刘月卿等去追剿土匪。他们跑步到青云乡，并追出土匪二、三里路。

正当我们紧张而又顺利工作的时候，一天鹰潭军分区政委袁子清匆匆来到临川，传达赣东北区党委指示：把临川移交给随四野南下的干部。大家对这一决定既感到突然，又有

留恋之情，认为从华北到江南，风风雨雨，艰苦行军三个月，刚安下又要走，实在是思想弯子一时转不过来，但共产党人有铁的纪律，绝对服从，没有价钱可讲，于是交待了工作，很快告别了临川人民。

参加接管东乡县

六月五日，我们原鄱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在杜竹林同志的带领下，根据地委指示，参加东乡县的接管工作。原来，我们这个县的干部，由于工作地区的变动，县委领导班子及其主要干部也给拆散了。县委书记沈廷梅、县长张武云、公安局长柴龙、民政科长李剑非等调地委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的参加东乡县的接管工作。原接管东乡县的干部很少，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根本顾不过来。我们的到达，东乡县委书记姚传德，县长于振东非常高兴。杜竹林同志仍任县委组织部长。我们这些干部除了充实县委、县府机关外，并由孙瑞民、王凤瑞、杜仲文为区委书记，接管三个区的工作。在东乡县期间，我们经历的几项工作是：

第一，征收公粮，应急大军过境，这是当时工作的中心。东乡县位于浙赣线上，我军过境日夜不停。开始时往东（福建）进军，继后向西（大西南）进军，因此，这个县的支前任务特别重，特别是区，全力以赴抓粮食，保证部队过境的供给。比如小璜乡（舒同同志的家乡），共有七个保，供应部队最紧张时，一天供应过大米四万斤。全县干部由于筹借粮食有成效，保证了部队的供给。

第二，紧紧抓住统战工作。舒同同志是华东局的宣传部

长，他在东乡有一定影响。我们到东乡后，舒同曾给东乡县委写有一封长信，介绍了东乡的情况以及上层人士的情况。舒同本人也与一些人有信函联系，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开展工作非常有利。比如我们到东乡不久，很多人到县委来访，有的是上层人物，有的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小璜区的余哲，据他说与舒同有亲戚关系。他靠近我们，并协助我们搞了不少工作。不久，与他有矛盾的人向他老婆打了黑枪（击中前胸，没有死），县委知道后，亲自派人从小璜区把他老婆接到县里治疗，在上层人士中起到很大影响。

第三，办干校吸收知识分子。遵照地委指示，我们六月八日在东乡中学办起了赣东北干部学校东乡分校。学校招收对象是：①小学教员；②失学的大中学学生；③流亡学生。共招收学生五百多人，杜竹林兼任校长，下设三个班，各配政治指导员一名。学习的时间两个月，学习的内容是时事、政治、形势以及新区的政策。办学校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为东乡以及西进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批知识分子和我们西进的共有六十一名，为在贵州接管余庆、锦屏、三穗等县发挥很好的作用。

在东乡县工作的四个多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乡人民的热情好客，老苏区人民对党、对政府、对军队的无限信任和爱戴，各界人士支援解放大西南的实际行动，每当想起这一切，一幕一幕地重现在我们的脑海。

接受西进

正当我们的工作根据上级党委部署顺利进行的时候，于

八月中旬县委接到了地委的通知，要我们向四野的同志移交工作，到区党委所在地上饶报到，准备随二野五兵团向西南进军。这再一次给我们刚“安下家”来工作的思想以冲击。

我们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到达上饶的，宿营地是离上饶十多里路的灵溪镇老虎坪村。上饶有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地方。我们将在这里进行短暂的整风学习，为向西南进军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贵州，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贵州情况如何，贵州处在祖国西南的什么位置，对我们这些不懂中国地理知识的人来说，简直是无从谈起。在北方时，我们只知道“云南贵州晃荡县”，离我们很远很远。又知道贵州古时候是充军的地方。什么“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雨便成冬”之说，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有的还半真半假的对女同志说：“可多带些盐，免得成了白毛女”。这些传词，无形之中引起了同志们的思想波动，对来贵州产生了一种怕苦和恐惧心理。这个思想弯子比在菏泽宣布不去京、沪、杭时大得多。面对这一情况，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开大会、小会进行思想动员，组织大家反复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件，进行形势教育，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同时，我们中队采取开大会树典型的办法，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控诉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罪行，回忆翻身作了主人，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情景。杜仲文、王凤瑞、孙瑞民、孙建申、范来义等都在大会上发了言，各班班长代表各班表了决心，同志们情绪高涨。这些道理，这种作法，现在看来都是老生常谈，甚至很多人不愿

听，可是在战争年代，却是解决思想疑虑的一剂良药。大家认清了形势，思想通了，纷纷向组织向领导表决心，有的同志还检查了自己的忘本思想；愿意接受新的战斗考验，誓把革命进行到底；有的同志在大会上痛哭流涕，要求尽快的出发，早日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贵州人民。

告别赣东北——西进

九月的江西，仍然炎热难忍。由于艰苦的行军生活，加之夜以继日的接管工作，疲惫的身体难以抵御暑病的侵袭，很多同志病倒了，有的发疟疾，有的拉痢疾，有的生疥疮，别说行军，就是平常行动起来也不方便。区长刘书善同志（牺牲于锦屏），浑身疥疮，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我们看到他从来不能把两腿并起来，不少同志担心他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但困难没阻挡住他那钢铁般的意志，他说："同志们能到贵州，我也一定能到贵州"。的确困难没有挡住我们西进的决心。

我们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乘上上饶至南昌方面的列车（当然是货车不是客车）出发的。火车行至向塘车站，我们下了车，并整理好队容，步行穿过南昌市区。南昌，是人民军队的诞生地。早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早在解放区读小学课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八·一》南昌起义这个震惊中外的英雄创举。如今我们来到了这里，当我们路过刚解放不久的广场时，多么希望瞻仰一下她的旧址，然而，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停留，我们必须一刻不停的行军。我们很快乘上北去的火车向九江方向进发。可是火车出南昌站不远，路就不通了。于是我们又改坐木船经过一天的

颠簸，穿过鄱阳湖的一侧，天黑才到九江。在九江住了将近一天，我们眼望庐山，云海茫茫，大雾遮天，看不见庐山真面目。有的同志感叹，有的同志惋惜，有的同志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回来逛逛的。"果然，我们这些步入老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战友们，有不少同志已游览了庐山，实现了当年的夙愿。

九月三十日，我们转乘一艘货船从九江逆水而上，这天晚上，我们都被分配在船的底仓，大家拥挤在船底层的煤仓之间。由于乘船人超过了仓的容量，大家紧紧的挤在一起，同志之间你坐着我的腿，我靠着你的背。一个行军煮饭的锅，把背包放在锅里，上面竟坐着徐法生、杜保义、林金玉、杜竹林四个人。仓内的闷热，空气的污浊，个个挤得汗流夹背，转不得身，透不过气。很多同志叫喊："支持不住了，还不如步行。"有的同志晕过去了，大家便把他从人群的头顶上托转出去。第二天，有的同志转到甲板上，天公又不作美，下起了滂沱大雨，大家开玩笑的说：先当了个"闷葫芦"，后当了个"落汤鸡。"经过两夜一天的航行，十月一日的黎明，船到了武汉码头。大家下船后，互相观看"尊容"，个个像个"煤黑子"，不由得捧腹大笑。大家在江边洗了洗手和脸，背上背包，整队上岸，步入武昌大街。这天是我们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武昌的大街上红旗如海人如潮，一眼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秧歌大队一队又一队，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喊成一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行军在游行队伍的边上，思绪万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的热泪夺眶而出。十多年的戎马生活，打日本、斗蒋帮，以及正在进行的向大西南进军，不就是为了这一

天的到来吗？！这一天终于到了。

继续西进

在武昌休整了十多天，没想到能在整训学习的间隙（大概是等船的原因）看一看大武汉。武汉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之一，“紧走慢走，一天出不了汉口”，早就听人们过去这样形容武汉三镇。出于好奇心，有的同志竟把武昌从这头跑到那一头。身上带有两块大洋的同志，还到饭馆找到北方人爱吃的面食。

在武昌，我们补充了食盐之类的物资，还为大家发了棉衣和胶鞋。胶鞋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捐献给向大西南进军的同志们的。穿胶鞋行军，对我们来说，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据了解，我们聊阳县的六十多位南下的同志，只有一位穿过胶鞋，这就是刘书善同志，因他青少年时代去东北沈阳当劳工，在那里用血汗钱买的。南下、西进中，虽然鞋帮早就“飞”了，但仍用带子捆在脚下行军，有时还要夸他这双“千疮百孔”的鞋为他立下的“汗马功劳”呢。现在大家都有了行军的胶鞋，谁不从内心里感谢这位陈老先生呢！

我们是在十月十二日乘轮船离开武昌，继续沿着长江逆水而上，船到岳阳后，因风大不能马上渡过洞庭湖，只好暂时住下，等风稍停过洞庭湖。在岳阳的两天，我们中队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两个通讯员乘机逃跑了。这件事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于是利用一天的时间进行了学习和短暂的整顿，加强了思想和纪律的教育。后来这两个人逃回去后都当

了农民，其中一个给供销社收破烂，他们非常后悔当时无知。两天之后，我们乘船穿过洞庭湖，经过湘阴、长沙，到达了了毛主席的故乡湘潭。从此，我们结束了坐火车和乘船，改为徒步行军了。

女同志个个是好样的

在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应把我县南下的女同志记上几笔。我们聊阳县南下的女同志是：吴荣坦、靳向纯、任守范、李子平、李耘平、刘秀英。我们毫不夸张的说："这几位女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她们不怕苦、不怕累，和男同志一样背背包，有的胜过男同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任守范同志，她是唯一的一位和男同志一样行军走完全过程的，在行军的过程中，她没有掉过一次队，没有给别人添过一点麻烦。帮助体弱和年幼的同志背行李，是她的常事，每到宿营地，她抢着干重活、赃活。借铺板、烧洗脚水、做饭菜样样抢在头里。每次出发前，又是她争着给老乡挑水、扫院子，帮助别人打背包，归还群众的东西。大家称她是"男小子"、"铁打的"。她的爱人杜竹林同志因腿负过伤，行军比别人付出的劳动大得多，过江之后，每天行军百里，他的东西几乎全部由任守范背着。年龄最小的杜保义常常得到任守范的帮助。最不会使人忘记的是，在行军到达湘江一个叫竹高塘的村子时，阴雨连绵，坡陡路滑，到了宿营地之后，谁也不想再动了。可是既没有起码的铺草，又没有点灯的油，天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怎么办呢？任守范同志一声不响地自己摸着黑路，到半里之外的一个农户家买回

了灯油，有灯了，又为大家烧洗脚水，等同志们睡下之后，她自己才去休息。在行军将要结束时，大家一致评她为“行军模范”。到湘潭之后，上级决定加快行军速度，紧跟作战部队，把全部女同志和病号暂留湘潭。任守范很不服气，她以质问的口气问她爱人，“你竹林作前梯队，我走路、背背包哪一点不如你？”她说的是实话，行军中任守范胜过男子汉，是有目共睹的。

行进在湖南境内

十月二十五日左右，我们从湘潭出发了。这次我们的行军条件有了改善，特别因大家脚上穿的是胶鞋，免除了脚疼之苦。但是我们的包袱相对的比过去重了，每人除一床被外，还有一套棉衣以及米袋子、盐巴，其重量不下二十斤。经过湘乡、双峰、邵东到达邵阳，四天行程三百多里。记得一天行军到邵阳西部的一个村子宿营，大家看到一片片桔子林，果实累累。有的农民在路旁摊着出售。北方绝大多数同志没有吃过桔子，也象吃梨一样，拿起来就啃，引起了“老倭”同志的大笑，说：“真土包子，吃桔子不知道剥皮”。有的同志反唇相讥：“老倭吃西瓜放在锅里煮，也土的够呛的了”。又是一阵大笑。

湘西著名的山脉雪峰山，海拔１９３０多米，山势陡峻，云雾飘渺，传说中上下山８０里。我们必须从这座山上翻过，才能进入贵州。行军爬这样的大山，对我们来说，确实是第一次。开始，大家的劲头很大，可是爬了几里路之后，尽管喊着“加油！加油！”，却越来越没劲了。恰在这

时老天下起了瓢泼的大雨，身上的背包越来越重，脚下的道路越来越难走。泥粘、地滑、路险、饥饿，还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对我们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同志们发扬了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当队伍走到最艰险地段时，有不少同志走不动了，这时体力好的同志抢着去背背包，去背米袋子。通讯员盛广合，他个头不大，身强力壮，他折了一棵小树当扁担，挑了三个人的背包，一气走了十多里。当大家行军征服雪峰山后谈体会时说："那时身上减轻一斤，就象减了十斤，身上加重一斤，就象加重了十斤。"

到达目的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傍晚，我们到达了芷江。在这里知道了离我们的目的地——贵州很近了，也知道我们要接管的县是余庆。余庆位于贵州的什么地方？山大不大？有多少人口？你打听我，我打听你，也得不出个正确的答案。有的同志说："管它呢！反正山大坡大，我们已经作好思想准备了"。

从芷江出发，经过晃县，很快就要进入贵州境内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湘黔界"三个大字的一块石碑。过了湘黔界之后，就爬山，终于在十一月九日晚进入贵州的第一个县——玉屏县。到了，到了，终于到了，每个同志的心情都非常激动。进入贵州的第二个宿营地是镇远县的羊坪。第二天一大早（十一月十一日）离开了羊坪，走小路直插青溪镇。由于沅阳河间隔，经过渡船过河，终于在天黑的时候到达了镇远。这天正是中共镇远地委、镇远专署成立的日子。

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〇年三月，我们原聊阳县南下的干部，在贵州的黔东南，先后参加过三个县的接管工作。

首先参加了接管余庆县的工作。这是中共镇远地委在湖南的芷江就定了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们在县委书记姚传德等领导的带领下，进驻了余庆县，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作，那时担任区委书记的，仍然是在聊阳县的老区委书记：孙瑞民、杜仲文和王风瑞；区长则是冯保平、张茅岭、刘书善。县政府秘书孙德祥，民政科长康阜等。除此之外，尚有地委抽调的地专机关和其他县的部分同志。

其次参加接管锦屏县的工作。镇远地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尚有边沿的锦屏县没有干部去接管，于是决定接管余庆的原聊阳县的两个区和徐翼县的一个区接管锦屏县。当时决定的负责人是：杜仲文，孙瑞民、刘书善、梁金柱。他们十二月二十日从余庆出发，经过近半个月的行军到达锦屏。带领大家接管这个县的县委领导是张武云和彭怀德。

第三，参加三穗县的接管工作。三月中旬，国民党残余看到我锦屏力量薄弱，发动了全县大叛乱，我聊阳干部牺牲多人，最后被迫撤出。撤出的一部分同志在彭怀德、杜仲文同志的带领下，参加了接管三穗县的一部分工作。

聊阳县除参加接管以上三个县的工作之外，尚有部分同志调出参加省或市、专署的工作，他们是：李健民、柴龙、杜竹林、靳向纯、李剑非、吴荣坦、李林轩、裴惠民、李盛英等同志。

聊阳县干部作出的牺牲

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数千里，从鲁西北来到祖国大西南的贵州，亲身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行列，这在我们的一生中留下了永远值得庆幸的一页。当我们这些步入老年的战友，凑在一起谈起以往硝烟弥漫的战斗生活，谈起今天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也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怀念为解放贵州，为贵州人民翻身而英勇牺牲的同志。

锦屏县委办公室主任孙瑞民、民政科长康阜同志，在一九五〇年三月锦屏反动势力的叛乱中，经过与敌人的搏斗，英勇牺牲。

锦屏县郭寨区长刘书善，在土匪暴乱中，落入敌人魔爪之后，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最后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献出生命。

助理员刘云芝同志，在锦屏新化乡工作中，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土匪捉住，高呼"毛主席万岁"英勇就义。

助理员王登岭、干部孙景宝同志在锦屏县平察乡被敌人包围，战斗到弹尽壮烈牺牲。

一九五〇年三月，助理员郑振华同志在施秉县工作，中了敌人的伏击，光荣牺牲。

一九五〇年元月，炊事员宓发尧、警卫员汤润生跟随张武云县长赴天柱工作，在该县的邦洞中了敌人的诡计，被敌人捉到后，一起活埋在天柱县城边上。

任守范是在贵州省唯一牺牲的一名妇女干部。一九五〇

年三月二日，她在贵阳市鸡场区工作，不幸被敌人包围，尽管她身怀有孕，但是仍英勇战斗，为掩护一位女同志撤退而光荣牺牲。

……

聊阳县南下的同志，在贵州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同志竟达17%。与鲁西北其他县的南下干部比，付出的代价是最大的一个县。我们这些幸存的同志，每当谈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时，心情就非常沉重，十分怀念牺牲的战友们。

1988年6月

回忆武训县动员南下干部的情况

——县长曾广成同志带近百名干部南下

司洛路

一九四九年春节后，武训县动员了县、区干部近百人，搭配成四个区级机构，与其他县组成一个县的架子南下。武训县委是由曾广成县长带队，区委书记与党务干部负责人有孙旭涛、宋兰臣、马再林、徐明奎、许明文；区长、科长有周良元、周心万、李健华等。

当年冬，又补充动员了原来是南下干部家属的六名妇女干部南下。

组织干部南下，是革命大好形势的需要。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急需大批干部接管新解放地区。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已连成一片巩固的后方，蒋家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党中央毛主席发表了新华社元旦献词，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组织干部南下，就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进行的。

组织干部南下，是一项政治任务。一九四九年春节之前，住在临清的地委会派秘书长杨新一同志来县传达动员干部南下的政治任务，他讲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和组织干部随军南下的政治意义，强调必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完成，并提出了具

体要求：（一），把县、区所有干部统一组织搭配，分成两套班子，一套是继续作好地方工作，开展大生产运动和作好支援前线的工作；一套要支援解放军南征，组织干部南下。武训县组成四个区的随军南下班子，再与其他县搭成一个县级架子。人员要骨干与一般，党群与政权干部进行搭配；（二），确定南下的干部，要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年龄为青壮，无重大家室之累，男女皆可，一律自愿；（三），春节后动员，二月集中在地委指定地点，按上级要求出发南下；（四）县委由曾广成同志带队。

完成南下干部任务的条件是优越的：（一）、全县在一九四八年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最后完成了土地改革。经过整党。县、区党、政、群、武装，合作社等组织机构充实，该县之后的任务是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战争。当时干部认为这个县没有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全打倒了，搞社会主义是以后的事情，感到这里革命似乎已经完成，要革命就得到全国去，因而，离县南征是干部应有之义务；（二），经过一九四五年的土改和整党，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不少优秀者被安插到县、区组织机构中去，干部已满员，除留作本地工作外，具备了一部分干部南下干革命的条件；（三），土地改革之后，就为参军参战作工作规划，诱发干部南下。

过去每在一次群众运动之后，一定是动员参军参战，或动员干部外调，这次是土改彻底完成了，而属于老区的武训县完全应当动员大批干部南下。此时，干部中早有酝酿有南下的思想准备，不少人磨拳擦掌，就等着领导上动员了。

自愿报名，领导批准，是这次动员南下干部的具体方法。这个县过去有多次动员干部外调，但都为数较少，都是经过个别动员，或以区，或以部门动员完成的。这次是大批动员，所以召开了全县县、区干部进行了大会动员，轰动了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

一九四九年春节之后，为完成南下干部的这一政治任务，便在县城召开了全县的县、区干部大会，各区除一、二人留守外，均都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总结了土改和整党工作，布置了开展大生产运动，接着动员了干部南下。

动员之后，分组展开了讨论，大家在认清了大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认识到老区干部的责任和完成南下这个光荣政治任务的意义之后，便纷纷进行了报名，全县只有两名干部未报，决大多数男女干部均报了名。

县、区委根据所有报名同志，逐个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把留下与南下的干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确定，留下的干部去完成大生产运动的工作，南下的干部就回家准备，结果只有两个没去，组织上对其进行了处分，其余都按时集中南下了。组织干部南下的整个工作，可说是顺利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于南京

没有炊烟的行军

南下行军途中纪实

赵　畅

四十年前，我曾经历过一次没有炊烟的长途行军。那情景至今还完整清晰地留在脑际。

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

今天，我们冀南一大队接管益阳地区的同志，分乘六条民生公司的小火轮离开武汉，向着长江上游驶去。

每只船上挤着近二百人，每个人的行李都极简单：武器、背包和几件生活日用品，还有六斤饼干——行军中唯一的口粮。

船上汗臭熏天。在武汉停留月余，烈日炎炎，烤灸着我们的躯体，夜不能寐。如今向着更南的方向驶去了，真不知还有多热呢！

江上吹起了阵阵清风。上船不久，身上的汗便全干了。真没想到，船上竟会这么凉快。

和着清风，我吃了一顿品种单调的，也是美美的晚餐。

八月十日

昨夜月色真好。圆圆的月亮把清光洒向长江，两岸一片

朦胧，水中一片鳞光，除了机器声和涛声，什么声音也没有，我还从未在这样宁静的环境中睡过觉呢。

船上传来一阵阵粗犷的歌声。船太小了，太不自由了。甚至没有我们伸脚迈步的空间。这船上青一色的青年男子，那饱满的活力无处宣泄，于是放声歌唱，间或大声呼唤邻船的同伴。有的则随意拨弄身边的枪支，以为消遣。

八月十一日

船开得真慢。突、突、突，好半天，两岸景色依旧。船上的人开始烦燥不安起来，这要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

晚饭时间到了。饼干已回潮发软，有的还碎了。吃了几餐甜食，心里腻得慌，饼干越吃越渴，要是有一顿馒头或大米饭该多好啊！

八月十二日

轮船经城陵矶出长江，进入洞庭湖。岳阳楼历历在目。船靠了岸作短暂休息。几百个人走进街巷，买光了仅有的米粑粑。

从岳阳往南，洞庭湖越来越宽广，渐渐地，我们望不见岸了。水和天完全融成了一片。听人们说，洞庭湖刚发了大水，湘省的灾民有几百万，湖面上不时漂过木板等漂浮物。看来，我们要去的虽然是鱼米之乡，恐怕暂时还是一副烂摊子呢。

八月十三日

船过湘阴，空中突然传来飞机声。为了防止敌机空袭，领导决定白天不行船了。大家都跑上资水河堤，在树荫下舒展手脚，美美地睡了一觉。

八月十四日

下午，船到了益阳。在益阳大码头上岸时受到了益阳地下党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根据安排，我们地委工作人员住原国民党县党部旧址，益阳专署住原国民党督察专员公署旧址。

晚上，在洗去全身的征尘后，大家动手煮大米饭。五天以来，我们第一次闻到了炊烟的香味，这一餐吃得真香啊。

随冀鲁豫南下支队南下情况的回忆

高　庆　华

一九四七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近一年的敌我较量，我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我刘邓大军于七月横渡黄河，取得了鲁西南战役大捷，并于八月强渡淮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随着大别山区的大部地区相继解放，急需大批地方革命干部到新区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革命根据地。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冀鲁豫区党委积极发动，共抽调一千余人，组成了第二批南下干部支队（据有的同志回忆说对外称黄河支队）。

支队下辖大队、中队、分队。大队按专区组成，中队一般由二至三个县的南下干部组成，我们聊城和阳谷等三县编为一个中队，每个中队一般约有一百人左右，中队以下按县划为一个分队。

聊城县机关确定南下的干部有县委副书记孙世祥同志（南方人）、县委贾靖五同志，县公安局局长张宗谦同志、县司法科科长阎海云同志和我（当时任县财粮科副科长）。贾、阎二同志最后未南下，我当时在南下中队部负责供给工作。

其他南下干部都是由各区抽调的区、村干部，其中绝大多数为村干积极分子，确切人数已记忆不清，大致是二、三十人。当我们在阳谷县坡里进行“三查、三整”时，我们中队的村干积极分子都不参加整党，为了对其加强管理，组织上将我留队负责。此时临近春节，原确定春节前不行动，所以我把一部分同志放回家过年去了。不巧突接上级通知，令我们第二天出发南下。我着了慌，星夜骑马赶回聊城，请县政府立即代为电话通知。第二天，幸好回家的同志一个不少地全部归队，这时我心里也似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一夜我也吃尽了苦头，地方上的马从未见过象火龙似的军用卡车接连不断地迎面开来，因而不时地受惊，有时连人带马陷进公路两边满是积雪的沟里。三十多华里的路程折腾了一整夜，直到天明车少了才到达聊城，对此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尤其对那些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的同志，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深受感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我和贾靖五同志到达冀鲁豫行署报到，住在观县的北寨村，报到后上级就明确我们负责聊阳队的工作，并和唐立全同志一起开了会。当时正过新年，冀鲁豫行署的豫剧团连续演出了《三打祝家庄》连本戏。大概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初，当我们回到阳谷县的坡里进行整党时，不参加整党的同志住在紧靠原聊阳公路西边的薛庄。记得在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三查三整”还没有结束，头天接到上级通知，我们第二天晚上就出发南下。我们原计划从冰上跑过黄河，但当我们来到范县城南的阳集黄河边时，冰已破，正在淌凌，不得已在黄河北岸等了两三天（为了防空，白天不出屋门）。在这里我们提前过了春节，

将发的年货全部提前吃了。二月二日晚，我们在李桥渡口乘船过了黄河。当时菏泽还有敌人，鲁西南处于敌我拉锯的局面。我们过河后，绕过敌人的据点，昼宿夜行，开始向东南走，后又向西南行，于二月九日下半夜，也就是春节除夕来到了河南省曹县城西南的一个大庄子。为了不影响群众过年，我们未进入老百姓家院，全部集中在一个场院里。原准备于十日（正月初一）夜晚，在商邱以西民权之间穿过陇海铁路，可就在这天早晨，国民党王牌部队新五军已过铁路迎着我们来了，我们有的队还没来得及住进房子，未吃上早饭，就迅速从原路向回撤，连续跑了一天一夜，十一日白天才休息了一天。在撤退途中当我们转向西北黄河方向时，敌人距我们越来越近了，领导上果断决定，进行轻装减员，补足给养。一方面动员年高体弱的同志和孕妇过河回去。虽然这些同志明知我们去的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斗争很艰苦，又面临敌新五军的紧追，但他们不解放全中国、誓不返回的决心很大，动员工作是十分困难的。最后不得不采取说服动员加行政命令才将这一百多位同志强行动员回去。齐秀英同志就是因怀孕被动员回去的。另一方面，规定继续南下的同志每人携带的东西不得超过八市斤，一个个过称后，超重的部分物件全部交村长就地保存，大家毫无怨言，主动将超重的东西留下，实际上就是丢掉。有的同志带的革命书籍比较多，村长不敢收存，只得忍痛烧毁。另外，还规定每人各带五天的食物（三天熟食，两天生食），从大队到分队的骡马一律不许驮私人物件，只许驮粮食和供伤病员急用。

当晚，动员了一批民工和四轮太平车，送回去的同志向西北黄河方向撤退。继续南下的大队则向东南挺进，连续三

夜急行军，每夜都行走一百多华里。这时正是阴历正月初，没有月亮，又阴天，行军中后边的同志稍慢一些就看不到前边的同志，为防止掉队失掉联系，我们每人在背包上扎上一块白布显示目标。在行军中不是跑步就是原地停下来（因过桥或遇有其他障碍）跑起来一身汗，停下来冻的打颤。第三夜拂晓前，来到了湖西地区（三分区），赶上了向大别山护送军用物资的我主力部队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这时，我们已疲惫不堪，但仍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由于遇到了主力部队，我们才得以休整。在行进中，两个纵队轮流阻击敌人或在前带着我们前进，就这样，我们在砀山以西虞城附近穿过了陇海铁路，由先头部队十一纵队的三十一旅于二月二十一日打下了亳县城，我们当夜在亳县城下过了涡河。

我们和主力部队一道行军，大大地增强了安全感，不再象单独行军时那样不敢靠近村庄、不敢大声说话，不许明火吸烟。由于我们人数多而又集中，特别是进入敌占灾区后，粮食更难筹了，有的队未按支队规定带足粮食，各大队、中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发扬风格，相互支持，把各自的粮食拿出来互相调济使用。

大概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了豫皖苏区党委活动地区　　安徽省太和县境内。这时，大别山区的形势出现了于我不利的变化，再进去更加困难了，而敌人追击着我们，为此，上级决定我们就地分配，并于当晚将支队化整为零，分送到各地委。唐立全同志和我带一部分同志到了六地委；张宗谦同志带一部分同志去了豫东的项城县（可能是二地委）；孙世祥同志分到什么地方始终未打听到

下落。聊城县的其他同志很可能随张宗谦同志或唐立全同志去了。

六地委很快也把我们分了下去，我被分配到阚町县，和怀远县财政科长邵云同志一道带着阚町、风台、怀远三县的财政干部十多人，沿途一区转一区地护送去各县报到。因我们来自老区和部队，而且大都有枪，当我们路经阚町县佛镇区时，区里要我们多留几天，协助他们夜间去搜捕潜伏的匪特和土顽。我们跑了一夜，回来住在一个很小的村上（便于封锁警戒），因筹不到粮，直到下午三、四点钟仍未吃上饭。后经我们耐心的宣传，反复讲明凡是群众能吃的我们都能吃，群众见我们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就偷偷借给我们鱼网，要我们到伪乡公所的鱼塘打鱼充饥。打的鱼既多又大，我们还给群众送去不少。可能由于太饿了，虽然是清水煮白鱼，但我觉得比任何东西都好吃，这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宣传群众，即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只有同群众同甘共苦，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我们到达阚町县委报到。该县建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位于颍河以北，阜（阳）蚌（埠）公路以南，风（台）蒙（城）公路以西的三角地区，是阜阳、涡阳、蒙城、风台、颍上五县的结合部，西淝河横贯其中。因境内有阚町大集镇而得名。现已改名为利辛县，属阜阳专区。

我们同来的四人加上县大队的胡月卿同志（现在南京），组成县财政科，我任科长。周广益同志为税务员，专管阚町集的税收工作，他机智勇敢，善于做群众工作，很快就团结并依靠群众打开了局面。一次他被敌人包围，敌人一听是北

方口音的人就要抓起来，他即装哑巴，背着一捆葱在群众的掩护下蒙过了敌人的岗卡，安全脱险。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地区不断扩大。一九四八年四月，地委决定成立颍上县（颍北），并确定县委副书记杨金辉同志（已牺牲）、副县长吕新杨同志（现在哈尔滨）和我过淝河去开辟该县的工作，我仍为财政科长。该县位于西淝河和济阳以南，颍河和淮河以北，是凤台县的淝西和颍上县的颍北的结合部，与正阳关一河之隔，是第六分区最南端的县。开始几个月形势还比较好，后来发生了变化，因该县县城解放比较晚（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早解放的其他县城溃散的敌人，大部溃逃到了该县城，国民党新编七十四师（师管区）也由阜阳撤退到正阳关。他们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妄图牵制我们对淮海战场的支前工作，指挥其左右县城的敌人同时行动，疯狂地对我们偷袭合围。斗争越到后来越艰苦。加之我们刚到不久，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一些地富分子倾向国民党，当我们发现敌情时，往往敌人已到了村前。地理环境是背水作战，淝、济两河又是雨季，河面宽，枯水时淤泥深的淤泥河（蒋介石花园口掘堤放水造成），因而对我们的斗争很不利。有一次，我们被迫突围，冒险过济河时，我因不熟悉情况，没有经验，见水很浅就大步向前走，被陷进淤泥，幸亏通讯员黄振昆同志及时提醒我"趴下"，我挣脱了外衣匍匐爬行，才得以脱险。我们的警卫连连长就是因陷进淤泥而被俘的。

颍上县盛产小麦、大豆、高粱和部分大米，农副产品较多，离敌占大城市较近，特别是水上交通比较方便，向蚌埠及宁、沪等敌占城市贩运生猪、肉牛、大豆、芝麻、植物油

等农副特产品经商的较多。我们通过税收工作，让商人找保、立据，并安排他们用应交的税款从敌占城市给我们带回了大批药品、医疗用具、黄绿染料、办公用纸、油墨、腊纸、纱布等军需物资，当然商人们也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合法利润，从而为支援淮海前线贡献了一份力量。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颍上县城解放，不久和颍南的颍阜县合并。组织决定县委书记王新成同志（现在西安）和我随军渡江南下。到阜阳地委报到后，确定我负责专区南下干部队的供给工作，并令我和专区中学校长王绍艮同志（现在杭州美术学院）立即骑马前去田家庵子（现淮南市），为后边乘船去大队的同志准备食宿和去合肥的火车票。到了田家庵子使我有机会照了相，写信寄回家中，家乡才知道我还活着。

我和王绍艮及两名通讯员，一名饲养员共五人，带着五匹马，在从阜阳出发至颍上的公路上，突遭冰雹大雨，匆忙赶到一个小村子上，这里停满了向前方送送军用物资的螺马大车队，村子里住满了人，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小草屋避雨，衣服全都湿透了，又冷又饿。这时，一位老村干部见此情景，立即设法为我们送来了用干山芋叶煮的杂面条，特别还有专为我们祛寒搅拌好的芥末，劝我们多喝热汤，充饥祛寒。当年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爱护，体现了军民鱼水情谊，使我至今难忘。

到合肥集中后，合编为金陵支队，打乱了原来按地区编队的界限，改按财经、政法、教卫、新闻、农业等编成专业大队，我编在第一大队（即财经大队），在大队部任供给科

长，大队长为胥广义同志（现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我随军参加了渡江战役，进入南京至今。

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

于南京

党的统战工作

记忆中的父亲

刘觉民　代　流　丁　甲
刘　桐　王　策　苏　坡

父亲名刘文烈，字建候，生于一八七二年，终年七十三岁。父亲是个无党派人士，他曾一度很赞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抗日后又对共产党颇为赞赏，但他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仅仅是个具有民族意识、爱国主义思想的民主人士。在他晚年期间甘愿倾家荡产，冒着生命危险，承受着各方面的攻击和非议，举家迁入抗日根据地，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在鲁西北专区参议室任参议，为抗日民主争取伪顽，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病逝在抗日根据地。父亲的后半生值得我们回忆、缅怀。

由于父亲和母亲结婚较晚，母亲是续弦，父亲比母亲大十九岁，虽然父亲已年迈，我们一群儿女却很年幼，因而对父亲的记忆大都从移居聊城后开始。

至于父亲一生的经历，我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只是从母亲、亲友口中得知一点梗概。据说父亲的童年时代，家庭生活尚称小康，父亲有六个兄弟，他是老五，与几个长兄弟读过几年私塾，后因连年灾荒，随着兄弟的成长，生儿育女，家景慢慢败落。到父亲成年时，家里人口众多，生活已无法维持，祖父即将他们赶出家门，自谋出路。父亲

一路讨饭，一路当小工，奔到天津在小饭馆里当过跑堂的，也随别人做过小摊贩。三伯父首先当上了警察，又帮助父亲补上了一名警察，随着三伯父的提升，同时提携了父亲，从天津调往南京，由警察当上了巡长，在南京曾当过某分区的警察署长。一九二五年前后，因军阀混战，时局动乱，心怀疑惧，且已年近花甲，即告老还乡，在聊城城里当了一名愚公，用他多年的积蓄买了三十亩地，因哥哥常年患肺病，大姐早嫁，其他几个姐妹年幼，土地交舅舅代种，四六分成，全家参加革命后，土地、房产都一无所有了。

当我们有了记忆之后，对父亲的印象还是深刻、亲切、形象也是高大的。

一、关心时局

父亲闲住在家却很关心聊城的市政建设，常看他写些有关减免税收、学校风化、修筑桥梁等有关公益的条呈，文字多系文言文，我们小姐妹偷偷地看看，但不完全懂。

“九·一八”事变后，三女儿正在读高小，学生基于爱国热忱，各学校联合举办宣传抗日的讲演会，父亲亲自代女儿起草讲稿，题为：“你当头之棒喝”，大意是把中国比成一只睡狮，当局醉生梦死，群众一盘散沙，日本侵华尤如当头一棒，应该猛醒，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用词用语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得到教师、同学的赞赏，赢得一片掌声，从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灌输了爱国主义思想，也为后来我们投笔从戎打下了基础。

三女儿在高小读书时参加县里的田径赛得了一部三民主义全书的奖品，我们女孩子们从未翻阅过，父亲戴着老花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事后他表示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并

对孙中山先生早逝深表惋惜。

一九三七年夏，聊城地区连下了四十多天大雨，造成洪水泛滥，先是家家户户派人冒雨去护堤，当时哥哥已病死，我们几个小姐妹有的年幼，有的上学，父亲虽是六十五岁高龄，仍积极冒雨昼夜参加护堤值勤。当洪水决堤的那天，父亲还在堤上值勤，开始水声象蚊蝇成群发出的声音，接着水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象倾盆大雨的水泄声。父亲气喘吁吁，脸色苍白的跑回家，报告了决堤的坏消息，全城都惶恐动乱起来，携儿携女，背着包袱行李，奔上城墙露宿。大水长势很快，第二天水位已接近城垛口，水浪翻卷着木板、小树、破烂的木器家俱及淹死的尸体，使劲向城墙上冲击。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灾难中，聊城专员范筑先亲自指挥抢救，疏导水源，措施得力，转危为安，保住了全城的生命财产。关于如何堵塞城墙的涵洞，防止水泄入城问题，父亲在危急中也曾写过建议的条呈，并讲给我们听过，至于具体办法是否被采纳，就不得而知了。

二、思想解放、作风民主

父亲封建思想很少，他是个无神论者，记得哥哥病重时，缺医少药，母亲到处求卦问卜，逐鬼避邪，父亲不仅不信，反而对母亲进行斥责。每逢过年过节，母亲要拜佛上供，过旧历年要请灶王爷、门神爷、天老爷……，父亲往往带着讥笑对我们说："敬神为神在，实际上鬼神是不存在的"，父亲除了敬奉祖先时磕头朝拜外，对其他神灵一概不跪拜。

哥哥常年有病，直至病逝，父母对哥哥多加照顾是应该的，但对我们女孩们也同样关心爱抚，在十九世纪二十年

代，女孩子能上洋学堂，特别在闭塞的聊城还是很少有的，而我们家除二姐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外，其他五个小姐妹都先后入学读书。哥哥死后有的叔伯兄弟要求过继给父亲，遭到父亲坚决拒绝，族人公开嘲笑父亲“养了一群赔钱货，将来要看着你们吃光、喝光、要饭”，父亲则坚决表示“我卖房、卖地也要让女儿读书，让他们自立”。实际结果也是从我家原有三十几亩地卖到只剩了十几亩地，父亲有时也感叹“我们家象个大纱灯，外边好看里面空”。为了补助家庭生活不足，给二姐买了一架织袜机，开始经营起家庭副业来了，一直维持几个女儿读书，有的读到高中，有的读到初中或高小、初小，直到抗日战争烈火漫延到山东，学校停办为止。

刚开化的聊城，封建思想还是比较严重的，在青少年当中，特别是对女孩子们有很多所谓禁书不许看，父亲则不然，什么红楼梦、西厢记等，父亲不仅亲自买来，而且向我们推荐，称赞它语汇丰富、语言精炼，并教给我们收集生动的成语、精辟的段落，以便在写作中加以应用。

父亲和我们结下了较深厚的友谊，父亲很爱讲故事，每逢阴天下雨、冬季的夜晚、夏天院中乘凉的时候，讲过《岳飞传》、《三国演义》、《水浒》等书的片断，讲的最多的是聊斋，我们是既害怕、又爱听，特别是夜晚坐在床上听聊斋，小姐妹缩在一起挤在床上，连脚都不敢放到床沿下，生怕有只毛茸茸的大手伸出来。回想这段和父亲相处的历史，爱父亲但不怕父亲，父亲从来不打骂和训斥儿女，我们小姐妹就是在这种民主气氛里成长起来的。

父亲为人正直好打报不平，亲友间有什么委屈与冤案，

父亲总是热心的代为执笔写诉讼状，并代为奔走，直至得到合理解决，却分文不取。

平时在街上和门口买菜，虽家境并不很富裕，但父亲从不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他常说，“做小买卖的也很不容易”，这和他那段艰苦的经历不无关系。

三、民族意识

“七七”事变后，日寇进占德州、石家庄，父亲开始了焦虑。而对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深为气愤，尤其几个女孩子已开始成长为十几岁的大姑娘，父亲忧国、忧民、忧家，紧锁眉头，经常失眠，是留在城里当顺民、当亡国奴，还是流浪逃亡，父亲对形势毕竟估计不足，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消极的逃避，全家搬到沙镇西刘堂老家隐居起来。

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飞机开始轰炸聊城，进攻的炮声由远及近，敌人奸淫烧杀，国民党败兵骚扰抢掠，某些土匪抢劫绑票，农村也一片混乱。父亲开始意识到，国家危亡，没有了安乐，没有了幸福，到处是毁灭，到处是灾难，开始想给女儿们找出路，支持我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一九三八年秋，一个女儿（代流）离开学校参加抗日时，年迈的父亲从几十里路赶到聊城城里送行，痛哭流涕的说：“当国破家亡的时候，谁也不甘心当亡国奴，我要是倒退二十年，我也拿枪抗日去……”。又说：“国家、父母都不能保护你们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路靠你们自己走了……”，还说：“中国地盘这么大，如果中国人民都觉悟了，小日本吞并不了我们，古人说：‘强弓之末不穿芦，别看他们疯狂一时，最后还是要失败的……”。当时父亲具有这样的远见卓

识，确实难能可贵。

聊城失守后，我们的家乡成了敌占区，一九四〇年七月共产党开辟聊西根据地，鲁西北专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周持衡、王树人、丹彤、刘序、刘潘溪等，到家进行抗日宣传，讲解共产党的主张，父亲进一步认识到谁是坚决抗日的，应该依靠谁。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掉信心，当时形容国民党的恐日病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八”，国民党的败兵到处流窜，再加上土匪遍地，土司令如毛，农民一日数惊，东躲西藏。在这血肉横飞、枪林弹雨的年代里，到底应该跟谁走，父亲毫不犹豫地做了抉择，又送走了两个女儿（丁甲、刘桐）到革命根据地马颊河西鲁西北民运会干部训练班参加抗日工作，父亲流着眼泪嘱咐女儿好好干，并说“总算给你们找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由于我们姐妹先后参加了抗日工作，家庭安全进一步受到了威胁，处境更加恶劣了，家产被敌伪没收、抢光，城宅被敌伪被迫变卖，全家赖以生存的条件被剥夺光了，身边还有两个小女儿（王策、苏坡）和一个二女儿（觉民），汉奸齐子修派人做媒与我家做亲，宣称“如同意可让我们全家回城里享福……”，父亲被激怒了，拍着桌子说：“我绝不能把女儿嫁给汉奸！”有些好心的人劝父亲：“你这边放两个女儿，那边放两个女儿，两边都有人该多好……”，回族的一些人则说父亲“太糊涂，让女儿参加穷八路，有什么出息”，更有甚者骂到祖坟上说“女孩抛头露面，男女混杂，参加八路，丢祖上的脸，我们也跟着受害……”。父亲在各方面的压力面前，大义凛然，毫不动摇，汉奸恼羞成怒，扬言要绑架父亲，父亲又毅然送走了两个女儿（觉民、王策）

参加抗日工作，父亲则带着母亲和小妹（才十三岁）为逃避敌伪的迫害，过着东逃西躲的隐蔽生活。一九四〇年底有人捎信给父亲说，“有人给钉子里（指敌据点）写了你的黑信。”父亲即断然决定全家投奔抗日根据地，父亲当时正患腿疼不能走路，亲友用大车连夜送父亲一家赶到莘县牛旺庄，聊西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了小女儿苏坡进了抗日中学读书，委任父亲为参议室参议，当父亲得到委任的通知时，激动的两手发抖，热泪盈眶，感慨地说：“没想到我这个老头子还能为抗日做点贡献！”至此，我们全家都投入革命阵营，这是党拯救了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找到了永久的归宿。

四、父亲投身抗日后的表现

父亲参加革命后热情很高，在党的各级领导宣传教育帮助鼓舞下，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救亡运动，他善于联络一些知识分子，也能联系一般的农民群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组织上交给他争取封建反动会道门黄沙会，瓦解土匪队伍、收集枪支的工作，他都积极认真地去抓，甚至亲自出马深入虎穴到沙镇土匪王奎一的老窝去做宣传动员说服工作，家人为他安全担忧，他仍坚持前往。不管成果如何，这种不畏艰险，大义勇为的精神是可佳的。

2、动员了一些亲友子弟参加抗日，也资助过光岳楼小学老师去延安。在农村有些地痞流氓强占农民的树木、草垛等，他即帮助农民写信给当地民主政府得到适当解决，所以父亲所在的村庄发生了什么不合理的事情，群众往往说“去找刘官去”。

3、他经常讲“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实行了孙中山的三民

主义”，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专制独裁则深恶痛绝。一九四一年在莘县余庄民主政府招集宪政委员会，招集一些有名望的士绅名流座谈讨论，父亲首先发言，对国民党的黑暗，实行宪政的必要性，讲得很精辟透彻；皖南事变发生后在莘县西梁店开声讨会，他对国民党不抗日、闹磨擦、杀害革命将士等罪行满怀义愤，发言激烈、尖锐，起了带头作用。

4、一九四三年在堂邑郑家庄居住时，是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敌人采取铁壁合围、篦筛战术，疯狂地扫荡、蚕食根据地，当时都说成了“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再加上虫灾、旱灾，人民生活奇苦，靠糠、菜、树皮生活。群众整天跑敌情，躲鬼子，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说跑就跑。有的士绅名流投敌了，有的外逃了，有的躲起来不露面了，会也开不成了，可是父亲仍很乐观，在政府的优待下，吃碗小米粥，啃块冷红薯就很满足。老两口住在群众的破屋里，下雨漏水，便用油布顶着，用大盆小盆接着，但从无怨言，从不叫苦，对投身革命从不后悔，对抗日胜利从不怀疑。他常和女儿们讲：“我总算没把你们领错路”，在女儿丁甲的婚礼上他自豪地讲：“我最大的骄傲是把女儿都嫁给了共产党”。

5、父亲很关心国际局势，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认识到国际局势与中国抗日胜败密切相关，凡是女儿、同事去看望他，他首先问苏德战场的局势如何。对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都能精心阅读，继而也就能提高认识、高瞻远瞩，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也很坚定开明，支持丈夫和女儿，在生活困难中纺纱、织布、种菜自给，什么都干，她走

到哪里都积极帮助妇救会做军衣、军鞋……任劳任怨，从不叫苦，从不拖丈夫和女儿的后腿。

不幸的是在抗日胜利前夕，父亲因脑溢血病逝在冠县段庄。我们家乡仍为敌占区，不敢公开发丧，派人深夜将父亲遗体送往刘堂偷偷埋葬。

父亲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起、有伏，颇为坎坷，功过都有。但他在古稀之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甘愿倾家荡产，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各方面的非议，决心一面倒，把女儿都交给了共产党，最后他自己也走上革命道路。究其原因，除民族意识内在因素和种种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联合一致统一抗日的洪流和“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党的召唤，同时实践斗争也教育了他，认识到真正打日本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这些都是父亲毫不动摇、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的精神支柱。父亲教育了我们，我们又影响着父亲。几十年的革命历程同样锻练了母亲，文化大革命中她随我们一块被冲击，八十高龄的她仍坚信共产党，逢人便说：“这不是共产党搞的，是些坏人干的。”有些老同志去看望她，她还用这两句话去安慰别人。

父亲虽然已长眠地下，如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他的女儿除已早亡者外，还有六个女儿健在，其中五人为司局级干部，一人为处级干部，她们在革命的征途中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教导和嘱托，不管能力大小，都在党的培育下健康地成长，为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八八年七月

聊城、堂邑解放专辑

忆我军第一次围困聊城

吴　星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之前，鲁西北地区除几个日伪据点未拔除外，广大地区基本都成了我们的根据地，而罪恶滔天的伪顽匪首赵振华、郭培德，以及陷害民族抗日英雄的王金祥之流，却先后龟缩在聊城城内和日军积极地进行反共反人民，作着垂死的挣扎。当盘踞在城内的几十名日军得息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便于八月十四日拂晓乘一辆汽车逃往济南。当天一早治安军亦向济南方向撤退了。我敌工人员随即报告分区，到了傍晚时，冀南一分区副政委张希才，敌工科杨大伦，率领刚升级的新编二十四团（不足五百人），和千余名民兵，团团围住盘踞在城内的近三千名匪伪军。使敌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

围而不攻，诱敌出洞，

这是因为聊城城墙坚固，又四面环水，且我军兵力不足，又无重武器，强攻不易，只有采取围而不攻，消耗敌人的办法。我军干部战士都机智勇敢的对敌，如二连的高连长，不顾行军的疲劳，吃着晚饭就和战士商议诱敌办法。之后，随即分头找到一部分麻绳，将麻绳一根根的结起来，趁天正黑时，高连长亲自拉着绳头爬到北门外水桥边，把绳捆到水桥上的枣树头上，一边吹攻击号，打枪，一边用长绳拉树头，城内敌人都登城防守，机枪、步枪、手榴弹、炮弹

（治安军逃跑时丢下的）齐向水桥旁、城下丢、放；待敌人停火时，我军再拉树头，打枪，引敌乱打一阵，一夜不停搞了数次。到天明时，敌人看到树头是绳拉动的，便大声嚎叫起来喊："你们骗人呀！"十五号上午约十点、敌人两个连由南门突出城来，团长李善亭得息后，立即率领一个连赶上去，不足半个小时将敌人打回了城内，敌人死伤二十多人。次日城内敌伪由西门出城一个营，妄图占领住吕祖庙，在城外与我军周旋。我军以两个连的兵力与敌激战约两小时，敌人伤亡残重，又一次败退进城内。敌人妄图从北门外突，刚到水桥便被我迎击回去。

发动群众支援，政治攻心敌伪，

广大群众早已恨透了敌伪军，当我军将城内敌伪军围困后，无不喜笑颜开。为发动群众支援，政治攻心敌人，以求尽快解放聊城，我政工人员便分组活动在城周四关和村庄，展开了政治宣传工作。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把拾到治安军逃跑丢掉的枪支、弹药献了出来。共献出步抢数十支，子弹二千余发，八二迫击炮弹两大马车。在城关清查出伪区乡政分散存放的烟四大箱，酒数千斤，食油两仟多斤。并经过宣传发动，还基本摸清了匪军头目在城外的关系，为我提供情况最积极的是我敌工人员在回队中交的老朋友关系，我们再向伪军喊话展开政治攻势同时，教育发动与伪军头目有关系的亲友对敌宣传我们的政策。派一伪乡丁向城内传送"命令伪军投降信"，送信的人很机灵，用秫秸夹着信高高举起，喊着："不要打枪，我是乡丁来送信的"。送到城门，把信从门逢里传过去，便回到东门外水桥边向北拐进了小胡同，长喘一口气，大声呼喊："我是替八路军给你们送信的，你们

要打枪就打吧，我知道了当汉奸不得好死”。气坏了城门楼上的伪军。

在围城中，我军司令部住过三个地方。开始住馆驿口北头路西一小院，因当时天气闷热，指挥活动不便，只住了一天多，便搬到了双街教堂。敌人对教堂不断打冷枪，在这里住了两天，又迁到小东关路南一竹子铺内。第二天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装着买竹货在院内乱串，我保卫人员观其象个小密探，便对其进行教育，而后，小孩说出了真情：他今年十二岁，是许光五（博平伪团长）的亲戚，许派他来的，经教育后，给他一元钱，放他回去，第二天他又换装来到竹子铺，保卫人员一眼把他看穿，经研究决定，暂时不能把小探子放回，我军正在紧张的活动中，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调新编二十四团去攻打高唐县郭庄伪军郭金城带电网的小围子。

第一次围困聊城敌人，距今已四十多年了。那时，我军政人员都是昼夜的紧张工作，从不叫苦叫累，真是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了广大人民的翻身解放，成绩是很多的，现在吃力的想起这么一点，因为我当时仅是一个敌工人员。我只觉得这是一段历史，应该把它回忆记载下来，以此作为引起参加第一次围困聊城敌人的同志写出更加全面具体的史料来。

一九八七年九月

铁壁锁敌五百日　日出一朝焕光岳

——解放聊城综述

李笃才

一九四七年元旦，旭日穿破淡淡的晨雾，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新的一年开始了。就在人们欢庆新年到来的同时，聊城解放了，古老、雄伟的光岳楼，沐浴着金光灿灿的晨曦，显得格外壮丽、辉煌。人们欢呼，跳跃，喜气洋洋地庆祝古城新生。

一

欲控鲁西北，须先据聊城。聊城地处鲁西平原腹地，位于京杭运河与济（南）邯（郸）公路交汇点上。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是鲁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古以来的军事重镇。宽阔的环城湖水面环绕着四四方方的城郭，巍峨的光岳楼（俗称古楼）矗立在城区中央，由光岳楼到四门整整一里，城内面积为四平方里。四面有以特制巨砖与三合土修砌夯筑而成的高达四丈二尺的城墙。城墙外沿成曲屈结构。北门为直向重门，其余东、西、南皆为牛头门。城门之上，有门楼高耸；城墙四角，皆有一炮楼，东南为魁星楼；门楼与角楼之间又各有一小炮楼；城上外沿

为犬牙垛口，内外沿之间，两辆马车可并驾齐驱。

聊城，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抗战开始时，聊城由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将军驻守。在我党中央统战政策的正确指导下，曾一度出现范将军与我党团结合作抗战的大好局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聊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中沈鸿烈、李树春等顽固分子收买了范将军的参谋长王金祥，在敌人进攻聊城时故意拥兵不救，范筑先将军和七百守城健儿血洒疆场。铁铸一座古城，就此落入日寇手中！

范筑先将军遇难之后，鲁西北的局面日趋混乱。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王金祥为聊城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又呈报原三支队司令齐子修为保安副司令。他们背叛了范筑先将军，破坏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占据地盘，发展势力，鱼肉百姓，并指令他们的部下公开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共同反共反人民。各地的封建民团和会道门也乘机而起，形成了“敌、伪、顽、会、匪五鬼闹中华”的混乱局面。

在局势严峻，人心惶惶之际，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几个支队傲然挺立，顶住了逆流。为了坚持抗战，建设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五支队编入八路军先遣抗日游击纵队，十支队与六支队合编成筑先抗日游击纵队。这两支纵队转战南北，驰骋疆场，坚持了鲁西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不久，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先后来到鲁西北，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坚持抗日斗争。聊城地方党组织迅速得到壮大，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装力量

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和发展起来。早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就酝酿筹建的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中共聊城县委领导和关怀下，于一九四〇年四月正式宣告成立，同时组建了抗日武装力量——县大队，并在聊城东部和南部开辟了下辖四个区的抗日根据地。同年十月，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聊城县更名为筑先县。

筑先县抗日根据地在长达八年的艰苦岁月里，虽几经兴衰，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共筑先县委、筑先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装植根于群众之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并组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力地粉碎了日、伪、顽、会、匪的进攻，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拔掉了敌人在筑先县安置的一个个据点，解放了除城里以外的所有地域，把赵振华、傅崇鲁、郭培德等汉奸围困到聊城城里。最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八年抗战之中，筑先县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据一九四五年五月统计，全县损失粮食317,111,200斤，折合法币约３１，７１１，１２０，０００元；牲口损失3000头，折合法币约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车具损失2278辆，其中大车６９８辆，小车１５８０辆，犁耙耧损失５７６０具，车犁等折合法币共约３５６，２００，０００元；房屋损失２５８００间，折合法币约７７４，０００，０００元。共计损失折合法币３３，４４１，３２０，０００元。全县被敌人杀害、因敌人制造的灾害病饿而死、流亡失踪、遭受敌人枪伤、拷打致残致病者数以万计。

聊城的国民党顽固势力王金祥、齐子修之流，在日寇侵

华的八年之中，不但不积极抗日，反与日寇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积极反共反人民。

一九三九年春，王金祥就令齐子修部在寿张攻打我八路军。同年七月十四日，他策动武装特务马泽远等，在朝城北部化庄进攻我筑先纵队，杀害了我鲁西北一地委书记张炳元同志。

一九四〇年元月，又在朝城向我挑衅，被我筑先纵队将其六个旅消灭殆尽。王带领几个残兵仓皇逃窜。

一九四〇年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齐子修为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接受任职以后将其掌握的力量编为九个旅，号称三万人（实则一万多人），肆无忌惮地搞投敌反共活动。

一九四一年齐部九旅副参谋长王克庄与该旅营长赵振华、朱耀武、傅崇鲁等带领三百人投降日寇，被编为“剿共游击第一大队”，王克庄任司令，下设一、二、三中队，赵振华、朱耀武、傅崇鲁分别任中队长。秋后全班人马即派往我筑先县东部的果子王、高囤、周庄一带修据点，就近进攻我抗日军民。

一九四二年春，齐部八旅田福州，带一、二营约六百人投敌，秋后被派往我筑先县赵庄、魏庄一带修据点，骚扰我根据地。

不久，齐部六旅的团长郭培德又率一百多人投日。

一九四三年冬，因齐日之间发生矛盾，齐部被日军扫荡以后，高耀南率七旅残部二百多人投日。

齐部几次降日人数共有一千五百余名。

以后，日寇将齐部投降的伪军统编为伪警备大队。在八

年抗战中，为虎作伥，“扫荡清剿”，烧杀抢掠，对筑先县群众骚扰最严重，对抗日根据地破坏最厉害的就是这部分伪军。

历史雄辩地证明，在聊城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垮日本侵略势力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广大爱国群众。日寇投降以后，残存在聊城城内的日伪武装力量，天经地义地应由我抗日民主政府受降。

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四日，在日寇占领下的聊城城里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我八A支部就从城外取来了日寇投降的传单，当晚在光岳楼附近及其以东以南的大街上张贴了出去。第二天天未亮，敌人发觉了，上下都惊恐得坐立不安。当时，城内还有两个班的日本兵，马上乘汽车溜到济南去了。天亮以后，满城群众都知道了，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这时城内还剩有伪治安军十七团和赵振华、傅崇鲁、郭培德的伪警备大队。几个汉奸头目战战兢兢地龟缩在屋里，经过一上午的密谋策划，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召开大会，“庆祝”日本投降，制造舆论，迷惑视听，表明他们是“曲线救国”。于是中午时分一场丑剧演出了，伪治安军十七团和赵振华、傅崇鲁、郭培德的伪警备大队集合到古楼南万寿观召开了“庆祝大会”，会后又摇着小旗上街游行。只一个中午，摇身一变，他们又成了“中央军”。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再变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慌，不安全感时时向他们袭来。天一黑，治安军的十七团

抓了部分民夫，用小车给他们推着武器，逃到济南去了。城内只剩汉奸赵振华等一伙的伪军了。

根据朱德总司令八月十日、十一日发出的关于解放区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由冀鲁豫七分区副政委张希才为总指挥，以新编二十四团（原马河支队）为主力，与筑先县县大队、区队、民兵等共二千多人，于八月十六日开始围困聊城。指挥部开始设在馆驿口，后迁至双街教堂，不久又搬至小东关。

正在这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和政府为了掠夺聊城人民的抗日胜利果实，指派早已失去兵卒，长期在高唐土顽庞长森团内住闲避难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王金祥，纠集在高唐的汉奸王兴邦、高耀南带领五百多伪军，从北城门窜进了聊城城里。因为城里的伪军，过去都是王金祥、齐子修的旧部，对王金祥的到来自然分外高兴。王金祥入城以后，立即将城里的伪军“收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四旅”，并委任赵振华为旅长，郭培德为副旅长。王金祥进城以后住进光岳楼西街路北老专署，门口挂出“山东省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和“山东省第六专区保安司令部”两个牌子。不久，国民党省党部的两个委员和省政府主席王耀武派出的两个代表一起来到聊城，在西北大操场召开会议，宣布对聊城伪军的“正式收编”，重新宣布了对王金祥的“专员”和“司令”的任命，并承认了王金祥对赵振华，郭培德的任命。

由于城内伪军力量得到了加强，又占有易守难攻的地利，一时难以攻下；更因为战争刚刚结束，全国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国际上（苏、美、英）也要求中国避免内战，国共重庆谈判正在酝酿，毛泽东同志将于八月二十八日赴重庆

与蒋介石谈判，于是我二十四团与筑先县县大队等以大局为重，围城十几天后，于八月底临时撤离了。

三

王金祥接替日寇占领聊城之后，借助地利之便，立即加强了布防。驻城残匪总称“保安四旅”旅部设一个特务连，长驻光岳楼。旅下设几个团，一团团长傅崇鲁，辖三个营九个连，团部设一个队，共一千多人；二团团长由郭培德兼任，辖三个营九个连，团部设一个队，共一千多人。另外有高唐来的王兴邦团三百多人，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其余也全是三八式，装备最好，住魁星楼。高耀南团仅有八十多人，装备最差，住警察局（今市公安局处）。还有一个江克敏，只有十几人。连同王金祥的司令部，城内匪军共约二千七百多人。

王金祥与赵振华、郭培德等密谋再三，多方策划，将全部人马作了苦心部署，妄图负隅顽抗。

重庆谈判历经十三天，签署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反动派从无和平诚意，“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颁发了内战密令，大量调动军队，准备挑起战争。

在此形势下，我晋冀鲁豫军区决定，以二纵为主，配合以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博聊战役，解放聊城和博平。

十二月下旬，住聊城城里的我八A支部书记李纯礼同志接到上级指示，要求他们迅速将城内敌人布防情况摸清并送出。李纯礼同志立即与支部成员吴金芳、赵国珍穿上伪军军装登上城墙，详细了解了敌人的布防情况。经汇总以后，由

李纯礼同志的爱人刘俊卿怀揣小孩，伴装走亲戚将情报送出，后又辗转送到军分区。

不久，我刘邓大军二纵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领四旅（旅长孔庆德）、五旅（旅长雷少康）、六旅（旅长周发田）来到聊城。同时到聊城的还有冀南一分区司令员赵健民率领的二十四团、冀中军区的十六团和冀鲁豫军区的六团、四团等部队。纵队指挥部设于东关基督教堂。参加博聊战役的部队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以二纵四旅为主力，由冀鲁豫运东军分区部队配合攻打博平；一部分以二纵五旅为主攻，六旅为助攻，冀南、冀中部队配合攻打聊城。

在誓师动员大会上，陈再道司令员说："我们奉刘邓首长的命令来解放聊城，这是我们部队的光荣。解放聊城不仅是聊城人民的愿望，我们二纵多数同志来自冀南，解放聊城也是冀南人民的嘱托。纵队司令部已下定决心，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拿下聊城，不拿下聊城不回去见冀南人民。"

誓师会上，官兵上下，热血沸腾，群情激昂，连队与连队之间纷纷写"挑战书"、"应战书"，积极要求打头阵，争上第一线，承担最艰巨的任务。

四面环水，墙高城固，敌人又戒备森严，如何攻打？

指挥部决定在四关将敌人团团包围起来，选定一个突破口，由一个团突进城去，然后再发动全面进攻。

很快我攻城部队就在四关将聊城包围起来。突破口选在城墙的西北角北侧，这里城外地面比较宽阔，往北去水面较窄，隔水便是聊堂公路，便于行动。此处是匪军一团三营七连谢春芳和一团三营九连仇志修的防地，爬城突破任务被五旅十三团争去。十三团团部设在三里[illegible]。为了完成这一任

务，团长曹丕堂以铁帽子二连为基础，组织了爬城突击队。队长是二连副连长傅凤喜，副队长是副排长朱正法。突击队由三个组组成：一、梯子组，二十五人；二、破碍组，十五人；三、手榴弹组，十人。突击队也称第一梯队，另外还有几个梯队。待第一梯队爬上城墙之后，第二、第三梯队等就在后面紧紧跟上。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刮了一整天的东北风，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已经在地上积了一尺多厚，但晚上仍然下个不停。深夜十二点钟的时候，十三团的全体指战员在曹团长亲自带领下由驻地出发了。官兵都翻穿着棉袄，白色的袄里朝外，一千多人的队伍便溶进了茫茫飞雪之中。宽阔的环城湖水面已经封冻，开始走在上面只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可是人越来越多，又架着长长的梯子，带着沉重的武器，冰层终于承受不住，开裂了，"忽啦"一下，战士们都漏进了水中，只好从深达胸部、夹杂着冰块和积雪的湖水中，一步一步向城墙泅来。

人民的期望，领导的嘱托，激励着战士们，解放聊城的热切心情，使他们忘记了寒冷。架着四丈八尺多长的梯子队，首先爬到了靠近城墙的岸上。因为天气寒冷，这时城墙上站岗的敌哨兵一个个都缩进了炮楼里，丝毫没有发觉。我梯子组的同志们架着梯子迅速向城墙靠近。不料前面出现了一条深宽各约三米多的横沟，被积雪盖着看不出来，几个战士一下掉进去了，梯子咔嚓响了一下，敌人发觉了。突击队员们连忙爬过沟去。梯子下端一边一个鸡爪钉，上端一边一个滑轮，紧挨滑轮各挂着一根长长的皮绳。开始竖梯子了，一边各两人拉住皮绳，掌着方向；几个高个扶好梯子，让滑轮贴着

墙皮；后面几个人架住梯子往上一攒，又往下一落，鸡爪钉便牢牢地插进了地里。

梯子竖好了，敌人也开始射击了。我掩护部队打响了机枪，排子枪，压住了敌人。梯子队的同志们迅速地爬上去。上到梯子顶后，该翻身上墙了，可是梯子不够长，因为城墙太高了。换了高个的，也无法翻上去。

敌人不断地打枪，扔手榴弹。曹团长命令部队撤下来。

第二天，团部迁到北坝，与城墙更接近了。

白天，整整准备了一天，梯子又接上了一丈多。重新组织了突击队，由于傅凤喜同志受了伤，队长由二连孙连长担任。因为城墙下没有什么障碍，取消了破碍组，只让一部分战士背上柴草，负责垫横沟。

晚上十点多钟，梯子竖起来了。这天，敌人早有准备，一开始就猛烈地扫射。曹团长一声命令，我掩护部队集中火力向城墙射击，靠近梯子的城墙上敌人不再射击了。

“上！”孙连长喊了一声。

副排长朱正法登上头梯。他腰里挂着十几枚手榴弹，背着两支枪，左手腕上拴着两个哨子。快到梯顶时，他抬起左手，吹一下哨子，我掩护部队开始往两边分射。朱正法正准备爬城，忽听得上面有响动，一抬头，只见几个敌人正架起一根粗大的柱子。“不好！滚木！”朱正法迅速地一扭身，转到了梯子背面。随即咔嚓一声，梯子从他脚下边被砸断了。朱正法抱着上半截梯子，摔倒地上。

敌人的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打来，还把浇上油的高粱秸捆点燃以后扔下来，城墙下面一片火光。敌人借着光亮向我们投掷手榴弹。因为距离很近，手榴弹扔下后不会马

上爆炸，我战士便拣起扔到横沟里，来不及拣的，就用脚踢。不少同志的裤子被烧着了，他们抓起地上的雪将火灭掉。

撤退的命令下达了，曹团长亲自背着伤员撤退。战士们满脸血污，分不清是你是他，背着伤员互相搀扶着，又从冰冷刺骨的湖水中泅回来。

第二天，五旅旅部奉命迁到山陕会馆，十三团团部迁到米市街。部队进行了几天休整。

一九四六年元月五日，由张庆德旅长率领的四旅一举解放了博平，奉命回到聊城，负责攻打南门。

纵队司令部发出命令：十二日晚上，四旅、五旅分别从南门、东南角同时攻城。

经过观察，南门东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段城墙塌陷了一下，四旅决定派一个团从这里爬城。十一日夜，该团从南关向突破口处架了一段浮桥。十二日晚上十点，团部组织的突击队集合在南关东面封冻的湖面上，架着梯子做好准备；炮排支起了大炮，等待团长的命令。

“打！”团长高声喊道。只听两声炮响，两发炮弹正正当当地落在了敌人的炮台上，突击队的同志们正要架梯前进，不料，大炮一响，湖面冰层被震开了。这里水深没人，敌人封锁了浮桥，突击队过不去。隔水射击距离太远，掩护部队无法发挥作用。我部队坚持到十二点多，没有攻上城墙，团长下令暂时撤下来，准备第二天重新部署。

攻打东南角城墙的仍然是五旅十三团。十一日晚上，全体指战员在团部驻地——山陕会馆召开了誓师大会。陈司令员到会并讲了话，鼓励同志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和连

续作战的精神，为解放聊城争立新功。曹团长作了动员，他说："为了消灭作恶多端的王金祥匪帮，解救城内人民，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纵队首长命令我们再次爬城，从魁星楼突进与四旅的同志们配合攻城。我们决不辜负首长对我们的信任，要坚决完成任务！"他还把一位炮团团长介绍给大家，"这位是毛主席派来的炮团团长，有名的神炮手。这次他要亲自放炮，帮助我们攻城。"

第二天，旅、团首长又仔细观察了地形，布置了作战计划。重新组织了突击队，队长由五连田连长担任。

晚上，四旅开始攻打南城墙的时候，五旅十三团也开始向魁星楼行动了。

敌人早已发觉。魁星楼是匪部王兴邦团的防地，武器装备精良，轻重机枪都有，一见我军行动，就开始扫射起来。

我突击队战士，顶着用湿棉被蒙着的方桌，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这时，"轰隆"一声巨响，我八八式野炮怒吼了。第一炮打在魁星楼上，紧跟着又是两炮，魁星楼北面的两个垛口倒塌了。接着，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射向城墙，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梯子队的同志们迅速地来到城墙下面。田连长喊了声"一、二"，高大的云梯稳稳当当地趴在了城墙上。突击队副队长朱正法第一个爬上梯子。

爬到梯顶了，朱正法一吹哨子，我火力立即向两边分射，朱正法随即向城墙上投去两颗手榴弹，趁着浓烟弥漫的当儿，他纵身一跃，爬上去了，端起美制汤姆式钢枪，向左、前、右三方扫射起来。在他的掩护下，副排长孔向宾、班长陈春田、战士王朴成……等十四位同志也都上来了。他们利用面前倒塌的砖头、土块作掩体，向敌人猛烈射击。敌

人见已有十几个人爬上城墙，吓得胆战心惊，怕我英雄战士继续爬上来，便集中火力射向我爬梯子的同志。由于子弹过于密集，未爬上来的同志有的牺牲了，有的被打伤摔下去了。田连长膝盖受了重伤，趴在地上起不来。梯子被封锁住，战士们一时上不来了。

十五位勇士和城墙上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孔向宾、王朴成等顶住北面的敌人，朱正法、陈春田等阻挡南面。北面有暗堡，南面就是魁星楼，敌人两面夹击。我勇士毫不畏惧，敌人的手榴弹扔过来，他们拾起来又还给敌人。有几枚手榴弹扔进了魁星楼，里面的敌人吃了自己的铁蛋，死的死，伤的伤。敌人上来一批，倒下一批，冲击了多次，都被击退了。赵振华、郭培德急急忙忙从南面赶来，押着他们的士兵向前冲击。他们在魁星楼西面，我勇士在魁星楼北面，战斗打成交织状态，敌人一批批倒下去，尸体摞成摞，不敢再往前冲。郭培德抡起大刀，一连砍倒了他的两个士兵，敌人又冲上来……

战斗进行到下午两点多钟，我十四位战士先后牺牲了，只剩下朱正法同志一人。他把同志们的枪支架在身体周围，把手榴弹打开盖放在身边，哪边来敌人，就往那边射击，扔手榴弹，一直坚持到三点多钟。

纵队首长正在组织力量，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坚决拿下聊城。马上，一场全面的进攻就要开始。聊城解放，旦夕可待。

正在这时，我二纵司令部接到上级命令，国共和谈已达成协议，从即日午夜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要求各部队剀切遵行。国民党的飞机也从济南飞来，散下国共和谈双方停火

的传单。

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

为了昭示大义，停火后我二纵主力撤离聊城，只留冀南、冀鲁豫军区的部队驻扎城外，监视敌人的活动。

四

停火以后，进入了国共和谈阶段。

一九四六年一月底，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成立了山东省济南执行小组（三人小组）。二月底三人小组来到聊城，我方代表是宋任穷同志，国民党代表是张叔衡，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共筑先县县委书记陶东岱和县长张侠作为地方代表参加了会议。第一次会谈于三人小组抵聊的当日晚上七点在东关基督教堂（美代表住地）举行。美国代表托病未出席。谈判开始，国民党代表张叔衡宣称，他们来聊是执行国民党政府的“统一军令”、“统一政令”，收编城里的驻军为正式国军，其他文职人员继续供职，听候调迁，并要求我方迅速修复我占区公路、桥梁等。气焰嚣张，咄咄逼人。我方代表宋任穷同志严厉驳斥了国民党代表的谬论，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城内残余伪军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对筑先县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将这些民族败类改编为中央军，无疑是和日本侵略者站到一边去了。国民党代表被驳得哑口无言。在后来的谈判中宋任穷同志又强调指出，城内这批残存伪军完全应该由我抗日民主政府受降，并提出要严惩城内伪军出城抢掠行为，制止国民党派飞机对城内伪军的接济。

美国代表提出受降问题要由重庆谈判会上解决；伪军出城抢掠为不轨行为，要停止；不许国民党再派飞机接济城内伪军。

谈判期间，筑先县抗日根据地无数受害致残群众，受害者的家属如潮水般涌来。他们带着大批控诉材料和物证，以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了赵振华、郭培德、傅崇鲁等汉奸的滔天罪行，有的还带来了被害亲人的尸骨。这时城内伪军的头目竟然出言不逊，说什么“南洋有一种野人，专门拿死人尸骨做装饰品”，一下激怒了在场的群众，纷纷拥上来要和他们算账。我方代表出于维护和谈大局，劝住了群众，这些家伙才免于挨打。他们见势不妙，一个个象丧家之犬，惊弓之鸟，吓得面如土色，在一片“打倒汉奸卖国贼！”“向汉奸卖国贼讨还血债！”的忿怒的口号声中，灰溜溜地通过人群，夹着尾巴逃往城里去了。

谈判共进行了两次，终因国民党方面的不抱诚意，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最后只草成会议记录三条：一、双方同意严格执行停战命令，停止冲突；对撤离问题，目前暂保持现状，待以后解决。二、双方同意由国共两方各派三人（有群众代表一人）共同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解决城内粮食问题。三、城内外居民经检查后可自由往来，各方不得拘捕与阻拦。但这些意见尔后城内伪军根本没有执行。会后，我方出于对城内群众的关心，与国民党方面协议：筑先县民主政府向城内运送三千斤粮食，城内伪军放出三千名老百姓。

几天以后，筑先县政府准备好了粮食，用小车推到东城门外面的水桥上。我们提出边进粮，边放人。我们运进了一千斤粮食，伪军们放出了几百个人。后来，他们见城内群众

都争着往外出，就关上城门，不再放人了。

谈判失败以后，我筑先县民主政府出于人道主义曾多次向城内匪部提出，将城内无辜居民放出，由我政府负责安置他们的生活问题。但敌人一来怕百姓出城涣散其军心，二来竟丧尽天良，把城内百姓做为向我讨价还价的筹码，榨取的对象，一律不准居民出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已过了八、九个月之久，被围困在城内的王金祥匪部陷入了极端饥饿的处境，在此期间，他们曾派小股匪队出城抢粮，均被我截获；济南国民党省政府也曾派飞机向聊城空投物资，但害怕我机枪射击，常达不到目的，不是投放到四关我军民驻地，就投放到环城湖中。于是他们又施出了另一花招，打着国际救济总署的招牌，以救济城内百姓的名义向伪军运送物资，借此大搞阴谋诡计。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下午五点多钟，在“济南执行小组”及国际救济总署十余人护送下，五辆吉普车和十二辆满载生活物资的大卡车来到了聊城。我筑先县民主政府依法予以检查。美国代表斯士如，国民党代表丛大泉企图阻挠，但没有得逞。在县长张侠亲自指挥下，查出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用毛笔楷体写给王金祥的信函一件和其他反共文件二十五件，并附有接济伪军之法币二千万元的物资清单。何思源在信中对王金祥说：阁下率部扼守聊城，已九月有余，虽军需不足，艰困接踵，犹能英勇抵御共军，坚守不懈，效忠党国之精神可钦可敬，望再接再厉，坐待良机。时下山东军区已布置就绪，不日国军即将由济北上，将由高唐进攻临清、聊城。至时共军将不战自溃。现有美国代表斯士如、我方代表丛大泉及救济总署代

表纳约翰等为阁下运去物资一批，以解燃眉之急，日后省军区将保证以飞机运送子弹及其他物资于阁下。望见信殷切款待诸代表为盼。信后并附有物资清单：白面、牛肉干、猪肉罐头、香水、香粉、胭脂等等各若干。

铁证如山，美蒋代表瞠目结舌，面面相觑。筑先县民主政府向美蒋代表提出质询，他们声称对各种文件一无所知，并当面道歉。后经我方与美蒋代表商谈，达成如下协议：一、查获之非法文件，由中共方面保存，由"执行小组"追究其来源，予携带者以严重处分。二、从查获文件中，证明何思源准备以飞机运送子弹支援城内伪军，各方认为此系破坏停战协议之举，今后如因此引起意外事件，中共概不负责。三、查获之法币二千万元之物资，从非法文件证明系何思源接济伪军之用，理应予以没收，现经各方协议，将该批物资救济城内外难民。但由于城内伪军不放城里居民领取，该批物资将交给所组织之救济委员会收存，以备将来处理。

阴谋失败了，王金祥的黄粱美梦破灭了，美、蒋代表灰溜溜地回济南去了。

何思源借救济总署之手资助王逆金祥残部企图败露之后，就不时借用飞机向城内匪军运送物资和武器弹药，支持他们苟延残喘。在此情况下，王匪不遵守二月二十六日执行小组的停战协议，不断向我城外军民骚扰袭击。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六日、七日均在夜间十二点后人们熟睡不备的时候，分别从西门、东门出动军队，进攻我城外驻军，骚扰我东关大街、米市街、小礼拜寺街、药王庙街、驴市口大街等，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居民们纷纷向当地八路军诉苦，坚决要求尽快铲除城内匪军，为他们除害。

生活在王匪屠刀下的城内二万居民更是暗无天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成为匪军们的刀下鱼，俎上肉。家中的食物，包括油盐酱醋全被抢光，无休止地忍受着饥饿的折磨。随着天气变热，瘟疫蔓延起来，病死、饿死、被迫上吊跳井自杀者与日俱增，数不胜数，尸横街头而无人过问。为了拯救城内二万居民的生命，中共筑先县委、县政府和驻聊八路军曾多次呼吁王金祥开门放人，并三次运粮到城关救济城内居民。消息传开，七百余居民跪在王金祥面前要求出城。王金祥则以“提出城者以内奸论罪”来回答请求的居民，后又用枪托木棒驱散了他们。

城内二万居民发出凄惨的呼唤，盼望共产党、八路军早日消灭王匪，击破古城，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五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军队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我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掀起了全面内战。解放区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奋起反击，伟大的解放战争开始了。

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电令：组织地方兵团，围困聊城，待机歼敌。接到命令，冀南一分区司令员白云同志与政治部副主任李大清同志率二十四团来到聊城，与冀鲁豫运东分区六团等部队将聊城团团围住。冀南二十四团团长李善亭、政委王希雍，团部设在东关教堂，负责围攻东门、南门。冀鲁豫运东分区六团团长岳舜卿，政委胡

潘生，团部设在城北念窑，负责围攻北门、西门。其一营、二营驻北关；三营驻守西门外，营部设在魏大庙。

为了防止敌人夜晚出来扰乱，驻防部队与筑先县县长张侠同志商量，又在城外周围挖了宽、深各约三米左右的封锁沟，全长三十多华里，只用了半个月就挖完了。土往外翻，沟内放上水，一可挡敌，二可做我们进攻的掩体。另外又筑起了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工事，铁壁一样将敌人围困起来。敌人出来很困难了，缺粮缺菜，成了瓮中之鳖。济南的国民党政府就派飞机向城内投送粮食、罐头，并对我军民狂轰滥炸。我部队、民兵和四关的广大群众一齐动手挖防空洞，将阵地工事和重点目标作了巧妙的伪装和隐蔽。同时挑选了一批优秀射手组成对空射击班，有的把枪拴在树上，代替高射机枪。每当敌机来轰炸射击时，大家就躲进防空洞里；敌人的战斗机一走，射击班的战士们就对着敌人的运输机一齐开火，使这些家伙不敢低飞，只能高空投放，其结果常常又是把大部分粮食和降药投到我阵地或环城湖中，成为我们的战利品。

空中接济线被卡断了，但王金祥仍不甘心死亡，企图在城西开辟一条与城外相通的道路，以便突围逃跑和外出抢粮。于是几次出兵争夺城西之吕祖庙。

吕祖庙位于西城门外一百多米处水桥西边，前后都是水，只有一条东西道穿过宽阔的水域从庙前通过，将城里城外连接起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我城西的一处重要防地。扼守住吕祖庙，攻，可以进逼城墙；守，可控制城西入城的唯一通路。吕祖庙阵地由运东分区六团三营某连驻守，火力配备较强，大殿东头、庙门前、戏楼下都构筑了明碉暗堡，许多火

力点直对城门一带。

九月二十三日，敌人调集数千人，组成两个队，一个是掩护队，由赵振华亲自坐阵，在城墙上进行火力掩护；一个是“敢死队”，由郭培德亲自率领，担任突击。

上午八点左右，两架敌机直扑吕祖庙上空，轮番狂轰滥炸，城墙上赵振华的掩护队也开始开火。刹那间，飞机轰鸣，炮弹爆炸，机枪吼叫，房屋坍塌，吕祖庙弥漫在翻腾飞滚的烟雾之中。在火力掩护之下，郭培德的“敢死队“蜂拥而出，气势汹汹地扑来，妄图一鼓作气占领我吕祖庙阵地。

面对敌人的张牙舞爪，隐蔽在地堡工事中的我英勇战士稳如泰山，一枪不发。

敌人越来越近了，五十米，三十米，到水桥了。

“打！”连长刘延辉在地堡里指挥着，并首先开了火。接着我六挺机枪、八十多支步枪，集中向仅十几米的水桥路上一齐开火。密集的子弹象大风卷起的砂石，迎面向敌人扫去。敌人一片片地倒下去，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剩下的“敢死队”都变成了“怕死队”，扭头便往回窜，在城门一带挤成一个疙瘩。距离恰好在我火力的射程之内，我英勇战士架起步枪、机枪，个个显示神威，向着敌人的屁股射击。最后，敌人留下一大堆尸体，剩下的钻进城里去了。

阵地上暂时平静了，我驻守战士连身上的泥土也来不及抖落，赶忙抓紧时间整修工事，擦磨武器，连队指挥员利用这段时间走到各个战斗岗位进行思想鼓动工作。全连上下士气高涨，信心百倍，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不久，敌机又来轰炸了，这是敌人进攻的前奏。突然，一颗炸弹落到我庙前阵地上，随着一声巨响，地堡塌落，两

挺机枪被砸在里面，几名战士牺牲了。这个地堡，是正面封锁敌人的主要火力点，失去它，对封锁敌人的进攻大为不利。

敌人第二次出城窜犯了。郭匪培德光着脊梁，一手提刀，一手握枪，驱赶着他的“敢死队”向我阵地扑来。敌人快到水桥时，我军又开火了。但由于失去了两挺机枪，火力明显地不如前次猛烈。郭培德象发现了秘密似的，挥舞着战刀嚎叫起来：“弟兄们，八路的机枪哑巴了，冲啊！”气焰甚嚣尘上。那些丧命鬼们听到喊叫，便呼啦啦冲向水桥。

就在敌人刚刚踏上水桥的当儿，我庙前阵地的两挺机枪突然吼叫起来，象两条火龙射向敌群。原来，我庙前地堡被炸塌之后，某班战士奉命抢修，就在敌人扑向水桥时，已经修好了，立即投入了战斗。

嗷嗷叫着向我阵地冲来的敌人又一片片地倒下了，没死的扭头便往回逃命。郭培德气红了眼，轮起战刀就砍他的士兵，逼着他们向前冲来。但上来一批，死伤一批，始终不能逾越水桥一步。最后连郭培德自己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拖着战刀又窜回城去。

从九月十三日到十六日，接连四天，敌人几次与我争夺吕祖庙，均遭失败，损兵折将三百余人。我前沿阵地吕祖庙，犹如钢打铁铸一般，安然屹立在西城楼下。

被围困在城内的敌人，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吃不饱，睡不好，陷入了绝望困境。为了从精神上进一步瓦解敌人，我驻军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各部队都成立了喊话小组，围绕四城筑起了一个个喊话堡垒。每天，特别是夜晚，各喊话组就向敌人喊话，给他们讲形势，亮政策，指出

路，正告他们负隅顽抗，执迷不悟，决没有好下场；欢迎他们投诚起义，脱离匪帮与家人团聚。

听，城东在喊："城里的顽军们，国民党打内战不得人心，连吃败仗，蒋家王朝眼看就完蛋了，你们快投降吧，八路军宽待俘虏！"

城西也在喊："顽军弟兄们，你们弹尽粮绝，不要饿着肚子给王金祥卖命啦！"

一颗颗政治炮弹，使敌人陷于四面楚歌。

喊话小组还查清了某些敌人官兵的姓名和家庭情况，指名道姓地喊："孙大发，你母亲的病又犯了，很想念你，叫你想法出来见见她。""孙大勇，你媳妇生孩子啦，叫你快回家……"有时喊话组的同志们还把匪兵的父母、妻子请到城下喊话。

更阑人静，话筒发出的敲动敌兵心弦的清晰的话音在满是星斗的夜空萦回飘荡。每当这时，城里的敌人都侧起耳朵静静地听着，听着听着，有些匪兵便哽咽起来。

为了显示我军的强大威力，我驻军各部还把号兵集合起来，又让民兵拿来锣鼓，组织起声势浩大的乐器大演奏，向敌人示威。敌人有时也吹号，但力量单薄，声音微弱，象秋后的蚊子哼哼一样，被我强大的声音压得听不见。

敌人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不少人开始在为自己找出路。仅管王金祥控制严格，仍然不断有人夜间拽着绳子越墙逃出，向我投诚。敌军的战斗力迅速减弱，在被我围困一年多的日子里，敌兵减员一半还多。

在围困聊城的日子里，我党政军各方都十分关心城里的乡亲百姓，喊话中一再警告敌人不准迫害老百姓，让他们把

老百姓放出来。可万恶的王金祥却把这些老百姓当做抵御炮弹的屏障，并恶狠狠地说："为了抵挡八路军，饿死三五千老百姓不算啥！"迟迟不让老百姓出城，把老百姓视若鸡犬，任意打骂糟踏，甚至枪杀。百姓称王金祥和郭培德是"王家肉坊"，"郭家宰坊"，苦不堪言，被杀害者不可数计。乡亲们盼解放，望眼欲穿。我战士恨不能立即攻进城去，杀尽匪军，将乡亲们救出火坑。

八月九日，东关城楼上的敌人突然向我们喊话说，要放出一部分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密切关注着城内百姓生死的我军指战员无不喜出望外。当晚，我们向敌人喊话，对放人表示欢迎，但要求他们做到：一、对老百姓不准打骂迫害；二、放人时间要在白天；三、放人时不准放枪，保证我们接受人员的安全。敌人同意了。

第二天早饭后，敌人真的放人出城了，地点是在东门。因为城门早已被堵死，临时从城门旁扒了一个洞，让老百姓从洞里爬出来。过了一些日子，敌人又从北城门放出了一千人左右。这些逃出来的老百姓，个个骨瘦如柴，面黄如蜡。出城后，许多人泣不成声，连连喊着："报仇，报仇……"向我军倾诉王金祥的滔天罪行，要求我军赶快解放聊城。

我军干部战士，看到此情此景，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解放聊城，为乡亲们报仇"的呼声愈来愈高，纷纷向部队领导递交请战书，决心书。与此同时，部队自发地掀起了动人的练兵备战热潮。巍巍铁塔之下，荡荡环城湖畔，杀声阵阵，刀光闪闪，登城云梯，渡水木筏，很快都准备好了。

六

冬天到了，宽阔的环城湖面被白茫茫的冰层封冻起来。围城部队首长们经过多方面的分析，认为解放聊城的时机已经到来：第一、从敌情看，敌人已被围困一年之久，战斗力大大削弱，已到穷途末路。但留在城内的一千多残敌多是民愤大，有血债的亡命之徒，死到临头也要坚决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非武力不能解决。第二、从我方来看，我围城部队经过数月的阵地练兵和政治思想教育，求战情绪很高，物资上也做好了攻城准备。我主力部队几个月来在外线作战中取得了很大胜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目前大部分经过休整，可以腾出手来解放聊城。第三，从气候条件看，当前天气寒冷，河床结冰，是攻城良机。于是驻聊部队委托李大清同志代表驻军首长起草了解放聊城的请战报告。几天以后，军区来电说，刘邓首长已批准请战报告，并将立即派主力部队抵聊。

十二月十八日，杨勇司令员、张霖之政委、刘致远副司令员等首长率三野七纵来到城下。一时，城关附近车辆马啸，部队、民兵东来西往，呈现出一片临战气氛。

这天东关小学一间宽敞的教室里，正面墙上挂着一张醒目的军用地图，课桌前面坐着部队指挥员和几名地方政府干部。杨勇司令员正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开始后，张霖之政委首先传达了八路军总部关于保护聊城固有文化的三条命令：一、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二、保护中国四大书库之一的海源阁图书馆；三、妥为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

先生在北街的住宅。

杨勇司令员接着讲话，他说："现在解放聊城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奉命就要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过去一年多来，刘邓首长灵活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从大局着眼决定由地方部队对聊城围而不攻，这是正确的，英明的。现在，在毛主席、朱总司令英明指挥下，全国的大反攻就要开始，刘邓首长又从大局着眼，决定立即拔掉敌人安在我解放区的这个钉子，铲除我前进道路上这个障碍。我们要坚决执行命令，彻底完成这项光荣的战斗任务。"

会上部队首长们围绕战术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此，张霖之政委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一要解放聊城，二要保护城内固有文化和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根据敌人的城防情况，要求我们在战术上更要灵活机动。消灭王金祥有两条办法：一是打进洞去，端掉狼窝；二是引狼出洞，洞外捉狼。相比之下，后一办法更稳妥有力。但是王金祥已在城内经营了一年多，不会轻易出来，要洞外捉狼，也必须狠狠地打，通过狠打，能端掉狼窝，当然很好，也可能经过一阵猛捅猛捣，把狼引出来，在洞外消灭它。这后一种打法，对于保护城内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城内固有文化更有好处。"与会同志对首长的分析都认为非常正确。

十二月二十二日，聊城人民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上午，阵地上一片寂静。

下午一点整，突然三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传来了震天动地的炮声，愤怒的炮弹撕裂长空呼啸着飞向东城门楼。这是我七纵金团（团长金士林）炮兵发出的怒吼。

刹那间，敌人城楼附近的防御设施，被炸得土崩瓦解，灰尘四飞，城门楼上浓烟滚滚，烈火熊熊。门楼上的敌人纷纷向两边撤去。

“打中了！打中了！”

“打得好！打得好！”

战士们一边呼喊着，一边挟着炸药包，抬着木板、云梯伏在堑壕里，待命出发。

一阵炮轰过后，从东关教堂楼上传来清脆的指挥枪声，接着三百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起来。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架桥的战士迅速地接近护城河，在冰层上搭设便桥，铺设木板；爆破组的战士冲向前去，把一包包炸药运到城墙脚下；梯子队的战士把爬城的云梯一架又一架的立于城壁……

我攻城的炮火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郭培德的胞弟、匪三团一营营长郭培显当场毙命。王金祥吓得胆战心惊，上窜下跳，一会儿到东边督战，一会儿到西边调兵，连连向其上司号呼“救命”。

一天夜间，我东关部队值勤哨兵报告：城门里面有搬动砖石的声音，好象敌人把堵门的砖石扒掉了。

这是敌人企图突围逃跑的迹象。李大清同志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告了纵队首长。接着纵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说济南守敌王耀武派其一一〇师孙焕彩全部及王之警备旅等驰援聊城之敌，现正渡黄河。纵队首长分析，济南敌人可能要接应王金祥逃窜。根据这一判断，我部队很快做了兵力调整和新的战斗部署，决定主力一部在茌南一线截击济南来敌，其余部队撤围离城，给敌人虚留生路，在城东马官屯一带布置一个口袋阵。

日历掀到了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页，夜幕降临了。连续几天的炮火停下了。夜，显得格外宁静。忽然，紧闭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东城门悄悄打开了一道缝儿，先是两个幽灵一般的黑影探出头来往外瞅了一下，然后拉开城门。接着，在城内憋了一年多的亡命之徒们象大水灌了蚂蚁窝一样，从城门里面拥了出来。

王金祥要逃跑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匪首，深怕陷入我伏击圈内，钻出东门后，便率匪徒们向东北方向逃窜，企图取道高唐、禹城奔济南。匪徒们刚到高唐，当即被我地方部队截住。不久，我追击部队赶到，激战一场，歼其一部，残敌溃不成军，狼狈逃窜。

王耀武的援军来到茌南，遭到我军的有力阻击。一阵白刃格斗，敌人被杀得横尸遍野。仅我某部房兆山一个班，就杀敌十六名，生擒三名，缴获日制三八式轻机枪四挺，加拿大冲锋枪二支、步枪六支。

一九四七年元旦，伴随着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聊城解放了，蒋匪在鲁西北最后一个内战碉堡被拔除了。

金色的太阳暖暖地照耀着光岳楼。

聊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怀抱！

（本文根据胡潘生、李纯礼、朱正法等同志提供的材料并参照有关文章整理编写）

无人区里闹革命　三次攻克白雀城①

——解放堂邑综述

李　笃　才

一

堂邑城，原是鲁西北重要县城之一，位于聊城西二十公里处，最早设置于隋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故址在今堂邑城西北。唐天宝十五年（公元七五六年）颜真卿遣兵大破安禄山叛军，就在堂邑县西南。宋熙宁初年，故城为大水冲毁，遂移于今址。堂邑县是清末著名义学创办者武训及农民义军领袖宋景诗的故乡。该县于一九五六年撤销，县城及南、北、东部划归聊城，西部划归冠县。

堂邑地处鲁西平原中心地带，是联系聊（城）、冠（县）、临（清）、莘（县）等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九三六年，范筑先将军来聊城任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收编领导了三十五个支队，委任其第八支队司令牟锡山兼任堂邑县县长。牟的八支队共三个营，约二千人左右，驻守以县城为中心的堂邑地盘。

---

①堂邑城，又称白雀城。据传城内有白色麻雀，故名。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将军战死，八支队即处于解体状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日军仅派连一兵力进攻堂邑，牟锡山闻讯落荒而逃，堂邑遂被日军占领。日军进入堂邑后，住在文庙（今堂邑完小），挂出“皇军司令部”的牌子，收容汉奸奴才，组建伪县政府、县大队。范筑先生前收编的二十六支队司令栾省三（外号栾小秃）和八支队一营营长江克敏先后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当了汉奸。不久，栾省三当了伪县大队副，江克敏当上了伪三区区长。

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范筑先将军战死后，堂邑成为鲁西北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日寇占领堂邑后，因利乘便将县城周围十五至二十华里的地方作为中心地带，在温集、张炉集、道口铺等地安设了据点，又在聊堂、堂冠、堂临、堂莘各交通要道之上修工事，筑炮楼，挖封锁沟，构成了碉堡林立、壕沟纵横的防守网。认贼作父投降日寇的栾省三、江克敏也分别在定远寨、梁水镇等修围子、安据点，拥兵固居。顽匪王金祥的二十二旅周振刚（外号周二虎）部盘踞于范寨、辛集，三十一旅吴连杰部活动在柳林、垢固、斗虎屯直到八甲刘一带。齐子修部七旅在桑阿镇，九旅在赵庄，齐润泽在东砂锅李。城南二区还有刘中孚的反动民团。另外，各种杂牌土匪和反动会道门也乘机猖獗起来，其中一贯道尤为肆虐。堂邑大地上群魔乱舞，日伪顽会匪各霸一方，你争我斗，兼并混战，抓夫抢粮，横征暴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搅得生灵涂炭，暗无天日。由于人祸天灾（天旱无雨）一九四三年出现了以堂邑为中心，西南至马桥、桑阿镇，东北至梁水镇、土闸长达八十多里，宽三四十里，涉及冠、莘、堂、聊四县十几个区一千多个村庄的无人区，时间长达

两年，饿死人之多数以千万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肥沃富庶的鱼米之乡，变成了蒿草满坡，饿莩遍地，“新鬼烦怨旧鬼哭”的荒凉野处，其悲惨情境，目不忍睹。

二

在日伪顽会匪“五鬼乱华”的局面下，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身上。一九三八年末和一九三九初先后组建起来的八路军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转战南北，驰骋鲁西北大地，与敌伪顽杂展开了殊死搏斗。多次重创日军，消灭日伪大批有生力量，极大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胜利的信心。

与此同时，堂邑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一九三九二月，在中共鲁西北地委的关怀下，中共聊堂边区工作委员会在凤凰集宣告成立。工委建立后，积极发展农村党组织，全面深入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和组织群众坚决打击汪派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并为建立县区政权与组织武装部队积极作准备。五月，一支由工委领导的游击队建立了，开始只有二十多人，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十月，中共聊堂边工委改为堂邑县委，同时建立了堂邑县抗日民主政府。原工委领导的游击队改为堂邑县独立营，后又改为县大队。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成长，并能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一九四〇年秋天，驻堂邑一日军小分队到我根据地“扫荡”，堂邑县大队将敌人诱至郑家村南沙丘地带，利用有利地形，全歼日军小

分队，生俘一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一九四二年十月，堂邑县改建为冠堂县，第二年十月又改为武训县。这时期就是堂邑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无人区"时期，条件急剧恶化，群众纷纷逃离。日伪顽杂勾结起来趁火打劫，筑围子，安据点，挖壕沟，步步为营，妄图挤垮抗日政权和抗日军民。我抗日县区政府活动曾一度受限，甚至不能在堂邑境内活动，县区武装也受到极大冲击。一九四三年一月，由上级党委决定以县大队为基础建立了马颊河支队。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武训县委、县政府带领一班人员到敌后开辟工作，在"无人区"里闹革命，一方面动员逃外的群众还乡安家，帮助群众救灾救荒，向群众贷款贷粮，贷耕贷种，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变工队，恢复生产，逐步改善生活。在此基础上，又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民兵）支前，配合部队作战。经过含辛茹苦地工作，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无人区恢复了生机，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县区政权得到了巩固，抗日武装也得到了发展，马河支队迅速成长壮大，抗日斗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一次，齐子修驻桑阿镇的部队来我根据地吕庄抢粮，被我马河支队打得大败而逃。我军共打伤敌人十三名，缴获步枪七支。不久，齐子修又亲自带领两个旅的人马向我扑来，马河支队在军分区部队支援下，在段蔡庄与敌人展开激战，打死敌人一百七十多名，最后敌人又狼狈而逃。从此以后，齐匪不敢再轻举妄动。一九四三年二月，马支配合主力部队进入冠堂边区，在冠县打开几个围寨，建立了乡区政权。一九四三年秋，又利用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阎营伪军据点，俘虏一百多伪军，并解除了敌人沿冠堂公路挖封锁沟造成的南北交通障碍。一九四三年秋末，马支借助内

应消灭了郭关庙的一个伪中队，扫清了东进的障碍。同年冬季，马支攻克伪自卫团团长刘中孚团部谢家围寨，消灭刘中孚的王永安部三百多人。不久，马河支队再展神威，一举拔掉聊西南王盐场据点，击毙伪中队长刘文玉，消灭伪军两个小分队。十二月初，冀鲁豫军区一分区部队又向盘踞在堂邑县的伪军孙景月部发起进攻，连克黄新庄、康李村等据点，俘虏伪军三百五十多人。

三

我抗日部队的节节胜利，使堂邑的敌人闻风丧胆。一九四三年冬季，我军组织了第一次攻打堂邑城的战斗。

当时活动在柳林、辛集、垢固一带的吴连杰自称是“中央军”，发誓效忠国民党。国民党顽固派当时采取联伪反共政策，吴连杰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旨意，于一九四三年冬季指派他原任辛集一带的连长张伯成率部进堂邑投降日军，实行敌、伪、顽联合反对共产党的政策。

张伯成进城投降日本以后，被派驻守北城门。

针对当时的对敌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我们不但要能指挥自己的部队，也要能指挥敌人的部队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冀南七专署七分区建立了敌工科，下属各县也相应建立了敌工站，专门做敌伪的工作，与敌伪头目建立工作关系，争取他们为我们服务，不干扰我根据地的军民活动，并给我们提供情报等。武训县敌工站建立之后，原在冠县四区做区长工作的田志一同志调来堂邑县做敌工站站长工作。敌工站干部刘金河是堂邑县赵庄人，对当地

情况比较熟悉。张伯成的部下不少一部分是冯庄人，有的是排长、班长。冯庄与赵庄相距很近，刘金河与他们大都认识。田志一便派刘金河去做他们的工作。

刘金河进入堂邑找到他们后，向他们讲抗日斗争形势，讲国格人格，指出他们已经是公开的汉奸，再说是"中央军"没人相信了，要给子孙后代留下骂名，想改变自己的身份，唯一出路就是反戈起义，投靠八路军；并告诉他们，日本人的日子不长了，抗日形势已经转向有利于中国人民，共产党八路军已经取得了节节胜利；又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准备攻打堂邑，这是你们的一个好机会，可以做内应，立功赎罪。刘金河同志又向他们交代我党我军的政策，进一步指出他们的出路和前途。经过多次做工作，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通了，同意在我们攻打堂邑时做内应。

攻城的时刻了。这天午夜，冀南七分区基干团共六、七百人，由参谋处刘处长带领来到了堂邑北城墙下。刘金河和我范王庄村长李洪雁同志领着几个人首先爬上城墙，城墙上的守兵悄悄地把他们接上去。接着，又有几十个人爬上城墙。然后由守城士兵领着他们走下城墙来到北门。城门用大铁锁锁着，钥匙被拿走了，战士们把枪口对准锁洞，砰的一声，锁被打开了。城门开了，刘处长带领大批人马进入城内，在靠近北城门的几间小屋里安设了指挥部。正在这时，伪县大队副栾省三来查岗哨，一看有人进来了，知道事情不妙，转身便跑了。不久，张伯成又来了，几个排长立即围拢过去，故意问道："张连长，八路军进来了，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张伯成心中早已有数，也故意反问。

“我们起义吧！”几个人同声说。

这时田志一、刘金河等同志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只要八路军信得过我……”张伯成欲说又讷，眼睛盯着“似曾相识”的田志一和刘金河。

田志一上前一步，拉住他的手：“请放心，只要你弃暗投明，我们热烈欢迎你，完全信得过你。”

“好！传我的命令，全连集合，城头起义！”张伯成的话引起了一阵掌声。原来刘金河进城来做工作张伯成早有耳闻，他曾经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汉奸”两个字时时在羞辱着他，压得他抬不起头来，日本人的骄横，对中国人的凌辱，甚至对他也嗤之以鼻的态度使他难以忍受，人格良知驱使他要摆脱这种处境，只是没有机会。今天机会到了，于是他很快地做出了反映。

全连人很快集合起来。经过查点，人，一个不少；枪，一支不缺。

许家大楼外面有敌人的一个马场，喂马人与我敌工人员有联系，见张伯成起义了，便将养马场内的二十多匹马、三只羊交给了我攻城部队。另外，我基干团还收拾了维持会的一个仓库，仓库中的粮食、煤油、香烟、火柴等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当时，日军有一个小分队住在许家大楼，栾省三的伪军大队部住在城隍庙，他们都已经听到我军入城的消息，但摸不清我军底细，未敢露头。我军为减少磨擦，也未去攻打他们。临近拂晓，我基干团带领起义部队，携带着缴获物品，撤出了堂邑城。

第一次攻打堂邑以后，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我军一鼓作

气，乘胜追击，拔钉子，克据点，连连取胜。一九四四年，我八路军冀南七分区多次与吴连杰部主力展开战斗，将这股顽匪势力消灭殆尽。一月，利用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盘踞在阮庄据点的吴连杰部黄竹斋团，击毙团长黄竹斋，消灭敌人近四百名。六月，吴部四团团长程子坊、副团长邢先觉率部于斗虎屯起义，后改编为武训县独立团。十月，端掉了顽匪吴连杰在吴海子的老巢，邓庄据点的宋凤岐团被迫投降。不久，武训县独立团在地下党员郎树林、曾广德配合下，里应外合巧取梁水镇据点，据点内罗兆荣部罗登殿率八十余人起义。一九四五年元月，武训县独立团和区小队在地下党员配合下解放了聊古庙伪据点，伪军一百二十多人及伪警察所十余人全部被俘。

武训县独立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四、五百人的劲旅，各区小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县区武装共约一千多人。他们或独立作战，或配合正规部队和兄弟部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日伪顽匪采取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政策，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冲破敌人的封锁网，拔掉了敌伪安设的上百个钉子，打跑了顽匪二十二旅，彻底摧毁了吴连杰，赶走了齐子修几个旅的大部，歼灭了在各地盘踞的杂牌匪军，开创了抗日斗争的大好局面。

四

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莘县解放后，原莘县伪警备大队副队长刘立泉搜罗了一部分逃散的伪军，十月撤到聊城改编为道保安大队，刘立泉任大队长。十一月进驻堂邑城，该伪道保

安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其中三中队队长邹荣川，莘县人，与我分区敌工科工作员楚增林是同乡，早年曾同在莘县伪警备大队共过事，相处关系不错。邹与我敌工干事刘协俊亦有"老亲"关系。于是我敌工科便先后派楚增林、刘协俊多次进入堂邑做邹荣川的工作，讲形势，亮政策，唤起他抗日救国的良知。经过不断地工作，邹表示愿意在我解放堂邑时举旗反戈，做我们的内应。邹的中队共三个小队，除一个驻伪大队部外，另两个都在城楼上，负责北门至东北角一带的防卫。他说："在此段登城，我保证士兵不打枪，并做好接应。"

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妄图以收缩兵力的战术负隅顽抗，驻堂邑日军全部撤到了聊城。堂邑城内只剩下伪县警备大队和刘立泉的道保安大队以及伪警察局、伪政府人员。日军撤离以后，城内伪军名义上统由伪县长胡玉南指挥，实际上他们之间矛盾很多，无法统一行动。这给我军攻打堂邑造成了有利机会。于是军分区首长作出了攻打堂邑的部署。

攻城的前一天，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同志向楚增林、刘协俊详细询问了堂邑城内敌人内部的情况和邹荣川配合我军行动的可靠性，并要刘协俊赶进堂邑城通知邹荣川予以配合。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一早，楚、刘二人一起到莘县找到了邹的父亲邹德乐，后由刘协俊与邹德乐一起在晚上掌灯时分赶进了堂邑。见到邹荣川后，刘协俊将我军准备当夜十二点攻城的行动和联络信号告诉了他。

吃过晚饭，邹荣川走上城墙，在一间小屋里秘密召集小队长李景禹、班长王景合、岳修民、传令兵李来玉等几个知

已开了会，说明了行动计划，分配了任务，并作了三条规定：一、在攻城前任何人不得离开城墙；二、八路军攻城时一律脱去上衣，着白衬衫为标记；三、八路军进城后分头为他们带路。

这次攻打堂邑由冀南一分区副司令员白云同志任总指挥。参加攻城的部队有二十四团、二十二团、马河支队、分区基干团。武训县独立团派往城东道口铺阻击聊城日伪军的增援部队。

我军共约一千多人，当晚十点由莘县出发，在茫茫的夜幕中向堂邑城挺进。由于当天下午落了大雨，积水满地，道路泥泞，为防止狗叫又要避开村庄绕道而行，多走了许多路，因而未能按时到达。一直在城墙上等待攻城部队的邹荣川的两小个分队，见已过午夜十二点还没发现联络信号，有的焦急不安起来，小声问道："邹队长，是不是八路军今夜不来了？"

"八路军说到做到，肯定会来。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邹荣川回答说。

就在这时，城东北方面闪出了手电筒的红光，并连续晃了三下。邹荣川赶忙按规定信号点起纸烟在空中画圈，意思是准备好了，可以登城。

于是攻城部队便靠拢城墙，架起梯子，开始迅速而有秩序地登城。进城以后，一部分向前方及左右行动，一部分去扒开了堵塞的北城门，让大部队进到城里。很快，南城门楼也已被我军占领，守城楼敌军缴枪反正。

天蒙蒙亮时，守卫城西北角城隍庙的伪军发觉了，砰砰地放起枪来，我军也迅速还击。顿时，城内大乱起来。我军兵

分几路，由邹荣川部队带路，向各个角落进攻，很快便占领了大半个县城。不久，伪军主要集聚点之一的城隍庙也被我军攻占，只剩下伪县保安队二中队与道保安团一部分固守在许家大楼负隅顽抗。我军一面围困该处伪军，一面继续追捕城区逃散之敌。战斗中，我敌工干事刘协俊同志在喊话时不幸中弹，打穿大动脉，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除许家大楼外，其余均被我攻陷，城内敌人大部被歼，东关外的土围子也被摧垮。我运输队在部队掩护下将缴获的大量物资运出。

这时，聊城的敌人听到了我军攻打堂邑的消息，十日下午急派日军五十余、伪军二百余前往增援。我在道口铺的武训县独立团五个连六百多人早已埋伏在从道口铺到铁庄一带的聊堂公路一侧，做好了充分准备。当乘车的日伪军进入道口铺我伏击圈时，我独立团立即给予迎头痛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有的慌忙跳下汽车进行还击。汽车上的日伪军头目见事不妙，命令司机调转车头往回逃窜。没有爬上车的几十名伪军发现被主子遗弃，立即缴械投降。另有两名日本兵抱着一挺机枪向铁庄方向逃去，在我战士追击下跑进铁庄一个芦苇塘里隐藏起来，但早已被我追击中的四连战士发现。两个鬼子想跑已来不及，面腿陷入泥中拔不出来，被我活活捉住。阻击结束，我缴获战马一匹、自行车一辆、日式歪把机枪一挺、日式掷弹筒一个、三八式步枪三支、步掷弹一批。

同日下午八时，聊城敌人又集合日军一百余、伪军五百余再次增援堂邑，一路上遭到我军袭扰打击。聊城到堂邑不足二十公里，敌人迟至十一日早上才到达。

在聊城援敌到达堂邑之前，我军早已接到情报。十一日凌晨三时，我攻城部队便安全地撤出战斗，邹荣川部和原守南关之自卫团等起义人员也随攻城部队一起，从南门撤出了堂邑城。

这次攻打堂邑，有一百五十多名伪军反正起义。我击毙伪军十余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两个、步枪一百多支、战马十余匹、粮食十万余斤，还有一大批其他军用品。

五

我军撤出堂邑以后，分区首长很快作出决定，重新部署力量，一举解放堂邑。

为了进一步摸清城内敌人的情况，分区敌工科科长杨大伦同志让田志一同志找到与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的伪县警备大队副队长张双令谈话，让他在我进攻堂邑时率领伪军起义。田志一找到张双令后，张双令说："船不翻，我反正不能往河里跳。"态度犹豫。田志一同志向分区首长作了汇报，分区首长认为，不能依靠他解放堂邑，但也不能放弃他，可以再与他继续联系做他的工作。

不久，马河支队队长李善享同志又让李乃武同志与张双令联系。李乃武同志几年前就受党组织委托做张双令等伪军头目的工作，早与他们建立了工作关系，接到通知以后又去做了张双令的工作。这天他陪同军分区高参谋在张双令的中队长高自安的掩护下，进入城内观察了地形和城防情况，绘成图纸，然后派人送回部队。

七月二十日下午，分区首长下达了解放堂邑的命令。二十二团主攻城区，马河支队和县大队分工打外围。总指挥部

设在温集，分区司令员赵健民任总指挥，前线指挥是二十二团团长曹丕堂。

二十二团共三个营，九个连，一千多人。一路急行军，午夜十二点我攻城部队已接近城郊。事先已约好，张双令将在南城墙接应。这时，我军突然接到李乃武从城内派人送来的情报，敌人对原城防部署进行了变动，将张双令所属伪军由防守南城墙改为防守东城墙。我部队遂即停止前进，将攻城部署作了相应调整，改为从东城墙魁星阁攻城。攻城开始以后，仅用了十八分钟，三、四、六连的勇士们便都先后爬上了城墙，控制了东、南、西三面的大部分炮楼要点。

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六连开始强攻伪县府及伪大队部驻地——许家大楼。许家大楼在第一次、第二次攻打堂邑时都没有攻下，伪军们便以为这里坚不可摧，伪县长胡玉南、伪大队副车农青和伪政府的科长们都钻进了这里。他们修补了寨墙，挖了寨壕，安设了铁丝网，企图固守顽抗。六连的勇士们只几分钟便爬进了寨墙，将三层大楼团团围住。一排的同志们首先用话筒向敌人喊话，让胡、车等缴枪投降。开始胡、车没有出来，伪军们还不断打冷枪，叫骂。于是我一排战士便架起十几挺轻重机枪猛烈地向敌人射击，一颗颗手榴弹也向敌人飞去。在一排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二排、三排的勇士们越过敌人的严密火网，竖起了梯子。三班班长王心宽第一个爬上去，接着九班班长安金明、三排长王金波都迅速地爬到房上，继而他们又象铁人一样，挺着胸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通过梯子由房上向楼上爬去。王心宽、王金波顺利地过去了，当安金明同志正爬到梯子中央时，只听咔嚓一声，梯子突然断了，他从一丈多高的空中掉下来，脚和背都

摔破了，沥沥地淌着血。但他毫不在乎，竟如无事人一样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抓住窗户又爬到房上，再爬到楼上。这时三排的同志们已全部赶上来，开始向敌人进攻。西南角小炮楼上的敌人企图反冲锋，被三排长王金波一枪撂倒了先头的一个，其余七八个从窗户里跳下楼逃跑了。这时，忽听得"轰！轰！轰！"三声巨响，三颗炮弹在楼上开了花。上层楼上的六个伪军立即缴了枪。

"伪军们，赶快投降吧！我们宽待俘虏，缴枪不杀！"

"胡玉南、车农青，赶快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

我战士瞅准机会向敌人发动政治攻势。

在我强大火力的攻击下，敌人已无其他路可选择，听到我战士的喊声，从窗户里举出了白旗。我方停止了射击。胡玉南、车农青及他们的科长们从床底下、桌子底下和各个角落里钻出来。接着，胡玉南、车农青把二十响的匣枪放在桌子上，举起双手走了出来。其他人也都把武器放下，尾随在胡、车二人后面，学着他们的样子，下楼向我投降。

许家大楼——这座日伪军经营多年的老巢被我全部占领了。战斗下来，共俘虏伪军二百多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五十多支。

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四连战士攻下了西南炮楼，击毙伪军二十三名，鬼子顾问一名，缴获步枪二十二支，掷弹筒一个，盒枪一支、电话机一部。

著名的铁帽子二连主攻城隍庙。这里是道保安二团一营驻守的地方，共三个中队，一百八十多人，是伪军的另一个主要聚集点。他们在城隍庙外面又修筑了一道小围墙。二十一日早上五点，我战士来到围墙下面，竖上梯子，扔了几颗

手榴弹作掩护，翻墙过去了。开始敌人想抵抗，但我战士的猛烈火力打得敌人不敢露头。接着，我战士又向伪军发动政治攻势，通过喊话交代我军的政策，告诉敌人：投降，我们优待俘虏；不投降，我们就发动强攻，彻底消灭你们。我敌工站的同志又把胡玉南、车农青找来，让他们向城隍庙内的伪军喊话。下午二点半时，在我军事胜利和政治攻势影响之下，伪军们摇出了白旗。不久，由副营长谢佃元率领全体伪军，携带步枪一百七十余支、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三个反正起义。

在我攻城时，伪大队副张双令率七中队与十中队一部分人越城逃窜了。我敌工人员通过中间关系告诉他："你想卷土重来，决没有好下场，我们决不饶过你。你把人集合起来，向我军投诚，算你起义，可以宽大处理。人集合不齐，也必须把枪收齐。人枪都没有，我们唯你是问！"张双令低头不语。

二十二日，张双令率部下一百多人带着枪支向我投诚。至此，原城里的敌人全被我肃清。

二十一日下午，我二十二团一连、八连开始攻打城区敌人的最后一处据点——东关据点，这里是伪三区区长江克敏的自卫团的盘踞地。开始强攻以前，我军用话筒向敌人喊话，要他们弃暗投明，缴械投降，走宽大之路。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大喊大叫，打冷枪，封锁路口。特别是伪特务班，在小队长张××指使下，拼命向我打枪，扔砖头，疯狂反抗。这时，忽听得"轰轰轰……"连续七声炮响，我军的炮弹在敌人的炮楼上、寨墙上、围子里炸开了。一阵烟雾过后，南门小楼塌了半边，六名防守南门的伪军先后归了西天。炮声

一落，我一、八连的勇士们便开始了强攻。一连指导员李克刚、连长孔筑亭和战士许盘礼三同志冒险架住梯子，九班长王清江背着步枪、炸弹第一个爬上去。这时八连的战士们也竖起了梯子。很快，一连、八连的英雄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去，迅速地突破了敌人的封锁，仅几分钟便进了围子。然后，勇士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寨墙上分别向东、向北压缩敌人；一部分在院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团部、营部的首长也来到这里，爬上围子，提枪助战。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也纷纷爬上房顶、围墙，有的甚至爬到树上，为战士们呐喊助威。战士们怕有危险，让他们离开，他们却说："不怕！"一定要亲眼看着战士们杀敌人。我战士越杀越勇，越杀士气越高。那个又肥又胖、满脸横肉的特务小队长，死到临头还拿着红缨枪乱舞划，拼死挣扎。我九班班长王清江和战士郭子刚等同志跃步上前，夺过他手中的红缨枪，反手一刺，结果了他的狗命。一场肉搏战下来，敌人二十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其余二十九人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跪地求饶。

太阳落地了，战场上渐渐平静下来，敌人惨淡经营多年的又高又深的东关据点燃起了熊熊烈火。平素耀武扬威，号称强大的自卫团除没在据点的江克敏等少数人外，其余凡活着的都一个不剩地做我军的俘虏了。群众和勇士们押着他们进了城里的东门。

"堂邑解放了！堂邑解放了！"

"堂邑回到人民手中了！"

成千上万的群众如潮水般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呼雀跃，互相传告胜利消息。

很快，城东又传来了捷报，伪六中队李同合部盘踞的道口铺据点也被我拔掉了。

从此，堂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此稿根据田志一、朱正法、张炬等同志提供的材料并参照有关同志的文章整理编写）

一九八九年七月

报 摘 资 料

何思源图谋进攻解放区

密运物资予聊城伪军，大批反共文件一并为我查获。

三日晚有汽车十余辆，载运大批物资，由济南驶经聊城八路军驻地，拂晓入聊城城内。内有济南执行小组及救济总署人员十余人。该地八路军以运输是项物资，事先既未得到通知，又无任何证明函件，竟欲运入伪军盘踞之聊城，当即依法予以检查，查得何思源致该城伪军的亲笔信一件，及其他反共文件二十五件，并附接济伪军之法币二千万元。何氏在其信中，鼓励伪军坚守待机，并保证以飞机运送弹药及物资。称："山东军区"已布置就绪，将由高唐进攻临清、聊城云云。八路军当局向执行小组美代表郝金斯、国民党代表顾自立、救济总署代表纳约翰提出质问，彼等声称各种文件与他们无关，并当面道谦，三方旋将此事详细商谈，取得如下协议：①查获之非法文件，由中共方面保存，由小组追究其来源，予携带着以严重处分；②从查获文件中，证明何思源准备以飞机运送子弹支援城内伪军，各方认为此系破坏停战协议之举，今后如因此引起意外事件，中共概不负责。查获之法币二千万元，从非法文件证明系何思源接济伪军之用，理应予以没收，现经各方协议，将该款救济城内难民，但由于城内伪军不放城内居民领取，该款将交所组织之救济

委员会收存，以备将来处理。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第一版）

聊城伪军出扰被歼近百

因踞孤立据点聊城之伪军王逆金祥，于十八日在美制蒋机四架掩护下向城外出扰，遭地方部队及民兵英勇抗击，蒋机一架中弹焚毁，伪军死伤九十余人。王逆狼狈窜回。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聊城人民要求解散城内伪军

聊城城内伪军王金祥、郭培德、赵振华部，不遵守二月二十六日执行小组的停战协议，在国民党飞机每日运送武器弹药的支持下，不断向我城外军民进攻骚扰，近日更愈益猖狂。本月四日夜十二时许，伪军从西门出动，进攻我城外驻军，强占我阵地后，又出动四百余分三路向我东关进攻，占领米市北头与西口小礼拜寺街，并窜至东关大街、药王庙街、驴市口大街大肆焚烧洗劫，计房屋被烧六十余间，抢去家俱财物无数，所剩余者悉被捣毁，我军忍无可忍，乃奋起将其击退。不料该伪等故意地挑衅，又于六、七两日约二时许再窜出城外，向我进攻，均被击回城内。东关居民经此洗劫后，多无法维持生活，纷纷向当地八路军哭诉，坚决要求解除城内伪军武装。按城内伪军头子王金祥，即系一九三八年勾结敌寇侵犯聊城、谋杀抗日老人范筑先的民族罪人，郭培德及赵逆振华投敌后，杀人无数，聊城一带人呼之为“东昌宰房”。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一版。）

水深火热的死城

——聊城居民呼唤救命！

在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百般支援下的聊城伪军，自五月二日黄昏经查获何思源大批非法援助物资，成立救济城内难民之协议后，不仅未放弃其对我敌对态度，且时常向我四关驻军发枪射击，而且坚决的拒绝了放难民出城以便进行救济的建议，并加紧对城内人民的压榨剥削，制造着三万居民的饥饿，自杀死亡的严重灾荒，致一座聊城县城，陷入阴森的恐布的深渊。据最近的城内偷跑出来的市民商人谈，该城近况如下：城里被汉奸糟踏的已不象样子。老百姓家中的桌椅、板凳、门窗、过木都已烧光了，各种用具也被汉奸兵抢去了，油盐酱醋粮食等食品，更不用提，早已跑到兵营中去了，早由汉奸们的肠胃变为粪了。被饿的皮包骨头的市民群众，沿街乞求，啼饥呼饿的声音凄厉地充溢到每个角落，就是有些有钱的人家，也买不到东西吃而无休止的饿着肚皮。随着天热，瘟疫蔓延起来了。病死、饿死，被迫上吊跳井、……等自杀的数目日渐增加起来，单饿死于自杀者新近来有三百余人，在街头路旁每天随处都可以看到死尸。求乞的市民成群的沿街呼唤（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可以获得什么食物），一点反映都没有，要有也是另一群乞丐的绝望呼

喊……，汉奸兵每天发两个馒头。一个兵要把发的馒头拿回家去，他老婆说："我吃了你怎么站岗呢？"结果给孩子吃了一块，待这个兵又回来时，他老婆已上吊死了，在此吊死老婆，饿坏儿子的情景下，他自己也上吊自杀。每个人都明白这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这全是汉奸王金祥一手造成的。

人民同样明白，只要开城门允许出入，数万斤救济粮会马上被带进肚皮。

八路军在城关三次救济的消息传进城来，市民想跑出去求个活路，马上集合起七百余人，跪在王逆金祥面前，要求把他们放出去，但王逆勃然大怒地骂道："你们真混蛋，出去叫八路军的机关枪扫死怎么办呢？谁在提出城就以内奸论罪！"请愿的群众依然跪着不动，期望能以人类对死亡的惋惜的天良感动这个杀人的魔王，但结果被一阵枪托木棒驱散，他们只好带着残破血流的躯体静候着死亡的来临。

聊城不挨饿的只有王逆金祥等汉奸官，何思源曾数次的空运来接济他们，除抛下扩大内战的武器弹药外，还有冰糖、罐头、大米、白面等贵重食品，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声耀潜更体贴地以公款二十余万，购送鸦片烟土，叫王逆金祥（以备以守城苦闷"受用"和剔除什么"烦恼"等等，）让汉奸们享乐痛快，那管什么人民死活。

世上再没有饥饿与死亡更能教训人的了，聊城市民谁都极为明白，现在的一切灾难，饿与死亡，都是那带着青天白日图样的飞机和带着"中央军"三个字的人带来的。这些人在市民的心里，和鬼子汉奸字样密切地连结在一起难以分辨。而今市民们只有抱紧肚皮期望着八路军早日来解放他

们1，击破这座死城。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第二版）

为民除害奋不顾身

聊城解放之役官兵恐后争先

吴　象

解放聊城之役，我地方兵团与野战军并肩作战，表现了旺盛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力。×分区×团各营，进入战斗前，纷纷要求担任主攻，并向野战军挑战。某连连长李建义交出存款一万元，决心为民除害；他写给上级的信说："如果汉奸民贼死不交枪，保证全连刺刀见血"。五连付连长芦京林，家中来信叫他回家结婚，他回答说："不打开聊城，不回去"。该团二连在敌人猛烈的火力射击下，坚持了四个小时，架起了一座长达七十米之木桥，伤亡仅四人。该团工兵组，连续爆破城墙，投弹组担任掩护，无一伤亡。总攻开始时，该团首先竖好长达四丈五之大梯一架，于友邻部队以有力鼓舞。野战军×部付司令，对该团甚为赞许，向所属部队说："他们虽然是地方部队，但是执行任务坚决，动作勇猛、配合的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解放聊城之役，我军×部听到当地群众哭诉蒋伪军暴行后，个个咬牙切齿，决心为民除害；当开始攻城尚未发起冲锋时，某团战士即自动向炮火轰开的缺口涌去！其他一切非战斗人员亦不分昼夜为解放聊城而艰苦的工作。几个炊事员白天做饭送饭，晚上抬伤员，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摇机员李

顺清，郭福祥在完成本职工作外，又去帮助烧锅，到火线上去送饭。军机员胡成信往阵地运送弹药，一夜送去三次。另外三个军机员不顾一切困难，在一夜中准备好所有做梯子的材料。卫生队在几个钟头内按置了四十五个伤员，帮他们上好药，穿好衣服，喂了饭，很舒适地躺在厚厚的乱草和褥子上。潘付主任、刘指导员并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他们盖上。后来办事处全体人员写信给攻城部队，保证作战中每天能吃上白面，弹药按时送到，伤员有木炭火烤，用对待父母的态度来照顾伤兵同志，并加强通讯报道工作，不使任何一个英勇事迹埋没。民运科长谢迎亭同志并将自己爱人所保存了十六个月的几块银元，捐赠攻城立功的战斗英雄。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三日，第二版）

聊城浩劫

田　兵

这是一座曾有几万人口的城市，抗战初期，共产党在这儿帮助老英雄范筑先将军率领十万北方男儿，抗住南下的敌兵，老英雄提出了“守土有责，良心抗战，上为祖宗父母，下为妻子儿女”的口号，就因为这，当时国民党的省政府说：“太行山东红了半个天”；就因为这，国民党政府收买了范将军的参谋长王金祥，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借日寇的刀杀害了这位英雄。从此，聊城便被敌人整整地屠杀了九年。

记者是在一九四七年元旦进城的，你无论进聊城的那一座门，都可以看到护城河边一尺多深的白草和蒿子，有时候在那儿落一两只吃死尸的老鸦。城里无论是那一条街，看不到一座完整的房子，一块完整的门板，一块不碎的玻璃，门板和房屋大部都被敌人烧饭或烤了火。就是伪军自己住的房屋，在临窜逃时也有的烧了，有的破坏的不成样子。

老百姓家里早被伪军翻箱倒柜，就是大街上也满丢着破衣服，被子、染着血的棉花破布，打碎的家俱，碎玻璃和伪军遗留的伤兵，尸首、杀人的武器、弹壳、联合准备银行的票子……。

城东北隅紧紧靠着北门，是傅斯年先生的家宅，已成为一片荒场。沿在这儿朝西面向公园或朝北看，都是无际的墓

地，在万寿观北面，以范筑先将军的塔为首的，也是一片荒墓，这些墓里的死者，有的是活埋的，有的是杀死的，也有的是饿死的。这几千座荒墓的死者，据老百姓说，几乎有一半出在“郭家牢房”和“赵家肉房”。（郭赵是王金祥手下是个杀人最多的刽子手，一个叫郭培德，一个叫赵振华。这是人民送他们的称号。）

我们访问了东北隅几家低矮的房舍，门都是紧紧的闭着，推开门进去看不到一个活的东西，屋里碗、盆还好好的摆着，可是锅台上已长满了草，不用说这都是死绝了的人家。汉奸们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把鼓楼最上层当年邓状元题的“光岳楼”三个字改为“中正楼”，站在“中正楼”上朝四面眺望，尽是一片瓦砾，一片墓场，北风呜呜地狂号，真是“新鬼含冤，旧鬼哭，天阴雨丝声啾啾”。真难怪蒋介石如此宠爱王金祥。

逃在四乡或四关的难民，黄昏的时候，已有的赶回家来，女人们看着死人的坟墓，看着破碎的家庭，大声的悲哭。暮色苍茫中劫后的城是多么的凄凉啊！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于聊城

用光辉胜利迎接新年

我军解放聊城

刘伯承将军部队，应鲁西北广大人民之请，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向盘踞聊城之伪军王金祥部总攻，经数日激战，该伪伤亡惨重，残部狼狈突围，八路军除分兵追击外，于元旦日进驻该城。至此，八路军在解放聊城前，某部政治机关为保护该城固有文化，特命令全军于入城后执行下列三事：（1）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致敬礼；（2）保护中国四大书库之一的海源阁书馆；（3）妥为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此街的住宅。

按：聊城为古东昌府治，民国二十七年汉奸王金祥勾结日寇进攻聊城，民族英雄范公筑先及山东省教育学家张郁光先生均与城俱亡，当地人民为纪念此抗日老人，乃将聊城县改为筑先县。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五日，第一版）

范筑先将军墓前

田　兵

是公平裁判的时候，
人民的仇恨一日不消，
罪魁祸首永远难逃。
碧绿的麦野之上，
追击的勇士正在纵马奔跑……

× × ×

一别九年，司令啊！
你所称赞的青年人回来了。
但是，已看不到你，
看不到和蔼慈祥的老将军了，
看不到繁荣的聊城了，
聊城，多么荒凉的墓啊！
你的墓前是万寿观，
墓后一片荒坟，
漫着新鲜的白草。

× × ×

我们祭奠你，
站在你的墓前，

我默默的哭了：
国民党借刀日寇，
杀死了这位年老的英豪。
你象一头民族的老牛，
共产党帮助你耕开了祖国的大地。
十万爱国的健儿，
高高举起“良心抗战”的大旗，
卖国的人，总是胆小，
恐惧和嫉妒……
国民党说：“山东红了半个天”，
急忙收买了你的参谋长王金祥，
暗暗地布下了罪恶的罗网。

× × ×

那时侯，我们都蒙到鼓里，
虽然有时侯也知道蛛丝马迹，
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的脑子，
总不会料到。
敌人兵临城下了，
你那么沉着镇静地
派王金祥出城指挥，
他却站在北门外的大堤上，
笑哈哈地看敌人的炮火，
笑哈哈地奚落我们无知。

× × ×

那夜，那悲凉壮烈的夜啊！
张郁光同志（政干校校长）姚第鸿同志（政治部主任）和你，
我们几个人愤怒哀痛地面面相对，
郁光同志说："与其城破，不如冲"。
弟鸿同志也说："冲"，
大家都说"冲"
只有你司令紧皱着眉头，
一字一字的说：
"你们想着，
聊城四面环水，
只有四门可通，
敌人用火力封住了，
冲总是不安全的，
我老了，死不足轻重，
你们都是有为的青年，
我能叫您陪着我死吗，
王金祥想到老头我还撇在城里，
能不来救吗？
你们听一听，
一会会有救兵的枪声"。

× × ×

司令啊，那时侯我们把耳朵伏在地上，

恨不得把毛孔都变作耳朵，
去听那边村里有没有枪声，
可是，听彻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黑夜，
只听得秋夜凄凉，只有落叶敲着秋风。
大炮隆隆的响，
炮火正烧的满天血红。

× × ×

弟鸿同志愤激地说：
“王金祥早把我们出卖了，
还盼什么救兵”？
司令你没有说什么，
只是长叹了一声。
我知道你心里的悲痛，
你是再想“我们良心抗战，吃窝窝头，穿布衣，
赤胆忠心，
捍卫祖国的土地，
为什么曾遭到算计”！
司令啊！我们常用良心感化一切，
那知道王金祥只披着人皮？！

× × ×

司令啊！和你一分手，
就成了永远的别离，
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你和第鸿同志到东门督战。

我和郁光同志，路子恒同志（手枪营长）坚守在司
令部里，
午间聊城失陷了，
猛烈的巷战一直搏斗到黑夜，
街上淌着人血，
就在那天晚上，
你举枪对着自己的胸膛，
三呼祖国万岁，
和人民长远的告别了。

× × ×

你是这样死的
而日寇汉奸却又替你修建坟墓，
杀人犯假装着令人恶心的“虔诚”，
想用涂满血腥的双手，
掩盖天下人的耳目。
可是血手捺不住人心，
鲁西北五百万人民的心里，
早已刻好了碑文，
杀害你范筑先将军的刀子，
是国民党借于日本。

× × ×

不论风雨饥寒，
你常说青年，孩子，
都在坚守着用血和眼泪创造的土地。

九年来炮火如一日，
黄河两岸上的风沙，
吹老了当年的孩子，
帮助你的共产党没有走，
大家争取着这个公平裁判的时候。

× × ×

当日寇投降的时候，
都指望罪人就审，
谁想当今的“朝廷”，
就是罪恶的主人。
罪人加官进爵，
聊城人民继续受着罪人的孽绩。

× × ×

今天“为范司令报仇”的人民军队，
解放聊城了，
我们奠祭你。
我站在你的墓前，
热泪横流。
是公平裁判的时候，
人民的仇恨一日不消，
罪魁祸首永远难逃，
碧绿的麦野之上，
追击的勇士正在纵马奔跑……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日，第三

版）

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夜于聊城

编注：作者田兵同志，在一九三八年聊城沦陷前，曾任范筑先将军机要秘书，与范筑先将军困守聊城。聊城失陷后化装逃出。逃出后参加前线记者团工作，此诗即为作者随我军光复聊城，亲谒范筑先将军墓后之作。现是贵州省文联副主席。

我军政干部于聊城解放日

公祭民族英雄范筑先

我军元旦日解放聊城后，全体军政干部于二日隆重公祭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公祭在城内范筑先将军墓前进行，由八路军代表张霖之、冀鲁豫二专区专员谢鑫鹤主祭，与祭者多为当年追随范筑先抗日的青年，他们对这位蒋日伪串通杀害的民族英雄，表示无限的悲悼与敬仰。主祭人张霖之的致词："范将军如果死而有知，知道抗战胜利后，聊城和他的遗骸还被汉奸统治了一年多，日本打败又来了个美国侵略者，汪精卫死了又来了个蒋介石，他一定要含恨于九泉"！张氏指出："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全市人民必须更加努力打击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贼。"按：范筑先将军原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抗战后日寇侵陷济南，山东北部国民党官吏逃跑一空，范筑先即组织十万人民的武装，和八路军合作抗日，深为蒋介石嫉视，勒令范部王金祥投敌，致聊城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为日寇陷落，范将军随遭蒋日伪串通杀害，光荣殉国。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日，第二版）

解放前后

吴　象

去年一月，当我八路军解放聊城四关，正向盘踞城内之伪鲁西北保安特务第四旅发动总攻时，一月十三日停战令公布了。我为昭示信义，当即撤回已经登城占领碉堡之部队。一年来，我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始终在四关坚持阵地，保护人民利益。记者于该城解放数日，抵达东关，首先大感惊异的是：东关与城虽仅护城河一水之隔。却为一熙攘安定之市场，此处据有一万人口。去年一月底已成立民主区政府，区长即东关人赵健民。在我民主政府积极扶助下，商业较敌伪统治时期繁荣，较大的饭馆，由一家增至四家，生意最好时，每日收入达一万元（当时货币）。一般铺房原四十家，现增加一倍。摊贩增加更多，现加入摊贩联合会的即有二百余户。推车工人也组织了工会。开银器的潘金榜先生告诉记者：因废除了苛捐杂税，他生活大改善，去年一年的负担，他只出了八斤米和四元钱，比过去一个月的捐税还少。居民们描述我地方武装屡次痛击出城枪粮抓丁的伪军，流露着极大的骄傲、感激的喜形悦色并称：济南蒋记美造飞机常给城内伪军运送弹药、食物，对四关居民则滥肆轰炸狂射。东关东大街开茶馆的金连生一家人口，只剩下了一个被炸伤的母亲和他的孩子。空袭威胁，使原设在东关柳园的集市，不得不另移地点，但当新集开始时，东关仍极热闹。每集均在五

万人以上。当记者于战事甫停入城巡视时，却见了另一景象：全城房屋被毁者几逾三分之一。在阒无人迹的大破房中，偶而钻出因饥饿而瘦黄虚弱的居民，抱着我入城战士，倾诉其数年来之怨痛。城内原有居民一万五千人，彼等早在执行小组初来聊城时，即请愿要求救济，冀脱离此一人间地狱出城谋生，我方代表朱子卫，亦力主释放穷苦群众出城予以救济，但蒋方代表却坚决不答复，至发生严重之饥荒。此时曾勾结日寇害死抗日老英雄范筑先，现又统率全城伪军的蒋记第五作战司令兼山东第六专员王金祥，竟公开宣布："为了军事行动，饿死三万、五万老百姓不算啥"。为此，全城群众受害者达三千余人。但王金祥及其伪军头子的食物，却是美造蒋机自济南送来的，白面牛油和海带。我民主政府入城后，即行安定秩序，抚恤救济，逃躲出外的难民均一纷纷回城，重整其破碎的家园。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日，第二版）

九年痛苦一旦解除
傅家父老感谢我党

——傅斯年先生故乡访问

勇　进

记者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往访中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之故乡——大兴庄（聊城南二里）①，傅家的祖墓即在该村之旁。当记者到兴庄时，傅家老少马上把我们围住了，我告诉他们傅斯年先生曾到延安访问过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引以为荣，傅国田先生说："傅先生之近门弟斯宪先生及其表弟李荣东，都在解放军过着民主自由的快乐生活，八路军及民主政府对俺傅家特别照顾，傅家之住宅及祖墓，为汉奸王金祥摧残的不成样子了。"为凭吊聊城古迹，傅乐东先生当领我到傅状元墓（即傅家祖墓），但见傅家墓地上牌坊破碎、石像歪斜、古柏稀疏，一片荒凉。傅乐东先生叹息着说："几年来王金祥、郭培德，为了修碉堡筑工事，把俺墓上的柏树砍光了，俺傅家老辈的神道大牌，也拉进城里，我们傅家的房子，被拆的一间未剩，斯年叔家的房子，也被折的片瓦无存。"傅先生谈到此，转怒为喜悦"八路军来了，我们傅家有了依靠，我们都感谢共产党对俺傅家的关心"。

〔编注：大兴庄，即今日傅家坟村〕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日十公元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第二第〕

政府拨粮救济聊城难胞

聊城收复后，冀鲁豫边区民主政府为救济城内难民特拨二十万斤米，现已发放大部，对被王逆金祥拆毁房屋无家可归者，则帮助木材砖瓦重建家园。

〔摘抄于原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四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第二版〕

筑先八、九、十三个区

诉苦清算分配土地

李海村地主、赤贫均已消灭

筑先县（聊城）八、九、十三个区的土地改革及诉苦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三十多个汉奸，恶霸地主已被清算。九区李堂村群众进行示威游行，斗了十一个地主坏蛋，全县土地改革仅才开始，目前群众的情绪高涨，他们黑夜白天忙着这件天大的喜事。

筑先（聊城）李海村，自实行土地改革后，两户赤贫和七十三户贫农都升为中农，有百分之七十的群众组织起来。筑先李海村是全区一个有名的村庄，土地改革前全村有二百一十六户人家，因受不了欠年和伪三支队迫害，逃往外村住的七户，下关外（东北）的有三十九户，实有一百七十户，每人平均地四亩左右，富农一、二户，平均地八亩，贫农八十一户，平均二亩多地，赤贫两户无地。村上的工作经过了回地，反奸诉苦和土地改革三个过程。回地时农会曾仅二三十人，经反奸诉苦和土地改革后，已经发展到二百三十七人。反奸诉苦和土地改革共计斗了二十一家，计约斗争果实小米两万另二百三十斤，麦子两万三千四百二十斤，土地一百三十六亩半，此外，献地者八家，共五十六亩三分。这次分

果实研究得很仔细周到，并充分发扬了民主商讨的方式，是分组讨论，集体表决。这些果实粮食是根据贫富等情况按等分，地是按填平办法分，即按每人三亩左右分，分时采取根据耕种方便和好坏地、高洼地搭配开，因此大家都很高兴，李海土地分配后，地主没有了，两户赤贫和七十三户贫农升成中农。由于农民分到了土地和粮食，故情绪很高，工作自动，各种组织也开展和壮大起来。参加各种组织的，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摘抄于原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四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第二版〕

筑先全县局面打开

十万农民反奸清算

筑先（聊城），结合反奸复仇掀起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二月五日到十四日十天内，全县各区初步轰开局面。运动开始，各地群众纷纷要求诉苦复仇，领导上适应群众的要求，用行政力量配合群众行动，惩办了最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三十几人，搬开了运动的拌脚石，活跃了群众情绪，打开了局面。作法上首先是召开农民会与积极分子会，进行训练动员，共训练四万余人，以小区为单位进行联合斗争，运动声势浩大，十万余农民卷入运动，并已开始获得利益。一区于十二日首先召开四千余积极分子大会，控诉葛海一带汉奸地主马风林。（在葛海斗争的）杨庄三十户就有二十八户诉苦，九区在九日召开了四千人的大会，斗争恶霸孙文章，群众并没收了他的家产。六区召开了六千五百余人的积极分子会后，十七日在南小区后军屯控诉全县第一号统治人物当过北京议员的奸霸聂湘溪，全县局面立即轰开。八区在侯营于十六日召开了七千多人的大会，控诉恶霸、汉奸马三祥，一位大嫂说："他搞死了我四个月的小孩，拉走了我十八岁的儿子，又活埋了七十多岁的老公公，把我家的东西全都抢走。"其他各区亦先后进行了联合斗争，轰开了局

面。

在联合斗争中，统一行动声势浩大，消除了群众的“变天”思想，压倒了反动势力，在分果实上也能解决小村贫土地少的困难，同时也帮助了落后村打开局面，但实际行动中都产生了几个问题：（一）先进村包办落后村。（二）富村的群众不愿叫本村的东西外出，同时地主为逃避斗争也想法把地献给本村，外村群众也感到斗了他村地主也分不了多少东西，斗争也就不积极。（三）本村的群众总怕对本村的地主处理重。对外村处理的轻。经领导上做了研究，除了大力进行“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教育外，确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在顾官屯一带，由各村讨论自报应斗的地主，除统一斗一部分大地主，统一分果实外，其余由各村自己处理。谭庄一带村庄，采取先由当村讨论，确定给贫村多少土地，多少房子，下余的不论斗出多少，一概归本村。全小区一般的仍是联合斗争。但那村要预先说明那一次斗争不需要去时，可以不去。以上这个办法群众都很满意。

〔摘抄于原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第二版〕

筑先局面轰开了

郭少英谈　张苏记述

筑先县（聊城）是冀鲁豫六分区新收复区土地改革运动进展较快的一个例子。运动一来，“村村点火，到处冒烟，”一个月的功夫，便轰开了局面，斗争地主三百余人。受到训练和得到果实的农民有十万余人（全县人口三十万）。被选为人民功臣的近万余人，其中有百余人被提拔为干部，约五千青壮年农民走上前线。被吸收参加共产党者约数千人。斗争气势雄壮，规模宏伟，特点是一面斗争，一面分田。其过程是这样：

搬石头

新收复区的农民，虽然急盼着分田，分粮，但他们慑于数年压在头上的大石头——地主的血腥统治，又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此，见到我们工作人员内心里热（要地），表面上冷（怕地主）。筑先县的领导深体民瘼，坚决执行农民的要求“搬石头”。大批干部下了乡，“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的政府布告与标语，三天之内贴满了全县的大小村庄，奸霸、地主是罪犯，农民分田是合法。每个区还捕地主二三百，全县“石头”搬了二千多。，地主心惊胆战农民扬眉吐气，社会空气为之一变！

农民大会高于一切

各区召开农民大会，五千、八千、一万的农民抱着千古罕有的希望来到大会“登底”。（看共产党的政策），大会第一天，民主政府将全区罪大恶极的奸霸、地主、枪毙一二人。演戏、扭秧歌、踩高跷，兴奋了群众情绪。干部深入群众中去，酝酿诉苦。第二天，宣布伪保长、乡长一律撤职，并将最坏者扣压起来。一二十个积极分子，在大会上首先诉苦，以苦引苦，全场纷纷要求诉苦，于是分为小组会普遍倒起苦水来，群情激昂，一致要求报仇雪恨，打倒地主。第三天，小组会上确定报仇计划，群众提出“打虎先打头”“砍倒大树有材烧”，每区规定斗争大地主五、六家。大会上通过后，当场选举临时行动代表会，组织纠察队，砍树队（该区烧柴极端缺乏，砍树是群众的迫切要求），自卫队等。大会宣布至此休会。群众回村，按照计划，分别进行联合斗争。这时干部兴奋，说这样象一把大火一样，烧坏了地主。贫农说：“一不做，二不休，鞋湿了趟吧”！老妈妈们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老汉们说：“改朝换代，兴咱了！”儿童穿戴上地主家的衣服，帽子，欢天喜地。地主说：“反了！抢了”！三五天之后各区完成了计划，分了果实，农民大会第二次召开。

第二次农民大会，来的人更多了，“怕抓兵”的老实农民，红男绿女都来了，差不多各区都是万人左右的大会。第一天，群众讨论各村的斗争对象，制“黑榜”。以村为单位的小组讨论，大家决定，群众把党的政策具体化了，最流行的口

号是地主就是罪恶，穷人就是道理。对中农是中贫农是一家，对狗腿子是带罪立功。对贫苦小村提出村帮村，邻帮邻，天下农民帮农民。第二天，选举人民功臣，在各村联合斗争中，凡是有一技之长的都可当选，斗地主狠的、挖破脸的、会宣传的，妇女参加斗争的……都是英雄。每区选出三百、五百、多者一千。英雄们做了农会、妇会的代表，对于这些人民的功臣，区上献花献酒、给以奖励。两天大会闭幕后，功臣在区上再讨论三个问题：（一）站稳立场，决不上地主的当。（二）为人民立功，公平合理分配果实，不多要一针一线。（三）养成民主作风，一切问题都要小组讨论，大家当家。散会后，众英雄个个磨拳擦掌，准备立功。农民也订“比武”计划（即立功），以村为单位“到处点火，村村冒烟”，复仇的火焰燃烧了各个角落。一改过去“重点突破，推动一般”的老方式，规模宏伟而迅速。农会突跃扩大，参加农会的户，占总户的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拥护毛主席，参加共产党

万民沸腾，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是救命恩人，这法子（分土地）多舒服呀”；儿童歌唱着：“瓜儿离不了秧，孩子离不开娘，老百姓离不了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参加共产党”，成为农民的要求。共产党区分委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讲明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的主张与做一个共产党员所具备的条件。会场上顿时掀起了波澜。农会会员说：“我还得再进一层（入党）。”老头儿说：“你们谁不在我也得在，不

然死了是个心病。”那些人民功臣，青年小伙子们，那里还捺得住，跳上台去问道：“我加入共产党够不够格？”从此，区分委的屋子里挤满了人群。最后据县上统计：约有五千个革命先锋参加了共产党。

人民功臣最光荣

十天左右的狂风暴雨式的分村斗争，暂告一段落，便进行第二次人民功臣的选举。首先各村选举，小村五、六人，大村二三十人不等，其中妇女约占三分之一，然后到小区竞选，最后召开区的人民功臣大会。标准有三：（一）斗地主狠，（二）分果实公平没多占，（三）实行了小组讨论，大家当家的民主作风。这比第一次功臣条件提高了一步，大刘庄被誉为放手的模范，前王村公认为公平分果实的榜样，该村干部成为大公无私的人民公臣。英雄模范为三等，县区发奖证；大匾，对联等，散会前，英雄们宣誓立功，有的说：“我贪污一粒粮食杀我的头”，个个带着立功计划光荣归来。各村锣鼓喧天接功臣，旗帜飘扬，功臣诗，状元榜，琳琅满壁，黑板上写着“向×××学习。”小学生写的功臣村村发行。小村贺大村，不忘帮助的恩。县府布告贺功臣，号召狠狠斗地主，公平分果实。提拔功臣当干部，每村五、六十人。一个卖豆腐糊口的贫农当了英雄，区长牵缰骑马游行，他说：“多分点也没这光荣”！这句话变成了每个群众的希望。

三点经验

"轰局面"阶段至此为止，经过约有一个月的时间（二月中至三月中），县上召开各区干部，村支部书记的功模大会。总结经验，选举功臣模范。他们认为以下三个问题得到了答案：（一）用行政命令，为群众撑腰，不是包办代替。因为运动初群众愿要土地因而害怕地主却不敢行动。这时我们用行政力量解除农民的顾虑，启发群众自觉行动起来，不是代替群众，而是起了收生婆的作用。（二）、农民大会是大胆放手，高度集中，是农民的最高权力机关。经过农民大会，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政策。并且群众又充实发展了党的政策，如"照顾"的问题、群众对不同地主、自有不同对策。（三）、不断的选模立功，政治上逐步提高群众（如斗地主狼，分果实公），组织上培养了骨干（如提拔了大批村区干部）。工作上树立起方向，大会提出全县三个方向：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坚决斗争地主的孙青殿方向。放手走群众路线、创造分地、春耕战勤结合大胡庄徐俊价方向。与贪污干部斗争到底的"两条路线"的孟继禹方向。专署当场提升孟、孙二人为区长，地委提升徐同志为区分委副书记。

目前全县在开展三种方向的基础上，迈上第二阶段，即农民打翻了地主后再踏上一脚。

〔摘抄于原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公元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二版〕

筑先训练积极分子
斗倒城关奸霸地主

筑先（聊城）城关区汉奸地主丁钦告被斗后，该村农会组织就急剧扩大起来。丁钦告的儿子从前在伪警察所做事，他仗恃汉奸势力，欺压讹诈群众，剥削得来二百七十多亩地。我军收复筑先后，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向恶霸地主算帐时，丁钦告企图逃避斗争，便先暗地里召开伪保甲长会议，决定叫贫农刘汉臣当农会会长，并派亲信许尚义送二斗玉米，给刘汉臣说："你干吧，亏不着你，有啥困难帮你解决，若'中央'军再来了，我保你是好人"。刘汉臣一时被他利用，当丁钦告被民主县政府扣押，群众还没分他的浮财，刘汉臣暗中先把一些细软东西掩藏起来，便虚伪的到这区里提出要分丁的东西，以便把丁放出，但未得到区里允许。县里办积极分子训练班时，刘汉臣也参加受训。明白恶霸地主剥削压迫穷人的罪恶，觉悟过来。于是把受丁利用的事情向大家表明，并表示："谁在给老丁掩护东西，不算人。"他当场报告了存放的东西，接着又争取许尚义，说明"穷人顾穷人回头是好人。"训练结束后，前菜市的积极分子回去即召开全街群众斗争大会。全体农民起来斗倒了汉奸丁钦告及十家坏地主。会后农会会员增加了五十多，妇女儿童组织扩

大，百分之九十以上户都参加了组织。

〔摘抄于原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版〕

筑先群众　治河防灾

筑先县（即聊城县）的赵王河，羊角河、周公河、新北河、长五十里的顺水道等五条河流，因日寇和汉奸数年盘踞失修，河道逐渐淤塞，每年有很多土地被淹。去年全县被水淹的土地达三分之一，造成了严重水灾。现在民主政府除拨款扶助灾民搞生产外，并积极动员群众治河，防止以后再闹水灾。全县大部分工作同志，亲自动员与织组全县群众，于四月一日即开始了动工。因治河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所以在挖河中，群众组织验工队互相检验，情绪极高。在八天内除周公河因河底有水没完工外，其余四条河流均修完毕，八天中共用工八万七千多个，挖土三十三万多方。挖完这五条河流以后，群众又提出复堤的要求，一区和五区的群众，要等种完庄稼后继续挖土治河。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版〕

筑先七区挖“防空洞”
中贫团结鼓励自报

上月二十七日，筑先县七区开农民大会，到会两千余人，首先由区指导员传达复查的基本精神是彻底清查地主后，中贫农分别酝酿倒苦水、贫农为什么翻身不彻底？中农为什么害怕，为什么不积极？双方讨论中明确了是因为地主未被消灭，在“一切罪恶归地主，面向地主”统一认识下，双方选出了代表、相互宣誓，团结复查。第二天领导上号召“自报最光荣”，“自报立功”，由先进带头二百二十多名，报出了地主存的衣服、粮食、家具等，很多人自报后受到献花、献酒，并记上功劳簿，群众热情和阶级觉悟空前提高，有自报两次三次的，自报中结合控诉。杨集老农会长张子贞说：“民国二十九年俺哥张子杰和赵春华、赵春洲他们在庄上成立农民互助会，地主翟文安、翟东镇勾通汉奸宪兵队，坐着汽车把俺村老少男女七十几个人抓去，东西一扫光，人在汉奸队受的罪没法说！俺哥哥被害死七八年，至今无音信”。接着戴桥阎玉明控诉该庄地主马洪鹿勾通汉奸三支队；谢庙王氏控诉地主杀人凶犯王金铭，并一致要求为死难者复仇，接着对贫富村问题，展开了讨论，掀起了自动帮助小村的竞赛，戴桥农会长阎玉清首先说：“俺庄送王楼一辆大车，一头牛，一个石槽”。散会后就

应赶快纠正。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九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第二版〕

扩大解放区　我军对敌展开
夏季攻势　打进堂邑城　逼走冠县敌

九日夜，我分区主力一部结合地方武装，向堂邑城急进，虽因当日下午落大雨，积水满地，道路泥泞，但我军仍排除行军艰难，按预定部署进击。十日晨四时许，我主攻部队秘密接近该城，并以迅速的动作攻入城内，上午十二点以前将守东门、南门之县保安一中队王兴安部、防守北门之道保安团一部全部解决。残部伪二中队与保安团一部分则固守许家大楼，拼死抵抗，我军一面围困该处之敌，一面继续肃清城区逃散之敌，随之我运输队在我军掩护下将大批资材粮食运出，至十一日晨三时，因情况变化安全撤出战斗。此次战果计俘伪代理县长（原警察所长）以下伪军一百五十多名，击毙伪军十余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二个，步枪一百余支，战马十余匹，粮食十万余斤，其他军用品极多，现正清查中。

十日下午四时许，聊城日军五十余、伪军二百余出发增援，在道口铺以东被我打援部队击溃，计生俘日军掷弹筒射手一名，毙伤日军七名（日军遗弃尸体四具），缴日式掷弹筒一个，三八式步枪三支，掷弹筒一部。同日下午八时，聊敌又纠集日军一百余、伪军五百余，再次增援堂邑，一路遭我袭扰打击，至十日早才到堂邑。

此次战斗中堂邑伪八中队四十余名，携步枪三十余支，举义反正，并配合我军作战。住南关的自卫团在我胜利影响下由其队长率领，人枪各二十余，也光荣反正，该两部已开到我根据地休息。

（原载《鲁西北日报》）

许家大楼强攻记

杨　杨

许家大楼是堂邑城内敌伪大队部及二中队的所在地。在第一、二两次攻打堂邑战斗中，都没有将它攻下，这更增加了这群黄狗子们伪军的坚守信心，伪县长及伪科长们也乘机钻到这里边保险，修补该处之寨墙，挖寨壕、设铁丝网，大干而特干起来，企图继续他们的血腥统治。岂知事与愿违，三层高的大楼并挡不住八路军的健儿。

七月二十日夜，我二团三、四、六连的勇士仅用十八分钟的时间，即一个比一个快的爬上了城墙，赶跑了伪军十中队。大部控制了东、西、南三面的炮楼要点，接着开始了对许家大楼的围困。这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各连都愿担任，但终被年青的第六连争过去了。他们几分钟爬进了围墙，很快的将该大楼围困起来。早饭后八点钟开始了白昼强攻，在一排全体同志投弹及十几挺机枪的掩护下，二、三排全体同志越过敌人的严密火网，竖上了梯子；第一个先爬上去的是三班长王心宽同志，接着第二个上去的是九班长安金 明 同志，第三个是三排长王金波同志，他们三个像生龙火 虎 一样，三分钟爬到了房上，又像铁人一样，在敌人的火网里，挺着胸膛，进一步爬上了大楼，特别是安金明同志，从房上向楼上爬的时候梯子断了，将他从一丈多高空跌了下来，他

好像没有觉着，又从地上抓住窗户爬上房去，再爬到楼上，这时三排全体同志已全部赶了上来，他们开始了向敌人进攻。西南角小炮楼之敌，向他们反冲锋的时候，被三排长一枪打倒了先头一个，这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枪，其余七、八个敌兵从窗户里跳下去跑了。当我们夜间把该楼围起来的时候，疯狂的伪军还象过去一样，骂叫，打冷枪；当我们开始强攻，第一、二、三个炸弹打到楼上时，敌人就不叫喊了，上层楼上的六个伪军，被缴枪后，其余的百十个，象老鼠见猫一样，站到屋子各个角落里，床底下，抖抖打战。素日威风凛凛的伪县长胡玉南、大队副车农青，及一群科长们，也同样藏在房子的深处，把二十响的匣枪放在桌子上，伏首贴耳的要求饶命，好象是后悔了！

战斗结束了，一百多象大烟鬼一样灰头灰脸的伪军官兵们，被六连同志们拥拥挤挤的从许家大楼内抓了出来，在外边看热闹的人们很不自禁的鼓起掌来。"六连同志真行"！

城皇庙住的伪东道保安第二团一营，一百八十余人，看到我们这样英勇，吓破了胆，吓的顺顺当当的交出了所有的武器，（机枪一挺，掷弹筒三个，步枪一百七十支）在副营长谢佃元的率领下向我们投诚了。

在进攻许家大楼中，六连全体同志一致要求担任主攻，新老同志都有不完成任务不回来的决心，为了表示这个决心曾预先发动全连签名盖章，并向全团提出挑战，战斗中普遍发扬了轻伤不下火线的光荣传统。负轻伤不下火线者有：副连长魏焕廷，一排长曹冠朝，二排正副排长田荣贵、胡金秀，班长王心宽、安金明、李学雨，战士赵金海、刘士山、马振江、刘凤春、赵明海、张凤云、等同志。因有这

样旺盛的战斗士气，所以才摧毁了敌人的坚固堡垒。

（原载《鲁西北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堂邑东关伪军自卫团被歼灭

杨　杨

堂邑东关据点，是伪三区长江克敏的自卫团驻地。提起他来，堂东北的同胞，一会有说不尽的深仇大恨，他跟齐子修干的时候，杀人放火先不说，就拿编成三区自卫团以后来说吧，夜间出来，牵牛架户，杀人放火是经常的小事，他们还有最恶的杀人方法，就是捉住拿不上给养的老百姓，或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就要活剥皮，进行示众、威吓我敌区同胞和抗日人员。被其活埋和活剥皮者，算起来不知多少。最近他们为在东关修钉子，将东关的民房一气拆了三分之一，造成了东关数十户同胞，流离失散没家可归。被抓来的伪兵中，有两个怕我们的大炮打死，说了一句："交了吧。"被他们的张小队长听见了，马上提鬼头刀过来，一个砍断了右臂，一个砍断了小指，要不是跑的快，也就送了性命。

我们将城里的敌人全部肃清后，仍本着宽大的精神，争取他们交枪。他们不但不交，反而骂人，打冷枪、封锁道口，大喊大叫，直到我们用大炮轰击，开始进攻时，他们其中的特务班，在张小队长的指使下，仍以钢枪、砖头拚死的抵抗。

太阳将要落了，这群欠下人民血债的饿狼们的寿命，也将随着这个时间死亡下去。轰！轰！七发在敌人手里夺来的炮弹，在炮楼上、寨墙上、围子里炸开了。随第一炮的开

头，南门小楼塌下了半边，防守该处的三个"该死鬼"，随着爆炸声被炸塌的半边砖土埋葬。接着又来了三个拿板堵缺口的"送死鬼"，也随着从原处打去的第二炮，肉飞骨碎。第七个冲锋炮响后，早已等心急了的一、八连勇士们，开始了强攻，炸弹和机枪的火力，一阵狂风急雨似的同时展开，八连从南北还没有竖上梯子，一连从西南角已冲到围子下面，指导员李克纲，连长孔筑亭和许盘礼三同志，冒最大的艰险扶住梯子，九班长王清江同志第一个爬了上去，赤着背，顶着钢盔，背着枪支、弹药，雄纠纠的杀向敌人。一、八连英雄们也紧跟着一气跑了上去，他们排除了敌人的炸弹、乱枪、红枪、砖瓦的封锁，飞速突进了围寨。一股从上面向东、北压缩敌人，一股在院内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此时，赵鹤亭团长、齐副团长、何营长，马、赵两副政委，贾卫生队长等也提枪爬上围子助战。英雄们齐声呐喊，伪军们爹娘的哭叫嚎啕。城墙上、屋顶上、围寨外，树头上跟着爬上来贺彩的观众，使整个东关震动。人民的愤怒忘记了生死，一个个争先恐后的爬上了围子助战。人民的怒火，燃红了天空的浮云。又肥又胖的敌张小队长，手持红枪，乱打乱刺的阻止我们前进，却被英勇的王清江、郭子纲等同志将他的红枪夺了过来，一个反刺，结果了他的狗命，替人们出了第一口气。刘治明同志一气挑了五个，王凤山挑了五个，卫生员×同志也杀红了眼，用刺刀刺伤自己一个穿伪军服认不清的战士。在追击逃敌中击毙了五个欠下人民血债的饿狼。其余二十九人，放下武器，在八路军宽大俘虏政策下得到活命。太阳落了，休息不久，敌伪的东关据点，燃起了熊熊烈火，素日号称顽强的自卫团，从二十一号的黄昏，一律勾消

了（一个没跑掉）。观众与勇士们押着俘虏，满面含着笑容，喜气洋洋的走进堂邑城的东门，堂邑城完全拿了下来。随着战斗的结束，人们的舆论传遍了堂邑城。

（原载《鲁西北日报》）

分区部队再接再励
堂邑全部解放

辛　人

二十日二十四时早，我分区主力×团六连再度攻入堂邑城，突进后逐渐肃清城墙上敌人。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开始强攻伪县府及大队部驻地——许家大楼。经半小时激战即突入小圈子，将敌伪全部解决。俘伪县长胡玉南，伪大队副车农青以下二百余人。长短枪一百六十多支。第四连攻西南炮楼，在上午十时许将炮楼攻克，击毙伪军二十三名，鬼子顾问（或指挥官）一名；缴步枪二十二支，掷弹筒一个，盒枪一支，电话机一架。下午二时半住城隍庙道保安二团 第 一营，共三个中队一百八十余人，在我军事胜利的政治攻势影响下，由副营长谢佃元率部携带步枪一百七十余支，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三个反正。至此城内敌人全部为我肃清，堂邑为之光复。当我攻城时，伪另一大队副张双令，率七中队与十中队一部越城逃窜，至二十二日该大队副在我胜利 影 响下，亦率部下一百余人，轻机枪二挺反正抗日。至此，堂邑全境，除东北边境梁水镇伪三区自卫队团江克敏残部二十余人，依博平伪军苟存外，全部已无敌踪。在攻势进行中，聊堂、武训两县慰劳队，在炎热的日光下，结队越前线慰劳。白鬓老太太和少妇，竹篮中提着鸡子、包子、水饺，青壮年

挑着整担的西瓜，赶赴前线慰劳我军。我军于二十三日休息一天，转锋东向，将沙镇敌据点包围，很快攻入大围子，先后解放民夫二百十余人，已将敌压缩在碉堡内。正在进行土工作业，要叫黄狗坐土飞机，彻底消灭汉奸郭培德！

（原载《鲁西北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堂邑战斗素描

张 恩 曾

（一）泥泞中行军

为了纪念“七·七”，我军分区发动二次进攻堂邑城。九日夜，大雨才止，路实在难走，满沟是水，稀泥一踏脚脖子深。三十五里路，走了整整一夜；大多数同志把鞋掉到泥水里，光着脚走，因为有打仗的热情在心里沸腾着。所以一点也不表示痛苦与疲劳，到堂邑城边时已是十日的拂晓。

（二）第一炮打响了

二十四团五连攻东门，五连还没有打过仗，这次攻堂邑的全体同志都表了这样的决心：头一炮要打响，一定夺机枪！杨世周同志领着突击组马名太、高风江等十一位同志，上好了刺刀，带好了手榴弹，愤愤地渡过城壕三尺深的水，把梯子竖在城墙上，杨同志提着手榴弹，首先爬到城墙上，别的同志也紧紧跟了上去。这时城门上的伪军，都正在睡大觉，杨世周同志勇猛地进了小屋，“谁？”一个伪军睡醒了，问了一声就想坐起来，“啪”地一声枪响打在他的脑袋上，“啪、啪”，惊醒的四、五个伪军坐起来，又都被打倒

了。一挺机枪、一个掷弹筒、二十七支步枪到了杨同志手里，东门上的伪军全部被解决。十一位同志欢喜极了，一面派人看守俘虏，清查胜利品，又继续向南门进攻。

（三）北门也拿下了

我马支一中队主攻北门，二排副排长吴堂同志为突击组长，他们抬着梯子从北门东边爬上去，墙上一个站岗的也没有，随通知后面队伍赶紧上。他们下到里面，直摸城门下面，一个伪军正在城门上站岗，"哪一部分的？""八中队！"敌人被我唬住了（伪军有个八中队，于这次反正了），到跟前就被我们抱住下了枪，屋里的伪军还正睡觉，当我们把枪完全搞到手里，随后到了城门上，三个伪军才发觉，三个家伙不打枪，扭头就向东跑，"把枪放下！"我们一中队的全体同志都上了城墙，三个家伙没往回跑，把枪放在了墙上。十一支步枪，一个掷弹筒，一支手枪到了我们手中，没费一枪拿下了北门。

（四）慰劳

武训县辛集附近有六个村的农会代表、姊妹团的代表、儿童团代表共同组织的前线慰问团，于十日午后到了城内，把鸡子、桃、洋烟、果子等慰劳品亲自送到战士手里说："老百姓都知道同志们英勇，打进了堂邑城，不顾一切地来挽救百姓……。""同志们为国家，为百姓拼命流血，我们很是下不去，所以大家捐了一部分东西来慰问诸位同志，希

望同志们把敌人都消灭掉。”有的战士被感动得流下泪说：“如果不把敌人完全消灭，真对不起百姓！”太阳快落了，慰问团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城去。

大车、小车、驴都在东门里装运粮食，成群结队的老百姓简直高兴的发疯了，“抢的我们的粮食也该还我们！”“欠帐的总有还帐的一天！”他们吵着、问着，好象忘记了西边还有敌人存在，赶会似的来来往往满装粮食，一直忙到天黑。

（原载《鲁西北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农历六月二十日）

火线上的慰劳

冯　守　愚

七月十日，我军攻入堂邑城。与城内许家大楼之敌伪相持的时候，武训三区辛集一带七个村庄的老百姓组织了慰劳队。慰劳队有农会员、妇女会员和儿童团，有的在后方担任职务，慰劳队有一百多人。儿童团在前面打着小旗，唱着歌，妇女们拿着鲜花和果子，壮丁挑着五大担子慰问品（约三百余斤）。沿途村庄的群众不断的参加和欢送。走到堂邑北关时，看见有一列列的大车向外拉粮食，一排排的军队在城头上围着城内楼上的敌人射击，儿童们高兴的跳了起来。虽然冷枪、流弹不时在头上飞响，也没有一个人觉着害怕，部队里郭同志带着慰劳队跑过大街小巷，穿过通墙断壁，又穿过两道封锁线，才在跟敌三十米远的阵地上，与我们英勇杀敌的战士们见面了。

战士们看见父老兄弟姊妹和幼小的一群小弟弟也忽然跑上了火线，顿时兴奋了，战斗的疲倦消散了，个个兴奋的和生龙活虎一样，妇女们，儿童团向战士慰问握手、献鲜花……，双方都有说不出的亲切热情。当妇女代表卞同志向战士慰问时，战士们的面上流着热泪，异口同声的举起了拳头，表示一定要用战绩回答父老们。在火线上是不允许多时逗留的，于是大家就在啪啪的枪声中恋恋不舍的分别了。当慰劳队出城的时候，天上早就没了太阳，在乌黑的归路上，

听得城里机枪和手榴弹响成一团，城的上空着起了通天大火。

（原载《鲁西北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堂邑战斗中

武训进行火线慰劳

二十号的下午，攻打堂邑的动员令下了。武训南边几个区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黄昏前，干部分头到村传达任务，动员慰劳。这时村干部——村长、农会长、队长、民兵及妇女队长，都各自进行了分工，大家活动起来，自卫队忙着绑担架，筹给养。八点钟动手，接着向前线出发，有的区离火线二、三十里地，十点左右，大家都到指挥部集中了，大家心里都在跳动。

担架队开赴前线，家里忙坏了群众团体的干部，他们组织了慰劳募捐团，挨家挨户的宣传募集，大家感到上次堂邑慰劳多是生东西，在战场上战士无法做，更不能吃，所以这次大家赶做熟礼物送给前方战士，各家在村干动员之后都忙着杀鸡、烹炸东西、摘瓜、煮鸡子……，有的半夜即想去火线慰劳，经村干阻拦才等到天明出发，最晚是早饭后出发，男男女女，一批一批的慰劳队，穿过敌人的火线，赶赴前线。最先到的是三区东部七分团，他们都是灾荒区群众的代表，他们虽然叫敌人弄的少吃少喝，但是因不愿再受敌伪的遭蹋，恨不能早叫我军拔掉它，所以把自己家的小鸡杀了，虽然买不起材料，用盐白水煮熟了也送往前线，下余黄瓜、果子一篮一筐、在炎热天气下，有的白发苍苍六十多的老人也跟着去前线慰劳，他们不怕艰险，当走进北关时，那时城

西北角，与城北面敌人还未被消灭，所以决定派通讯员先去验一下路，可是他们总是不让去，他们说："不要紧，去吧！"人家同志们整天在枪林弹雨里过活，咱过一趟就碰着啦，快走吧！同志们打仗打的都渴了，饿了，再晚就对不起他们了！因此，他们一直到最前线，把瓜交给战士们吃，战士们接到自己家送来的礼品，吃得很中意。一、五区都是以区为单位去的。特别一区慰劳队组织的好，最前边是一排整整齐齐的民兵，刺刀亮亮的，并挂着鲜明的大旗，写着一区部第一慰劳团，后边是群众代表，工、农、青、妇，最后是礼品，真是一批很好慰劳大军，一群群地从南向北往城里拥过来。指挥所，团部的门前摆满了慰劳品，堆的象一个集市一样。前线×营长出来向慰劳群众代表致谢，并代表全体战士表示坚决彻底消灭堂邑的敌人。

（原载《鲁西北日报》）

随 军 记

——堂邑战斗通讯

阮贯之

这次堂邑战斗，二十四团担任主攻任务，虽然经过长行军，但战士们的勇气，却鼓得很足。他们在夜间冒着雨，踏着陷泥也不觉疲劳。五中队的勇士们是先锋，他们首先攻占了南门楼，把守楼伪军缴了枪。同时一中队二排长夏登潮，在战斗中也表现了勇敢、机智、灵活，并能领导全排完成任务。二连长申怀中在战斗中是一贯的勇不可挡，不怕一切，对机枪的掩护起了保证作用。四班长刘振华真是个浴血战斗的英雄，他在火线上腿上两处挂花，鲜血流在地上也不哼气，不上药，许多人劝他，他却说："这伤不要紧，子弹穿的是臀肉，我下去怕完不成任务。"又经石支书及排长再三劝他，还是没有下去，结果，他带伤得了一支枪，教育影响了其他受伤的同志，感动的同班战士都说："在战场上咱们得学刘班长这劲头，他真是一个杀敌英雄。"

这次二十四团预先的战斗动员很好，战士们都知道这回首长给的任务是全团建军来的最大任务，这一炮一定得打响，不能丢人，影响咱们的扩军，并且我们得向其他团比赛学习。所以这次战斗中缴了伪八中队全部的枪，解决了警察所，新民会等伪组织，得了一挺机枪，四十余支步枪，其他

军用品也很多，全团的同志们个个都露着胜利的微笑。

堂邑城被我攻入后，记者即随军入城，在城内视察了一遍。沦陷六半年的堂邑县城，让敌人践踏的破烂不堪。首先到了武训中学，鬼子曾在这里安司令部，里面破坏得很厉害，一堆一堆的砖瓦，四角高筑着炮楼，校门上写着“皇军驻堂司令部”的痕迹仍模糊可辨；高等小学也被敌人破坏的不堪入目，除砖瓦及木材之外，找不到其他的东西；十字街的商铺买卖全关门大吉，还有堵门逃外者，原因是受不住敌人汉奸的敲榨。皇协军买东西不给钱，如说一句没有，就打人，或给你戴上一个“通八路”的帽子，所以一些善良的商人都逼得关门逃外，再加上警察所、新民会的敲榨、剥削，怎能受得住呢？不是说你的货未登记，就是说你的货资敌（对我们而言），再加上鬼子票，现金比擦腚纸还不如（麦子一千余元一斗）。一个开小饭馆的对我说：“买卖是不能干了，一天到晚卖不了钱（指没乡下人吃饭），全是些汉奸皇协，吃完了饭嘴一抹就走，半个月里讨不出钱来，凭支票又这样毛，有钱买不出东西来。”城里的住户也是受着同样的痛苦，十之七八都从家逃外，房子拆了很多，破烂不堪，整个城呈现着一片荒凉的景象。我和房东主人谈了谈（姓张的），他说：“别提啦，城里的老百姓真难过，乡下人都知道城里人动手得用钱，可是自被敌人占住后，指望做买卖不中，指望地又不行。就今年来说，麦子收了斗儿八升的，汉奸每顷要十六斤麦子，加上别的摊派怎能受得住？！整天价出夫不给人留空，修工修得不好，不是打就是罚，最近把城里的壮丁（二十余岁的）皆编上了，训练，听说要往太平洋开。我的二小，为了这就跑了，把我抓到警察所押了九天，把二小

叫回来才算完。年轻受训的小孩子都攥着一把汗，害怕得很，背地盼解放军来打城，全盼红眼了，听亲家朋友说："八路军的地面（指根据地）老百姓再好没有了，这里的贼味俺算尝够了，只有八路军才能救俺，汉奸贼子都是为自家，拿着庄稼人一草不如，八路军才真是我们的靠山。"

由此可见，堂邑城里的商民在敌人的铁蹄下过的是地狱生活。

（原载《鲁西北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万余群众索还八年血债

武训四区摧毁奸霸统治

武训四区反奸霸运动猛烈展开，一月来已有四十二个村庄，三万五千群众卷入斗争，彻底摧垮了奸霸统治；群众历来所受损失获得赔偿，收回了应得的土地。该区八九十来受着敌伪顽霸重重压迫剥削，早已民穷财尽。抗战后，伪吴逆连杰即到达该地，以组织义勇军之名，行土匪、汉奸之实，抓兵抢兵三千余名，霸占群众土地三千余亩。恶霸地主们除高租剥削群众外，并与吴逆勾结，残害群众，贪污自肥，枪毙之无辜群众在三千以上，去秋区始获解放。今春曾普遍进行减租、减息、增资运动，三百多个工人和一百五十家佃户初步得到果实。最近又开展猛烈的反奸、霸运动。首先在柳林镇打倒了伪团长杨广润和恶霸赵敏齐等十六人。而后，在垢固镇自称“皇帝的黄家和‘军事’的刘家等两大恶霸先后被打垮；群众说：“现在是咱们的天下了。这个基点的运动胜利后，立即推动了全区，摧垮了奸顽统治。镇压特务破坏，群众收回了许多被榨取的财物。现群运已将近结束，正在清理果实，整理各群众组织，改造财政权中。

（原载《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六日，第二版）

武训李大庄等村

耐心说服群众，坚决补尝中农

马景汉

在开展春耕大生产中，八区李大庄、双庙，进行了团结中农与解决扫地出门地主的问题，得到几点经验：（一）对弥补中农损失，取消“被斗户”名称，坚持团结中农，得到群众的拥护。贫农说：“补偿中农损失，马上就能使中农和贫农和好起来，同时也把贫农怕上升到中农被斗的思想，和新升上中农害怕被斗的思想一下去掉了”。可是对今天“仍表现不低头”的被斗中农不同意补偿他们的损失。这时候，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中农政策，又要耐心说服群众，再三向群众说明他为什么“不低头”，中农本身没有剥削，他的东西都是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和地主根本不一样，所以被斗自然不满，这是因为过去斗错了，这样使贫农才逐渐认识了团结中农政策的正确，表示坚决执行。（二）过去斗争中农是村干领导的，今天一提出弥补损失，村干很难打通思想，他们怕被斗中农联合起来向他们进攻。李大庄武委会主任说：“俺村没斗着中农”，他想用“没斗争中农”达到不弥补中农损失的目的。经过领导上一讲，和贫农会上划阶级，过去划做了许多，所以对村干部这个思想也作了耐心的解释，这样错了中农只会高兴，决不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攻。（三）扫地

出门没法维持生活的地主填补一些土地，说明这是为了发展生产，使地主不再过剥削的寄生生活，免得他们走坏路，对农民不利，决不是地主立场。双庙贫农说："不给地主点地，到秋里麦里他又该偷咱穷人的庄稼啦；要饭也是剥削咱；还不如分给他点地哩"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版〕

武训农民齐换脑筋

武训在大检查运动中，及时提出“换脑筋”，以提高群众觉悟。农、妇、民兵，村干各组织都举行了“思想会”，以算账办法回忆过去比比现在，明确了眼前这时光，都是共产党给的。在大纸坊头小组会上，老汉曹振堂说：“俺五口人九亩地，汉奸在时地卖了，逃荒了，共产党来了，九亩地赎回来，三年收了十八石粮，又分了几亩地”。经过这样算账，群众觉悟提高，接着掀起互相批评的“洗脸会”。检查自己办过那些坏事，纸坊头村村长反省说：“我过去有些贪污”。农会长反省浪费了斗争果实，中农曹成珠说他企图免出差，想把牛卖了，经过这次反省，已达到了群众自觉的大团结，巩固了组织，又自觉的进行了宣誓，许多人说：“日子是共产党给的，毛主席是咱们的当家人，老蒋来了，一齐和他干到底”。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七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第二版〕

武训某些村庄

依照填补精神　重新分配果实

冀南土地改革检查中，果实分配不公的村庄，都在重新进行分配填补。武训房屯村去年反奸诉苦中追回土地一百余亩，麦子三十七石多，当时分果实时，要麦子的不能要地，贫农因为没吃的，多数只分到麦子，土地大部分落到中农手里，会外的贫农一点也没分着。经过检查，耐心的进行了教育，并在各小组进行了酝酿讨论，中贫农都同意把多分的土地交出来分给赤贫。结果三十一户贫农每人填平标准地三亩，中贫农之间更团结了。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第二版〕

武训村干响应党的号召

自动退出多得果实

武训翻身大检查中，许多群众由于村干积极分子响应区党委号召，纷纷退回多得果实。一区温集村干在分果实时自己决定提奖办法，共提奖二十余万元，经过领导上教育打通了思想，已向群众认错，退出了多得果实，二区王信村村干私用果实款，私借地主富农棉花开联合合作社，亦已交由群众经管。前王庄经过检查，未分得的一百八十五亩地迅速分给贫农，并抽出八万元果实款分给贫中农，在“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号召下，送给后王庄贫农土地二十五亩。五区大纸坊头村干私用果实成立合作社，所有果实迟迟不分，现合作社已转入农会全部果实（七十三亩地、五十万元），已分配下去，全县赤贫已消灭。因为对村干，积极分子把分得果实退给农民，农民情绪大大提高，大纸坊头清理果实后，紧接着进行了翻身大反省，出担架时人人勇跃。四区不脱离生产的干部除刘影武外，其余干部都贱买了斗争果实，还有两个干部分了群众的果实款，因此动员村干积极分子退出多得果实工作难以进行。全区干部经过反省，决定先清理自己，再领导村干部退出多得果实。清理的具体办法：(一)登记干部买的东西，买的方式，什么时候，何村的。（二）原物坚决退回，坏者应按市价赔偿。经过评议，村干部退回了衣裳二

十六件，木器十三件，增价赔偿一万四千六百元。问题解决了，干部也觉得很愉快。××村干集体贪污了九万元，在区干退出果实影响下，也全部拿出来。刘培田拿出好棺 材 一个，以前失掉的衣、被、皮箱七百七十八件都找出来。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第二版〕

武训村干纷纷自退多得果实

武训袁庄有八十户人家，三百多口人，去春在查减运动中检查，发现农会长乔仲奎管理村财政，多分了果实，并和自卫队长独占一磨轧车和一头大牛，群众反映："在村里闭着眼换一个人当农会长，也比乔仲奎强"。了解情况后，教育他向群众承认错误，并把多得果实全部退出，群众很满意，该村工作已活跃起来。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公元一九四七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警惕敌特不法地主
组织暗杀组暗杀我区村干部及人民

杨凤云

自高五投敌后，不断向我二、四区根据地进行抢 掠 杀人。并收留敌特不法地主组织暗杀组，对我二、四区人民及抗日积极村干实行暗杀，在最近五、六天内已实行了四次。第一次，当我二区干部王凤先同志在夫人寨行动时，被王二寨敌特张九图带领两个武装汉奸企图暗杀，首先由张九图叫王同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谈话，正走着，敌特对准王同志"啪"一枪，幸亏打在衣服上，王同志看事不好，用自己的匣枪对着那两个汉奸"啪啪"两枪，汉奸跑了，又对着敌特张九图"啪啪"两枪，张被击中受重伤滚往高梁地内，王同志接着又是一枪，打死了敌特张九图。

第二次，当二区干部霍鲁奎同志在他本村晚上到村外去玩时，被敌特发觉，敌特对着霍同志就是一枪，幸亏是一个皮火没响，霍同志随即对敌特回了一枪，可惜也是一 个 皮火。

第三次，当二区干部王在学同志到邓官屯工作时，被该村的敌特发现，想把他活埋，并找好了绳子，幸亏有忠实抗战的群众告知，王在学同志才逃了生命。

第四次，武装汉奸十余人（邓官屯人），准备到邓官屯

南抢掠东西，以便实行暗杀，临走时将梅二庄模范社员捉走一人，捉走一个跟他有仇的老百姓。以上发觉的不法行为，我二区正在调查中，现在已经捉住三个坏蛋送交政府处理，此事希各区千千万注意。

（原载《鲁西北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 三 十日）

注：文内二区，指武训县二区。

武训深入运动进行翻身大检查

武训深入运动进行翻身大检查，健全组织，开展时事教育，为全面抵抗胜利奠定基础。

武训开展运动的村庄占全县村庄的百分之九十，领导上除组织力量突击落后村外，现在深入运动，进行翻身大检查，整理组织，加紧时事教育，为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摘抄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公元一九四六十月十七日）第二版〕

武训四区教育村干

重新分配果实

武训四区在深入查减运动中，发现村干部过饱现象相当普遍，领导上决定重新检查果实分配。全区五十二个村，大部分村庄没分果实，或分的不公。如倪屯村村干随便以低价买斗争果实，自卫队长除要了好多零用东西外，又要了一口好棺材 转卖给别人换了一处宅子，群众纷纷反映说："再也不斗啦！有熬的夜，没吃的食，经常跟着斗，大小东西得不到一点，还干个啥劲。"形成了村干与村干，村干与群众相互之间的矛盾，群众消沉，组织涣散。领导上根据该村情况，决心把果实合理的分配。首先教育干部，打通思想，按没啥分啥的原则重新分果实。地一律从下往上补齐，浮财都作成价划等分配，这样一来家家都分到了果实，人人都高兴。

〔摘抄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公元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第二版〕

武训各区
深入检查解决悬案
纠正脱离群众现象

武训各区深入检查，及时解决农村悬案。根据县委会再次指示，彻底解决农村中悬案，合理迅速的分配斗争果实，争取春耕前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精神，武训五区大纸坊头村干部根据群众分果实的迫切要求，连续召开村干部会、小组会，打通思想，将全部果实（七十五亩地，五十万元），按阶层合理分配下去，彻底消灭了贫农，群众非常兴奋。接着进行了翻身农民大反省，积极完成战勤工作。一区张屯小区代表主任李莹玉经反省检讨，深刻了解由于自己作风硬，工作遭受很大损失，表示以后办啥事得和大家商量，并要求会员多提意见，多提批评，建立了定期汇报制度。二区前王庄在检查反省后，全村群众经小组讨论，坚决送给后王庄二十五亩地。六区大陶庄通过小组会打通会员思想，坚决将浮财一部分给中农，全村中农非常满意，不少中农参加了农会，八区自接到县委的指示，全区区干首先进行检查领导，大家致认为必须深入细致的处理各村悬案问题。小区领导形成各霸一方、互不研究、个别村代表脱离群众，自私自利，都

将车、牛、石槽等送到王楼。在“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下，到会的人都决心回去广泛开展立功自报运动，使穷兄弟一起翻身。

摘自《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读 者 校 正

对《聊城县党史资料》第一期《我党和范筑先合作发动鲁西北抗战的经过》一文的订正

耿　荆　山

最近在《聊城县党史资料》第一期上，读到用张维翰同志遗作名义发表，由姜克夫同志整理的《我党和范筑先合作发动鲁西北抗战的经过》一文，在该书第二十四页第八行中有，第三师范在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胥子君（系之误）和耿毅（系书之误）的领导下……”一段，我感到这里有错误。胥子君本来是个国民党员，又是学校的训育员，怎么会成了共产党的地下支部的负责人呢？特向你们提出作必要的更正。

我是一九三三年夏季到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先任图书管理员，后任教务员。当时的校长是孙芳时。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三年多，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被解职离校。

一九三五年五月在三师经学生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钱杰东同志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在该校的三年半中，对学校中的进步教师和学校的思想倾向，政治活动，一般是熟悉的，有些事情，地下党都随时向我打招呼。

胥子君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寒假后到三师当训育员的，因同在一个学校，生活工作不断接触。胥子君曾对我说过："他是聊城人，家在聊城西南沙镇附近，曾在武汉大学读书，参加过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曾参加过南昌暴动。"他还说："自己现在是国民党员，来三师后在聊城国民党县党部办了党员登记手续。

那时学校训育员的工作性质——掌管全校学生的思想动向，这是人所共知的；还监视全校进步教师的革命活动，随时向当地国民党县党部汇报。关于在学校监视和反对进步学生等事，也都由训育员掌管。

一九三五年一月寒假后三师相继用不挂牌方式开除了（或叫勒令退学）两个共产党地下党员学生申景玮（即申云甫）、王连级（即王晋亭）和进步学生李士杰（即李士钊）等人。事是从胥子君检查他们的信件和所取特务学生的汇报作根据，由胥亲自经办的。三个学生的先后被开除，在教师和学生中影响很大。这些事情虽然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是经历了这些政治事件的进步教师和同学还是记忆犹新的。

一九三五年秋季，三师训育主任，国民党员徐星坦去职，接任的训育主任叫蔡银之，胥仍任训育员。一九三六年冬，三师校长孙芳时去职，全校的行政人员统被换掉，唯有胥子君留下仍任训育员，直到"七七"事变抗战爆发。

以上是我了解的胥子君的情况。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于泰安

对“聊城市党史资料”第四期的更正

目录第3页倒数第五行“消沉面局”应为“消沉局面”；

8页倒数第十行“蠢事”应为“蠢事”；

34页第五行“隋”应为“随”；

34、31页及目录第1页“周乐享”、35页“周乐享”均应为“周乐亭”；

42页第二行“展春堂”应为“展书堂”；

51页第四行“陆蠡”应为“陆诒”；

55页第七行及倒数第四行“李莹”应为“李瑛”；

86页正文第三行“爱国人士”应为“爱国人士”；

96页倒数第十行“战斗剧壮”应为“战斗剧社”；

102页第八行“攻权”应为“政权”；

115页第七行“迁徒”应为“迁徙”；

127页第九行“始络”应为“始终”；

128页倒数第三行“逢”应为“奉”；

187页第十行“负责人孙笑仙”后应加上“后为翟乐民；一处是刘皋分校，四七年后迁往沙店集，负负人许肖梦，”；

196页第六行“伪军部郭培德”应为“伪军郭培德”；

２０９页倒数第六行“不原”应为“不顾”；

２２６页第三行“大叫”应为“不叫”；

２３４页第四行“誓卫排”应为“警卫排”；